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53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不需要的战争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多人译　　薛鸿时选编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不需要的战争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多　人译　薛鸿时选编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不需要的战争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多人译　薛鸿时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插页5　字数276,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4450册
ISBN 7-5407-0747-0/I·624
定价：5.60元（平）
　　　8.20元（精）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10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重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任何文学奖的颁发都不能不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自不例外。它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

麻烦，不时会引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 50 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局限，有时囿于某种政治偏见或地域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 1901 年开始颁发，到 1991 年止，中间有 7 年因战事未授奖，有 4 年每年授予 2 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为 88 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 5 大洲 30 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 12 人，美国 9 人，英国 8 人，瑞典 7 人，德国 6 人，意大利 5 人，西班牙 5 人，俄苏 4 人，挪威、丹麦、波兰各 3 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 2 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 15 国各 1 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 2 位，而北欧却有 12 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与实际相去较远。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憾（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敌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犯“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鲜为人知，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

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专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

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典文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贵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读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

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塞菲里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

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请著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了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着比今日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称。我立即说：“不需要的战争。”①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战给世界以重大的破坏，留剩下来的东西，在这次大战中又给毁光了。现在，在亿万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并取得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在比我们曾经终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险更为严重的危险之中，这可以

① 原文“The Unnecessary War”，中文旧译“非必然的战争”，可参考。

说是人类悲剧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①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1948年3月于肯特郡恰特韦尔庄园

① 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序言。

·译本前言·

特殊的得奖人

薛鸿时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范围有时并不十分严格地限于纯文学领域，著名历史学家蒙森、哲学家奥伊肯、柏格森、罗素分别在1902、1908、1927、1950年得过奖，1953年丘吉尔也得了奖。丘吉尔是又一位特殊的得奖人，齐凡尔茨院士在颁奖辞中说：“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丘吉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既写小说又作画，还会砌墙，就连他养的猪也不止一次地在伊登布里奇的展览会上获奖①，但是他主要的身份还是一位政治家，并且长期处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西方评论家对他的赞誉是不遗余力、毫无保留的。1950年《时代》杂志把他选为“本世纪前五十年的伟人”，尼克松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②。对此，我们无意于随声附和，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像丘吉尔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概莫能外。丘吉尔是英国大贵族马尔巴罗公爵七世之孙，年轻时曾在古巴、印度、苏丹和南非积极从事殖民主义战争，二十六岁时当选国会议员，在历届内阁

---

① 〔英〕佩林：《丘吉尔传》，中文本，1988年东方出版社，第437页。
② 尼克松：《领袖们》，中文本，1984年知识出版社，第9页。

中先后担任过九种重要的大臣职务；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他就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且他的这种顽固反共态度是至死不变的，1946年他在富尔顿的演说中公开使用“铁幕”一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对于上述的一切，任何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士总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吧！

然而，我们认为丘吉尔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也是他著述事业的高峰，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他作为首相兼国防大臣领导英国人民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丰功伟绩，尤其应当赞扬他早在战前很多年就已认清纳粹主义的本质并且不知疲倦地予以揭露的远见卓识以及在英国被迫单独作战的危急关头誓死战斗、决不屈服的英雄气概。在希特勒悍然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大举侵入苏联国土时，他从世界大局、从英国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不顾意识形态的分歧，毫不犹豫地立即促成与苏联的伟大同盟。对于他的这一方面，即使是斯大林也赞扬他说，“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首推他”，他是“百年来才出现一个的人物”①。

我们认为，选择他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丘吉尔的代表作是比较恰当的。这部回忆录卷帙浩繁，它的最大特色是：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函电以及他个人保存的档案材料，尽管选材、叙述、评说不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带有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难以避免的偏颇和局限，但在许多方面仍然较好地反映了重大历史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文本，第6卷，第315页，1954年伦敦卡塞尔出版社。

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例如对于英国的失败与挫折（韦维尔和奥金莱克都曾被隆美尔打得溃不成军），他作为主要决策人，比较公正地披露他当时的决策依据，并不在事后文过饰非，欺世盗名，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尽管丘吉尔有他的局限性，但这种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态度还是可取的。

这部回忆录最充分地显示出丘吉尔的散文风格和语言技巧。丘吉尔性情急躁，说话直率，那种特有的辛辣、尖刻、机智、自信跃然纸上。例如：英国下院就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的有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协定进行辩论时，丘吉尔这样说："他（希特勒）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这个简单、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无耻伎俩和张伯伦的鼠目寸光揭露无遗。他还把一心对希特勒姑息迁就的英、法两国当政者比作两个熟透了的苹果，放在一起一挤就稀巴烂了。长期的议会政治使他练就了出色的演说技巧，例如：为说明一旦捷克被希特勒吞并会对双方力量对比产生什么影响时，他欲擒故纵，先说捷克这个国家很小，捷克的陆军不大，"只比英国的大两、三倍"，捷克的军火生产只比意大利的"多两、三倍"，使听众大为吃惊，用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提醒人们捷克在战争天平上的重要分量，收到了加倍强烈的效果。丘吉尔虽然性格直率，但也有狡黠的一面。例如，在张伯伦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他辞职后由谁来继任首相时，以往每次开会丘吉尔总抢着发言，但这一回他却一言不发了，他耐心地等张伯伦属意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先发言表态，这位勋爵说自己是上院议员，不适于担任包

括各个党派的战时联合政府的首相，至此，首相的职位就自然地落到丘吉尔的身上。这都是丘吉尔早就设计好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他当仁不让，自信唯有他才具备足够的能力和经验领导英国打赢这场正义战争。

丘吉尔长于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刻画人物，他的《马尔巴罗传》、《伦道夫·丘吉尔传》和《当代伟人》等著作就是明证。在这部回忆录里，他描绘了当时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罗斯福、杜鲁门、斯大林、蒋介石、宋美龄、莫洛托夫、李维诺夫，甚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亲自会见过并在战时多次打过交道的。顺便提一提，上述人物中他没有会见过的只有希特勒一人。1932年他曾在德国访问，住在里吉纳旅馆，希特勒派特使去向他表示想在旅馆中会见他。丘吉尔同意与他会见，但向使者坦陈他的观点：反对希特勒毫无道理地凶残地虐待犹太人。使者转达了他的这一观点，于是会晤取消了。以后希特勒上了台，曾多次向丘吉尔发出邀请，都被丘吉尔拒绝了。

这部回忆录原文六大卷，约合中文三百五十万字，由于篇幅很大，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购置与通读的，我们从中挑选出最重要的部分，编成一本书，奉献给读者。我们并不认为用原著十六分之一的篇幅就能容纳其中全部丰富多采的内容，但是，我们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1.涵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使历史动向脉络分明；2.使选本浑成一体，无割裂之弊，不但具有可读性而且还有趣味性；3.力争在有限的篇幅中，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量，我们打破原书章节的限制，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对本文进行“浓缩”和组合；4.注意所选篇章在文体上的多样性，从中可以领略丘吉尔高超的

语言技巧和驾驭文字的本领。为实现上述目标，选编者曾用了数年之功，至于主观意图是否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只有请读者来评说了。

我们采用丘吉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命名“不需要的战争”(The Unnecessary War)作为书名是因为“战争主要是人们行事失策的记录”(丘吉尔语)，要不是英、法等国的决策者处置不当、一味姑息退让，尤其是他们死抱住反共的偏见，不愿与苏联合作以抵抗纳粹的侵略，终于逼得苏联为了自身的生存，走上与德国订约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雅尔塔到马耳他，四十四年来世界终于从冷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然而世界并不平静，全球性的矛盾与地区性的冲突依旧存在，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并采取正确的对策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捍卫崇高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

全书译文，除附录外，都采用我国已有的一个比较可靠的全译本(1974—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多人合译)，只是在个别地方根据原文作了校改。另外，我们还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以帮助读者对一系列史实的背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至于书中的某些资产阶级偏见和错误观点，比如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李顿调查报告”辩解，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导人一再攻击，认为“作为极权主义者，希特勒和斯大林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的政府制度也颇类似”，等等，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相信读者也会作出应有的评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引发到进行到结束，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站在不同的立场来回顾，在某些问题上往往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丘吉尔这部回忆录，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完整、科学的历史，而只是作者以其特殊身份写出的一部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个人色彩较浓的作品。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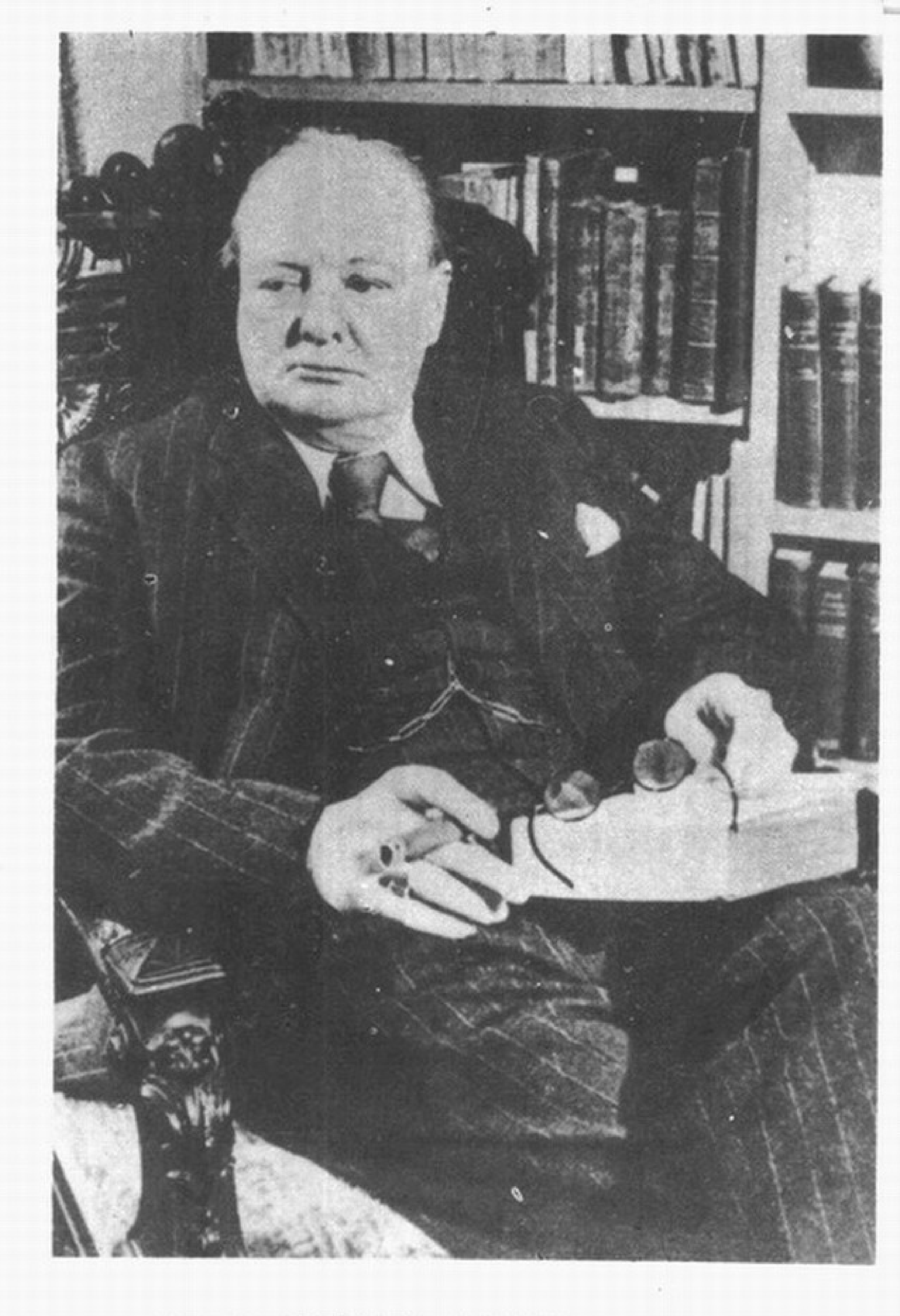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原书的译校者和出版者，同时诚挚地欢迎读者对本书编选工作给予批评和指正。

1990年除夕于北京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演说”。



〔英国〕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

（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录

·附录·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那么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创巨痛深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因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拚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

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作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于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里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①和维也纳和约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是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得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1815、1870、1914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

① 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系列双边和约，因于1713—1714年签订于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而得名，签约的有法、英、荷、普鲁士、萨伏依、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② 拿破仑战败后，俄、奥地利、普鲁士、英等国1815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和会。

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免者。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决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

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会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哪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因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会变得贫穷；它会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会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因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

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由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

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尔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

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如象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象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

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磅礴。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①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

① 当时的英国首相（David Lloyd-George）。

量陷于彷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法国。在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因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① 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

① 普鲁塔克的这句名言，英文是："Ingratitude towards their great men is the mark of strong peoples."

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来因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的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慨，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象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的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

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美国人对德国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者，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对莱因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不仅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同盟的废止，在日本发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中上升到第三位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

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① 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于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① 作者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仇视、恐惧和诬蔑、攻击明显可见。书中类似文段未一一指出，请读者注意。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所有它的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象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须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无需使用武力，无需流血，也可

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决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些愚行，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本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

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容易才加以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

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①

① 英国诗人西格弗里特·萨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1967）的诗。

2. 我对未来战争的预言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我对于自欧战停战到1922年底英国政府更迭这四年中的情况，写下了一些感想。该书是1928年写的，当时我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

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分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战的头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准备进行的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恐怕1919年的战役会看到杀伤力量的大大增强。假使德国军队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因河，那末，在1919年的夏季，他们恐怕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城市。好几万门大炮将夷平他们的阵线。当时协约国正在进行种种部署，准备在同一时期内把二三十万配有一切必要装备的军队，用每日行驶十到十五英里的机械化车辆，源源不绝地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的防毒面具(这是德国人还没有及时造出的)才能确实防御的狠毒到难以置信的毒气，将使遭受攻击的敌方阵线的全部抵抗陷于窒息，使全部生命陷于瘫痪。当然，德国人当时也有他们的计划。但愤怒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象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精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象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

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齑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十八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战争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下，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能幸存下来。恐怕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第二次大战更容易防止。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家，是以通常处事那种贯彻始终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惯常具有的常理来处理它们的事情的话，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实力，而不见得要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而又公正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他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令局势逐步发展，终于达到他们最害怕的那个顶端。现在，我们又面临极其相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国家还再用那种善意的、但目光短浅的做法来对付，那就不免要导致第三次大动乱，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

能够幸存下来讲故事了。

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迄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因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说的。

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

备，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尊重被迫服从的条约。“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是暴力所迫的，是无效的。”所以，强行使一个战败的敌人继续处在解除武装的状态，乃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他们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又必须以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原来的敌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第二，他们必须采取旨在使战败国繁荣昌盛的宽大措施，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创造一个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使诉诸武力的诱因逐渐消除。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之怨气在先，裁减战胜国之军队在后。”下面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讲了。

3. 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正在武装起来

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和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

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的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佩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象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做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那些部下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愿意仍然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

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担任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用钱买了一个营业不振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

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个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

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1923年11月，这位“领袖”在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它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古兰经：夸张、冗长、紊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

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只要德国不能维

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份，决不是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决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之。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纯粹党”①，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

① Nazi：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

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的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了。若干时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① 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

① 魏玛共和国的总理（Heinrich Brüening）。

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有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靠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

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不久就感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在全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褐衫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负责办理的。这是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的最厉害的敌人——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是戈培尔的工作。他当然是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对希特勒主义不愿接受，或坚决反对，甚至是积极反对的。选举的结果，共产党获得八十一席，有许多人在彷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党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与希特勒结成同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五十二席。为数较少的右派中心集团分得三十三席。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选举结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以操纵国会。希特勒不择手段，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能在德国选民中得到这一多数选票。按照通常文明国家议会政治的情况，这样庞大的少数，对国家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的。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现在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陵墓的

驻军教堂内召开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征德国威力绵续的陆军代表和复兴的德国的新显贵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9月24日，国会的多数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向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搞得兴奋热烈，欢欣鼓舞的国社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面前，行异教式的敬礼。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知战败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①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难以想象的残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来形成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以及如何使这种机构趋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的只是，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了。

正当德国发生这些极其严重和不祥的变化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②的政府，迫于财政危机，却认为必须在若干时期内把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大大削减和限制。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

① 古代以人为祭品的火神（Moloch）。

② 指以工党领袖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和保守党领袖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为首的英国联合政府。

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象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那种缺乏先见之明、对欧洲事态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影响。如果美国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就有可能激发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过去虽已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庄严的机构，它本来是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对付希特勒的新的战争威胁的。可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美国人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几年，他们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财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英里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漩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伯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

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我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立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情况毫无所知，一

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我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

一年延长为三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① 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② 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当时一致认为，公开破坏牺牲了好几百万人才得以订立的庄严条约，是绝不能容许的。但英国代表们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纵令和约遭受破坏，他们也不会去考虑制裁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使会议只限于空谈。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由单方——意即一个方面——破坏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并将请国际联盟行政院公布已暴露出来的情况。……

4月15日至17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对所传德国下令实行普遍征兵制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进行审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的国家有：阿根廷共和国、澳大利亚、英国、智利、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不得以"单方面"行动破坏和约这一原则，并把这个问题交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由于深切关

① 法国总理（Léon Blum）。
② 法国共产党主席（Maurice Thorez）。

注波罗的海的海军均势，也联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议的国家，总数有十九国之多，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准备甚至到最后关头使用武力，因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是空口说白话！

4.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

一旦让希特勒的德国重整军备，又没有受协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干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了。实力决斗的日期越拖延，则我们在第一阶段要不经艰苦的战争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阶段，经过可怕的考验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都将越来越少。1935年夏季，德国破坏和约恢复征兵。英国对此已表示默许，而且还根据另外一个协定，准许德国重建海军，如果高兴的话，它还可以按英国的规模来建造潜水艇。纳粹德国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军，到1935年春季，还公开宣布其空中实力与英国相等。它在长期暗中准备之后，就积极制造军械，到现在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以及当时觉得遥远的美国，已面对着欧洲最有效率的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这种有组织的武力和战斗意志；这个民族正盼望着重新恢复他们的民族光荣，当他们稍有踌躇时，一个军事的、社会的和政党的残暴政权就驱赶他们向前进。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他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并未遇到欧洲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国方面，除了高瞻远瞩的总统① 以外，也只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罢了。在

① 指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1935年，有获胜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现在却几乎完全失败了。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亚获胜，他公然对抗国际联盟，尤其是对抗英国，结果获得成功。他现在痛恨我们，和我们疏远，而与希特勒携手。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现在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防止战争，或者用类似战争的实力试探来延缓战争，已经没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现在除了等待挑战到来之外，只有尽可能作好准备。

也许还有时间来建立一种“集体安全”，这种集体安全的基础应该是有关各国准备使用武力来执行国际联盟决议的明显决心。各民主国家及其附属国，无论就其目前的实力或潜力而论，都比独裁国家强得多，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敌人相比，已比十二个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敌不过武装的和坚决的邪恶。对和平的真诚热爱，绝不能为糊里糊涂使千百万平民卷入全面战争进行辩解。在善意但软弱的大会中的欢呼，不久就寂然无声，他们的票数不久也要作废。大难日益逼临。

来因兰的“非军事地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42、43、44各条成立的。这些条文，宣布德国不得在莱因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在这些条文之上的，则是曾由双方自由谈判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在这个条约中，缔约国个别地和集体地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的永久性。公约第二条，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保证不越过这些边界进行侵犯或攻击。如果凡尔赛和约第42或43条被侵犯，则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就构成了“无故的侵略行

为”，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种破坏行为应该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而国联在确定破坏行为属实之后，必须向缔约国建议，它们必须对受侵国提供军事援助。

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约①后两小时，他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来因兰，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区所有的德国重要城镇。他们到处受到欢迎，但他们也深恐协约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为了迷惑英美舆论，希特勒宣布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递交艾登先生一项建议，其内容与纽赖特②当天早上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各缔约国大使的建议相同。这个建议使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就此心安理得。……

希特勒成功地重占来因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① 德国建议订立二十五年公约，莱因河边界两边设非军事地带，订立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同东西方邻国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② 德国外交部长（Freiherr von Neurath）。

英美两国对德国在来因兰设防的严重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时，我就再提到这个问题：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来因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来因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至筑成为象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筋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经过三个月、四个月或六个月，一定可以看到一道十分强固的壁垒。这在外交上和战略上会发生些什么后果呢？……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现在我们来看看东线，来因设防的后果，在东线可能来得更为直接。它对于我们固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危险，但却是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我这篇警告，一言一语，都已陆续地和迅速地得到证实。

德国在占领来因兰和建立对法的防御工事以后，第二步显然是把奥地利并入德帝国了。……

（1938年3月13日）在大批德军和奥地利纳粹党人占领维也纳之后，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

里宾特洛甫① 先生这时正要离开伦敦，返国就任外交部长。张伯伦先生② 特别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欢送，我和我的妻子应首相邀请出席作陪。席上一共约有十六个人。我的妻子坐在桌子的一端，在卡多根爵士③ 的旁边。正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外交部信差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他把信封打开，全神贯注地看。接着他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到首相的坐处，把信交给首相。虽然卡多根的举动没有表现出发生了什么乱子，但我不由不注意到首相显然有点心神不定。不一会，卡多根把信收回重新就坐。后来我听说信的内容是说希特勒已向奥地利进军，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正在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宴会仍顺利进行，没有半点停顿。但不久张伯伦夫人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了若干暗示，便站起来说："让我们大家到客厅里喝点咖啡吧！"我们陆续走进客厅，在我或者在一些其他人看来，张伯伦夫妇

① 德国驻英大使（Joachim von Ribbentrop）。
② 英国首相（Neville Chamberlain）。
③ 英国外交部首席官员（Sir Alexander Cadogan）。

显然希望快点把这个宴会结束。大家都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闲散地站着只等同贵宾说再会。

但里宾特洛甫先生夫妇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气氛。相反，他们拉着主人夫妇喋喋不休地谈了约半小时之久。有一阵，我同里宾特洛甫夫人谈起来，我以临别赠词的口气说："我希望英国和德国将保持友好。"她庄重地回答说："请你当心不要损害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当然他们都完全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认为把首相拖住，使他不能去办理公事和接听电话，是一个好策略。最后张伯伦先生对大使说："对不起，我得去处理急事。"说完立即走出房间。里宾特洛甫夫妇还是不走，因此我们大部分人都托词脱身回家。我想他们终于也走了。这是里宾特洛甫被绞死前我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

侵略奥地利的暴行和征服这个美丽的维也纳连同它的声誉、文化及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使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次日，即3月14日，我在下院说：

3月12日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欧洲现在遭遇到一个侵略的计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在时间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开的。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而且也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只剩下一个选择：或者象奥地利那样屈服，或者趁我们还来得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把危险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办法对付……如果我们坐待事势的演变，那我们对目前可供保卫我们安全与和平之用的资源还要放弃多少呢？多少个朋友将因而离开我们呢？我们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多少个可能的盟国先后被推进那可怕的

深渊呢？虚张声势的恐吓还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吓的背后不断积聚力量，变为真正的实力呢？……比如说，两年以后，那时德国陆军肯定将比法国强大得多，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尽可能为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维也纳是组成旧日奥匈帝国各国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欧各国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现在已落入德国的掌握。纳粹德国在控制了维也纳之后就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这对于欧洲的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国际均势，对于所谓小协约国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小协约国这个国家集团，我必须说明一下。把小协约国的三个国家分别来看，可以说是三个二等的国家，但它们是很有力量和精力充沛的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它们就成为一个大强国。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根据最密切的军事协定联合在一起。它们联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罗马尼亚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矿藏和原料。两国都有庞大的军队；而它们的军火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在英国人的耳朵里听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称似乎有些怪异。它无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主国家。它的陆军无疑只比我们大两三倍。它无疑只有比意大利大三倍的军火供应。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有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他们有一条要塞防线；而且他们有着表现强烈的生存意志，有着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意志。

捷克斯洛伐克此刻不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处在孤立状态之中。根据和约，汉堡虽然是它的对外贸易的通道，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封锁。现在它和开往南欧以及经南欧而到西南欧的铁路与水路的交通随时可能被切断。它的贸易可能被迫缴纳毁灭性的过境税，就是说，一种完全可以制其对外贸易于死命的过境税。这个国家是以前的奥匈帝国境内的最大工业区。除非在势必举行的谈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交通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否则它同外界的交通就要被切断，或者马上就要被切断。从南斯拉夫来的原料供应以及它在那里建立的自然市场的联系也许会立即被切断。上星期五晚上的暴行，结果也许会使这个小国的经济生活大大受到窒息。在所谓小协约国的中心，已经打进一个楔子了。这几个小国，在欧洲有过不受侵扰的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任何人在我们乡土上有不受侵扰地生活的权利一样。

现在俄国人发出警报了。8月18日，他们建议举行会议以讨论时局。他们希望讨论一下，如遇德国对和平有重大威胁时，要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在国际联盟行动体制内履行法苏协定，那怕是商量一个纲要也好。这个建议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应都很冷淡。法国政府由于别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他们国内的飞机工厂发生严重的罢工。佛朗哥的军队正在深入到共产党统治的西班牙地区。张伯伦表示怀疑，态度消沉。他非常不同意我所提出的关于前途危险的看法和为了抵抗这些危险所主张的方法。我一直竭力主张，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

法伊林先生[1]告诉我们，首相曾在3月20日写信给他的姐姐，流露了他当时的心情：

> 温斯顿所说的“大联盟”，其实在他提到之前我早就想到了。……我同哈利法克斯[2]谈过，并把这个想法提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研究过。这是一个有极大吸引力的设想；而且直到你进而考虑它是否切实可行之前，会觉得这一设想几乎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但一到具体考虑时，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德国如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法国或我们都毫无办法来救它。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并且由于法国对它有条约义务，我们对法国也不能给予任何保证。

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一个决定了。这个决定是根据错误的推理得来的。在现代大国或联盟之间的战争中，要保卫某个区域，并不单靠同一地区的势力。这涉及到整个战线的力量对比。这种情况，在战争尚未开始和战争还可避免的时候，尤其是如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当然无需思索就可以报告首相，英国的海军和法国的陆军不可能部署在波希米亚山头阵地上而置身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希特勒入侵的军队之间。的确，这是打开地图一看就知道的。但德国如果肯定地知道越过波希米亚边境一定会引起全欧洲的大战，那么，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许还很可能阻止或延缓希特勒进行下一次的进攻。不到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价值已给丢光了，希特勒的权力和

① 基思·法伊林教授，《内维尔·张伯伦传》的作者（Keith Feiling）。
② 哈利法克斯伯爵，英国外交大臣（Earl of Halifax）。

威望差不多又增加了一倍，这时他却贸贸然向波兰提出保证，试想张伯伦先生这种在私下说的出自内心的推理竟错误到何种程度！

1938年3月24日，首相在下院提出他对俄国动议的看法：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建议采取的那种行动，其间接的，但势所必致的后果，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不过，首相也不能躲避所面对的残酷事实：当时存在着"国际信任的重大妨碍"，政府对英国在欧洲的义务迟早必须作明确的解释。我们在中欧将负什么义务呢？"如果战争爆发，参战国家大概不会只限于那些承担法律义务的国家。战争将打到哪里为止？哪些国家会被卷入？这都是无法预测的。"此外必须注意"排他性国家集团"固然有其弊害，但不这样做就只有让侵略者逐一消灭，各个击破，这样，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而且，这种想法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是非问题。事实上毕竟还有国际联盟及其宪章哩。

首相的路线现在是很明白地规定了：同时向柏林和布拉格施加外交压力，对意大利采取姑息态度，对法国的义务则作严格限制的解释。为了执行前两点，对最后一点必须作慎重和精确的解释。

……希特勒决心要把所有的日耳曼人结合为一个大德意志

帝国并向东扩张，而他又深信法英两国的领导人因酷爱和平和未能重整军备所以都不想打仗。他对捷克斯洛伐克采用惯用的伎俩。苏台德的日耳曼人确有不满情绪，但被他尽量加以扩大和利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有一千万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我们边境相邻的两个国家里"，德国有责任去保护这些日耳曼同胞，应该为他们争取"一般的自由，包括人身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自由"。

西方民主国家竟然接受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这就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

5. 慕尼黑的悲剧

1938年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1]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地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去访问他。第二天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于是，在9月15日早晨，这位英国首相就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从各方面来看，选择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合适。当这个消息传到捷克首都时，捷克领导人简直不能相信真有这回事，他们感到很奇怪：正当他们刚刚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内部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去访问希特勒。他们感到这会削弱他们同德国打交道的地位。因为，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的演说，以及随后德国鼓动亨莱因的党徒叛变，都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因失去领导显然已不同意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政府在其所谓"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的领袖们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过了今年4月亨莱因

[1] 1938年4月10日，达拉第继勃鲁姆之后担任法国总理（Edouard Daladier）。

在卡尔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中所提出的意见，符合西蒙爵士① 在8月27日演说中的声明。但甚至朗西曼勋爵② 也看出，苏台德的领袖们和捷克政府之间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正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的事。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党有了一个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该党的极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提出归并德国的要求。

首相的飞机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然后他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关于归并这个问题，不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现在已经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到张伯伦的突出印象如下：“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早几个月以前就已下了决心并且做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些。他建议采取“一项

① 英国新任外交大臣（Sir John Simon）。
② 7月26日张伯伦派朗西曼勋爵（Viscount Runciman）到布拉格，目的是就地促成捷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

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这个办法至少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住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聊以自慰；甚至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取得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①]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

① 法国外交部长（Georges Bonnet）。

象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象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地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提早，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请你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①]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②]和曼德尔[③]。这两位部长都

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Dr. Eduard Beneš）。
② 后代替达拉第担任法国总理（Paul Reynaud）。
③ （Georges Mandel）。

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

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① 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个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问我们：一旦捷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如下极其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答复："我们准备

① 苏联外交部长。

根据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将同法国一起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我国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只是在两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则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以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明确的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条件的声明，竟然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对于这次危机的处理丝毫不起作用。我听到有人说，在地理上俄国不可能把军队开到捷克去，而发生战争时，俄国的援助也只能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当然，这需要取得罗马尼亚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1]对我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就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从俄国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的一条是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的一条是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相当距离的铁路，就可以转运三十个师的俄国军队到捷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更远大的后果。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此，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

① 苏联驻英国大使。

不必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事态的发展，好象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捷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赛洛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来因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这两个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他所说的“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回来后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希特勒）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讨论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整个早晨，张伯伦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它们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他们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那天晚上十时三十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十时半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者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这时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说，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会发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责备德国总理对我谋求和平的努力没有作出任何响应。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是一个不会引起战争的问题。"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讨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斯贝格所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消息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之高确实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次日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中所定的期限，

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时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人必须在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他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正象处在类似的情况时一样，危机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在这关键的一天，下午三时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俄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情绪和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大约八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现在的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就立即发表了。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他对几个议员说，他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感觉到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他当然是不难传达这种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①]在海军部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高度组织和高度效率的工业机械把他们装备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还准备履行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国海军部向我国舰队发出了警戒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11时38分）。9月28日上午11时20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张伯伦自己又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说：

> 现在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在这里挖掘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真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我这个人，从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

① 英国海军大臣，因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愤而辞职（Sir Alfred D. Cooper）。

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恶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我就认为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上次让威尔逊爵士转交的信的答复。这封信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的联合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的下午二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于是写了一封个人的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 9月28日下午三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在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俄国参加，捷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词率直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二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晨二时签字。它在基本各点上接受了戈德

斯贝格最后通牒。苏台德区由10月 1 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准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汽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现在我们又有了凯特尔元帅[1]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凯特尔元帅回答："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的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象在莱因兰一样，元首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都是爱国的人，他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打开了。阴谋反叛的人已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被他们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所出卖。

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决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

[1]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Field-Marshal Keitel）。

况。某些事实在当时也许尚未为人们所知，因而对事情的估计，基本上只能是猜测，还可能受到试图作出判断的人的一般情绪和意向的影响。那些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而困难的问题寻求斩钉截铁的解决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国的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而忠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妥协办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坚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是由于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因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而且结成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是以这种教义为根据。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避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并避免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不论其目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而正确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况证明确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来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劣势，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

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道的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

但是，有一个有助于作出评判的准则，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做“道义”。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同基督教的教义不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又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的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已指出了责任之所在的时候，而当时对于事实又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不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精神、道义感，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是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是一定会起而战斗的。但无论如何它已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

6.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进攻波兰，大战爆发

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惨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使我们大家都陷于困境这一事实，说明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光明正大，都应受到历史的谴责。请回头看看我们过去曾接连接受的或者放弃的东西：根据庄严的条约把德国解除了武装，德国破坏庄严的条约重整军备；我们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来因兰，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一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同化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显然愿意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来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三十五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

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这个波兰，只是在六个月之前，还象一只饿狼一样参与掠夺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如果我们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德国军队还不一定能够派出五六个有训练的师到西线驻防，那时候，法国以其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尽可以风驰电掣地越过莱因河，进入鲁尔。但是在那时，只要提到这种战争，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卤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象这种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向随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①，甘愿接受显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条件远较以前恶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里好好地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样的事例来。

此外，我们又怎么能够保护波兰，并履行我们的保证呢？那只有对德国宣战，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们吓退的而现在更坚强的“西墙”和更为强大的德国陆军发动攻击。这是走向灾祸的一连串的里程碑。这是向日益强大的德国威力接连地屈服的记录，只是在开始时我们还有力量轻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先是把所有的资产和有利条件肆意挥霍殆尽，然后用颠

① 1939年3月14日，希特勒公然撕毁慕尼黑协定，派军队全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3月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表示极大的愤慨。3月31日张伯伦在议会宣布：英法两国决定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

倒过来的精心刻画的辞藻，宣称决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你可以在无须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为正义而战，或者在稳操胜券并且代价不大的时候不战，那就会有一天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被迫进行战斗了。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可能在全无取胜希望时还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好些。

英国政府对于它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究竟牵涉到什么实际问题，急须加以考虑。这两个保证除非纳入英国同俄国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体制之内，否则无一具有军事上的价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驻苏大使和李维诺夫终于在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由于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受到那种对待，现在就不能对他们抱有多大的期望了。然而，他们还是在4月16日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法、苏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这个建议的全文没有公开。苏联的建议还主张这三个国家，如果可能的话还加上波兰，要对中欧和东欧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国家提出保证。成立这个协定的障碍，就是这些和苏联同一边界的国家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它们和抵抗德国的侵略；这样一来，苏联就会顺手把它们并入它们所深恶痛绝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不知道自己所最害怕的究竟是被德国侵略还是接受苏联的援助。正是这种可怕的抉择，使英法两国的政策陷于瘫痪。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记载说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递国书的苏联大使，在4月17日那一天曾对他作第一次的拜

访。……他问这位国务秘书对德苏关系有什么想法。魏茨泽克答："在我看来，最近苏联报纸并不完全同美国报纸和若干英国报纸那样唱一样的反德调子。"关于这一点，苏联大使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然并不影响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种障碍。苏联从来没有利用目前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德国，它也不想这么做。在俄国，并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中就会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为这次谈话是极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大使正在这时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会谈及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这是俄国脚踏两条船的初次明显举动。从此以后，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进行俄德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为建立反对德国侵略的"三国同盟"进行谈判。

……5月3日，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李维诺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该职将由总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莫洛托夫)一向赞成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从慕尼黑和其他许多事件中，使苏维埃政府深信，无论英国或法国，除非它们自己受到攻击，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乌云密布，风暴逼临。现在俄国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了。

犹太人李维诺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强烈的偏见有所缓和。从此德国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对外政策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转而攻击谩骂"财阀的民主主义"。报纸的文章向俄国人保证说，德国的生存空间不会扩张到俄国的领土；它在各方

面的确只到俄国边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苏联不同英法订立“包围”协定，俄国和德国之间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理由。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①奉召返回柏林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项对苏联有利的长期货物信用贷款。双方的动向都趋向于订立盟约。

俄国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转变，这样摇身一变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做到的。仅仅两年以前，俄国陆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好几千个最有成就的军官，正是因为倾向于这种政策而惨遭杀身之祸。可是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少数焦虑不安的主人，又觉得这种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时，亲德主义是异端邪说，是阴谋叛国。而现在，一夜之间，它却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敢于提出异议者，当然就活该倒霉了；而那些转变得不够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样的命运。

为了完成立刻就要进行的工作，当然没有别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员更为合适或条件更好的了。

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苏联对外政策讲坛上的人物，值得略加叙述，这是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经常有遭清洗的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起来的。他的象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象。他比谁都更适合充

① (Count von Schulenburg)。

当一个在变化莫测的国家机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时带点幽默风趣的会议上，或者当他殷勤地提议来一连串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干杯时，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见过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看来是讲道理又讲究修饰的外交家。至于他对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立即进攻日本。从此之后，莫洛托夫对日本大使的态度如何，可以从他的谈话记录中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地举行微妙的、试探式的、十分尴尬的会谈中，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谈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的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同他通信讨论，总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谎言或侮辱之词来收场。在这本书里，不久就有这类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应。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从美国返国途中，飞机在英国降落。那时我们已签订了英苏条约，他将要冒着危险飞回本国去。在唐宁街我们用来开秘密会议的花园的大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臂，两人面对面互相凝视着。突然间，他好象深受感动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内的真实的人显现出来了。他用同样的力量来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为回答。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只是互相紧紧握手。那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的。在他一生中，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暴乱和破坏，他

或者自己受到威胁，或者把别人投入其中。苏维埃的机器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确是有了一个干练的、在各方面都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永远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我能直至生命结束时都不必经受他所遭受的那种紧张生活，那真是叫我高兴。要是过他那样的生活，倒不如不生下来才好。假如人死之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又愿意去的话，那么，马扎兰、塔莱朗、梅特涅都一定会欢迎他和他们一起搞外交了。

从莫洛托夫当上外交人民委员那天起，他就推行牺牲波兰来同德国达成协议的政策。没有多久，法国就知道这种情形。法国《黄皮书》中曾载有5月7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电文，说是根据他秘密得到的情报，他断定第四次瓜分波兰将成为德俄和解的基础。1946年4月，达拉第先生写道："自5月份以来，苏联进行了两种谈判，其一是同法国的谈判，另一是同德国的谈判。它似乎愿意瓜分波兰而不愿意保卫波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英国和法国政府为了同苏俄达成协议又再度进行努力。……

谈判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不愿意让苏联把他们从德国手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点上，谈判始终没有进展。……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同法英两国代表从军事角度上继续谈判。英国政府于是派了德拉克斯海军上将率领代表团于8月10日前往莫斯科。这些军官并没有得到进行谈判的书面授权。法国代表由杜芒克将军率领。在俄国方面，则由伏罗希

洛夫元帅出席主持。我们现在知道，当时苏联政府同时也同意德国派遣一个谈判代表到莫斯科。英法苏三国的军事会谈不久因波兰和罗马尼亚拒绝俄军过境而终归失败。波兰人的态度是，“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

为了便于讨价还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必须把真正的意图掩藏起来，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摊牌。莫洛托夫及其下属在和英、德双方接触时，显出他们两面应付的惊人本领。直到8月4日，德国大使舒伦堡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还只能这样说：“从莫洛托夫的整个态度看来，显然，苏联政府实际上更倾向于改善德苏关系，但他们以前对德国的不信任还是根深蒂固的。我的总印象是：如果英国和法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苏联政府现在是决心要和他们订约的。当然，谈判也许还要拖很久，尤其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不信任英国……在我们方面，如果要使苏联政府转换方向，就必须作相当的努力”。其实他不必担忧，大局已定了。

8月19日夜，斯大林向政治局宣布他准备同德国签订条约。8月22日，同盟国代表团直到晚上才找到伏罗希洛夫元帅。他对法国代表团团长说：“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去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时，我们等待法国的音信，但始终没有消息。我们的军队是准备着的……法国和英国政府现在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谈判都一味拖延，而且已经拖延太久了。既然如此，出现某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加以排除的。”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就抵达莫斯科。

我们现在从纽伦堡文件和美国最近发表所缴获的文件中，

完全知道了这一件永不应该忘记的交易。根据同里宾特洛甫一起飞到莫斯科去的他的主要助手高斯的话，“8月23日下午，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德国外交部长在长时间会谈之后回来，显得极为满意……”即在这一天晚些时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正文，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没有什么困难，高斯说，“里宾特洛甫在前言中亲手加进一句有关德苏两国友好关系的形成的重要意义的话。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苏联政府在被纳粹政府劈头盖脑地倾倒了六年大粪之后，不能突然之间把友好的宣言拿到群众面前来。因此，前言中的这一句话就被删去了。”在一个秘密的协定中，德国声明它在政治上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都不感兴趣，但认为立陶宛应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瓜分波兰的分界线已经划定。对波罗的海各国，德国只要求经济利益。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直到8月23日深夜才签订。

……我心平气和地记录了一切。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对于这类违背常理的行为所引起的非难和反感，只有两国的专制极权主义者才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知道希特勒还是斯大林这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最厌恶这个条约。双方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这两个帝国和两种制度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斯大林无疑地知道，在希特勒和西方国家作战一年之后，德国就不再成为俄国的劲敌了。希特勒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则是“各个击破”。这一类的协定竟然能够成立，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在苏联方面，我们必须说明的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使德国军队部署的阵地越往西越好。这可以使俄国有时间从其广大帝国的各部分把军队集中起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俄国军队在

1914年的不幸状况。当时他们在仅仅部分动员的情况下就向德军进攻。现在他们的边界，较上次大战时要偏东得多。因此，他们必须在受到攻击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武力也好，欺骗也好，都得首先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的一大部分。他们的政策固然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却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

这个不幸的消息，好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全世界爆炸。苏联塔斯社说，8月21日到22日，里宾特洛甫正飞往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国政府当时所感到的情绪不论究竟如何，但他们当时没有恐惧的成分在内。他们立即宣称，“这件事绝不影响他们所决心要履行的义务。”现在已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避免或延缓大战的爆发了。

我们仍有必要把“条约”的条件记录下来：“缔约国双方约定相互之间不进行单独的或和其他国家联合的任何暴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和任何攻击。”

这个条约的有效期间为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没有一方提出废除则自动延长五年。在会议桌的周围，欢呼庆贺，祝酒干杯。斯大林还主动提议为德国元首干杯，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我为祝他身体健康干杯。”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平凡而简单的教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在本书中还要谈到几个同样的例子。奸诈的人和政治家，虽然费尽心机，总是害了自己。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过了二十二个月，斯大林和俄国的成千成万的生命，就得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一个在道德上毫无顾忌的政府，似乎总是大占便宜，为所欲为。但“一天结束时，一切都得算清楚，全部时间结束时，更得算清楚”。

8月25日，英国政府公布同波兰订立的正式条约，确认以前所提供的保证。……实际上希特勒将进攻（波兰的）日期从8月25日推迟到9月1日。而且象张伯伦所希望的那样，同波兰进行了直接谈判。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想同波兰达成协议，而是想给英王陛下政府种种机会，使之可以逃避保证。至于英国政府的思想，象议会和全国一样，根本不是这样。英国岛民的性格有点古怪，他们讨厌军事训练，近千年以来从来没有敌人入侵，但在危险日益临近和日益扩大时，他们反而越来越镇定，在危险到了迫在眉睫时，他们反而更为凶猛，在危险发展到了性命攸关的关头，他们反而无所畏惧。这些习性，曾使他们能够在多次危难中转危为安。

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早晨我们的所有部队奉命动员。首相请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认为避免与德国作战的希望已经幻灭。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组成的战时内阁来指挥作战。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将会参加。他邀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未加任何评论，便接受了他的提议。……

9月3日①……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他邀请我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阁员。……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

① 英国、法国向德国宣战。

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英尺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德国军队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在9月1日出动，它的空军首先出动袭击波兰飞机场上的波兰空军中队。在两天之内，波兰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歼灭。在一个星期内，德国军队已深入波兰。波兰军队在各处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归无效。所有边境上的波兰军队，除了在波森两翼已深深陷于包围中的兵团外，都被驱向后退。……第二个星期的特点，是剧烈的战斗，结果名义上约有二百万人的波兰军队，溃不成军，不再成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波兰军队，就是在对华沙的钳形攻势的合围下进行搏斗而牺牲的。在波森的波兰兵团，和由于德国军队猛攻而自索恩和罗兹撤退的几师人会合，现在总数共有十二个师。德国第十集团军由比较薄弱的第八集团军作掩护，突过这支波兰部队的南翼，涌向华沙。虽然实际已被包围，波兰的波森兵团司令库特尔齐亚将军，决定向南进攻德军主力的侧翼。

这次英勇果敢的波兰反攻，即所谓“布祖腊河之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不仅吸住了德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一部分第十集团军，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华沙的目标，甚至从北方吸引来第四集团军的一个兵团。波森兵团，在所有这些强大的军队的进攻下，在丝毫无力抵抗的空中轰炸的强大压力下，维持它们的永垂不朽的光荣战斗达十天之久；最后，在9月19日这天全军覆没。

同时，外圈钳形围攻的部队已经会师合围。第十四集团军在9月12日达到伦贝格的外围，向北进击，在17日和越过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第三集团军部队会师。现在已经团团合围，没有一线之路可供离散的及敢于冒险的人逃脱了。20日，德国人宣布，维斯杜拉河之战，“是自古至今最大的歼灭战之一”。

现在轮到苏联来采取行动了。他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就要具体地表现出来了。9月17日俄国军队蜂拥地越过了几乎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在一个广阔的前线地带，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猛进。18日，它们占领了维尔纳（维尔纽斯），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它们的合作者德国军队相会。在上次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违背他们和西方协约国所订的庄严协定，就在此地单独和德皇时代的德国媾和，并且屈辱地接受了德国严酷的媾和条件。而现在俄国共产党人，竟和希特勒的德国，就在这个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方，握手言欢。波兰的覆灭以及它全部被征服的过程，进行得很快。可是华沙和莫德林尚未被征服。华沙的抵抗，主要是由于民众激昂的爱国情绪，真是伟大悲壮，但却毫无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猛烈的空中轰炸，以及许多从平静的西线，通过东西向的主要公路迅速调来的重

炮队的疯狂的炮击，华沙电台终于停止播送波兰国歌，而希特勒便进入了这个一片废墟的城市。莫德林是维斯杜拉河下游二十英里的一个要塞，曾经收容了索恩的兵团残部，继续苦战，直到28日为止。于是，在一个月中，一切都告结束，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就这样陷于残酷的桎梏之中，而对它施加这种桎梏的人们不仅要征服，而且要奴役，甚至要消灭它的广大人口。

我们已经看见了现代闪电战的一个完整的标本；看见了陆军与空军在战场上的密切配合；看见了对于一切交通线及任何可以成为目标的城镇所进行的猛烈轰炸；看见了活跃的第五纵队的身手；看见了间谍和伞兵队的任意使用。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批装甲部队势不可挡地向前冲锋陷阵。然而，波兰人却不是忍受这种苦难的最后一个民族。

苏联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它们和希特勒商妥的界线为止，到了29日，苏德两国瓜分波兰的条约正式签字。我仍然确信苏德之间有深仇大恨，并相信这种仇恨决难消释，而且我始终希望，苏联一定会由于局势的逼迫而倒向我们方面。因此，对于苏联这种无情残暴的政策，我虽然感到十分愤慨，而且在内阁中，在我周围的人们虽然情绪激动，但我仍保持冷静。我对苏联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他们不承认任何道德准则，只顾他们自己的利益。

俄国和德国瓜分波兰以后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订立了三个“互助协定”。这些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在1918年和1920年的解放战争中，摆脱了苏联政府的羁绊而获得了自由。这些小国完成了严厉的土地改

革，主要是牺牲了以前德国地主的利益，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反共色彩的民族主义的农民生活方式。它们一贯畏惧强大的邻邦——苏联，并且非常迫切地希望维持中立地位，因此设法避免一切挑衅。但是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它们的艰巨的任务很难实现。例如里加变成了一个搜集俄国方面情报的窃听站和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中心。但是德国在和苏联进行的交易中，却乐于把它们加以放弃，现在苏联政府抱着积蓄已久的仇恨和急切的贪婪心理向它们的牺牲品扑去。这三个国家过去曾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和彼得大帝旧日的征服地。它们立即遭到苏联强大的军队的占领，因为对于这样的大军，它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苏联使用了惯常的方法，对于所有反共反苏分子，实行了残酷的清算。二十年来一直在他们本土过着自由生活、并且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许多人士，现在都失踪了。其中一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余的人们被送到了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互助”的过程。

……苏俄从德国一卷入对英、法两国的战争以后，就根据对德条约的精神，进行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通道。第一条路线是从东普鲁士经过波罗的海国家而进入苏联；第二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湾的水域；第三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本土，横过卡累利阿地峡而至芬苏边境，距离列宁格勒近郊仅有二十英里的一个地方。苏联人没有忘记1919年列宁格勒所面临的危险。甚至高尔察克的白俄罗斯政府也曾通知巴黎和会，在波罗的海国家内的基地和芬兰，都是保护俄国首都所必需的地方。在1939年夏季，斯大林对英、法两国的代表团也曾经说过措词相同的话；我们在以前的有关各章中，已经看到，这些小国的自然的恐惧

心理，如何成为阻碍英、法两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障碍，以及如何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的协定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没有浪费时间；9月24日，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奉召访问莫斯科，四天以后，他的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条约给予俄国在爱沙尼亚境内重要基地驻防的权利。10月21日，苏联红军与空军就去驻守。同时，对拉脱维亚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而且苏联的驻军也在立陶宛出现了。这样，通往列宁格勒的南路以及半个芬兰湾，已由苏联的武装部队很快地加以阻断，以防止德国可能入侵的野心。现在只剩下通过芬兰本土的一条路线了。

10月初，芬兰的政治家、曾经签订1921年苏、芬和约的帕西基维先生到了莫斯科。苏联的要求范围很广，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边界线，必须后移相当的距离，使列宁格勒脱离敌方炮火的威胁。苏联的其他要求包括：芬兰割让芬兰湾内的若干岛屿；将雷贝锡半岛，连同芬兰在北极圈内唯一的不冻港比特萨摩，一并租借给苏联；而最重要的是，将位于芬兰湾入口处的汉戈港，租借给俄国作为海军及空军基地。芬兰人对以上要求，除最后一条外，都准备让步。在他们看来，如果芬兰湾的要害地点被俄国掌握以后，芬兰在战略上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就将荡然无存。谈判在11月13日宣告破裂，芬兰政府开始动员，并加强他们在卡累利阿边境的军队。11月28日，莫洛托夫宣布《苏、芬互不侵犯条约》作废；两天以后，苏联军队就沿着长达千英里的芬兰边境，从八处进攻，同日早晨，芬兰首都赫尔辛福(赫尔辛基)受到苏联空军的轰炸。

苏联进攻的主力，最先是集中在卡累利阿地峡芬兰的边境防御工事。这种工事包括一个设防地带，从南至北纵深约达二

十英里，穿过积雪甚厚的森林区。它被称为曼纳海姆防线，曼纳海姆是芬兰的总司令，同时是在1917年使芬兰免于被布尔什维克党征服的救星。苏联以它巨大的力量，无缘无故地进攻一个高度文明的生气蓬勃的小国，在英国、法国、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人们极端的愤慨，但不久，人们又感到惊讶和如释重负。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战争中，苏联军队毫无进展，进攻的军队在开始时，几乎全是从列宁格勒的驻军中抽调来的。而芬兰军队的全部战斗力量仅有将近二十万人，却表现了良好的战绩。他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和一种不久被人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新式手榴弹，对付俄国的坦克。

从1940年年初开始，苏联就把主力压在芬兰人的身上，苏联加倍努力，企图在积雪融化以前，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芬兰人，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春天来临和积雪融化上，但不幸，这一年的春天和融雪季节却迟来了将近六个星期。2月1日，苏联开始对地峡展开强大攻势，前后持续了四十二天，同时对芬兰防线后方的基地仓库和铁路线的联接站，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紧密排列的苏联大炮先进行了十天的猛烈轰击，接着开始了有力的步兵进攻。经过十四天的战斗，这条防线就被攻破了。……到了2月底，曼纳海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3月12日，芬兰接受了俄国的条件。……

7. 张伯伦辞职，英王命令我组织政府

在短暂的挪威战役①中所发生的许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甚至就战前若干年间最不活动、最迟钝的人们来说，其中有些人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昂。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决定在（1940年）5月7日举行。下院挤满了神情非常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们。张伯伦先生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敌意的浪潮。在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坐在政府席后面席位上的艾默里先生，在响彻下院的一片喝彩声中，引用克伦威尔向长期议会所说的几句专横的话："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区的议员、一位声名卓著和经验丰富的枢密顾问官的口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痛心的话。……5月8日，人们看到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干预。

① 1940年4月，德军占领中立国挪威的全部港口和水域，英国派军队企图夺回，挪威海岸的行动，严重受挫，终于被迫全部撤离。

他在一篇不超过二十分钟的演说中，对政府首脑进行了充满恶意的抨击。他企图替我开脱说："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我立即插话申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的责任；我也愿意接受我应负的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先生警告我不要为了掩护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弹击中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然后，他把目标转向张伯伦先生说："现在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当前的问题要大得多。首相曾经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有领导的人物，政府必须明确地表示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能够相信领导他们的人正在尽他们的最大的努力。"他最后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

在辩论结束以后，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对于下院对他的情绪持有最严重的看法。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执政。现在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5月9日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会奉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前景，既没有使我兴奋紧张，也没有使我惊慌失措。我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心安理得地听任形势的发展。……

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金斯利·伍德爵士①来看我，他刚才会

① 战时内阁成员，空军大臣，张伯伦的亲密朋友。

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见解。十一点钟，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对面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的态度保持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分。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他感到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使他执行首相的职务。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

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多年共事，无论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原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在那里也许不难想象，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哩。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飞抵此间。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地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纷扰混乱的状态中；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因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的地点，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袭击堤道，给蜂拥而来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看来，她似乎已经不能在当地久留了。

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军部对我们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的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到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和残酷的袭击。为了处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问题，一两个小时便消磨过去

了。从受到德军推进影响的各个边境方面，电报如潮水般地纷至沓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现在似乎已经充分地加以实施了。1914年德国侵略军队的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以便进行越过荷兰国境的运动战了。现在这种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这些便利的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是其他的发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的打击，并不是作为对侧翼的迂回运动，而是主力前线的突破。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谈话记录中，就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计划中显然可见的情形，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什么命运。但我的话却引起了别人的厌恶。

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或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料得到。不久，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六点钟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在皇宫门前，也没有等候的群众。

我立即被引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

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国王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具有举国一致的性质。我感到我的任命与这一点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张伯伦先生辞职的情况，则建立联合政府显然是在当前形势下应有的安排。如果我感到无法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政党实行妥协，那么，在宪政上并不能限制我设法成立一个最大限度的坚强的政府，罗致所有愿意在危急时期为国效劳的人士，条件是，只要这样的政府能获得下院多数的信任。我告诉国王，我将立即邀见工党及自由党的领袖；我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个或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同时，我希望在午夜以前，使他知道至少五名人选。接着，我即告辞，回到海军部。

在当晚七、八点之间，艾德礼先生①应我的邀请来看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来。我告诉他，我已奉命组织政府，并问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说他们愿意参加。我提议他们在政府中应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两个职位；我请艾德礼先生给我一张名单，以便我们能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我提到了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他们出任高级的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当然，我对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两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识。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我多少处于独立地位，与保守党和联合政府发生的冲突和摩擦，远远超过我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的冲突。这时，我们曾有一个短时间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他们就告辞，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

---

① 工党领袖，后任英国战时内阁副首相（Clement R. Attlee）。

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彼此之间，在前四十八小时内，曾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

我邀请张伯伦先生以枢密院大臣的职位领导下院，他在电话中答允接受，并告诉我已经做好安排，决定在当晚九点钟向全国广播，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赞助他的继任者。所有这些，他后来在广播中，用非常豁达的措词，都谈到了。我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战时内阁，并连任外交大臣。大约在十点钟左右，我按照我所作的诺言，把五个人的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关于这三部大臣的人选，我心中早已决定。艾登先生[①]应该主管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应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应主管空军部。同时，我兼任国防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对于国防部的范围和职权，却不打算加以规定。

这样，在5月10日的晚上，在这场巨大战斗开始时，我取得了主持国政的大权。此后，在世界大战的五年零三个月中，我所持有的权力日益扩大，直至最后，当所有我们的敌人，不是已经无条件地投降，就是正在准备无条件地投降时，英国的选民立即解除了我的职务，使我不能再处理他们的事务了。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这些忙乱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感到格外的兴奋。我对事态的发展，全部加以接受。但是对于阅读这篇真实记载的读者们，我却不能隐瞒：我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象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

① 丘吉尔最得力的助手和接班人，他在战前曾与丘吉尔在一起长期地、不遗余力地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Anthony Eden）。

备要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已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以上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卷：
《风云紧急》(1948年，初版)

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我要求下院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在报告了充实各部人员的进展情况后，我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我们的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我在结束时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

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

8. 英国为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

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对垒。在上次大战的艰难岁月里和这次大战的初期，我们惯于躲在法国战线的后面过日子，而今这条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竟被摧毁得不堪收拾。不到三个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的陆军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装备损失无遗。不到六个星期，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掐住我们的咽喉，整个欧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则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虎视眈眈。正是面临这种种事实和黯淡的前景，我就任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担负起首先组织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政府的任务，以便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来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内外事务。

差不多正好是五个年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处境抱比较乐观的看法。意大利被征服了，墨索里尼被杀死了。强大的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了。希特勒自杀了。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大批的俘获以外，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近三百万德国士兵被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和蒙哥马利元帅在德国俘虏了。法

国获得了解放，重整旗鼓，振作起来。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携手迈进，迅速地摧毁了日本的抵抗。这一对比确实是惊人的。这五年中所经历的道路是漫长的、艰苦的和危险的。那些在这条道路上倒下去的人们，并没有白白地牺牲他们的生命。那些昂首阔步地走到尽头的人们，将因为曾经光荣地走过这条道路而永远感到骄傲。

要阐明我做的工作和著名的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经过，我首先有责任阐明愈是艰难愈是紧密团结的大不列颠及其帝国对那最终成为这么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作出的贡献有多么大和起了什么作用。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我们最伟大的盟国美国作令人不快的比较，或者毫无意义地论个高低，我们对美国的感激是无法衡量和永远不忘的。但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英国在战争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是符合英语世界的共同利益的。……直到1944年7月为止，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与敌接触的师的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个总的数字不但包括了欧洲和非洲战区，并且也包括了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所有地区。直到1944年秋天大批美国军队到达诺曼底为止，在太平洋和大洋洲以外的每一个战区，我们一直有权利至少作一个平等的伙伴而且往往是最主要的伙伴讲话的；直到上述时期为止，在任何月份内各个战区所有的师的集结情况也是如此。从1944年7月起，从与敌接触的师数来看，美国战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一直这样下去，不断扩大，捷报频传，直至十个月后取得最后胜利。

我作的另外一个比较表明：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甚至比我们英勇的盟国人员的牺牲还要大。英国武装部队的

死亡、失踪、被认为是已死亡的人数共达三十万零三千二百四十人，再加上各自治领、印度和各殖民地的十万零九千人，总数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人。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联合王国国内死于空袭的六万零五百平民，也未包括大约三万名死亡的商船船员和渔民。与这些数字相比，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牺牲的人数是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人。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令人伤心的光荣牺牲的人数，是深深相信由这么多宝贵的鲜血所凝成的平等的战友关系，将继续博得英语世界的人们的崇敬，并鼓舞他们的行动。

在海洋上，美国当然肩负了太平洋战争的几乎全部重担，1942年，他们在中途岛附近、在瓜达卡纳尔岛以及在珊瑚海所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使他们在那辽阔的海洋上获得了全部的主动权，给他们打开了袭击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道路，并最后袭击日本本土。美国海军是不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承担重任的。在这里我有责任摆明事实。在欧洲战区、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击沉的七百八十一艘德国潜艇和八十五艘意大利潜艇中，有五百九十四艘是英国海军和空军击沉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除了击毁或俘获意大利全部舰队外，还消灭了德国的全部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在空中，美国从珍珠港事件后的最初时刻起，便以最大的规模作出巨大的努力投入战斗，特别是使用了他们的白天“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他们的空军既用来打击日本，也用来从英伦三岛打击德国。但是，当1943年1月我们到达卡萨布兰卡后，便没有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白昼向德国投下过一颗炸弹，这是事实。不久之后，他们所作的巨大努力就有了成果；但是，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英国在德国投下的炸弹合计起来，无论白天

或黑夜，都以八吨对一吨之比，超过了美国飞机所投的炸弹，只是在1944年的春天，美国的轰炸才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如同在陆地和海上一样，我们是从开始就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只是到了1944年，美国的巨大的作战努力才赶上和超过了我们。

有一点必须记住，从1941年1月开始实行租借法案起，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我们的军需供应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有了他们给予我们的物资和武器，我们实际上就能够以全国四千八百万人当五千八百万人去作战。同时，在海运方面"自由轮"的大量建造，使物资的供应能经过大西洋源源而来。另一方面，对整个战争期间各国的船运由于敌方军事行动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作一个分析，记在心里，其数字如下：英国11,357,000吨、美国3,334,000吨、（不受敌人控制的）其他各国6,503,000吨。在这些损失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大西洋，其中包括英国沿海水域和北海，只有百分之五的损失是在太平洋。

列举以上事实，并不是想得到不应有的功劳，而是要在一个能博得公正人士的尊敬的基础上，说明在世界历史的危急关头，首当其冲的这个小岛的人民在各种形式的战争活动中作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

9. 法国溃败，敦刻尔克大撤退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这一令人难忘的战争截至目前这一阶段所经过的过程。

只有希特勒才处心积虑地要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比利时在它自身遭到攻击以前，一直是不愿意让盟军入境的。因此，军事上的主动是操在希特勒手中。他在5月10日发动了进攻。第一集团军群以英军为中心，不是在防御工事后面固守，而是冲入比利时，从事徒劳无功的援救，因为为时已经太晚了。法军在阿登山脉对面留下一道缺口，防御工事既不完善，防御力量又很薄弱。大战以来空前规模的装甲部队的侵犯，突破了法军战线的中央地带，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所有北方各集团军同南方以及同海岸的交通线有完全被切断的危险。法国最高统帅部至迟应该在14日向这些集团军发出紧急命令，以最大速度实行总退却，不但甘冒危险，即使物资遭受重大损失也在所不惜。甘默林① 将军没有用无情的现实主义正视这一问题。法国北方集团军司令比约特也就无法自行作出必要的决定。遭受威胁的左翼各集团军完全陷于混乱。

① 法军总司令（General Gamelin）。

当他们感到敌人的兵力占优势时，便向后退却。由于迂回运动是围绕他们的右翼，他们便构筑了一道防御侧翼。如果他们在14日开始后撤，那么，到17日他们就可能回到他们的旧防线，从而获得一个突围的好机会。至少是损失了至关紧要的三天时间。从17日起，英国战时内阁看得很清楚，只有立即向南突围才能挽救英国军队。他们决定要迫使法国政府和甘默林将军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他们自己的司令官戈特勋爵却怀疑，要脱离正在激战的战线，特别是还要同时冲过去，是否可能。19日，甘默林将军被免职，由魏刚①接任。甘默林的"第十二号命令"——他的最后一道命令，虽然迟了五天，但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也符合英国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的主要论断。更换最高统帅，或者说没有统帅，又造成另外三天的拖延。魏刚将军在访问北方各集团军以后提出的大胆的计划，始终不过是一纸空文。他的计划基本上就是甘默林的计划，而且由于时间更加拖延，所以愈是没有成功的希望。

在当前这种进退维谷的可怕局势下，我们接受了魏刚计划，并且一直到25日我们始终是忠实地、坚决地努力执行，虽然在现在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到25日，所有的交通线全被切断，我们微弱的反攻被击退，阿拉斯失守，比军的战线被突破，国王利奥波德准备投降，于是，逃往南方的全部希望遂成泡影。只剩海路可走了。我们能否到达海边？如果不能到达，我们是否一定会在开阔的战场上被敌人包围和击溃？我们陆军的全部大炮和装备一定会丧失殆尽，好几个月也补充不起来。可是那些大炮、装备同军队比较起来又值几何呢？只要有他们，英国

① （General Weygand）。

将来建立军队，就有了核心和基础。戈特勋爵从25日以来就觉得从海路撤退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现在，他在敦刻尔克附近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率领全部残剩的兵力打到那里去。这就需要英国军队严守纪律，需要英军司令官，包括布鲁克、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内，发挥他们的才智。需要的东西还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已经做了。这是不是就够了呢？

现在必须研究一个众说纷纭的插曲。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曾声称，此刻希特勒对于战事曾亲自作了唯一一次有效的直接干预。据这位权威人士称，希特勒"为这些装甲部队担心。因为他们进入一个运河交错、处境不利的地区，要冒很大的危险，可是得不到任何重大的收获。"他觉得，不能让这些装甲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因为它们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相信他的空中优势能够制止从海路的大规模撤退的。据哈尔德说，希特勒因此就通过勃劳希契[①]给他一个电报，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尖兵甚至可以撤回。"哈尔德说，这样就给英国军队让出了一条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无论如何，我们在5月24日上午11时42分截获了一份德军的明码电报，大意说目前暂停向敦刻尔克——哈兹布鲁克——梅维尔一线进攻。哈尔德说，他代表陆军最高司令部(O.K.H.)拒绝对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的行动进行干预，该集团军群奉有明确的命令制止敌人到达海岸。他争辩说，这一地区作战的成功越快越彻底，以后补充所损失的坦克也就越容易。第二天他奉命同勃劳希契一同参加一次会议。

---

① (General von Brauchitsch)。

这场激烈的争辩，最后由希特勒发出一道明确命令而告结束。希特勒说，他要派一名他本人的联络官到前线去监督执行他的命令。凯特尔奉命乘飞机前往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总部，其他军官奉派前往前线各指挥所。“我始终不能理解，”哈尔德将军说，“希特勒怎么会认为装甲兵团是在冒无谓的危险。凯特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呆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根据他讲的故事而产生的。”

其他德国将领也曾谈过颇为类似的情节。甚至暗示说，希特勒下这道命令是出于一个政治动机，以便在击败法国之后同英国有更好的媾和的机会。现在，由于发现了龙德施泰特总部当时记载的日记原本就是一个可靠的证明文件。日记记载的却是另一种说法。23日午夜，勃劳希契从最高统帅部带来命令，指示第四集团军仍由龙德施泰特指挥，以便进行“包围战”的“最后行动”。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到龙德施泰特总部，龙德施泰特对他说，他的装甲部队已前进了那么远，速度那么快，力量已大大减弱，需要停下来整顿，重新部署，以便对敌人进行最后的打击，他的参谋日记中写道：这个敌人“打仗非常顽强”。而且，龙德施泰特还预见到，他的很分散的兵力有遭到南北两方夹击的可能；事实上，魏刚计划如实行的话，就显然是盟军的反击。希特勒“完全同意”阿拉斯以东的攻击应由步兵执行，机动部队应继续扼守朗斯—贝顿—埃尔—圣奥梅尔—格拉夫林防线，以便截击受到东北方B集团军群①压力的敌人。他也考虑到为以后的作战而保持装甲部队的兵力是极为必要的。然而，25日很早的时候，勃劳希契送来一份新的命令：

① 德国布置在战场右翼的军群，有二十八个师，由冯·博克将军指挥。

总司令命令装甲部队继续前进。龙德施泰特仗着有希特勒的口头答应，竟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他没有把命令传达给第四集团军司令克卢格，他告诉克卢格要继续节省使用装甲师。克卢格对这种拖延提出抗议，可是直到第二天(26日)，龙德施泰特才放手让他们行动，而且就是在这时，他还命令暂时不要以敦刻尔克为直接攻击的目标。日记上记载了第四集团军抗议这种限制，集团军的参谋长于27日打电话说："海峡各港口的情况如下：大船停在码头边，放着跳板，人们纷纷登船。所有的物资都丢在后面，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人以后重新装备起来和我们为敌。"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装甲部队曾经停止前进；不过，这并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是龙德施泰特的主意。龙德施泰特的这种见解无疑是有理由的，既考虑到了装甲部队的情况，也考虑到了战争的总的形势，但是，他应该服从最高统帅部的正式命令，或者，他至少应该告诉他们，希特勒在口头上是怎样对他说的。德军的司令官们普遍认为失掉了一个大好机会。

然而，在这一紧要关头影响德军装甲部队的行动的，还有另外的原因。

20日夜，德军主要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到达阿布维尔的海岸后，就沿着海岸经埃塔普勒向北方朝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前进，其目的显然是企图切断所有从海上逃走的去路。由于上次大战的经验，这一地区的情形又重现在我的心头，那时我曾使用机动的海军陆战旅从敦刻尔克攻击向巴黎进军的德军侧翼和后卫。因此，我无需去了解加来与敦刻尔克之间的洪水系统或格拉夫林洪水防线的重要性。水闸已经打开，洪水逐日奔流，这样就在南面掩护了我们的退却路线。布洛涅的防御

战，尤其是加来的防御战，一直在狼狈的局面下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时英国立即派遣守军到达该地。5月22日布洛涅陷于孤立并遭到攻击，担任守备的是两个营和我们少数几个反坦克炮队中的一个炮队，另外还有一些法国部队。抵抗了三十六小时以后，他们报告说难以支持，我同意将残剩的守军连同法国部队从海路撤出。5月23日到24日的夜间由八艘驱逐舰将守军撤走，只损失了二百人。法军继续在城堡战斗到25日清晨。我对于我们的撤退感到遗憾。

早在几天以前，我就已经将海峡各港口防卫工作交由帝国总参谋长直接指挥，我和他经常保持接触。我现在决定：必须死守加来，不准守军从海路撤退，这里的守军计有步枪旅的一个营、第六十步枪旅的一个营、维多利亚女王步枪旅、皇家炮兵第二二九反坦克营和皇家坦克团的一个营，另外还有二十一辆轻坦克和二十七辆巡逻战车，以及同样数量的法军。为了争取两天或三天的时间，竟要牺牲这些经过训练的优良部队，实在令人痛心；这样的部队我们是很少的，而争取到的两天或三天时间有何裨益还值得怀疑，这几天究竟作何利用也难预定。陆军大臣和帝国参谋总长同意了这一令人痛心的措施。……

加来是成败的关键所在。许多其他的原因可能阻挠从敦刻尔克脱围，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加来的防御战赢得了三天时间，我们就可以保住格拉夫林的洪水防线，否则，纵使希特勒迟疑不决，龙德施泰特发了命令，我们所有的后路也将被切断，从而全军覆没的。

关于英国和法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已有翔实而完善的记载。自从20日以来，舰只和小型船只的集结便已在多佛尔港

司令官拉姆齐海军上将的指挥下进行。26日晚，（下午6时57分）海军部一声令下，“发电机”①作战计划便开始实行，第一批军队就在那天夜里运回国来。当布洛涅和加来失陷后，只有敦刻尔克港和连接比利时边境的开阔海滩还在我们手里。这时，我们认为，我们最多只有两天时间救出大约四万五千人。翌晨，5月27日，采取紧急措施，搜寻更多的小型船只，以“应付特殊的需要”。这不得少于足敷撤退全部英国远征军之用。显而易见，除了较大的船只从敦刻尔克港装载士兵外，还需要大量的小型船只，以备在海滩应用。依照海运部里格斯先生的建议，由海军部官员从特丁顿到布赖特灵锡之间的各个船坞中找到了一共四十只可用的汽艇，第二天便集中在希尔内斯。同时，伦敦各码头定期航轮上的救生艇、泰晤士河上的拖船、快艇、渔船、驳船、平底船和游艇，只要可以沿海滩使用的运输工具，都一律征集备用。27日夜间，所有的小型船只象潮水似地涌向大海，先到我们的海峡港口，再从那里开往敦刻尔克，到达我们热爱的军队的身边。

一旦不需要保密了，海军部马上就放手让我国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船民普遍自发的行动充分开展起来。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都开往敦刻尔克；幸而准备工作一个星期前就着手进行了，现在又有许多人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29日开来的小型船只数目还不多，但是它们是以后开来的将近四百只小型船只的前驱，这四百来只船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31日起，把大约十万人从海滨渡送到了远离海岸的大船。在这几天里，我没有见到我的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其他

① 5月20日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必要时“紧急撤退大量军队渡过海峡”的作战计划的名称。

两三个经常见到的人。他们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在四天内运送了八百人。在敌人不断空袭之下，前往营救军队的船只共计约八百六十艘，其中将近七百艘是英国的，其余是同盟国的。

此时，在环绕敦刻尔克的海岸上，对周围地区的部署有条不紊、至为严密。队伍到达时并不混乱，井然有序地沿着防御工事整顿，在两天之内使防御力量大为增加。阵容最好的队伍调去构筑防线。损失最大的部队，如第二师和第五师，作后备队留在海滩上，然后，尽早登船。最初，前线有三个军，但是到29日，由于法军接过了更多的防线，所以有两个军就够了。敌人拼命追击我们的后撤部队，激烈的战斗没有停过；尤其在靠近尼乌波特和伯格的两翼更是激战不已。随着撤退的进行，英国和法国军队的数目都在不断减少，所以防线也相应地缩短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在海滩的沙丘中间一连三、四天或五天遭到无情的空袭。希特勒以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使我们无法逃走。所以他想把他的装甲部队留作战役的最后一击之用；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三个因素使他的希望落了空。第一，接连不断地轰炸沿着海岸集结的大量军队，造成的伤亡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住，散不开。在最初阶段，经过一阵轰隆隆的空袭之后，军队吃惊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但是很少有什么人受伤。有岩石的海岸也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结果。不久以后，兵士们对空袭就不在乎了。他们沉着地蹲在沙丘之间就有活的希望。在他们面前的大海是灰色的，但并不是不欢迎他们的。在那边，有救命的船——就到家了。

第二个为希特勒所未料到的因素是他的飞行员的伤亡。英国和德国的空军的质量在这里直接受到了考验。英国的战斗机队尽最大的努力在战场上空不断巡逻，与敌人殊死战斗。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入德国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予敌机以重创，把它们打得七零八散，逐出上空。天天都是这样战斗，一直到皇家空军获得光荣的胜利为止。无论在哪里遇着德国飞机（有时德机一来就是四、五十架），便立刻向它们展开攻击，往往我们的一个中队或者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便打下几十架敌机，敌机的损失不久就达到几百架之多。我们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战斗机的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战果很显著。优势的敌人有些被击败了，有些被打死，尽管他们很勇敢，但也被我们战胜，甚至被我们打得畏缩不前。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可惜，海滩上的部队很少见到这空中的伟大战斗场面，因为战斗时常是在几英里以外或云层上空进行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空军使敌人遭受的损失。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敌机向海滩投下的炸弹，这些敌机从上空飞过，但是也许就飞不回去了。在陆军中甚至对空军有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有些军队在多佛尔或泰晤士河港口登岸时，由于不了解情况还侮辱了穿着空军制服的人。他们应当和空军紧紧握手的，但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在议会中，我千方百计地向大家讲明这一事实。

但是，如果没有海，所有海滩细沙的有利条件和空中的英勇战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十天或十二天以前所下的命令，已在事态的紧急和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结了丰硕的果实。岸上、船上秩序井然。海面很平静。小船来往于海岸与大船之间，在海滩边把涉水过去的士兵运走，把落水的士兵救起来，它们全不

顾敌人的轰炸，虽然轰炸常常使它们遭受牺牲。单是船只数目之多，便足够弥补空袭造成的损失。就整个“蚊式”舰队来说，是打不沉的。正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光荣的事情传到了我们团结一致、不可战胜的岛国人民的耳里，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

虽然小船的工作很出色，然而不要忘记最繁重的任务还是由军舰负担的，它们来往于英国和敦刻尔克港之间，载运了三分之二的士兵。……驱逐舰起了主要的作用。私人船只和他们的商船水手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忽视。

人们以焦急的眼光和逐渐增长的希望注视着撤退的进展。27日晚，海军当局认为戈特勋爵的阵地已十分危急；海军部派往敦刻尔克担任高级海军军官职务的皇家海军上校坦南特紧急电告，要求立即派遣所有能够利用的船只到海滩去，因为“明天夜间是否能撤退将成问题”。情势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了。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派去了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二十六艘其他舰只。28日是很紧张的一天，但是由于皇家空军的有力支援，我们守住了陆上的阵地，因而紧张的局面又逐渐缓和。我方尽管在29日受到了严重损失（三艘驱逐舰和二十一艘其他船只被击沉，还有许多被击伤），但海军的计划却仍然照样执行。

绝没有发生过把法国士兵丢在后面不管的问题。在法国方面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发出什么怨言以前，我就下达了如下的命令：“……应尽量使法国军队和我们共同从敦刻尔克撤退，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他们单依靠他们自己的航运工具。……”

30日我在海军部作战室召集海、陆、空三军大臣和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议。我们研究了当天比利时海岸的情况。军队撤退的总数已达十二万人，其中只有六千法国人，参加工作的各种船只共八百六十艘。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威克-沃克来电说，尽管有激烈的轰炸与空袭，在前一小时也有四千人上船。他还认为，敦刻尔克也许明天就守不住了。我强调迫切需要撤退更多的法国军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对我们和盟国的关系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我还说，当英军的力量缩减到一个军的时候，我们便应当告诉戈特勋爵上船回国，留下一个军长负责。英国军队应坚守阵地，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以便法国军队得以继续撤退。

由于我深知戈特勋爵的性格，所以我亲笔给他下了如下一道命令，由陆军部于30日下午2时正式发出：

应尽最大努力继续防守目前阵地以便使目前顺利进行的撤退工作能撤走最多的人。可每隔三小时通过比利时西部的拉·潘尼报告情况。如果我们仍能保持通讯，当我们认为你指挥的部队已缩减到可以移交给一个军长时，我们将给你下达命令，让你偕同你到时觉得应当撤退的军官返回英国。你现在即应指定这位军长。如果通讯断绝，当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超过三师的人数时，你就应移交指挥，并按照规定的办法回国。这是按正确的军事程序部署的，此事不能由你个人自由行事。从政治上考虑，当你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一小部分时，你被敌人俘虏就等于是让敌人获得一种多余的胜利。应当命令你所选择的司令官继续与法军共同防御，并继续从敦刻尔克或海滩撤退，但是当

他认为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并且不能再给敌人以相当的杀伤时，他有权与法军高级司令官协商正式投降，以免无谓的牺牲。

很可能这封最后的电报对其他的大事和另一位英勇的司令官的命运产生了影响。1941年12月底，我在白宫从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那里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科里几多尔美国驻军即将面临的命运。我认为，我们在一位总司令指挥的部队已经缩减到他原来指挥的一小部分时，我们应当站在他的地位给他们指出这样处置的方法。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都很注意地读了那封电报，我感到惊奇的是，那封电报好象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天，过了一会儿，史汀生就来要一份电报的抄件，我立刻给了他。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这封电报促使他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他部下的一位将军，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后来才得以建立许多辉煌的战功，否则他不死也会成为日本的俘虏，不能参加战争。我希望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30日，戈特勋爵的参谋人员与在多佛尔的海军上将拉姆齐会商后通知戈特说，6月1日白天是可望守住东部外围阵地的最后时间。因此，应采取非常的紧急措施，尽可能保证撤退那时还留在海岸上的大约不到四千人的英国后卫部队。后来发现这个数目的兵力不足以防御最后的掩护阵地，于是决定将英军的防御地区保持到6月1日与2日之间的午夜，同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撤退法军和英军。

5月31日晚，当戈特勋爵遵照命令将指挥权交与亚历山大

少将，回到英国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

在5月31日和6月1日，敦刻尔克的战事虽未结束，但已到最后的高潮。两天来，在英国平安登陆的士兵已超过十三万二千人，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是在猛烈的空袭和炮火下用小船从海滩撤出来的。6月1日清晨起，敌轰炸机拼命轰炸，每当我们自己的战斗机必须飞回加油时，它们便乘隙而来。敌机的袭击使密集的船只遭受严重的损失，几乎等于上个星期损失的总和。单单这一天，由于空袭、水雷、快速鱼雷艇的袭击，或其他不幸事故而沉没的船只就有三十一艘，被击毁的有十一艘。在陆地上，敌人增加了他们对桥头阵地的压力，他们竭力想冲进去。他们遭到盟国后卫部队的拼命抵抗，全部击退。

在最后阶段，撤退工作便进行得很熟练和严密了。这是第一次能够事先作好计划，而不象过去那样临时看情况办事了。6月2日拂晓，约有四千英军配备着七门高射炮和十二门反坦克炮与相当数量的法军坚守缩小了的敦刻尔克外围阵地。撤退工作现在只能在黑夜进行，海军上将拉姆齐决定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船只在当夜一起调到敦刻尔克港。除拖船和小艇外，包括十一艘驱逐舰和十四艘扫雷艇在内的四十四艘舰只于当晚从英国出发。四十只法国和比利时船只也参加了。在午夜以前，英国的后卫队就上船了。

然而，敦刻尔克的战斗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打算在那天夜里撤退更多的法军，其人数要大大超过他们自己提出的要求。结果是，当我们的船只(其中有许多还是空的)要在拂晓撤退时，还有大量法军留在岸上，其中有许多还在与敌人接触中。必须再作一次努力。尽管船员这些天来不断工作，没有休

息，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但他们还是响应了号召。6月4日，有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法国士兵在英国登陆，其中二万一千多人是英国舰只载运的。不幸的是，有几千人留在那里没有撤走，他们在愈来愈缩小的桥头阵地里一直战斗到4日早晨，这时敌人已经进入该城外围，他们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他们英勇地战斗了许多天，掩护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同伴撤退。他们要在俘虏营里渡过今后的岁月。让我们记住：要不是敦刻尔克后卫部队的坚持战斗，我们在英国重建一支保卫本土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军队的工作，就会大受挫折。

最后，在6月4日下午2点23分，海军部在法国同意之下宣布"发电机"作战计划现已完成。

议会于6月4日开会，我有责任先公开，然后在秘密会议中向议员报告全部经过。我的讲话稿现在还存在，这里只摘引其中的几段。刻不容缓的是，不仅应当向我们自己的人民阐明，而且也应当向全世界阐明，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是有可靠的依据的，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挣扎。同时，把我自己对于抱有信心的道理加以说明，也是必要的。

> 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是，在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这一点应当注意到。这个胜利是空军获得的。归来的许许多多士兵未曾见到我们空军的活动；他们看到的只是逃脱我们空军掩护性攻击的敌人轰炸机。他们低估了我们空军的成就。关于这件事我曾听到许多议论；我现在所以要离题来谈谈这件事，其理由就在这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

诉你们。

这是英国和德国空军实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德国空军的目的是要使我们从海滩撤退成为不可能，并且要击沉所有密集在那里数以千计的船只；除此而外，你们能想象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的吗？除此而外，从整个战争的目的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军事重要性和军事意义呢？他们曾全力以赴，但他们终于被击退了；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任务中遭到了挫败。我们把陆军撤退了；他们付出的代价，四倍于他们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已经证明，我们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我们所有的飞行人员比他们现在面临的敌人优越。

当我们说在英伦上空抵御来自海外的袭击将对我们更有好处时，我应当指出，我从这些事实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论据，我们实际可行而又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个论据想出来的。我对于这些青年飞行人员表示敬意。强大的法国陆军当时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大部分溃退了。难道不可以说，文明事业本身将由数千个飞行人员的本领和忠诚来保护吗？

有人对我们说，希特勒先生有一个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过去也时常有人这么盘算过。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平底船和他的大军在布洛涅驻扎一年以后，有人对他说，“英国那边有厉害的杂草。”自从英国远征军归来后，这种杂草当然就更多了。

我们目前在英国本土拥有的兵力比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或上次大战中任何时候的兵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这一事实当然对抵抗入侵的本土防御问题起很有利的作用。但

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能打防御战。我们对我们的盟国负有义务。我们必须再重新组织、重新建立在英勇的总司令戈特勋爵指挥下的英国远征军。这一切都在进行中；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必须使我们本土的防御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组织水平，即只需极少数的人便可有效地保障安全，同时又可发挥攻势活动最大的潜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部署。

我在结束语中有一段话，正如将来可以看到的，对美国的决策起到了及时的重要影响。

尽管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古老的有名的国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10. 竞相抢夺：狼和熊

英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从加里波的和加富尔时候就开始了。意大利北部从奥地利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每一阶段，意大利走向统一与独立的每一步骤，都曾博得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者的同情。这已经养成一种亲密而持久的感应。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原来缔结的三国同盟条约中约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均不卷入对大不列颠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所以参加协约国，受英国的影响最大。墨索里尼的上台和作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建立，在其最初阶段，曾使英国的舆论分成几派，但是并没有响影两国人民之间的广阔的友好基础。我们曾见到，在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计划引起严重争论之前，他曾经和英国一道反对希特勒主义和德国的野心。我在前一卷书中曾谈到了鲍德温—张伯伦对阿比西尼亚采取的政策如何给我们两个大陆都带来了最坏的结果；谈到了我们如何与意大利的独裁者疏远但未破坏他的权力；谈到了没有援救阿比西尼亚使国际联盟受到了多大的损害。我们还看到，在姑息政策期间，张伯伦先生、塞缪尔·霍尔爵士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为了和墨索里尼重修旧好，曾真心诚意地作过一番努力，但结果全属徒劳。最后，墨

索里尼益发自信，认为英国的太阳已经落山，意大利的未来可以借德国的帮助在大英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紧接着便出现了柏林—罗马轴心，从这一点看，显然可以料到意大利在战争爆发的头一天便会参加对英国和法国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使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无可更改地承担义务之前，只要稍稍慎重一点，便一定会先看看战争将如何发展。采取等待的办法，决不会没有好处。双方都在争取意大利，意大利的利益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充分尊重，它签订了许多有利的协定，并且赢得了改进军备的时间。这样，局势未明的几个月过去了。假使意大利保持这种政策，它的命运究竟如何，还值得我们猜测。美国可以利用它大量的美籍意大利人的投票，很清楚地向希特勒表明：想用武力把意大利拉到他那一边去，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坚持中立就可获得和平、繁荣以及力量的不断增长。一旦希特勒与俄国发生纠纷，这种美好的状态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好处愈来愈大；无论在和平或在战争行将结束的一年中，墨索里尼都将成为这个阳光普照的半岛及其勤劳富裕的人民历史上仅有的最贤明的政治家。这种情况要比他后来遇到的实际情况好得多。

在1924年以后的数年中，当我在鲍德温内阁任财政大臣时，我曾在保持意大利与英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上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与沃尔皮伯爵商定的债务结算办法，比对法国采取的办法优厚得多。这位领袖曾向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而且，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谢绝了他给我的最高荣誉勋章。此外，在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同情和信念究竟在哪一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当我在1927年两次会见墨索里尼的时候，我们的个人关系是很亲密和融洽的。在阿比西尼

亚问题上，除非我们最后走上极端，准备打仗，否则我是决不会鼓励英国同他决裂，或者鼓动国际联盟反对他的。对于我鼓吹的重整英国军备的主张，他虽然由于英国舆论不支持我的主张而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和希特勒一样，是理解和非常尊重这一主张的。

我们现在处于法国战事惨败的危机中，我身为首相，显然有责任尽我最大的努力，使意大利置身于战争之外；虽然我并不抱过多的妄想，但是我还是立即运用了我所有的一切手段和影响这么做了。在我出任政府首脑六天以后，我根据内阁的愿望，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呼吁信；这封信连同他的回信一起，两年之后在与当时大不相同的情况下发表了。

首相致墨索里尼先生 1940年5月16日

现在我已出任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回顾我们在罗马的会晤，我甚愿越过这似乎在迅速扩大的鸿沟，对你这位意大利民族的领袖申述我的友好之意。制止在英意两国人民之间造成血流成河的局面，是否为时已晚呢？我们两国之间的不和，无疑将使我们互相残杀、两败俱伤，并使地中海上密布乌云。如果你硬要这么做，其结果必然如此；但是我声明，我从来不是伟大的意大利的敌人，心眼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意大利的立法者作对。目前在欧洲激烈进行的大战，其趋势若何尚难预言，但是我确信，无论大陆上发生什么事情，英国一定要象过去那样坚持到底，即便是单独作战，也要坚持，我有几分把握，相信我们将获得美国、甚至美洲所有各国日益增加的援助。

请你相信，我所以发出这种庄严的呼吁，并不是因为

我们力量软弱或心里恐惧，这一点将来会载诸史册的。凌驾于若干世纪以来所有其他种种要求之上的，是这样一种呼声：拉丁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共同继承者切莫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请倾听这一点，在可怕的信号发出以前，我以一切荣誉和尊敬恳求你。我们绝不要发出这样的信号。

回信是很冷淡的。这封信的优点至少是说话很坦率。

墨索里尼先生致首相 1940年5月18日

我之所以回答你的来信，是为了告诉你，你一定知道使我们两国处于敌对阵营的历史的和偶然的重大原因。不必追溯得太远，我愿提醒你，贵国政府1935年在日内瓦率先提出要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当时意大利不过是为了要在非洲的阳光下获得一小块空间，它丝毫未损害贵国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领土。我也愿提醒你看看意大利在它自己的领海里受人奴役的真实情况。如果贵国政府对德宣战是为了给你的签字增添荣誉，那么，你就应当明白，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对意德条约的同样的荣誉感和尊严感也将指导意大利今天的和明天的政策。

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对于墨索里尼打算在对他最有利的时刻参战，已毫不怀疑了。实际上，当法国军队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他就跟着下了决心了。他在5月13日告诉齐亚诺[①]说，他要在一个月之内对法国和英国宣战。5月29日，他通知

① 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伯爵(Count Ciano)。

意大利的三军参谋长们，他已正式决定在6月5日以后的任何适宜的时候宣战。在希特勒的要求下，宣战的日期延至6月10日。

根据法国政府的建议，我们曾于5月25日联合请求罗斯福总统进行干预。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英国和法国授权他说明：我们了解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领土问题上对我们怀有宿怨，我们打算立即考虑任何合理的要求；同盟国将允许意大利以一种与任何交战国相等的地位参加和平会议，并且我们将邀请总统监督现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的实行。总统照办了；但是他的演说被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极端粗暴地拒绝了。在我们与雷诺会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总统的答复。法国总理现在提出了更明确的建议。显然，如果用他的那些建议来矫正意大利在“它自己的领海里受人奴役的情况”，那肯定会影响直布罗陀和苏伊士的地位。法国准备就突尼斯问题作同样的让步。

我们对这类意见不能表示丝毫的赞同。这并不是因为不应当对它们加以考虑，也不是因为在这种时机似乎不值得花那么大的代价去使意大利不参加战争。我自己的感觉是：根据我们当前的处境来看，如果我们战败了的话，任何东西墨索里尼都可以亲自去拿，或者由希特勒送给他。在快要死亡的时候，是很难与人讨价还价的。一旦与领袖开始了友好调停的谈判，我们就会破坏我们继续作战的力量。我发觉我的同僚都很坚决，毫不动摇。我们的想法更偏重于当墨索里尼宣战时，马上就轰炸米兰和都灵，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这并未阻止法国政府在几天以后直接向意大利提出领土的

让步，让墨索里尼以轻蔑的态度对之。齐亚诺在6月3日向法国大使说，“墨索里尼对通过和平谈判从法国收回任何领土的建议不感兴趣。他已决定对法宣战。”这正是我们预料到了的。

虽然美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关于这一点赫尔①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动人的记述），但却未能使墨索里尼回心转意。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应付这场新的攻击和纠纷的准备工作早已相当充分了。6月10日下午4时45分，意大利外交部长通知英国大使说，意大利认为它从当天午夜起就与联合王国处于战争状态了。对法国政府也送达了同样的照会。当齐亚诺把照会递交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时，弗朗索瓦-蓬塞先生一面走向门口一面说道：“你们也将发现德国人是难以侍候的主人。”墨索里尼在罗马从他的阳台上向组织好了的群众宣称，意大利与法国和英国已处于交战状态。据说，齐亚诺后来曾辩解说：这是“五千年才有一次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虽属稀少，但不一定是好机会。

意大利立即进攻阿尔卑斯阵地的法国军队，大不列颠也立即对意大利宣战。被阻拦在直布罗陀的五艘意大利舰只被夺取了，海军奉命截夺海上所有的意大利船只，并将它们带到我们控制的港口。12日夜晚，我们的轰炸机队从英国起飞，经过长距离飞行（即轻载飞行）之后，在都灵和米兰投下了它们的第一批炸弹。我们预期，等我们能够利用法国马赛机场时，我们就要享之以重大得多的炸弹。

在这里简短地谈谈法意战役，也许比较方便。法国只能集

① 美国国务卿（Cordell Hull）。

结三师军队以及另外相当于三个师多一点的要塞部队，抵御意大利西部集团军从阿尔卑斯山山口和里维埃拉沿岸发动的进攻。该集团军在翁伯托亲王指挥之下共有三十二个师。此外，德国强大的装甲部队，迅速地沿罗纳谷而下，马上就要横断法国的后方。虽然如此，意大利人还是遭到了抵抗，甚至在新阵线的每一点上都被法国的阿尔卑斯部队牵制住，就是在巴黎已经陷落、里昂也落入德军之手以后，意军还无法进展。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18日在慕尼黑会面时，这位意大利领袖没有什么可吹嘘的。因此，意大利于6月20日发动了新攻势。然而法军的阿尔卑斯阵地证明是不易攻陷的，意军向尼斯的主力攻击停顿在芒通的郊外。虽然法军在东南边境上保住了它的荣誉，然而德军却从南面抄了它的后路，从而使他们不能再进行战斗，同时，与德国缔结的停战协定也连带有法国向意大利要求停止敌对行动的条款。

我对意大利悲剧的叙述，也许可以用不幸的齐亚诺在他的岳父下令处决他之前不久写给我的一封信来结束。

丘吉尔先生： 维罗纳，1943年12月23日

你也许不会感到惊奇：当我临近死期的时候，竟要向你略道衷曲，因为我对你景仰备至，把你看作是一次十字军的战士，虽然你有一个时期曾对我说过不公正的话。

在违背祖国和违反人道的罪行中、在与德国人共同作战中，我从来不是墨索里尼的帮凶。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说我去年8月在罗马失踪，那是因为德国人使我相信我的孩子们已处于紧急的危险中。他们满口答应把我送到西班

牙去，但是却违反我的意志将我和我的家属放逐到巴伐利亚。现在，我在维罗纳的狱中已将近三个月了，备受党卫军的野蛮虐待。我的末日已经临近。有人告诉我说，数日之内我的死期即将决定，然而在我看来，这正好使我免受这每天的苦难折磨。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意大利在德国兵的统治下蒙受耻辱和不可补偿的损害。

我现在要赎我的罪：我曾亲眼目睹而且深深痛恨希特勒和德国人为发动这次战争所作的冷酷的和残忍无情的准备。在密室中看到这些万恶的匪帮准备将世界投入一场血战的外国人，只有我一个。按照匪徒的规矩，他们现在计划要镇压一个危险的证人。但是他们估计错了，因为我在很早以前就把我的日记和各种文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它们比我本人更能证明这些人所犯的罪行，证明后来那既可悲又卑鄙的傀儡墨索里尼为了他的虚荣和无视道德的价值而加入他们那一伙的情形。

我已作了安排，在我死之后，这些文件（佩西·洛恩爵士出使罗马时就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就尽快由盟国的报纸发表。

也许我今天向你贡献的只是很少的一点，但是我只有这一点以及我的生命能贡献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我深深相信这种事业是要得到胜利的。

应当把我的这一证词发表出去，让世人知道，让世人痛恨和记住，并且让那些对未来下判断的人不致忽略这一事实：意大利之所以遭到不幸，不是它的人民的过失，而是由于一个人的可耻的行为。

你的诚实的格·齐亚诺

罗斯福总统于10日夜间发表了一篇演说。约在午夜时分，我和一部分军官在海军作战室收听这篇演说，当时我仍在海军部办公。他强烈地谴责意大利，说："1940年6月10日这一天，手持匕首的人将匕首刺进了他的邻人的后背，"这时室内发出了一阵满意的叫声。我不知道在即将来到的总统选举中美籍意大利人的投票如何；但是我知道罗斯福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美国政党政治家，为了实现他的决心，他是从来不怕风险的。这是一篇很漂亮的演说，它充满了情感，并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讯息。趁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我在临睡前给总统写信表示我的谢意。

前海军人员①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6月11日

昨天夜里我们都收听了你的演说，你的宣言的伟大远见加强了我们的信念。你关于美国将给予斗争中的盟国以物质援助的声明，对于目前处于黑暗但还不是绝望时刻的盟国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必须竭尽所能使法国继续战斗，并防止任何这样的想法，即巴黎一旦陷落就成为谈判的时机。你对他们激起的希望，将赋予他们以坚持的力量。他们应当继续保卫他们的每一寸土地并发挥他们陆军的全部战斗力量。这样，想速战速决的希特勒将受挫折，从而转向我们，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抵抗他的凶焰，保卫我们的本土。由于救出了英国远征军，我们本土并不缺乏军队，一俟各师有了适合大陆军事需要的更好的装备后，就把它们派往法国。

① 丘吉尔在与罗斯福的通讯中，惯用这一称号来称呼自己(Former Naval Person)。

我们的打算是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法国作战，进行1941年的战争。关于飞机，包括飞艇在内，我已给你发去电报，它们在当前大不列颠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但是更迫切需要的是驱逐舰。意大利的暴行使我们必须有驱逐舰以应付更多的潜艇，这些潜艇可能进入大西洋，而且，也许还会在西班牙的港口建立它们的基地。唯一能对付潜艇的舰只是驱逐舰。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不过的，就是要把你们为我们重新装备的三十或四十艘旧驱逐舰拿到手。我们可以很快地给它们装上我们的潜艇探测器，这在我们战时新建造的舰只下水以前，可以在这六个月内弥补我们舰只之不足。不论任何时候你需要这些舰只，请提前六个月通知，我们一定把原舰或价值相等于原舰的舰只归还给你，决不延误。今后的六个月是最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一面要保卫东海岸免遭敌人入侵，同时又要应付德意潜艇对我们商船的新的严重袭击，则非我们力之所能，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交通就可能被切断。一天也不容损失。我和我的同僚对你为我们当前确应称之为共同事业正在作的以及想要作的种种努力，谨表衷心的感谢。

竞相抢夺的场面开始了。但是墨索里尼并不是唯一争食的饿狼。和狼合伙的还有熊。

我在前一卷中曾经叙及截至战争爆发及敌对行动开始以前的英苏关系，到那时，苏联和英法的关系，在俄国侵略芬兰期间实际上已濒于破裂。这时，德国和俄国在它们深刻的利害冲突能容许的范围内紧密合作。作为极权主义者，希特勒和斯大林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的政府制度也颇类似。在每一个重要

场合，莫洛托夫对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总是笑脸相迎，冒失而卑鄙地赞同德国的政策并称赞希特勒的军事措施。当德国进攻挪威时，他（4月7日）说：苏联政府了解德国是被迫采取这种措施的，说英国人的确作得太过分了，说他们完全忽视了中立国的权利……“我们希望德国在它的防御措施中完全成功。”5月10日上午，希特勒煞费苦心地把他开始对法国和保持中立的荷、比、卢三国发动的进攻通知了斯大林。舒伦堡写道：“我拜访莫洛托夫。他赞赏这个消息，并且还说，他了解德国必须反抗英法的攻击以保护它自己。他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成功。”

虽然他们所说的话的含意在战争结束以前自然无法知晓，但是我们对于俄国的态度却丝毫不抱幻想。我们仍然遵循一种耐心的政策，试图与俄国重建互相信赖的关系，把希望寄托在事态的演变和俄国与德国根本的对立上面。我们认为聪明的办法是借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①的才能，派他充任驻莫斯科的大使。他愿意接受这一前途黯淡又无成功希望的任务。那时我们还未充分体会到，苏联共产党人恨极左翼的政治家比恨保守党人或自由党人还甚。一个人在情感上越和共产主义接近，便越受苏联人的厌恶，除非他加入了党。苏联政府同意接受克里普斯为大使，并将这一步骤向他们的纳粹同伙进行了解释。5月29日舒伦堡向柏林报告说，“苏联甚愿以木材换取英国的橡胶和锡。克里普斯的出使苏联，没有使人忐忑不安的理由，因为没有理由怀疑苏联对我们的忠诚态度，并且由于苏联不改变其对英政策的方向，因此对德国或德国的重大利益决无危害。此间没有任何迹象足以使人相信最近德国的成功曾在苏联政府中引起对于德国的惊慌或恐惧。”

① (Sir Stafford Cripps)。

法国的崩溃和法军的毁灭以及西方一切势力均衡的破坏，应该会在斯大林的头脑里产生某种反应的，但是苏联的领袖们似乎对他们自己的危险没有任何警觉。在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时，舒伦堡报告说，“莫洛托夫今晚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从这时起，差不多正好在一年之后，同一武装力量，完全出乎苏联政府的意料之外，把瀑布似的炮火和钢铁倾泻在俄国的领土上。我们现在才知道，希特勒在1940年击败法国仅仅四个月之后，便毅然决定了要对苏联进行歼灭战，那些曾经一度被苏联热烈祝贺过的德军，向东方开始了路程遥远、规模庞大、秘密布置的进军。苏联政府和它的共产党代理人以及它遍布世界的伙伴们对他们错误的估计和过去的行径进行回顾之后，不能不高呼开辟第二战场；曾被他们认为注定要遭受毁灭和奴役的英国，却在这第二战场中要扮演主要的角色。

然而，我们比那些冷酷无情的策划人更能真实地洞察未来，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的危险和他们的利益。这时我第一次向斯大林写信。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 1940年6月25日

当此欧洲面貌时刻都在变化的时候，我愿乘你接见英王陛下的新大使的机会，请他转交我本人写给你的一封信。

从地理上看，我们两国位于欧洲的两端，再从政治制度来看，可以说我们两国代表着极不相同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我相信，这些事实不会妨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中达成和谐与互利。

必须承认，在过去（诚然是在最近的过去）我们的关系

由于互相猜疑而受到危害。去年8月，苏联政府决定，为了苏联的利益，应该中止与我们的谈判而与德国结成密切的关系。因此，德国几乎是在成为我国的敌人的同时成了贵国的朋友。

但是从那时起便发生了一种新的因素，使我敢于设想，我们两国都愿意重新建立以前的联系，以便在必要时，我们能就那些必然与我们双方都有利害关系的欧洲事务进行商谈。目前摆在全欧洲(我们两国也包括在内)面前的问题就是欧洲的国家和人民对于德国在大陆建立霸权的形势将如何反应。

由于我们两国都不是位于欧洲之中而是位于它的两端，所以我们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没有我们幸运，因此我们能够比它们更好地抵抗德国的霸权；正如你所知道的，英国政府的确想利用其地理位置和庞大资源来达到这一目的。

事实上，大不列颠的政策集中于两个目的，一个是使英国免遭纳粹政府企图强加在它头上的日耳曼统治；另一个是把欧洲的其余部分从德国正在强加给它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德国目前试图在欧洲建立霸权是否威胁苏联的利益，这只有待苏联自己来判断，如果威胁的话，应该用什么最好的办法来保卫，也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已感觉到，欧洲(实际是全世界)目前经历的危机是如此严重，因此，我认为应将英国政府所感受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你坦白陈述。我希望这样做可以保证：苏联政府在与斯·克里普斯爵士的任何商谈中，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或者对英

国政府准备就德国目前试图在欧洲推行分阶段征服与吞并的严密计划而引起的广泛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充分磋商的愿望，不致有所误解。

当然没有答复。我也并未期待答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平安到达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举行了一次纯属礼仪性的冷淡的会见。

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正忙于攫取掳获物。在6月14日，即巴黎陷落那天，莫斯科对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指控它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对苏联搞军事阴谋，要求它彻底改组政府并作军事上的让步。6月15日，红军进犯立陶宛，斯梅托纳总统逃往东普鲁士。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遭到同样的待遇。必须立即成立亲苏政府并准许苏军进驻这些小国。抵抗是谈不到的。拉脱维亚的总统被放逐到俄国，维辛斯基先生到来，指定了一个临时政府，办理新的选举。在爱沙尼亚也如法炮制。6月19日，日丹诺夫到达塔林，建立了同样的政权。从8月3日到6日，拿掉了亲苏的友好的和民主的政府的假幌子，克里姆林宫将波罗的海各国并入苏联。

俄国对罗马尼亚的最后通牒于6月26日夜10时送交罗马尼亚驻莫斯科的公使。要求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省北部，并要求于第二天立即答复。德国虽然被俄国的这种威胁了它在罗马尼亚的经济利益的突然行动所激怒，但受到了1939年8月的德苏条约的约束；该条约承认俄国在东南欧这些地区享有独占的政治利益。因此，德国政府遂劝罗马尼亚屈服了。6月27日，罗马尼亚部队从上述两个省撤退，罗马尼亚领土沦入俄国之手。苏联武装部队现在牢牢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多瑙河河口。

11．英国单独作战——最光辉的时刻

1940年夏法国沦陷后①，我们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各自治领、印度或各殖民地都不能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援或及时的供应。得胜的德国军队，装备十分完善，后方还有许多缴获的武器和兵工厂，现在正在大批集结，准备对我们作最后的一击。拥有强大军队的意大利已经向我们宣战，一心要在地中海和埃及把我们打垮。在远东，日本心怀叵测地瞪着眼睛瞧我们，并且直截了当地要求封锁滇缅公路，断绝对中国的物资供应。苏俄对纳粹德国负有条约义务，并且在原料方面大力支持希特勒。西班牙已经占领了丹吉尔国际共管区，可能随时与我为敌，并且要求取得直布罗陀，或者请德军协助它进攻直布罗陀，或者架设大炮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通道。在贝当和波尔多政府统治下的法国新近迁至维希，随时有可能被迫向我们宣战。土伦残存的法国舰队看来行将落入德国人之手。的确，我们的敌人真不少。

① 6月16日，法国政府中的一帮失败主义者在波尔多拥立贝当元帅为政府首脑，代替坚持抗战的雷诺总理，并立即向德国求和；7月1日在维希成立傀儡政府，并于7月5日正式与英国断绝关系。7月11日，贝当元帅代替总统勒布伦，成了国家元首。

奥兰事件① 以后，各国已经看清，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决心战斗到底。然而，在英国虽说不存在士气不振的弱点，可是又如何克服这些严重的具体困难呢？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陆军除了步枪以外，其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事实上，全国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野炮还不足五百门，中型和重型的坦克不到二百辆。要好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工厂才能制出弥补我们在敦刻尔克损失的那些军火。全世界普遍认为我们的末日已经到来，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极端惊慌不安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美国，其他所有幸存的自由国家亦复如此。美国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暗自忖度：为了沉迷于一种慷慨又无望的感情而枉费自己非常有限的资源，是否合适？他们不是应当尽心竭力、爱护每一件武器，以补救他们自己的疏于备战吗？要撇开这些令人信服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论点，就需要有非常正确的判断。那位贤明的总统和他的重要官员与高级顾问，即便面临第三届总统大选，也从未对我们的命运和意志失去信心，英国对他们实在感激不尽。

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我能表现它是一种光荣，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在战前的岁月里曾陷入极端和平主义而又缺乏远见，他们沉迷于政党政治的角逐；他们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现在他们面对着一项任务：要同时清算他们过去的善良心意和疏忽的安排了。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沮丧。他们藐视那些欧洲的征服者。看来，他们宁愿血染他们的英伦本土，也不愿

① 为了避免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之手，从1940年7月3日开始，英国执行“弩炮”作战计划，对停泊在奥兰等港口的法国舰队进行奇袭，夺取、控制之，或有效地使之失去作用或予以击毁。

投降。这在历史上会写下光荣的一页的。这一类故事过去有的是，雅典人曾经被斯巴达所征服。迦太基人曾经独力抗击过罗马。在过去的史册上不乏这样的记载——还有好多悲剧根本没有记载或被人们永远遗忘：有些英勇、自豪和遇事达观的国家，甚或整个民族遭到消灭，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的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失传了。

我们岛国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了解这一点的英国人并不多，而外国人则更少；甚至在战前那些举棋不定的年代里，怎样在海防以及后来在空防上保持重要设施这一点，也不是人们普遍认识得到的。不列颠人在英格兰土地上看到敌人的营火，已经是将近一千年以前的事了。在不列颠抗战的高潮时，每一个人都表现得很沉着，宁愿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决一死战。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全世界无论是敌是友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这种心情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命运现在取决于能否赢得空战的胜利。德国领导人已经看出，他们能否实现入侵不列颠的一切计划，完全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和他们在我国南部海岸选定的登陆地点的上空。不能防御英国空军的袭击，就不可能进行登船港口的布置、运输舰只的集结、航道的扫雷和敷设新的水雷区。完全掌握运输舰只上空和海滩上空的控制权，是实现横渡海峡和登陆的决定条件。因此，结果如何，要看是否能够摧毁皇家空军和伦敦与海岸之间的机场系统。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在7月31日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八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

就势必要推迟到1941年5月。”现在要打的就是这场战争。

我个人在心理上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毫不畏惧。我曾在6月4日对议会说：“庞大一时的法国陆军，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就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了。难道文明事业不也是能够由几千名飞行员用他们的本领和忠心来保卫住吗？”我又在6月9日对史末资①说：“我现在只看到一条唯一可靠的出路，那就是：让希特勒来进攻我国，在他来进攻的时候摧毁他的空中武器。”这个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

在法兰西之战中，德国空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和德国海军在挪威战役以后一样，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休整。这段间歇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除三个中队以外，全都先后参加了欧洲大陆的战斗。希特勒没有想到，在法国崩溃以后，不列颠还是不接受和平建议。象贝当元帅、魏刚以及法国的其他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不理解一个岛国单独具有的，不依靠外援的智慧；而且，同这些法国人一样，他错误地判断了我们的意志力。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而且从慕尼黑以后学到了不少的东西。6月间，希特勒在逐渐看清了新的形势后，便针对这种新形势作出努力，同时，德国空军也恢复了战斗力，并为他们的下一个任务进行了部署。下一个任务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必须进攻并征服英国，否则他就要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难以预测的危险与困难。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在空中战胜英国，就可使英国停止抵抗；至于真正侵犯，即使实际可行的话，也没有必要，除非他要占领这个已经

① 英国陆军元帅；南非总理（J. C. Smuts）。

战败的国家。

德国空军在6月和7月初已经恢复了战斗力，进行了整编，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有飞机场，准备从那里起飞进攻，并用侦察和试探性的袭击来估量将要遇到的抵抗的强弱和规模。直到7月10日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猛烈的袭击，因此，通常就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另外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是8月15日和9月15日。在德国人的攻势中，还有三个彼此衔接而又互相重叠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是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舰队和位于多佛尔到普利茅斯之间的我国南部港口进行骚扰，考验我们空军的力量，引它出战，把它消耗光；这样还可以使那些被划作即将入侵的目标的沿海城镇受到破坏。第二个阶段从8月24日到9月27日，是想消灭皇家空军及其设施，从而打通一条通向伦敦的道路，对首都进行猛烈的、连续不断的轰炸。这样还可以切断首都与遭受威胁的沿海地区的联系。但是在戈林看来，他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做还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那就是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陷入混乱和瘫痪，使英国政府和人民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屈服于德国的意志。德国海军和陆军参谋人员都一心希望结果如戈林之所料。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发现皇家空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为了毁灭伦敦，就顾不上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海狮"① 作战计划的执行了。接着，当所有一切都失望了的时候，当他们由于缺少最重要的条件——制空权——而无限期地推迟入侵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想在白天空战中获得胜利的希望幻灭了，皇家空军仍然精

① 即希特勒关于德国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登陆并加以占领的作战计划。

神抖擞，使他们感到头痛，戈林无可奈何，于是在10月份就对伦敦和各工业生产中心不分青红皂白地狂轰滥炸。

我们应当把9月15日看作是最高潮的日子。在那一天，德国空军继14日的两次猛烈空袭后，集中最大力量对伦敦再次进行白天空袭。

这是这次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之一，而且，和滑铁卢之战一样，也是在星期天。那天我在契克斯。在这以前，我曾到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部去过几次，想要亲眼看看指挥空战的情况，但是那几次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不过，今天的天气似乎对敌人有利，于是我便驱车前往阿克斯布里奇，到大队指挥部去。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所辖的战斗机中队有二十五个之多，它负责的地区包括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汉普郡以及所有经过这些地方通往伦敦的道路。空军少将帕克指挥这个与我们命运攸关的战斗机大队已经有六个月了。从敦刻尔克之役开始，所有英格兰南部白天的战斗全都由他指挥，他的一切部署和指挥系统都已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我的妻子和我被带到距地面深达五十英尺的防弹指挥室去。如果没有这种地下指挥中心和电话系统，"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一切优越性能都无法发挥，这种系统是战前在道丁① 的建议和敦促下由空军部设计和建造的。不朽的功绩应归于全体有关人员。在英格兰南部，当时有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和它所属的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它们的担子都很重。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代表最高统帅部行使职权，但是它明智地把实际

---

① 英国空军上将（Dowding）。

指挥战斗机中队的权力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而大队又通过驻在各郡的战斗机驻防中心控制各个中队。

大队作战指挥室象一座小剧场，纵深约六十英尺，一共有两层。我们坐在楼上的特别座厢里。在我们下面是一张大型地图台，台的周围约有二十名受过高度训练的青年男子和妇女，以及他们的电话助手。在我们的对面，在应当悬挂舞台帷幕的地方有一块遮盖了整面墙壁的大黑板，黑板分成六个装有灯泡的纵行，代表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这些驻防中心的每个战斗机中队又有它自己的小格，并且用横线划开。这样，当最下面的一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就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命令下达后两分钟内“立即起飞”，第二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则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准备完毕”，能在五分钟内起飞，再上面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二十分钟内起飞，又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起飞，再上面一排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发现敌机，再一排灯泡——红色灯泡——表示哪些中队正在战斗，而最上面的一排灯泡则表示哪些中队已在返航。左边，在一个类似玻璃座厢的小屋子里，有四、五名军官负责分析、判断从我们的对空监视哨收到的情报，这时候，在我们的对空监视哨工作的，男的、女的和年轻的一共有五万多人。当时雷达还处在初期阶段，但它可以发出发现敌机飞近我国海岸的警报，而敌机飞临我们上空的情报，则主要靠那些携带着望远镜和手提电话机的对空监视员提供。因此，在一场战斗中要收到好几千件情报。在这个地下指挥部的其他地方，有好几间屋子里挤满了经验丰富的人，他们迅速地把得到的情报加以甄别，每分钟一次把结果直接传达给楼下围在桌子周围的座标员和从玻璃座厢里指挥的军官。

右边是另外一个玻璃座厢，里面是陆军军官，负责报告我们高射炮队的作战情况，那时候，我们的高射炮队有二百个是隶属空战司令部的。在夜间，不能让高射炮向我们的战斗机飞去接近敌机的那些空域开炮，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我过去对这个指挥系统的大致轮廓并不是毫无所知，因为我在战前一年到斯坦莫尔拜访道丁时，他已经向我讲解过了。这个指挥系统在不断的作战中得到了发展和改进，现在它的各个部门已结合成一部最完备的作战机器，象这样的机器，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

当我们走下楼去时，帕克说："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还平静无事。"然而一刻钟以后，空袭座标员开始来回走动。据报告，"四十多架"敌机正从迪埃普地区的德国机场飞来。当各个中队完成"立即起飞"的准备时，墙上的指示牌底层的那一排灯泡也随着亮了。紧接着传来"二十多架"、"四十多架"的信号，很显然，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了。天空中开始布满了敌我双方的飞机。

信号接连传来，"四十多架"，六十多架"，甚至有一次是"八十多架"。在我们下边的那张桌子上，每分钟都在沿着不同的飞来的路线推动座标，标明所有分批入侵的敌机的行动；在我们对面的黑板上，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的灯光表示我们的战斗机中队已经飞入上空，直到最后只留下四、五个中队处于"准备完毕"的状态。这些关系如此重大的空中战斗，从开始接触起，只打了一小时多一点。敌人有充分的力量再派出几批的飞机进攻，而我们的战斗机中队，由于全力抢占高空，因此在七十或八十分钟后必须加油，或在作战五分钟后降落，补充弹药。如果在这加油或补充弹药的时候，敌人再新派来几

中队无法阻拦的飞机的话，我们有些战斗机就有可能在地面被击毁。因此，在指挥我们的战斗机中队时，要注意的主要事项之一，就是在白天不要使过多的飞机同时在地面加油或补充弹药。

不久，红灯表明我们大部分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楼下有人在压低嗓门咕咕哝哝地说话，在那里，忙碌的座标员正在根据迅速变化的情况来回地推动座标。帕克空军少将发布了如何部署他的战斗机队的总的指示，坐在楼上“特别座位”中心的一位青年军官根据他的指示，作成详细的命令，传达给各战斗机队的机场，我那天就坐在这位青年军官的旁边。几年以后，我才打听到他的名字。他名叫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后来在1947年，赛马俱乐部——他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位干事——邀请我观看德比赛马会时，我又见到过他。他对于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感到惊奇。)这时，他根据地图台上出现的最后情报，命令个别中队起飞巡逻。空军中将本人则在后面踱来踱去，警惕地观察这场战斗的每一个动态，注意地看着他这个执行命令的部下是不是作得正确，他只是偶尔下达一些明确的命令，无非是对某一个受威胁的地区进行增援。转眼之间，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有些已经开始飞回来加油了。所有的战斗机都在天空中。下面一排灯光熄灭了。留作后备的中队，一个也没有了。这时，帕克打电话给驻在斯坦莫尔的道丁，要求从第十二战斗机大队抽调三个中队归他指挥，以防万一当他自己的战斗机中队正在补充弹药或加油时，敌人再来一次大袭击。他的要求照办了。当时特别需要这三个中队来保护伦敦和我们的战斗机机场，因为第十一大队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

那位年轻的军官就象是在处理例行公事一样，继续按照大队司令官的总的指示，用一种很平静、低沉而无变化的语调发布命令，而三个增援的中队很快就加入了战斗。这时，我觉察到司令官有点焦灼不安，仍然静静地站在他那位部下的椅子后面。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是默默地察看。现在我问道：“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后备队吗？”“一个也没有，”帕克空军少将回答道。他在事后所写的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记述里说，我听到这句话时“显得很沉重”。我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加油的飞机在地上又受到敌机“四十多架”或“五十多架”的袭击的话，我们的损失将多么惨重！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们幸免的机会很少；真是危险极了。

又过了五分钟，我们大部分的中队都已降落，需要加油。在许多场合下，由于我们的力量所限，无法对它们给予空中掩护。后来发现敌机飞回去了。下边桌子上移动着的座标表明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地向东移动。没有出现新的袭击，又过了十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我们重新登上通向地面的楼梯，我们刚一走出去，“解除警报”的信号便响了。

“首相，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亲自看到了这次空战，”帕克说道，“当然，在最后二十分钟，情报来得太多，使我们感到应付不了。你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力量的极限。今天使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限度。”我问他们是否已经接到关于战果的报告，我接着说，看来这次打退敌人进攻的空战打得很好。帕克回答说，他感到不满意的是，我们截击到的敌机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多。显然，敌机到处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据报告说，有好几十架德国轰炸机及其护航战斗机进入了伦敦上空。当我在地下室时，有十多架敌机被击落，但当时无法得知

关于战果、破坏或损失的全部情况。

下午4点30分我才回到契克斯，我立刻就上床睡午觉。我因为观看第十一大队的作战经过，弄得太疲倦了，所以一直睡到8点钟才醒。当我按铃的时候，我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拿着世界各地消息的夜间汇报进来。这个汇报真是不如人意。不是这里出了差错，就是那里耽误了时机；或是说某某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在大西洋又沉没了许多船只。“但是”，马丁在他结束这段叙述时说，“这一切都由空战补偿了。我们一共击落了一百八十三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四十架。”

虽然战后的资料表明敌人在那天的损失仅仅是五十六架，但9月15日仍不失为不列颠之战的关键一天。当天晚上，我们的轰炸机队大规模地袭击了从布洛涅到安特卫普的各港口的船舶。安特卫普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元首在9月17日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作战计划。直到10月12日才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7月，希特勒再度把它推迟到1942年春，“到那时对俄国的战争就将结束了”。这是一个徒然的、但是是很美妙的幻想。1942年2月13日，雷德尔海军上将为“海狮”作战计划最后一次谒见希特勒，并且说服他同意将整个计划完全“搁起来”。“海狮”作战计划就这样完蛋了。而9月15日就可以算作它断命的日子。

……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五十七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在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回敬，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相比，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他在内心是佩服我们的。当然，他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作文章，并且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政策——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确曾拼命这么做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新的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强大。

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生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

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我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① 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四十码宽，二十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

11月3日晚，伦敦几乎在两个月内第一次没有响警报。许多人对这种平静觉得奇怪。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次日晚，敌人的空袭遍及我们这个岛的各个角落；这种空袭继续了一个时期。德国又一次改变了它的空袭办法。现在，虽然伦敦仍然是主要目标，但他们却把主力用于摧毁英国的工业中心。德国曾训练了配备新式导航设备的特殊轰炸机中队来袭击指定的重要

① 丘吉尔的高级参谋官（General Ismay）。

地点。举例来说，他们训练了一个编队，专门用来摧毁格拉斯哥市希林顿地方的罗尔斯—洛埃斯飞机发动机工厂。这纯粹是一种一时之计，一种过渡办法。入侵不列颠的计划暂时是放弃了，而对俄国的进攻则尚未开始，除希特勒的亲信以外也没有人这样想。因此，残冬季节对德国空军来说是一个试验时期，试验夜间轰炸的技术装置，试验对英国海上贸易的袭击，并企图破坏我们的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如果他们每次只专心于一件事，并且干到底，也许效果更好得多。但是，他们已经受到挫折。暂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这些新的轰炸战术是从11月14日夜对考文垂进行闪电轰炸开始的。伦敦这个目标似乎太大，漫无边际，因此很难收到决定性的效果，于是戈林希望能有效地摧毁各地方城市或军火生产中心。空袭是在14日黄昏时分开始的，到天亮时，将近五百架德国飞机共投了六百吨烈性炸药炸弹和好几千颗烧夷弹。总的说来，这是我们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考文垂的中心区被炸得粉碎，在一个短时期内所有的一切活动完全停止。被炸死的有四百人，受重伤的人数更多。德国的广播电台说，我们的其他城市也将同样遭到“考文垂那样的轰炸”。虽然如此，所有重要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并未停顿；在此以前从未受过轰炸考验的居民也未停止活动。紧急重建委员会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恢复考文垂的日常生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1月15日，敌人趁皓月当空，又回头向伦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堂及其他名胜古迹。下一个目标是伯明翰，由11月19日到22日接连三次空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伤亡。将近八百人被炸死，两千多人被炸伤；可是伯明翰

的生活和精神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一两天后，当我到这个城市去视察工厂并亲自看看轰炸的结果时，发生了一件很令我高兴和感动的事情。那时正是在吃晚饭的时间，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向我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我马上叫汽车停了下来，她说道："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英镑。我很高兴地(以首相的身分)亲吻了她。之后，我就去看那长长的集体坟墓，在那里面刚刚埋葬了许许多多的市民和他们的儿女。伯明翰精神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它那高度组织起来的、自觉的、明察事理的一百万居民则丝毫未被他们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所吓倒。

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12月初，空袭的重点转移到各港口。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尤其是利物浦，都受到了猛烈的轰炸。后来普利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的军火生产中心也都毫无畏惧地通过了炸弹的考验。不论敌人袭击什么地方，我们国家都坚如磐石，硬似钢铁。

12月29日，星期天，这几个星期的空袭又再一次在伦敦达到了高潮。所有德国人苦心积累的经验都在这次轰炸中用上了。这是一次典型的纵火行为。空袭的重点集中在伦敦中心金融商业区本身。轰炸的时间正好是潮水最低的时刻。一开始就用带降落伞的重型烈性炸药包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我们要扑灭的大火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处之多。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八座"雷恩"式教堂被炸毁或受到破坏。市政厅被毁于大火和炸弹，而圣保罗教堂全靠大家的英勇努力才得救了。直至今日，在大英帝国的最中心还有一片空旷的废墟。但

是，当英王与王后来现场视察时，人们欢迎他们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任何皇家的盛典。

在这个还有好几个月才能结束的漫长的考验里，英王经常是留在白金汉宫。虽然白金汉宫的地下室里正在修建适当的隐蔽处，但需要许多时间才能建成。而且，有好几次英王陛下由温莎到伦敦时，正好遇到空袭。有一次他和王后差一点被炸。……

大约在这时候，英王改变了他接见我的方式，在我上任的最初两个月里，通常是每周正式接见我一次，时间是在下午5点左右。现在的安排是每逢星期二我和他共进午餐。这的确是一个共商国家大事的好办法，有时候王后也在座。有好几次，我们不得不端着我们的盘子和酒杯到尚未竣工的防空室中去吃完我们的午餐。这每周一次的午餐变成了一种经常的制度。过了最初几个月以后，英王陛下决定用餐的时候一个侍从也不要，由我们自己上菜，互相招待。这事一直继续了四年半。在这中间我觉察到英王非常专心地阅读所有呈交给他的电报和公文。按英国的宪法制度，君王有权了解他的大臣们所负责的一切事务，并拥有向政府提出意见的无限权力。我特别注意，要使国王了解一切情况，而在我们每周的会见中，我常常看出他已彻底洞悉那些我还没有批阅过的文件。在这些决定英国命运的年代里，能有这样好的国王和王后真是英国之福，而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坚决拥护者，我把我——他的首相——受到英王这么亲切的接待，看作是无上的光荣，我认为这是安娜女王在位，马尔巴罗执政以后，就没有见过的亲密关系。

这样我们就到了这一年的年末。为了照顾到情节的连贯，我已叙述到整个战局的前面了。读者将看到，所有这些霹雳和

暴风雨反而愈加衬托我们泰然处之的冷静态度，我们的作战活动就是靠这种冷静态度进行的。真的，我必须写明，在最高当局，这些伤害未能致人于死地，反之，它们倒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我们有明确的看法、忠实的友谊和明智的措施。然而，要是以为敌人的空袭比现在猛烈十倍或二十倍——甚或只猛烈两、三倍——也同样会产生我在这儿描述的健康的反应的话，那也是不智的。

议会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应怎样进行工作，也需要加以指导……我对议员们的安全始终惦念在心。归根结底，通过公正的普选产生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可以随时推翻政府，但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却以支持政府为荣，这是可与敌人争一日之长的一点。议会胜利了。

我怀疑任何一个独裁者是否能在他自己的整个国家里行使象英国战时内阁行使的那么多有效的权力。当我们一说出我们的意图时，人民的代表就支持我们，全体人民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服从。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侵害批评权利的事。批评家们几乎是始终不渝地以国家利益为重。当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时，上下两院便以绝大多数的票予以否决，这一点，与集权统治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或利用警察和特务。每当我想到议会民主或用任何其他名词表达的英国的公众生活能够忍受、克服并战胜一切考验时，我就感到骄傲。甚至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但是，亡国灭种的事也好在没有发生。

12. 租借法案

这时，在一片刀枪交响和大炮轰鸣声中，在我们面前浮现一件另外一种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事。美国于11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这四年一度的竞选你争我夺，激烈进行，尽管两个大党在国内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袖人物都一样，非常重视这“崇高的事业”。11月2日，罗斯福先生在克利夫兰说：“我们的政策，是向那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面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一天，他的竞选对手温得尔·威尔基先生[1]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宣称：“我们大家——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赞成支援英勇的英国人民。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我国工业的产品。”

这扩大的爱国主义保障了美国联邦的安全和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不安地等待着竞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

① （Wendell Willkie）。

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重新谈起，这对于我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自从敦刻尔克之后，我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焦灼不安。当我得到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的消息后，我的欣慰之情真是难以形容。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向美国提出军火定单，虽同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磋商，但并不通过他们的手。由于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而时常在许多地方发生定货重叠的现象，尽管大家都怀着一片好心，但仍有可能在较低级的官员中引起摩擦。斯退丁纽斯①写道，“只有政府对一切防务用的物资采取单一的、统一的采购政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这项艰巨任务”。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统筹安排所有在美国的军火定单。总统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来分配美国的军火产品。军火一出厂，就大致把其中的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则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批准了英国的要求，答应我们在美国定购的一万一千架飞机以外，再供应一万二千架。但是这笔钱怎么偿付呢？

11月中旬，洛西恩勋爵②从华盛顿乘飞机回国，同我在迪奇利一起盘桓了两天。人们劝我不要老是到契克斯去度周末，特别是在月圆的时候，恐怕敌人特别注意我的行踪。罗纳德·特里先生和他的夫人曾多次在他们牛津附近的又宽敞又精致的

① 后来继赫尔担任美国国务卿（Edward Stettinius）。
② （Marquess of Lothian）。

住宅里盛情接待我和我的僚属。迪奇利和布伦宁相距仅四、五英里。我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接见了洛西恩大使。我觉得洛西恩完全变了。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岁月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一派贵族气概，超然于世俗之上。他讲究风度，有主见，落落寡合，举止端庄，批评严苛，但他的态度却很轻松和活泼，始终是一位很好的伙伴。现在，在我们一起遭受严重的打击之下，我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十分踏实，凡事深思的人了。他对美国的态度了如指掌。他在主持“驱逐舰与海空军基地交换”①的谈判中，曾博得华盛顿的好感和信任。他和总统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在回国之前一直和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他现在把全部心思都用来考虑“美元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受中立法的约束，使总统不得不在1939年9月8日颁布禁运令，禁止把武器运往任何交战国家。十日之后，他召开国会，举行特别会议，考虑撤销禁令，因为这项禁令表面上似乎很公允，实际上却剥夺了英国和法国在运输军火和供应品方面拥有制海权的优越条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讨论和争执，直到1939年11月底才撤销中立法，而代之以“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这样，在美国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副严守中立的样子，因为美国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卖给盟国，也可以自由地卖给德国。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海军力量阻止了德国的一切海上运输，而英国和法国则只要他们有“现金购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输”。在这项新的法令通过后的第三天，以才能出众的阿瑟·珀维斯先生为首的采购委员

① 1940年8月，英国为了得到其急需的五、六十艘美国驱逐舰，主动提议将其在西印度群岛的海、空军基地设施租借给美国，租期为九十九年。

会就开始工作了。

英国参战时，有四十五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美元现金、黄金和在美国可折算的投资。增加这些资财的唯一方法是：在大英帝国——当然主要是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以及千方百计地向美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奢侈品，如威士忌酒、上等毛织品和陶瓷等。在战争的头十六个月中，用这种方法又获得了二十亿美元。在"晦暗不明的战争"①中，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急欲向美国定购军火，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害怕我们的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在张伯伦先生执政时期，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时常向我们诉说，我国的美元储备已经少得可怜，并一再强调要保留美元。大家或多或少地承认，我们向美国购买商品应当严加限制。我们的做法就如珀维斯先生有一次向斯退丁纽斯说的一样，"我们好象是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点口粮多维持几天"。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精打细算，以弥补我们的款项之不足。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自由进口，交付货款不受限制。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为了动用黄金、美元和私人财产，为了防止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把他们的资财转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国家，为了削减浪费金钱的进口货和其他的开支，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管制机构。除了确保我们不浪费货币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察看其他国家是否还接受我们的货币。英镑区的国家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采取了同样的外汇管理政策，而且也愿意接受和持有英镑。我们同其他国家作出安排，对他们用英镑支付，使英镑可以在英镑区的任何地方使用，而且，

① 指英、法对德宣战（1939年9月3日）到德国进攻法国、荷兰、比利时（1940年5月10日）这段时期。

他们答应，保存暂时不用的英镑，并按外汇官价进行贸易。这种办法起初是同阿根廷和瑞典商定的，后来扩大到欧洲大陆和南美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办法是在1940年春季以后商妥的，我们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能够商定和维持这种办法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足见英镑是受人信任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用英镑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进行贸易，把我们大部分宝贵的黄金和美元保存下来，以便向美国购买重要物资。

1940年5月，当战争急转直下，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可怕的现实时，我们意识到，在英美的关系上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自从我组成新政府，由金斯利·伍德爵士出任财政大臣以来，我们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在敌人继续不断地轰炸，虎视眈眈地即将入侵之际，我们为生存而战，而且现在几乎成了孤军，如果过分担心于美元告罄的后果，那是错误的节约方法和不恰当的小心。我们意识到，美国舆论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华盛顿，就是整个联邦，也越来越相信，他们的命运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况且，这时，在美国全国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的浪潮。从华盛顿直接给我们送来了非常友好的信息，而且还通过加拿大转告我们，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战斗，并指出，无论如何能想出一个办法来。有摩根索①先生当财政部长，盟国的事业就有了一位始终不渝的拥护者。我们在6月间把法国在美国的订货合同接手过来，从而使我们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我们向各方面发出了新的订货单，订购飞机、坦克和商船，

① （Henry Morgenthau Jr.）。

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兴建大规模的新工厂。

截至1940年11月，我们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货款。我们已经卖掉了价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是用英镑从英国的私人持有者那里征购来的。我们支付了四十五亿美元以上的现金。我们只剩下二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资，有许多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显然，我们再不能象这样继续下去了。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货款，况且，战争的拖延还使我们需要的订货增加十倍。我们手头必须留点钱，以供日常的使用。

洛西恩确信，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认真寻找一条最好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现在，选举已经结束，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爵士和摩根索先生代表双方的财政部正在华盛顿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大使催促我写一封信，向总统全面地陈述我们的处境。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在迪奇利和他商量着草拟了一封致总统的私人信。11月16日，我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我正在给你写一封长信，阐述1941年的展望，将于数日后由洛西恩勋爵面交。”由于这份文件需要经过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的一再审核，而且还要经过战时内阁批准，所以在洛西恩返回华盛顿以前，未能完成手续。11月26日，我给他拍去了一封电报说，“我仍在忙着致总统的那封信，希望能够在几天之内拍发给你。”这封信最后定稿的时候是12月 8日，并且立即拍发给总统。由于这封信阐明了伦敦各有关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共同看法，而且对我们的前途起了显著的作用，所以值得研究。

亲爱的总统先生

白厅，唐宁街10号

1940年12月8日

1. 在接近年终的时候，我觉得你也许希望我向你提出我们对1941年的展望。我这样做是出于至诚和信心。因为，我觉得，美国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深信，美国的安全，以及我们这两个民主国家的未来和我们所代表的文明，是和英联邦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分不开的。只有这样，那些为控制大西洋和印度洋所必不可少的制海权才能掌握在忠实的友好的国家之手。美国海军之控制太平洋和英国海军之控制大西洋，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安全和通商航道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防止战火蔓延到美国海岸的最可靠的方法。

2.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把一个现代国家的工业改变为满足战争目的的工业，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当最大的工业能力尽可能地从民用转用于军需生产的时候，便达到了饱和点。德国无疑地已在1939年年底达到了饱和点。我们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只走了第二年的一半。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一定不如我们走得多，而且，我知道，美国目前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海、陆、空防御计划，完成这些计划无疑需要两年。在美国准备停当之前，坚持阵地并与纳粹势力搏斗，是我们英国人对共同利益应尽的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许两年之内胜利便可到来，但是我们不应当这样打算，从而放松任何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努力。因此，我怀着莫大的敬意请你以友好和善意考虑这样一点，即：只要上述情况还存在，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益就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才冒昧给你

写这封信。

3、这场战争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形式，而且看来还可能继续采取这种形式，因此使我们难以在任何德国人能够集结主力的战场上和他们的陆军抗衡。然而，我们能够借助于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在德军只能投入较少部队的地区和他们周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德国的统治从欧洲扩展到非洲和南亚。我们还必须在我本岛保持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强大到使渡海入侵成为敌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为了这些目的，我们正在尽快筹编五十到六十个师。即使美国成了我们的盟国，而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和必不可少的伙伴，我们也不会请求美国派遣一支庞大的远征军。限制的因素是船舶而不是人员，必须把力量尽先用来运输军火和供应品，然后再用来从海上运送大量士兵。

4．对同盟国和欧洲来说，1940年上半年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期。最后五个月，大不列颠孤军作战，坚强地，也许是出人意料地挽回了颓势，但这和你第三次被选为元首的那个伟大的共和国在军火和驱逐舰方面给予我们的莫大援助是分不开的。

5、大不列颠被敌人以优势兵力迅速一击就完全消灭的危险，目前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继此而来的，是另外一种长期的和逐渐形成的危险，虽然不象前一种危险那样突如其来、怵目惊心，但也同样是致人死命的。这种致命的危险就是船舶吨位继续不断地、一天一天地减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之下，房倒屋塌，平民惨遭杀伤，这我们是能够忍受的。我们希望，随着我们科学的进展，能够逐

步应付空袭，而且在我们的空军力量更接近敌人的力量时便回敬他们，去袭击德国的军事目标。决定1941年的成败系于海上。除非我们确能维持我本土的食品供应和输入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军火，除非我们确能把我们的军队调动到各个战场去迎击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墨索里尼，而且把我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并且确信，能够把所有这一切一直进行到使欧洲的独裁者精神崩溃，否则，我们就可能中途失败，同时，美国也将失去其为进行防御准备所需的时间。因此，1941年整个战争的进展取决于船舶以及远涉重洋——特别是大西洋——的运输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使我们所需要的船舶运输无限期地在海洋上来去航行，那么，我们就可把优势的空军力量转用于德国本土，更加上德国人民以及其他惨遭纳粹蹂躏的民族日益增长的反抗，也许就能给遭受浩劫的文明带来幸福，使它重见光明。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这项任务。

6. 我们船舶损失的程度，几乎和上次战争损失最大的一年不相上下，最近几个月的损失数字，请见附件。在11月3日以前的五个星期内，损失共达四十二万零三百吨。为了使我们的作战活动保持充分力量，我们估计，每年应进口的吨数是四千三百万吨；9月份，进口吨数只达到了三千七百万吨，10月份达到三千八百万吨。如果船舶吨数象目前这样继续减少，那么，除非真能及时得到远远超过目前补充的吨数，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虽已想了许多新的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但要减少损失显然比上次战争困难得多。我们缺少法国海军、意大利海军和日本海军

的协助，特别是缺少美国海军的协助，虽然美国海军曾在紧张的年代里给予我们重大的援助。敌人已控制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的所有港口。越来越把这些港口和法国海岸附近的岛屿当做潜艇、飞艇和战斗机的基地。我们不能用爱尔兰的港口和领土以便从空中和海上对我们的海岸进行巡逻①。事实上，我们只有一条可以进入英伦三岛的航道，即北部航道，但是敌人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并以潜艇和远程轰炸机不断骚扰。除此之外，近几个月以来，在大西洋和印度洋还出现了袭击商船的敌舰。现在我们还需要对付强大的袭击军舰的敌舰。我们既需要能够追击敌舰的舰只，也需要护航用的舰只。尽管我们的资源和准备都如此充分，但还是不够用。

7. 在未来的六、七个月里，我本土水域内战舰力量的对比不太能令人满意。“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②号在1月份内一定可以服役。我们已经有了“英王乔治五世”号，并且希望“威尔斯亲王”号也能同时参加战斗行列。这些新式战舰在装甲方面，特别是在防御空袭方面，当然大大胜过二十年前设计的“罗德尼”号和“纳尔逊”号这类舰只。我们最近不得不把“罗德尼”号用于横渡大西洋护航，但是，当船只的数目这样少的时候，任何时候一个水雷或是一个鱼雷就会断然改变战斗行列的力量。当“约克公爵”号在6月份竣工时，我们就可以松一口气，当“安森”号在1941年年底也参加战斗行列的时候，我们

① 英国的上述要求遭到爱尔兰首相德伐莱拉（Eamon de Valera）的拒绝。

② 这两艘都是德国海军的新型主力舰。

就更好了。但是，那两艘装设十五英寸口径大炮的第一流的三万五千吨①新式德国战舰使我们不能不集中一支自开战以来尚未见过的雄厚的海军力量去对付。

8. 我们希望，意大利那两艘"利特里奥"级战舰暂时不能投入战斗，而且只要不配备德国海军，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许它们会配备德国海军的！我们非常感激你在"黎歇留"号和"让·巴尔"号方面所给予的帮助②，而且，我敢说，这样做就行了。但是，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比你更清楚，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这次战争中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舰队行动，即敌人至少将有两艘战舰相当于我们最优秀的、也是仅有的两艘新式战舰。我们不能缩减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因为土耳其的态度，实际上整个东地中海的局势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在那里保有一支强大的舰队。那些非近代化的较陈旧的战舰要用来作护航舰。因此即使在战舰级的舰只上，我们也是十分紧张的。

9. 还有第二种危险。维希政府或者参加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或者用某种办法，如从海路派遣一支远征军去侵犯自由法国③的殖民地，使我们不得不去打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借口，把现在尚留在他们手中的那支相当大的、没有受到损失的海军用来和轴心国家一起作战。如果法国海军参加轴心国，则西非将立刻落到他们

① 实际上它们都将近四万五千吨。——原注。

② 1940年11月13—23日，罗斯福就上述两艘法国战舰决不能落入德国之手一事与维希政府元首贝当进行磋商，后者保证把舰只留在它们停泊的港口（达喀尔和卡萨布兰卡）而决不交给德国。

③ 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

的手中，从而严重危及我们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而且也会影响到达喀尔，当然也会随之影响到南美。

10. 第三种危险是在远东。看来很显然，日本正在穿过印度支那向南挺进到西贡和其他海、空军基地，这样他们就和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相距不远了。据悉，日本人正在准备五个精锐的师，以便有朝一日充当海外远征军。这种形势如果继续发展，则我们今天在远东的兵力就不能应付。

11. 面对着这些危险，我们必须尽量利用1941这一年来建立足以奠定胜利基础的武器供应，尤其是飞机，一面在我本土冒着敌人的轰炸提高产量，一面得到海外的供应。从我罗列的那些事实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事实可以看出，这项任务是至为艰巨的，因此，我觉得我有权，不，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以便美国能够给予这个从某些方面看来是共同的事业以崇高的和决定性的援助。

12. 最迫切的需要，是在大西洋通向我本土的航道上防止和减少船舶的损失。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对付袭击的海军力量；一是增加我们所需要的商船数目。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似乎有下列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甲）美国重申海上自由通航的原则，船舶不受非法的和战争的野蛮手段的骚扰，这是上次大战之后有了决议，而且德国在1935年欣然承诺并作了规定的。根据这项原则，美国船只可以和一些没有受到有效的、合法的封锁的国家自由进行贸易。

（乙）我认为，接着，就应以美国的武力，即护航战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空军编队，保护这种合法的贸易。你如果能在战争期间在爱尔兰获得基地，这种保护措施就会更加有效。我想，这种保护措施大概不致于引起德国向美国宣战，虽然很可能不时发生一些危险的海上意外事件。可以看出，希特勒先生想避免德皇的错误。在他还没有彻底摧毁英国的军队以前，他是不想卷入对美国的战争的。他的铭言是“一个时期打击一个敌人”。

我冒昧陈述的这项政策，或与此相类似的政策，可使美国的断然行动被解释为积极的非交战性行动，而且，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确保英国的抵抗能够有效地想进行多久就进行多久，一直到取得胜利。

（丙）如果以上所述难以办到，那么，为了维护大西洋的航线，便不得不请你们赠予、借予或供给我们一大部分现在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此外，美国海军难道不能在靠近美国那面的大西洋扩大海上控制，以防止敌人的舰只侵扰通向美国正在西半球英属各岛上修建的海、空军基地的新航线？美国海军力量是如此强大，所以美国给予我们的上述援助将不会危及它对太平洋的控制。

（丁）我们还需要美国从中斡旋，需要美国政府不断地运用其全部影响力，为大不列颠在爱尔兰南部和西部海岸取得停泊小舰队的便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飞机取得向西活动于大西洋上空的便利。如果宣布英国的长期抵抗以及为了源源运送在北美为大不列颠准备的重要军需品而确保大西洋航线畅通无阻，是美国的一种利益，那么，

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也许愿意向爱尔兰政府指出，爱尔兰当前的政策正在给美国本身造成危险。

如果爱尔兰由于它所采取的行动有招致德国进攻之虞，英王陛下政府当会事先采取最有效的保护措施的。我们不能强迫北爱尔兰人民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脱离联合王国而参加南爱尔兰。但是，我不怀疑，如果爱尔兰政府在这紧急关头表明它和英语世界各民主国家团结一致，那么，就能够成立一个全爱尔兰的防务委员会，而且，从这个委员会起，或许在战后能以某种形式实现爱尔兰的统一。

13。以上措施的目的，是把目前海上的大量损失缩减到可以控制的程度。除此之外，为供应大不列颠和供大不列颠全力从事战争需用的商船吨数，应当大大增加，并超过现在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年产量一百二十五万吨，这一点极关重要。护航系统、绕航、"之"字航行，目前输入供应品的航程遥远以及我国西部各港口的拥挤，这一切，已使我们现有船舶的效率大约减低了三分之一。为了确保最后的胜利，至少必须增加三百万吨的商船建造能力。只有美国能够供应这种需要。展望将来，1942年的生产规模似乎应当和上次战争在霍格岛计划的生产规模相似。与此同时，我们请求美国在1941年把它所拥有的或是控制的商船，除供自己的需用外，悉数提供我们，并设法把目前正在为国家海务局建造的商船拨出一大部分来供我们使用。

14。再者，我们指望，共和国的工业力量能够弥补我们国内战斗机制造能力的不足。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得不到大规模的增援，我们就不能在空中取得绝对优势，去削弱并摧毁德国在欧洲的控制。我们目前正在从事于一项计

划，要在1942年春季把我们的第一线飞机增加到七千架。但是非常明显，这项计划还不能使我们具备我们需要的优势去冲开通向胜利的大门。为了取得这种优势，我们显然需要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所能支援的最多的飞机。我们虽处于敌人不断的轰炸之下，但我们迫切希望，把原定的生产计划在本国完成一大部分。根据目前的安排，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计划生产中得到飞机，但是，即使把这些飞机全部拨给我们的空军中队，我们仍然没有希望取得必要的优势。所以，总统先生，可否请你认真考虑一批紧急的定货，以联合结算的方式每月再增加二千架作战用的飞机？我认为，在这批飞机中，绝大部分应当是重轰炸机，因为我们主要是靠这种武器去粉碎德国军事力量的基础的。我知道，这将使美国的工业组织承担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由于我们的迫切需要，我们要满怀信心地向世界上最有办法、最有才能的技术人员发出呼吁。我们要求他们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可以办到的。

15. 你也收到了有关我们陆军的需要的情况。在军火制造方面，我们虽然处于敌人的轰炸之下，但仍然稳步增长。在工作母机的供应和某几种物品的让与方面，如果没有你的一贯的协助，我们就不可能希望在1941年装备五十个师。我感激已经充分作好的安排，感激你们对我们计划编成的部队支援装备，感激你们对我们的十个补充师及时提供美式武器，以便投入1942年的战斗。但是，当独裁统治开始衰退的时候，许多力图恢复自由的国家便可能要求得到武器，而他们除了指望美国的工厂以外，别无其他来源。因此，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美国尽量扩大小型武器、大

炮和坦克的生产能力的重要性。

16. 我正在准备向你提出一份完善的计划，说明我们希望从你们那里得到的各种军火，当然，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已经取得了双方的同意的。如果美国军队选用的武器的类型和那些已经在实际战斗中——在无论什么时候都能——证实了它的性能的武器的类型是一致的，那么，就可以大大地节约时间和精力。这样，储存的大炮、军火和飞机就可以交换，从而大大增加它们的数量。然而，这是一个深奥的技术问题，所以我就不在此详述了。

17. 最后，我要谈一谈财政的问题。你们能够支援我们的军火和船只越迅速、越丰富地源源而来，我们的美元存款就消耗得越快。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已经提取了我们大部分的美元存款来支付到期的帐款。的确，正如你所知道的，那些已经提交或正在磋商中的定单，包括那些为在美国建立军需工厂业经支付或有待支付的开销在内，已经超过大不列颠手中残存的全部外汇储备若干倍。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当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正当的牺牲用外汇来支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财，以致在我们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其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这样的方针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是不符合于我们任何一国的利益的。战后，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就不能多于我们对美国出口的货物，购买的范围将不超过那些适合你们的关税条件和工业经济

的出口货的数量。不仅我们在大不列颠要备尝艰苦，就是美国也将因出口能力的削减而引起广泛的失业。

18. 再者，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与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的。请你相信，为了正义事业，我们是决心要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牺牲的，而且我们也将因为我们是维护这一事业的斗士而感到光荣。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19. 总统先生，我深信，如果你认为摧毁纳粹和法西斯暴政对美国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么，你就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将把它看作是一份陈述书，其中说明为了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应当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这封信附有一个统计表，列明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同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因遭受敌人的袭击而损失的吨数。①

这封信是我写的最重要的书信之一，当它送到我们伟大的朋友的手中时，他正乘美国军舰“图斯卡露莎”号在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游弋。他左右的人全是他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②——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告诉我说，罗斯福先生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阅读这封信，而且，经过了两

① 从1940年5月—12月，英国、盟国、中立国运输船只共损失3,239,190吨，其中英国损失的船只就有2,109,286吨之多。

② （Harry L. Hopkins）。

天他都还没有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他绞尽脑汁，默默沉思。

他从默默沉思中得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决策。总统的问题绝对不是他不知道他应该作什么。他的问题是：如何使他的国家跟着他走，如何说服国会听从他的引导。据斯退丁纽斯说，早在去年夏季，总统就在船舶资源防务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提议过，“英国无需自己出资在美国建造船只，也无需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来达到这一目的。值此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他们使用。”这种想法似乎最初是来源于财政部，是财政部的法律顾问，特别是缅因州的奥斯卡·斯·考克斯，在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启示下提出来的。原来，根据1892年的一项法令，陆军部长“在认为符合于公众利益的时候”，在国家不需要的前提下，可以把陆军的财产租借出去，为期不超过五年。这项法令的应用有先例可援，租借陆军各项用品的情况是屡见不鲜，有案可查的。

因此，罗斯福总统心中早就有了“租借”这个字和运用租借的原则来满足英国的需要之意，以之作为代替不久就要使英国失去所有偿付能力的无限期借贷政策的一种办法。现在，所有这一切一变而为果断的行动，宣告了“租借”这一光辉灿烂的概念。

总统在12月16日从加勒比海归来，翌日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的计划。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的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在离他四、五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如果他能拿我的水龙带去接在他的水龙头上，那么我就可以帮他把火扑灭。现在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以前，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这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值十五块美元，你得给我十五块美元才能用。’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呢？我不要这

十五块美元——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他还说：“无庸置疑，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最直接有效的防卫在于大不列颠之得以保卫其本身；因此，姑且不谈我们在历史上和在当前都对在全世界维系民主制度于不坠深感兴趣，就是从自私的观念和美国的国防出发，我们也应竭力帮助大英帝国去保卫它自己。”他最后说：“我打算消除美元符号。”

在这个基础上，永垂不朽的“租借法案”立即草拟完毕，提交国会。后来我向议会说：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最光明磊落的行为。”法案一经国会通过，就马上改变了整个局面。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一切的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账目也没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全是借的或租借的，因为我们对希特勒暴政的继续抵抗，被认为是和伟大的共和国休戚相关的。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说法，今后决定美国武器去向的，不是美元而是美国的国防。

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这段期间内，我们的美元非常紧张。我们的朋友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应急方法。美国政府买下了根据我们的定单在美国建立的几个兵工厂。他们把这些工厂纳入美国防务计划之内，但嘱咐我们继续尽量使用。美国国防部定购了一些并非他们所急需的军需品，以便制成之后转让给我们。另一方面，美国也作出了几件在我们看来是苛刻难堪的事。总统派了一只军舰到开普敦，要把我们储存在那里的黄金扫数运走。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我们把英国在美国的大企业——科陶尔股份公司按比它本来的价值低得多

的价格卖掉了。我有一种感觉，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是用来着重反映我们的困难处境，并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去抵制那些反对租借法案的人。无论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我们总算度过了难关。

12月30日，总统通过广播发表了“炉边谈话”，劝告他的国人拥护他的政策。“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13. 德国与俄国

希特勒未能打败或征服不列颠。这个岛国显然要坚持到底。大家都知道，没有制海权或制空权，便不可能把德国军队运过海峡。冬季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暴已经来临。德国想用轰炸来恐吓不列颠民族或粉碎其作战能力和作战意志的企图，业经破灭，闪电战的代价十分昂贵。要想恢复“海狮”作战计划，势必有许多个月的耽延，而每过一个星期，英国国内军队的发展、成熟和装备便更加好转，便愈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海狮”计划，运输也愈益困难。到1941年的4月或5月，即使用七十五万人，装备齐全，也难胜任。到那时，到何处去找这样大规模渡海袭击所必需的船舶、驳船和特制的登陆艇呢？在英国日益增长的空中力量下，他们如何集结？同时，英国的空中力量，由于有英国和美国各工厂积极生产的支持，由于在以加拿大为中心的各自治领采取了训练飞行人员的庞大计划，将使已经在质量上超过德国的英国空军，于一年左右在数量上也超过德国。所以，希特勒一认识到戈林的希望和吹嘘已经破灭，便把目光转向东方，这有什么奇怪呢？正如拿破仑在1804年的情形一样，在没有完全弄清东方无后顾之忧以前，他是迟迟不敢进攻我们这个岛的。现在他觉得，在孤注一掷地入侵不列颠

以前，应不惜任何代价把同俄国的关系搞清楚。和拿破仑率领大军由布洛涅到乌尔姆、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的情况一样，希特勒也受着同样的压力的支配，按同样的想法行事，暂时放弃毁灭大不列颠的欲望和需要。现在，这出戏就只能这样收场。

毫无疑问，他在1940年9月底就已经打定主意了。从那时以后，对英国的空袭，虽然时常由于普遍增加飞机而规模较大，但是在元首的思想和德国的计划中，都只占第二位了。空袭也许是用来有效地掩饰其他计划的，希特勒已不再指望靠空袭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向东去吧！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我个人并不讨厌德国于1941年春季或夏季发动对英国的进攻。我相信，敌人将遭受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次特定的军事冒险中从未遭受过的惨败和伤亡。但是我也不会这么简单，仅仅为了这个缘故就希望敌人真来入侵。在战争中，你不反对的事，敌人也往往不做。况且，在指挥一场长期的战争中，当时间在一年或两年内对我们有利，并且还会获得强大的盟国时，我感谢上帝，使我们的人民免于遭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件就可看出，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德国会在1941年侵袭英国。到了1941年年底，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不再是单独作战；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国家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是，有许多难以逆料的惊心动魄的大事都出现在这令人难忘的一年里。

当不明白真相的欧洲人和外界人士认为我们的命运似乎已经绝望，或者最多也不过是存亡莫卜的时候，纳粹德国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却在世界事务中占了首位。一经看出英国不能象法国和低地国家那样被吓倒和制服时，这两个专制暴虐的大国之间的基本矛盾便又显现出来了。说句公道话，斯大林在尽最大

努力，忠实地和希特勒合作的同时，也在苏俄的广大群众中尽量聚集他所能聚集的一切力量。德国每打一次胜仗，他和莫洛托夫都照例毕恭毕敬地表示祝贺。他们把大批的食物和重要的原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德国。他们第五纵队的共产党员极力扰乱我们的工厂。他们的广播对我们备加诬蔑和诽谤。他们随时准备就两国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同纳粹德国获致永久的解决，幸灾乐祸地希望英国的力量遭到最后的毁灭。但是，他们也一直认识到，这项政策可能失败。他们打定主意利用各种方法争取时间；就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来看，他们也无意把俄国的利益或野心单单置于德国胜利的基础之上。这两大集权国家，都缺乏道德上的节制，在彼此的相互关系中彬彬有礼，却又冷酷无情。

当然，对于芬兰和罗马尼亚，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苏联领袖们对法国的沦陷和第二战场的结束（不久以后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重开这个战场）感到震惊。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突然的瓦解，满以为在西线会出现双方长期互相消耗的局面。现在没有西线了！但是，在尚未看清英国在1940年是否将屈服或被消灭以前，就对于勾结德国的办法大事改变，那也是愚蠢的。由于克里姆林宫逐渐认识到，英国能够应付一场持久的、无限期的战争，而且在战争期间，在美国周围和日本本土可能发生任何事情，斯大林就更加意识到他的危险，就更加想争取时间。但是，正如我们行将见到的，他为了要同纳粹德国保持友好，显然牺牲了许多利益，冒了许多风险。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于即将临头的大难作出了许多错误的估计，表现得愚昧无知。从1940年9月一直到希特勒1941年6月发动进击的时候为止，他真是一个既冷酷无情，又诡计多端，又孤陋寡闻的巨人。

在前面把情况略事交代之后，我们不妨来谈谈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插曲。当这位布尔什维克的使者到达纳粹德国的心脏地区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恭维话，受到了一切隆重的款待。在以后的两天中，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也同希特勒——进行了冗长而紧张的会谈。他们艰难可怕地交换意见和当面折冲，在1948年初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从缴获的文件中选编的《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这本书中暴露无遗。为了要叙述或了解其中的经过，就必须引用其中的材料。

莫洛托夫第一次是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

1940年11月12日

德国外交部长说，他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已表明德国坚信：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改变大英帝国的末日业已开始来临这一事实。英国已被击败，最后承认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也许不久就要认输，因为英国的形势正日渐恶化。当然，德国也欢迎及早结束战斗，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愿意不必要地牺牲人的生命。……

英国或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想在欧洲大陆登陆或采取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彻底失败的。这根本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一点，英国人还不了解，因为在大不列颠显然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再则，因为这个国家是由一个名叫丘吉尔的人领导的，此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外行，他以前的事业，每到关键时刻都彻底失败，这一次还要失败。

再说，轴心国家已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在欧洲压倒英

国。甚至法国——法国业已战败，而且要为战争付出代价（附带说一下，法国人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也接受了这一原则：法国将来绝不支持英国和唐·吉诃德式的非洲的征服者戴高乐。轴心国家由于具有异常强大的实力地位，因此，它们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而是如何迅速结束这场已经打胜的战争。

午餐后，元首接见了这位苏联使节，并再次侈谈英国的全盘失败。他说，战争带来了许多违背德国意图的复杂情况，时常迫使它不得不从军事上对某些事情作出反应。

接着，元首向莫洛托夫概述了到目前为止的军事行动的进程，还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已使英国在大陆上没有盟国了。……当前，德国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这场最后的斗争进行军事部署，而且要澄清在这次最后摊牌中和摊牌之后的极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他重新检查了同俄国的关系，他不是从消极的精神出发，而是想要积极加以调整——如果可能的话，使之经历一个长时期。他在这方面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德国不想从俄国获得军事援助。

2．由于战事蔓延极广，德国为了对付英国，曾被迫深入远离其本国的地方，而它对这些地方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根本不感兴趣。

3．虽然如此，德国也有某些需要，这些需要的全部重要意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显示出来，它们对德国是绝对重要的。在这些需要中，包含有某些原料的来源，德国认为

• 不需要的战争 13 •

这些原料是极端重要的，绝对不可缺少的。

莫洛托夫对这一切含糊其辞地随声附和了一番。

莫洛托夫问到了《三国条件》①。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新秩序中要苏联扮演什么角色？……

元首回答说，三国条约的宗旨是要根据欧洲国家的天然利益来调整欧洲的局面，因此，德国现在要求苏联自己表示它感觉兴趣的地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苏俄的合作，就不能决定。这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亚洲，要求俄国合作，一起来划定大东亚圈，并提出它对那里的要求。德国在这方面的任务是担任调停人。俄国决不会碰到任何一项既成事实。

当元首着手建立上述各大国的联合时，他认为最困难的一点倒不是德俄关系，而是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之间的合作是否可能的问题。只有现在……他才觉得，可能通过同苏联的磋商来解决黑海、巴尔干和土耳其的问题。

当会谈结束时，元首总结道，这次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向着广泛的合作迈出了第一个具体步骤：会谈曾充分考虑到西欧的问题，要由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国来解决；同时认为远东的问题，主要是俄国和日本的事情，但德国愿以调停人的身分居间调处。这是一个反对美国企图"靠欧洲发财"的问题。美国对欧洲、非洲或亚洲没有置喙的余地。

①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莫洛托夫表示，他同意元首关于美国和英国的地位的说法。他认为，只要俄国能以伙伴而不仅仅是以对象的身分进行合作，则俄国参加三国条约在原则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苏联参加共同事业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条约的目的和意义，特别是关于大东亚圈的区划，必须首先予以更明确的规定。

当11月13日恢复会谈的时候：

莫洛托夫提出立陶宛那条狭窄的领土的问题，并着重说苏联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尚未获得德国明确的答复。但是，这一问题正在等待着决定。关于布科维纳，他承认，这牵涉到另外一块土地，在秘密议定中没有载明这一块土地。俄国最初的要求仅限于北布科维纳。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应当了解俄国对南布科维纳的关心。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也没有获得答复。相反，德国却保证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而完全不顾俄国对南布科维纳的愿望。……

元首答复道，如果德俄合作要在将来产生实际的结果，苏联政府必须了解德国正在从事生死攸关的战争，它无论如何要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双方在原则上同意芬兰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两国与其继续纯理论的讨论，不如转入更重要的问题。

英国被征服以后，英帝国将要作为一份拥有四千万平方公里、范围遍及世界的破产者的庞大财产被人瓜分。在这份破产者的财产中，俄国可以分到真正通往大洋的不冻的出海口。四千五百万的少数英国人迄今统治着大英帝国

的六亿居民。他就要摧毁这个少数了。就是美国，它事实上也无非是要从这份破产者的财产中拣几项特别适合于美国的东西。当然，德国要避免在它攻击英帝国心脏英伦三岛的战斗中再遇到其他分散其力量的冲突。因此，他（元首）不喜欢意大利对希腊发动的战争，因为，这样做，就要将部队分散到外国，而不能集中兵力于一点来攻击英国。在波罗的海区域发动战争也是一样。对英国的战争将进行到最后为止，他毫不怀疑，英伦三岛一被挫败，即可使帝国趋于瓦解。如果以为可从加拿大来统治并团结帝国，那是在做梦。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世界范围的前景了。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这些问题都要在同俄国的联合外交谈判中解决，并作出使苏联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安排，一切对这份破产者的财产感觉兴趣的国家，彼此都应当尽弃前嫌，专心考虑瓜分英帝国的问题。这适用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很感兴趣地倾听了元首的议论，并且对他所了解的每一件事情表示同意。

柏林会谈对于希特勒内心深处的决定丝毫没有发生影响。10月间，凯特尔、约德尔和德国总参谋部都根据他的命令拟定计划，把德国军队东调，以便于1941年初夏进攻俄国。在这一阶段还没有必要规定正式的日期，因为这也受天气的影响。考虑到越过国境以后还需要走那么远的距离，而且要在冬季开始以前攻克莫斯科，所以5月初显然是最相宜的。而且，沿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两千英里的战线集结与部署德国军队，以及准备所有的兵站、营房和铁道侧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来没有承担

过的最艰巨的军事任务之一，无论在计划和行动上都不容有所延误。在这一切之上，还亟需保守秘密，蒙骗对方。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利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掩护，每种形式都各有其优点。第一种是在瓜分和分配大英帝国远东殖民地的基础上进行有关共同政策的细致的谈判。第二种是通过匈牙利不断地增派军队以控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这在军事上有重大的收获，同时，又可掩盖或解释在该战线南翼集结德国军队，进行针对俄国的部署。

谈判系采取由德国提出建议草案的方式，邀请苏俄参加《三国条约》，把英国在东方的权益给予俄国。如果斯大林接受了这一方案的话，事态也许会在一个时期内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变。希特勒随时都可暂时搁下进攻俄国的计划。拥有百万军队的大陆上的两大帝国结为军事同盟，会怎样分割巴尔干、土耳其、波斯和中东，甚至进一步图谋攫取印度，同时还有那热衷的伙伴日本所倡导的“大东亚计划”，结果如何，我们真是难以设想。但是希特勒一心要摧毁布尔什维克，他对他们恨之入骨。他相信，他有力量使他一生的大志能如愿以偿。以后，一切都可以归他所有了。从柏林会谈和其他的接触中，他必然已经看出，他让里宾特洛甫送交莫斯科的建议远远不能满足俄国的野心。

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信件中曾发现一份《四国公约》的草案，上面没有载明日期，据说舒伦堡于1940年11月26日曾与莫洛托夫会谈，这份草案显然就是他们会谈的基础。根据这一草案，德、意、日三国同意尊重彼此的天然势力范围。由于这些势力范围互相接触，因此，由此引起的问题，他们将以友好的方式经常地互相磋商。

德、意、日三国又共同宣布，它们承认并尊重苏联目前的领土范围。

四国决不参加或支持以反对四国中任何一国为目的的国家联合。它们将在经济问题上彼此通力协助，并且要补充和扩大彼此现有的各项协定。协定的有效期为十年。

在《四国公约》之外，还有秘密议定书，在议定书中，德国声明，除在缔结和约时重新划分的欧洲领土以外，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中非的土地；意大利声明，除了重新划分的欧洲的领土以外，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北非和东北非的土地；日本声明，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日本帝国本土以南的东亚地区；苏联声明，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苏联国土以南通向印度洋的地区。

四国声明，除特殊问题尚待解决外，它们都互相尊重这些领土愿望，并且不反对它们获得这些领土。

不出所料，苏联政府没有接受德国的方案。他们在欧洲单独同德国周旋，而日本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又对他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对自己逐渐增长的力量和广大的领土深有信心，他们的领土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之多。因此，他们一再讨价还价。1940年11月26日，舒伦堡把俄国的反建议草案送到柏林。俄国的反建议提出：德国军队应立即撤离芬兰，因为根据1939年的条约，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在今后几个月内，为了保证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安全，由苏联与在地理位置位于苏联黑海疆界安全区以内的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在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范围内为苏联陆军和海军建立基地；承认巴统和巴库以南凡是通往波斯湾的地区为苏联领土愿望的中心；日本放弃在北萨哈林岛开采煤炭和石油的权利。

没有对这一建议给以明确的答复。希特勒根本不打算和俄国讲调和折中。象这样严重的问题是值得双方本着友好的精神进行长期的仔细研究的。苏联当然是希望而且也的确在等待德国的答复。在这期间双方都向本已大军云集的边境开始增兵，希特勒的右手已经伸向巴尔干了。

凯特尔和约德尔根据元首的命令拟定的计划，现在已充分成熟，使他能在1940年12月18日从他的司令部发出他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十一号指令。

> “巴巴罗莎”作战计划：德国武装部队必须作好准备，以便在结束对英战争之前就能在一场快速战中摧毁苏俄。……

——以上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最光辉的时刻》(1949年，初版)

14. 海外战场：地中海、大西洋和北非沙漠

回顾扰攘不安的战争年代，我想不起有任何时期象1941年上半年这样，战事急如星火，许多问题一起涌来，或接踵而至，更直接地困扰着我和我的同僚的了。事件的规模逐年增大，但是必须作出的决定，却并非更加困难。1942年，我们在军事上遭受更大的灾难，不过到了那时我们已经不再孤立，我们的命运已经和伟大同盟的命运合在一起了。我们在1941年中的问题，没有一部分不是和其他问题相互关联而获得解决的。拨给一个战场的物资，必须取自另一战场。把力量用在这里，便意味着在那里冒着危险。我们的物质资源极为有限。有十几个强国的态度，是友好，是观望，还是有敌对的可能，尚在未定之天。在国内，我们必须应付潜艇战、敌人入侵的威胁和接连不断的闪电战；在中东，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战役；第三，我们必须试图在巴尔干半岛开辟一条对德作战的战线。在以前一段漫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得不孤军作战。现在经过一场大风大浪之后，我们又须在急流中挣扎了。我们凭着独自的努力，逐日为不致在急流中溺毙而斗争并克尽自己的职责，而较前远为

重大的事件却又在冷酷无情地向前发展着，这篇记述的困难之一，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比例失当。

我们在大不列颠总算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我确信，只要我们在国内保持高度的戒备和必要的兵力，德国在1941年进攻我国的尝试对我们并不是不利的。德国空军在各个战场的实力和1940年相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我们国内的战斗机中队则已从五十一个扩充到七十八个，轰炸机中队已从二十七个扩充到四十五个。德国人并没有在1940年的空战中获胜。看来，他们在1941年也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我们本土上的陆军已经大大加强。从1940年9月到1941年9月，已从二十六个现役师增加到三十四个现役师，另有五个装甲师。加之军队已经训练成熟，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也已大量增加。国民自卫军已经从一百万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人，并且这时都持有枪支。在兵员数额、机动性、装备、训练、组织和防御工事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改进。当然，希特勒为了侵犯我国，需要时时拥有超过需要的兵员。他要征服我们，至少须运送一百万名士兵和所需要的给养横渡英吉利海峡。到1941年，他可能拥有大量的——纵然不是足够的——登陆艇。但是，由于我们拥有优势的空军和海军，足以控制海空，我们深信我们有摧毁或重创德国入侵舰队的能力。因此，我们在1940年所依靠的一切论据，现在都无可比拟地更加强有力了。只要我们不放松警惕，或者，不大肆削减我们自己的防卫力量，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便不会感到忧虑。

虽然我们的美国朋友——他们当中有些将军曾经访问过我们——对于我们的处境很为担心，而且全世界一般都认为德国进攻不列颠是很可能的事，但是，我们自己却放心大胆地尽我

们现有船舶的运输能力把所有军队运送到海外去，投入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攻势作战。我们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即在于此，而其最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就是从1941年开始的。在战争中，军队必须战斗。非洲是我们唯一能够和敌人在陆地上周旋的一个洲。保卫埃及和马耳他岛是我们的职责，而意大利帝国的毁灭则是我们能够获得的第一个战利品。英国在中东抵抗耀武扬威的轴心国家，我们试图联合巴尔干各国和土耳其共同抵御敌人，便是我们当前叙述的主题与线索。

自从纳尔逊时代以来，马耳他岛就象是一名忠诚的英国哨兵，捍卫着地中海中部那条狭窄的、重要的海上走廊。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比过去更大了。为满足我们在埃及部署大量军队的需要，我们的运输船队自由地通过地中海同时阻止敌人向的黎波里增援军队，已成为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了。同时，德国新式空中武器不但对马耳他岛，而且对英国在这些狭窄的海面上有效地保持制海权，进行了严重的打击。如果没有这种现代武器的危险，我们的任务就简单多了。我们原来能够在地中海自由通航，并可以断绝所有其他国家的海上往来。现在已不可能以马耳他岛为主力舰队的根据地了。该岛本身就受到敌人从意大利各港口出击的威胁，并遭受经常的、多次的空袭。敌人的空军也使我们的运输船队因危险莫测，几乎无法通过突尼斯海峡及马耳他海峡，只好绕道好望角，经历漫长的航程。与此同时，敌人占优势的空军使我们的战舰若不甘冒重大的损失和危险，便不能在中地中海充分展开活动，这样他们便得以保持一条向的黎波里运送军队和给养的补给线。

意属班泰雷利亚岛距马耳他岛约一百四十英里，扼着西西里岛与突尼斯之间西部海峡的咽喉。该岛素以设防巩固著称，并有一个极有价值的飞机场。这是敌人通往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航线上的重要据点，它如果落到我们手中，将显著地扩大我们能在马耳他岛周围布置的空军掩护区。1940年9月，我曾请海军上将凯斯制定一项计划，用新编成的突击队夺取班泰雷利亚岛。我们的设想是，两三艘军队运输舰跟在我们一支防守力量很强的运输船队后面。当运输船队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时，这几艘军队运输舰便在黑暗中转换方向，出其不意地猛扑该岛。这一被称为“车间”的作战计划，越来越获得三军参谋长的支持。凯斯热情洋溢地声称，他要抛开海军上将的身分，亲自领队进攻。

我和左右的人并不认为实际攻占该岛有多大困难，但是，当我们在马耳他岛已受到沉重的压力时，要保持这一战利品的困难却引起了我们的疑虑。……

大家的意见已完全一致，但是，由于从事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没有来得及在原定1月底的日期开始行动。1月18日晨，在契克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我同意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参谋长等的意见，把日期推迟一个月。我想，我本来是能够使会议通过维持原定计划的决议，但是，我和其他人，一则忙于更加重大的事务，再则听说突击队还没有完全训练好，所以没有坚持原定的日期。凯斯当时不在场，他闻悉后大失所望。这次推迟使这项计划成为泡影。在1月底以前很久，德国空军早就进驻西西里岛，于是，局势完全改观。我们没有得到的这项战利品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我们在1942年占领班泰雷利亚岛，在我们运输船队冲破敌人拦截驶往马耳他岛的航程中，有

许多优秀舰只可以免遭损失，而且敌人通向的黎波里的航线也会受到更大的骚扰。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很可能被德国的空中进攻所压倒，失去有利地位，而使马耳他岛的防务在这时更加复杂起来。

我深深感到迫切需要班泰雷利亚岛，但是时机已经失去了。我们面临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到1943年5月，我们摧毁了在突尼斯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以后，一支英国登陆部队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命令在经过猛烈的轰炸之后，才攻占了班泰雷利亚岛。那时，我们在这一战场上已有极为强大的力量，虽然在事前认为任务非常艰巨，却没有受到损失。

我方海军同德国空军第一次激烈的遭遇战，发生于1月10日。那时，舰队正掩护一系列的重要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一支运输船队从西面驶过中地中海，其他船只正从东面向马耳他岛运送给养，以及各种小规模的运输船队正驶往希腊。那天清晨，驱逐舰"豪侠"号在马耳他海峡内护送主力舰队时触了水雷。不久便出现了尾随侦察的敌机，当日下午，德国轰炸机开始猛烈袭击。敌机集中轰炸由博伊德上校指挥的新航空母舰"光辉"号。在三次空袭中，"光辉"号被巨型炸弹击中六次，重创起火，死八十三人，重伤六十人。该舰幸亏有装甲甲板，才能有效地进行抵御，舰上配备的飞机至少击毁了五架来袭的敌机。这天夜间，在空袭愈益加剧、舵机失灵的情况下，博伊德上校把"光辉"号驶进了马耳他。

当夜，坎宁安海军上将率领主力舰队在马耳他岛以南护送向东行驶的运输船队，未受阻挠。翌日，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格罗斯特"号在快要驶抵马耳他岛东岸时，受到了俯冲轰炸机的袭击，这些敌机是从太阳照射过来的方向飞来的，因

此来被发现。“格罗斯特”号被击中一弹，未曾爆炸，受创轻微。但是，“索斯安普顿”号的机舱却被击中了。烈火熊熊，无法扑灭，该舰不得不放弃，随后便沉没了。这样，运输船队虽然安全地驶到目的地，舰队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德国人觉察到那艘受伤的“光辉”号在马耳他岛处境危险，所以决心要摧毁它。但是，我们驻在该岛的空军已经增强，因此在战斗中，一天之内便击落敌机十九架。尽管“光辉”号在船坞中又被炸弹击中，它还能于1月23日晚启航。敌人发现它已驶去，千方百计地搜寻，但该舰于两天后安抵亚历山大。

这时，从西西里岛出击的德机不下二百五十架。马耳他岛在1月间受到五十八次轰炸，从这以后直到5月底，每日遭到三、四次轰炸，中间只有短暂的间歇。但是我们的人力、物力增加了。1941年4月到6月间，海军上将萨默维尔的H舰队曾出动六次，将相当数量的飞行小队运送到马耳他岛的航程以内，同时有二百二十四架“旋风”式战斗机连同少数其他型式的飞机从西面飞抵战场。给养和增援部队也从东面运到。到了6月，击退了敌人第一次猛烈的袭击，该岛才得以幸存。大难的来临是在1942年。……

在纷至沓来的严重事件中，有一件事使我们最感不安。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是支配我们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控制自己的远洋航线以及使我们的船只得以自由驶近并出入我们的港口。我在前一卷曾谈到德国占领北起北角① 南

① 在挪威马格吕岛。

至比利牛斯山脉的欧洲海岸线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敌人的潜艇在速度、续航力和活动半径方面都不断有所改进，它们能够从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任何港口或海湾出击，摧毁我们海上运输的粮食和商品。它们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在1941年的第一季度，新潜艇的生产率是每月十艘，不久后就增加到每月十八艘。这些潜艇包括所谓五百吨型和七百四十吨型两种。前者的巡航航程为一万一千英里，后者则达一万五千英里。

这时，在德国潜艇带来的灾难以外，又加上远程飞机在远洋所进行的空袭。在这些飞机中，被称作兀鹰的“福克乌尔夫200”式飞机是最可怕的一种，幸亏在最初为数有限。它们可以从布雷斯特或波尔多起飞，在不列颠岛上空盘旋一周，到挪威加油，然后于次日返航。我们由于缺乏护航舰，不得不编成包括四五十艘船只的庞大运输船队，敌人的远程飞机在途中可以从高空俯瞰这些运输船队的出航或返航。它们可以用毁灭性的炸弹袭击这些运输船队或个别船只，也可能把方位示知待机而动的潜艇，以便进行截击。还在12月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准备作为最后手段的办法：从默尔西河口及克莱德河河口起，到爱尔兰西北六百英尺深的水域线止，设置水中爆炸网。

这时，我们已下令扩充并重新部署空军海防总队，尽先供给驾驶员以及飞机。我们计划到1941年6月，海防总队的飞机增加到十五个中队，而且在这些增援的飞机中包括我们预期在4月底收到的五十七架美国“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在内。南爱尔兰拒绝给予我们以一切便利，再次对我们的计划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北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岛加紧建造新飞机场。

以上谈到的种种不利条件继续存在，而且有些还变本加

劳。由于英国科学和技术取得成就，由于二万名忠实的工作人员携带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新奇仪器，不辞辛劳地把研究成果在上千的小艇上运用起来，我们才使磁性水雷这条绞索松动一些，不让敌人勒紧。我们沿不列颠东海岸的整个海上运输工作，经常处于德国轻轰炸机或战斗机的威胁之下，因此海运量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认为对我们的生存有极大关系的伦敦港，这时的吞吐量已降到四分之一。英吉利海峡是实际作战的水域。敌人对默尔西河、克莱德河和布里斯托尔的空袭，严重地破坏了这些仅存的主要商港。爱尔兰海峡和布里斯托尔海峡或则遭受封锁，或则受到严重障碍。每一位权威的专家，如果在一年前遇到现在这些情况，都会立即宣布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

我们的保护措施规模很大，要求又非常细致，其中包括护航、变更航线、使用消磁电缆、扫雷、不走地中海航线等等。大多数船只的航行时间和航行距离都有所延长。同时，由于轰炸与灯火管制，船只在港口也要拖延一些时日。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我们船舶的有效运输力大为降低，这种情况比实际遭受的损失更形严重。在开始的时候，海军部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使船只能够安全进港，并以沉船愈少成就则愈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成就。但是，现在却不能以此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了。我们一致认识到，国家的生存和作战活动，都依靠安全起岸的进口物资的数量。我在2月中旬向第一海务大臣发出备忘录中说，“我了解到，1月份载货进口的船只不及去年1月份的一半。”

压力在不断地增加，同时我们损失的船舶远远超过了我们新建的船舶。美国的庞大资源只能缓慢地发生作用。我们不能

再期望意外地获得大量的船只，象1940年春季挪威、丹麦、荷兰与比利时被敌人占领后那样大量船只落入我们手中。而且被击伤的船只数量很多，远远地超过我们的修复能力，同时我们的港口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拥挤，使我们穷于应付。3月初，被击伤的船只共达二百六十万吨位，其中有九十三万吨位是一面修理、一面装货，近一百七十万吨位的船只无法使用，必须修理。我如果能回避得了这些严重的麻烦问题，而在军事方面从事于虽不顺利、却是生气勃勃的冒险行动，那简直是如释重负。我是多么愿意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来替代这些用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表明的难以捉摸、难以估量的危险啊！……

现在，潜艇战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间，我们消灭了三名德国的海上“王牌”，我们的防御措施也有所改进，这些都对潜艇战术发生了影响。敌人发现西部海口地区战事过于激烈，便把潜艇西移到更远的海域。由于南爱尔兰拒绝我们利用它的港口，我们只有少数小型舰队的护航舰只可以驶入那些海港，而且在那里也得不到空中掩护。我们从联合王国海军基地出航的护航舰，只能在通往哈利法克斯航线约四分之一的航程中对我运输船队提供有效的掩护。4月初，一个“狼群”①在西经28度袭击一支运输船队，当时护航舰还没有赶到。在一场历时很久的战斗中，二十二只船中有十只被击沉，一艘德国潜艇也被击毁。我们无论如何总得设法扩大我们的控制范围，否则我们生存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

直到现在为止，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援助还只限于物资供应；但是，在目前这种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下，总统依据他作

---

① 德国的潜艇群。

为三军统帅所享有的、并载明于美国宪法的各项权力行事，开始给予我们武装援助。他决意不容许德国潜艇和攻击舰艇所进行的战争逼近美国海岸，并且要确保他运送给不列颠的军火至少要运过运输途中的一半路程。早在1940年7月，他就派遣了一个海、陆军使团到英国来进行“探索性的会谈”。美国海军观察员戈姆利海军上将不久就满意地见到，不列颠已经下了百折不回的决心，并且能够抵御得了逼到眼前的任何威胁。他和英国海军部共同担负的任务是，确定怎样才能更好地将美国的力量集中用于：第一，根据现行政策的“除了参战以外的一切援助方面”；第二，一旦美国被卷入战争时，同英国武装部队联合作战。

从一开始便产生了两大英语国家对大西洋联防的广泛计划。1941年1月，在华盛顿开始了参谋人员的秘密会谈，会谈范围涉及整个战局，并制定了一项联合的世界战略。美国军事首脑同意，一旦战火蔓延到美洲和太平洋，大西洋和欧洲应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场。必须首先击败希特勒，美国在大西洋战役中所提供的援助便是根据这个概念筹划的。为了适应大西洋中联合远洋运输船队的需要，各项准备工作已着手进行。1941年3月，美国军官访问大不列颠，为他们的运输船队和空军选择基地。随即开始了建筑基地的工程。在这期间，美国在西大西洋英国领土内发展基地的工作（这项工作在1940年便已开始）进展非常迅速。北大西洋的运输船队的最重要的基地是纽芬兰的阿根夏。美国的武装部队借助于这一基地和联合王国的港口，可以对大西洋战役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或者说，在规划这些措施的时候，看来是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

在加拿大与大不列颠之间有纽芬兰、格陵兰和冰岛。这些

岛屿都位于哈利法克斯港与苏格兰之间那条最短的，也可以说是弧形的航线的一侧，离航线不远。以这些“踏脚石”为基地的武装部队，可以分段地控制整条航线。格陵兰是完全缺乏资源的，但是我们可以对其余两个岛迅速地善加利用。有人说过：“谁占领了冰岛，谁就牢牢地握着一枝手枪对着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当丹麦在1940年遭受蹂躏时，我们所以在冰岛人民的同意下占领该岛，就是根据这种想法。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对付德国潜艇了，于是我们于1941年4月在该岛设立了基地，以供我护航舰分队和飞机使用。冰岛成为一个单独的指挥区，从那里起，我们把海上护航舰的活动范围扩展到西经35度。虽然如此，西面仍有一个不祥的缺口，暂时还无法弥补。5月间，一支从哈利法克斯港出航的运输船队在西经41度受到猛烈的袭击，并在我反潜艇护航舰能够赶到以前丧失了船舶九艘。

这时皇家加拿大海军的力量正在增长，他们的新式护航快艇开始大量地从造船厂驶出。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加拿大准备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担任重要角色。从哈利法克斯港出航的那支运输船队的损失，十分清楚地表明，要护航，就非得实施从加拿大到不列颠的全线护航不可。于是，英国海军部于5月23日请求加拿大和纽芬兰政府同意，利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为我们联合护航舰队的前哨基地。他们立即表示同意，到月底，全线的连续护航终于实现了。从那时起，皇家加拿大海军便负起了护航责任，用他们自己的人力物力保护那条远洋航线西段的运输船队。我们能从大不列颠和冰岛保护其余航程上的舰只。尽管如此，可资利用的舰艇数目仍然极少，难以完成护航的责任。这时，我们的损失急剧上升。到5月为止的三个月中，仅由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就有一百四十二只，共计八十一

万八千吨。其中九十九只，共约六十万吨，是美国的。德国人为了获得这些战果，在北大西洋继续不断地保持十二艘左右的潜艇，此外，还在弗里敦附近的海域进行猛烈袭击，力图扼杀我们的防务。在这一海域内，仅在5月一个月中，六艘潜艇便击沉三十二艘船只。

在美国，总统正一步一步地靠拢我们，而且他的有力的干涉不久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有必要在冰岛发展基地，他也在同月采取步骤，在格陵兰设立了一个专供美军使用的航空基地。据悉，德国人已在格陵兰东海岸面对着冰岛的地方设置了气象站。因此总统的行动是十分及时的。此外，我们还可根据其他决定，将我们在地中海或其他海域的激战中受伤的商船和军舰，都送往美国的船厂里修理，这就使我们国内极其紧张的人力、物力立即得到了非常必要的缓和。总统在4月4日的电报中证实了这一点，这封电报还提到，他已拨出经费另行修建五十八处下水场并新建船舶二百艘。……

一星期后，传来了关系重大的消息。总统于4月11日打电报告诉我，美国政府打算把从战争初期以来就划定的所谓安全地带和巡逻区域，扩展到包括西经26度左右以西全部北大西洋水域在内的一线。为了这一目的，总统建议利用从格陵兰、纽芬兰、新斯科舍、美国、百慕大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以后还可能再扩大到巴西）出动的飞机与海军舰只。他敦促我们极其秘密地将运输船队的行踪通知他，"从而使我们的巡逻舰只，得以寻觅侵略国家在安全地带的新线以西出动的任何舰只或飞机"。就美国方面来说，只要在他们的巡逻区域内发现可能是侵略国家的舰只或飞机，将会立即公布其位置。总统最后说，"我不一定就此发表特别的声明。我可能决定发布有关海军行动的必要

命令，而让时间去证实这个新的巡逻区域的存在。”

我把这封电报转到海军部，心中如释重负。……

两天以后，4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总统于4月11日的电报中提及的那条东西两半球的分界线。其后，这条沿着西经26度划定的界线遂成为美国实际上的海上边疆。这条分界线把英国在美洲的或邻近美洲的领土、格陵兰和亚速尔群岛，都包括在美国范围以内，并且，不久以后又向东扩展，把冰岛也包括进去。根据这项声明，美国军舰将在西半球的海域巡逻，并随时将这一区域中敌人的任何活动通知我们。但是，美国仍然是非交战国，所以还不能在这一阶段对我们的运输船队提供直接的保护。英国依然独自担负在全线上保护运输船队的责任。……

我们在巴尔干成立一条战线的所有努力，都是以确保在北非的沙漠侧翼为基础的。这一侧翼或许应该设在托卜鲁克。但是，韦维尔① 的迅速西进和班加西的攻克已使我们占领了昔兰尼加全境。这一区域的门户就是阿盖拉的海角一隅之地。在伦敦和开罗的有关当局一致认为，应不惜一切代价据守阿盖拉，这是超过所有其他军事行动的重要任务。意大利军队在昔兰尼加全军覆没，而敌人调集新军又必须跋涉漫长的路程，所有这一切都使韦维尔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他可以用少量的军队据守这个重要的西翼，而以训练较差的军队去替换他那支久经战斗的部队。沙漠侧翼是影响全局的关键所在，任何方面都无意使它为了希腊或巴尔干的任何事件而受到损失或威

① 英国陆军元帅（Sir A. P. Wavell），1940年12月他曾在北非大败意大利军队。

胁。……

这时，我情报人员的报告开始引起了三军参谋长的关心。2月27日，他们向韦维尔发出一封电报，提出警告说："鉴于德国装甲部队和空军已抵达的黎波里塔尼亚，此间已在考虑埃及和昔兰尼加的防务问题。请简要电告你的意见。"针对这封电报发来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复电，其中包括下列内容："……航运的危险、陆路的困难和酷暑的临近，在使敌人难以在夏末以前发动这样的攻势。……"

但是这时有一位新人物跃登世界舞台，他是将在德国军事史占有一席地位的一名德国武士。埃尔温·隆美尔①于1891年11月生于符腾堡省的海登海姆。他童年时代体质孱弱，在家读书读到九岁才转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他的父亲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1910年，他在符腾堡团中任见习军官。当他在但泽军官学校受训时，他的教官们说道，他身材虽小，但很强壮。他在智力方面并不出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转战于阿尔贡地区、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曾经两次受伤而获得最高级的铁十字勋章和战场勋章。在两次大战之间，他担任团级军官，并供职于参谋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波兰战役中任元首行营的司令官，其后担任第十五军第七装甲师司令。这一个师的绰号叫"鬼怪"，是德军突破马斯河的先锋。英军于1940年5月21日在阿拉斯反攻时，他几乎被俘。之后，他统率着他的师经由拉巴西向利尔推进。如果这一次突击再多获得一点点成就，或者如果没有被德国最高统帅部下令进行限制的话，便可能把包括蒙哥马利将军所指挥的第三师在内的大部分英军切

① 德军名将，有"沙漠之狐"之称，后晋升为元帅(Marshall Erwin Rommel)。

断。他指挥的这一师是越过松姆河、沿着塞纳河直指鲁昂的尖兵，曾席卷法军左翼，而在圣梵勒利附近俘获大批英法军队。他这一师最先进抵英吉利海峡，而在我们最后的一批军队刚刚撤退后进入瑟堡，隆美尔在这里接受了该港与法国俘虏三万人的投降。

由于这许多战绩和功勋，他于1941年初被任命为德国派往利比亚的军队的司令。2月12日，他率同他的部下抵达的黎波里，协同他以前曾与之对垒从而建立了殊勋的那个盟国①作战。那时，意军的希望只求据守的黎波里塔尼亚，而隆美尔则负责指挥在意军司令统率下日益扩充的德国分遣队。他立即争取进行攻势行动。4月初，意军总司令试图说服他，在未获得他的同意前，德国的非洲军团不得前进。这时，隆美尔抗议道，“作为一名德国将领，他必须按照形势的需要发布命令”。他宣称，因供应问题而提出任何保留都是“毫无道理的”。他要求并获得了行动的完全自由权。

隆美尔在非洲战役中自始至终表现出是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特别擅长于在一次战役之后迅速整编，争取新的胜利。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赌博家，善于掌握供应问题，而且藐视种种阻碍。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是放手让他做去，后来对他的成就感到惊愕，因此有意抑制他。他热心作战，一往无前，使我们受到严重的灾难。但是，他对于我1942年1月在下院对他的称赞是当之无愧的(这番话并不是没有引起公众的指责)，当时，我提到他时说道，“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勇敢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可以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对手意大利。

领。”他也值得受我们的尊敬，因为尽管他是一名忠诚的德国军人，后来却憎恨希特勒和他的所作所为，并且参与了1944年企图驱除这个狂徒与暴君以拯救德国的密谋。为此，他牺牲了生命。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进行的残酷战争中，侠义行为是没有地位的。大规模的无情屠杀和群众意向压倒了一切公平意见。我对隆美尔所表示的敬意，虽然曾被评判为不合时宜，但我仍不懊悔，也无意收回。

在伦敦，我们接受韦维尔3月2日发来的电报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阿盖拉隘路是全局的核心。如果敌人突破阿杰达比亚，那么班加西以及托卜鲁克以西的一切据点便都岌岌可危了。他们可以选择通往并越过班加西的那条良好的沿海公路，或者选择利用直通梅基利与托卜鲁克而把二百英里长、一百英里宽的沙漠突出部分切断的那些小路。我们曾于2月间采取后一路线，因而切断并俘获经由班加西撤退的数千意军。如果隆美尔也走这条沙漠路线，用同样的办法欺骗我们，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只要我们据守在阿盖拉的门户，敌人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来愚弄我们。那里有良好的地形，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布防，部分原因在于托卜鲁克向外运输的任务过于紧张，而班加西的港口据鉴定还不能使用。

这一仗打得如何，不仅依靠是否熟悉地形，也要看是否熟悉沙漠作战的条件。我们以前的前进是十分迅速，我们的胜利是十分容易，十分彻底，以致我们在这一时期没有牢牢掌握这些战略要领。但是，如果我们在装甲和质量方面而不是在人数方面占有优势，加上空军力量势均力敌，那么即使失去那个门户，也还是能够使比较精锐、比较活跃的军队在一场沙漠的混战中获胜的。我们所作的安排却没有一项达到这些条件。我们

在空军方面处于劣势，我们的装甲部队大感不足（理由将在以后说明），而托卜鲁克以西的军队，在训练与装备两方面也都不完善。

3月17日，韦维尔将军和迪尔将军①到昔兰尼加，亲自进行视察。他们乘汽车经由安特拉特到阿盖拉，迪尔立即感觉到防卫阿盖拉与班加西之间大片沙漠地带的困难。他在3月18日从开罗发给国内帝国副总参谋长的一封电报中说道，显著的事实是：在阿盖拉与班加西以东的那些盐田之间的沙漠，一片空旷，很适宜于装甲车辆的行驶；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较强的装甲部队将获得胜利。步兵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当然，在这些辽阔的沙漠中，给养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完全有利于守方。他说，韦维尔已经着手解决防守方面的困难问题了。……

3月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德国军队正从的黎波里开往阿盖拉。韦维尔于3月20日报告说，敌军似乎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有限度的进攻，昔兰尼加边境的局势使他感到有些不安。如果我们的前哨部队被逐出他们现在的阵地，在班加西以南将没有阻挡敌军的适当据点，因为这一地区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但是，敌人由于后勤的问题，只能作一次有限度的进攻。……

隆美尔于3月31日开始对阿盖拉进攻。尼姆将军奉到的命令是，在敌人进逼时，打一场拖延战，然后退到班加西附近，并应尽量持久地掩护该港。他还奉令在必要时在破坏该港后撤退。因此，我们在阿盖拉的装甲师——实际上只有一个装甲旅和该师的支援部队——在以后两天内缓缓地撤退了。在空军方

① 元帅，英国总参谋长（Field-Marshal Sir John Dill）。

面，敌人确实是强得多。意大利空军仍然是无足轻重，但是德国空军约有一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韦维尔将军于4月2日报告，昔兰尼加的前哨部队受到德国一个殖民地装甲师的袭击。“昨日，有几个前哨据点受到袭击和破坏。目前的损失虽还不算严重，但是装甲旅的车辆情形使尼姆非常担忧，损坏的车辆看来不少。至少在三四个星期之内我抽调不出装甲部队来，因此我提醒他，即使要撤退一大部分军队，甚至可能从班加西撤退，也要保存三个旅。”

我根据韦维尔将军以前的估计，仍然觉得敌人的潜在力量有限。……

4月2日，我们的第二装甲师的支援部队被敌军五十辆坦克逐出阿杰达比亚，而撤至其东北三十五英里的安特拉特境内。该师则奉命撤至班加西附近。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德军袭击下秩序紊乱，损失惨重。电讯最后说，“已下令破坏班加西的港口”。韦维尔将军于3日飞临前线，归来后报告说，装甲旅的大部分遭到占优势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击，已溃不成军。这将使班加西以东及东北的第九澳大利亚师的左翼失去掩护。“他们的撤退或许是必要的。”他说，由于敌人在利比亚的兵力强大，第七澳大利亚师不能开往希腊，而必须调往西部沙漠。英国第六师仍未装备停当，必须留作后备。“这就要推迟对罗得岛的进攻。”于是，在一击之下，而且，几乎在一日之中，作为我们一切决定的基础的沙漠侧翼便崩溃了，并且大事削减了本来就力量薄弱的那支派往希腊的部队的力量。攻占罗得岛是我空军在爱琴海的作战计划的重要部分，现在也不能实现了。……

韦维尔的前线之行是要让奥康纳接任司令的职务。这位军

官当时尚未恢复健康，他向总司令表示，在战争中途，最好不要真的接替尼姆的司令职务，而是用他对于当地的专门知识从旁协助。韦维尔同意了。这次商定的办法未得顺利实行，或者说，没有实行多久。6日夜间，我大批军队从班加西撤退。第九澳大利亚师正沿着海岸公路向东撤退。为了避免交通拥挤，尼姆将军偕同奥康纳将军乘坐一辆汽车，未带任何护卫，从一条小路驶去。在黑暗中，他们突然被截住，一队德国巡逻兵从车窗伸进手枪对着他们；这时，他们除了个人投降以外别无办法。尼姆曾获得维多利亚勋章，奥康纳从各方面来说是我们的最有经验和最有成就的沙漠地区司令官；我们损失了这两位英勇的陆军中将，不胜悲痛。……

正当我们在希腊的冒险行动全面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沙漠侧翼遭到失败，构成了一个最大的灾难。我在相当时期内对于所以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大惑不解，因此战事略一停息，我便觉得必须要求韦维尔将军对于事情的经过进行一些解释。我一直等到4月24日才向他提出了对他是一种精神负担的要求。

我们仍在等待阿盖拉和梅基利方面的战况。这几场战斗使我们损失了第三装甲旅和一个摩托化骑兵旅的精华。我们显然已受到一次重大的失败。因此，为了理解你的困难以及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有必要概括地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和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谋略上、战术上比不过敌人，还是因为据说是过早地破坏了汽油库造成的错误？根据幸存者的报告，一定能够使我们对于这场关键性战斗得到一个有头有尾的报告。如果你不将情况报告的话，我便无法再帮助你了。……

韦维尔于25日电复。他指出，因为几乎所有有关的高级军官都已失踪，所以无从获悉他们的行动和动机，他必须慎重将事，以免不公正地归咎于他们。正如他素日的性格一样，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同日，他又发来总结这次战斗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他曾注意到，第二装甲师司令部和第三装甲旅要经过相当时间才能够熟悉沙漠和沙漠作战的情况。他曾经希望，在敌军大举进攻以前，至少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适应当地环境的时间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安顿停当，攻击就开始了，而且至少比他的参谋人员根据时间与空间计算出来的可能日期早了两个星期，但是敌军的实力则大致同他的估计相符。他曾经料到，敌人将有限度地向阿杰达比亚挺进。缴获的文件和战俘的供述一直证实了敌人的本意不过如此。我们现在知道，敌人的初步成就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后来他们所以能够乘胜追击，完全是由于第三装甲旅过早而不幸地被击溃。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敌人从阿杰达比亚推进的部队是临时匆匆编成的，它包括由德意两国部队编成的八支小纵队，其中有几支纵队与后方供应脱节，不得不由飞机运送物资。

我第三装甲旅是一支临时编成的部队，拥有机械装备不良的巡逻坦克一个团、轻型坦克一个团和用〔缴获的〕意大利中型坦克装备起来的一个团。从昔兰尼加战役结束时我装甲战车的情况来看，如果准备派往希腊的军队配备任何装甲力量的话，这一个旅就可能成为他能够投入这场战斗的最精锐的部队。如果它拥有充分的实力并有较长的时间作为一支战斗部队而安顿下来的话，它本来是足以对付得了预料中的进攻的。……

我好象记得艾登说过，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我记

得有人曾经这样评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这不是真实的想法，只不过是一时出于悲痛说的话。……但是事实终归是：在实行"战斧"①作战计划之后，我得出结论，认为应该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了。②

① 英国企图在北非击败隆美尔的作战计划。韦维尔于1941年6月15日开始向德军发动攻势结果又遭到灾难性的失败。

② 丘吉尔于1941年6月21日任命奥金莱克（Sir Claude Auchinleck）去接替韦维尔担任中东地区英军总司令，韦维尔改任印度地区英军总司令。

不需要的战争

15. 苏联的报应

内米西斯是“司报应的女神，她毁伤一切非分的幸运，抑制那随之而来的骄傲情绪，……并且是大奸大恶的惩罚者。”(见《牛津英语词典》)现在我们必须揭露苏联政府和庞大的共产党机构的冷酷算计的谬误与虚妄，必须揭露他们对自己处境认识的极端无知。他们对于西方列强的命运漠不关心，尽管这意味着“第二战场”的破灭，但不久以后他们又大声疾呼地要求开辟这一战场。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到，希特勒在六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决意要毁灭他们了。如果说，他们的情报组织曾经报告过德国正向东欧部署大军(这时正日益扩大规模)的消息，他们却忽略了采取许多必要的对策。这样，他们就听任德国蹂躏所有巴尔干国家。他们仇恨、憎恶西方民主国家。但是，对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本身安全有莫大关系的那四个国家，即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本来是能于1月间在英国的积极援助下由苏联联合起来成立巴尔干战线反抗希特勒的。他们却让这些国家陷于混乱，于是，除了土耳其以外，都一个一个地被德国吞并。战争主要是人们行事失策的纪录，但是我们怀疑历史上是否有象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党的领袖们所犯的那样的错误，他们抛弃在巴尔干的一切机会而因循等待，他

们也没有能够觉察到那即将对俄国发动的猛攻。我们前此一向把他们看作自私的谋略家，现在证明他们还是傻瓜。俄国的力量、群众、勇敢和坚忍还有待考验。但就战略、政策、预见和才能来判断，斯大林和他的人民委员们在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骗上当者。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在12月18日的指令中曾规定5月15日为进攻俄国的日期，但是他在对贝尔格莱德革命①的盛怒之下，于3月27日把进攻日期推迟一个月，以后又推迟到6月22日。到3月中旬，德国在北面向俄国主要前线调动军队，已经不是需要采取特别隐蔽措施的行动了。但是，柏林当局在3月13日下令在德国境内工作的俄国考察团人员停止工作，并遣送他们返国。在德国这一地区的俄国人只许逗留到3月25日为止。在北部地区，德国已经集结强大的部队。3月20日以后，还要集结更强大的兵力。

4月22日，苏联方面向德国外交部指控，越来越多的德国飞机连续侵犯俄国边界。从3月27日到4月18日，这类事件有八十次。俄国的照会并指出，“如果德国飞机继续飞越苏联边界，将会发生严重事件。”

德国的答复是一系列对苏联飞机的反指控。

5月7日，舒伦堡满怀希望地报告说，斯大林已经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成为苏联政府的首脑。“更换的原因可能在于最近在对外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导

① 1941年3月27日，南斯拉夫空军司令米尔科维奇领导一批爱国军人举行起义，推翻了与纳粹德国勾结的以茨维特科维奇首相为首的政府。

致了火热的德苏关系的冷却，而斯大林则是一直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和保持双方这种诚挚关系的。……”德国海军武官自莫斯科发来报告，用这样的话来表示同一要点：“斯大林是德苏合作的中心。”俄国对德国姑息的事例增多了。……正如德国驻军部经济司长托马斯将军后来在他的论述德国战时经济一文中所写的：“俄国人履行交货任务直到进攻前夕，在最后几天，还从远东用快车急运橡胶。”

希特勒对于他的欺骗与隐瞒伎俩的成功，以及对于他的受害人的心理状态，理应感到满足。……

6月22日晨四时，里宾特洛甫把正式宣战书递交驻柏林的俄国大使。黎明时分，舒伦堡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莫洛托夫。后者沉默地倾听了德国大使所宣读的通知，然后评论说，“这就是战争。你们的飞机刚刚轰炸了我们十多个未设防的村庄。你认为我们应该受到这样对待吗？”

面对着塔斯社的广播，要想在艾登先生已经向驻伦敦的苏联大使提出的各项警告之外再说些什么，或者由我重新作出私人的努力去唤醒斯大林注意他的危险，都是徒劳无益的事。美国甚至经常地以更确实的情报送交苏联政府。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打破斯大林在他自己和那可怕的事实之间所持的愚昧的偏见和固执的想法。虽然按照德国的估计，俄国有一百八十六个师集结在它的边界，其中有一百一十九个师面对着德国前线，但俄国军队却多半受到突然袭击。德军在前沿地带没有见到任何准备进攻的迹象，而且俄国的掩护部队很快地就被打败了。类似1939年9月1日波兰空军遇到的那种灾难，这时又以大得多的规模重新降临在俄国的飞机场上。天亮以后，数百

架俄国飞机被发现，在能够起飞以前就被炸毁了。这样，苏联的宣传机器于午夜播送出来的仇恨英国和美国的叫嚣，到了黎明时分就被德国的炮声压下去了。

6月20日(星期五)晚上，我独自乘车到契克斯去。我知道，德国对俄国的进攻不过是几天内的事，或许是几小时内的事。我曾经安排在星期六晚上就此事发表一个广播演说。这当然得用审慎的词句。而且这时苏联政府态度傲慢，盲目无知，把我们提出的一切警告，只当作是被打败的人想拉别人同归于尽的图谋。我在汽车中思索的结果，把这次广播演说推迟到星期日晚上，我想到那时一切会明朗起来。所以星期六象往常一样，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

我在星期日(22日)早晨醒来以后，听到了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消息。信念已变成了事实。我毫不怀疑我们的任务和政策是什么。也毫不怀疑我要说的话是什么。现在尚待完成的只是起草这篇演说稿了。我吩咐负责人员立刻公告我将在当晚九时发表广播演说。不久，迪尔将军从伦敦赶来，带着详细的消息进入我的卧室。德军已经从一条辽阔的战线进攻俄国，已经突然袭击了苏联一大部分停留在地面上的空军，并且似乎正锐不可当地迅速前进。这位帝国总参谋长又说，“我想，他们将会成群地被包围。”

我一整天在起草我的广播稿。没有时间去同战时内阁商量，而且也没有必要。我知道，我们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一致的。艾登先生、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他是在10日离开莫斯科的)也一整天和我在一起。

我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先生在这个周末值勤，他所写的这个星期日契克斯的情况，或许是值得一读的。

6月21日，星期六，我在晚餐以前到了契克斯，怀南特①夫妇、艾登夫妇和爱德华·布里奇斯正在那里。进餐时，丘吉尔先生说，德国进攻俄国，现在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了。他认为，希特勒正指望博得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但是希特勒错了，我们应当全力帮助俄国。怀南特说，美国的态度也是一样。

饭后，当我同丘吉尔先生在槌球草场上散步时，他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我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同流合污了。丘吉尔先生答道，“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翌日晨四时，我被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惊醒，电话说，德国已经进攻俄国了。首相曾经常说，除非敌人打到〔英格兰〕，不得因别的事情把他唤醒。因此，我延迟到八点钟才告诉他。他只说了一句话：“通知英国广播公司，我在今晚九时广播。”他在上午十一时开始准备讲稿，除了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克兰伯恩勋爵和比弗布鲁克勋爵共进午餐外，他整天都在忙于此事。……讲稿在八时四七分才准备好。

① 美国驻英大使（John G. Winant）。

我在这次广播中说：

“纳粹制度……除了贪得无厌和种族统治而外，没有任何宗旨和原则。它的残酷行为和凶暴侵略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各式各样的人类罪行。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他们在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啊，是的，大家经常都在祈祷——她们在祝愿亲人平安，祝愿她们的赡养者、战斗者和保护者的归来。我看到俄国上万的村庄，那里穿衣吃饭都依靠土地，生活虽然十分艰辛，可是那里仍然有着基本的人类乐趣，少女们在欢笑，儿童们在嬉戏。我看到，纳粹的战争机器在以疯狂的进攻，向这一切猛冲过去；跟着过去的是身穿着华丽戎装、佩刀和鞋跟叮当作响的普鲁士军官们，以及刚刚威吓过、压制过十多个国家的那些奸诈的专业特务们。我也看到大批头脑愚钝、受过训练、唯命是从而凶暴残忍的德国士兵，象一群爬行的蝗虫在蹒跚行进。我看到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空中飞翔，它们被英国人多次鞭挞仍然伤痛在身，却想寻找它们认为是比较省力和稳当的猎取对象。

“在这一切令人头晕目眩的突然袭击的背后，我看到那一小撮计划、组织和发动这种造成人类极大恐怖的恶棍。……

“我必须宣布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我确信伟大的自

治领不久就会一致同意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发表这个宣言，但是，我们将要采取什么政策，你们还有怀疑吗？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和敌人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会谈。我们将在陆地上对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里对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中对他作战，直到邀天之助，我们把他的影子从地球上消除尽净，把世界上的人民从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止。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与的一切援助。我们将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朋友和盟国呼吁，请他们采取同一方针，并且如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坚持到底。……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而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与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美国的行动，不应当由我来讲，但是我要说这样一句话：如果希特勒妄想他对苏俄的进攻，将会使决心消灭他的伟大民主国家的目标有丝毫偏离，或者会使他们的努力有丝毫松懈，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我们从他的暴政下拯救人类的努力将得到增强和鼓舞。我们将加强而不是减弱我们的决心和手段。

“有些国家和政府行事愚蠢，它们让自己被人家各个击破，而如果它们采取联合行动的话，它们本来是能够

拯救自己，并且能够使世界免于发生这场灾祸的；但是现在不是针对它们的愚蠢向它们讲清这些道理的时候。我在几分钟前谈到迫使或诱使希特勒对俄国进行冒险所表现出来的嗜杀和贪欲时，我曾指出在他的暴行后面还存在着一个更深的动机。他想摧毁俄国的力量，因为，他希望，如果他能得逞，就可以把他的陆空军主力从东欧调回，再大举进攻这个岛国。他知道，他必须征服这个岛国，否则他就要因他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切行动可以在冬季来到以前结束，他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进行干涉以前击败大不列颠。他希望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重演他各个击破敌人的故技。他一向就是依靠这种手段起家的。然后，他就可以为他的最后行动扫清障碍，这最后行动就是使西半球屈服于他的意志和制度之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征服别国的一切战果都是空的。

"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16. 我同罗斯福的会晤和《大西洋宪章》

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哈里·霍普金斯来到唐宁街的花园中，我们同坐在阳光下。他一开口就说，总统很愿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之类的地点同我会晤。我随即答道，我确信内阁将允许我请假。这样，一切很快就安排好了。地点选定为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日期定为8月9日。接着，命令我们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准备出发，我渴望同罗斯福先生会晤。到现在，我已同他日益亲密地通信将近两年了。况且，我们之间的一次会谈，将昭告世人：英美两国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将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担心，将使日本仔细考虑，并使我们的朋友欢欣鼓舞。关于美国介入大西洋问题，援助俄国问题，我们本身的供应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威胁日益增加的问题，都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事。……

我携同前往的还有：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国防部的彻韦尔勋爵、霍利斯上校与雅各布上校，以及我个人的幕僚。此外，还有技术与行政部门以及计划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总统说，他将携同美国三军首长和国务院的萨姆纳·韦尔

斯与会。那时在北大西洋有大量的德国潜艇，所以必须极端保密。为了确保秘密，总统在表面上是休假巡游，但在海中换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把他的游艇留在后面作为迷障。这时，哈里·霍普金斯虽然身体很不好，但得到罗斯福的许可，取道挪威、瑞典和芬兰飞越一段令人疲倦而又危险的漫长航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最详尽地获悉苏联的局势和需要。他将在斯卡帕湾登上“威尔士亲王”号。

我在首相郊外官邸附近上了这列载运我们一行人员(包括大批译电人员)的长长的专车。我们在斯卡帕湾从一艘驱逐舰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8月4日黄昏时分，“威尔士亲王”号同护送它的几艘驱逐舰驶入大西洋浩瀚无际的洋面。我发现哈里·霍普金斯在长途飞行和莫斯科的吃力的会议之后是那样疲惫不堪。的确，他在两天以前抵达斯卡帕的时候是那样精神萎靡，以致庞德海军上将立刻让他躺在床上，并留他在那里休息。虽然这样，他却象往常那样快活，在航程中慢慢地恢复了气力，并告诉我他出使莫斯科的全部经过。……

位于螺旋桨上面的那些宽敞的舱房，当船停泊在港内的时候最舒适，但是，在海上遇到波涛汹涌的时候，则由于摆动而使人难以安身，所以我就迁移到舰桥上舰队司令的舱房内，在那里工作和睡眠。我很喜欢我们的舰长利希，他英俊可爱，具有英国水手的应有的一切品质。唉！不到四个月，他和他的许多伙伴，就随着他那艘极好的战舰永远沉没在波涛之下了。第二天，海上风浪是这样大，使我们不得不减低速度，否则就得丢开我们的驱逐舰护航队。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作出了决定。自此以后，我们就单独以高速度继续航行。据报告，曾

发现几艘德国潜艇，因此，我们曲折前进，并作大迂回，以躲开它们。舰上严禁发出无线电波的声音。我们能够收到电报，但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只能偶尔交谈。因此，我的日常工作暂停，并且有一种生疏的空闲感，这是自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许多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能够看一本消遣的书。驻开罗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曾送给我一本书，叫做《皇家海军霍恩布洛尔上校》，我发现这本书非常有趣。我趁一个适当的机会电告他说，“我发现霍恩布洛尔好得很。”这竟在中东司令部中引起了不安，那里的人以为“霍恩布洛尔”是他们不曾获悉的某项特殊军事行动的暗号。

由于海面波涛汹涌，后甲板不能使用，但是我每日三、四次出入各个舱房，并上下通向舰桥的各个扶梯，因而得到充分的运动。晚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电影院，在那里为我们一行人和那些不值勤的军官放映最新最好的影片。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晚餐后，观看‘汉密尔顿夫人’影片。非常好。首相看过五次，还是深受感动。放映完毕后，他对大家说：‘诸位，这部影片的内容很象你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大事，所以我想，它会使你们感兴趣的。’”这次航行是一支令人愉快的插曲。……

我们于8月9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会晤地点。……

在海军互致例行的敬礼以后，我登上“奥古斯塔”号军舰向罗斯福总统致敬。总统以完全的礼仪接待我。在奏两国国歌时，他由他的儿子埃利奥特搀扶而站立着。然后对我致最热烈的欢迎词。我把国王的一封信交给他，并介绍我们一行人员。随后，总统和我本人之间、萨姆纳·韦尔斯和亚历山大·卡多

根爵士之间以及双方的参谋人员之间分别开始会谈，在我们逗留的几天内几乎是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有时个人对个人，有时举行较大的会议。

在星期日（8月10月）的早晨，罗斯福先生带着他的僚属和几百名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各级的官兵代表来到“威尔士亲王”号舰上，在后甲板上参加礼拜仪式。我们大家都感觉到，这次礼拜是我们两国人民信仰一致的一种极为动人的表现。凡是参加这次礼拜仪式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阳光灿烂的早晨呈现在那拥挤的后甲板上的景象——讲坛上挂着英美两国的国旗；美国和英国的牧师共读祈祷文；英美两国的最高级海陆空军军官们成为一个整体，聚集在总统和我的背后；密集的英美两国水兵队伍完全混合在一起，他们合用着一本圣经，一齐热烈地参加双方都熟悉的祈祷与唱诗。

我亲自选择了两首赞美诗——“海上遇险歌”和“基督徒进军歌”。我们结束时唱了“上帝是我们千古的保障”这首诗，麦考利的著作使我们忆起，这是铁骑军在把约翰·汉普登[①]的遗体送入坟墓时曾经歌唱的那首诗。每一个字都好象震动心弦。这是生活中的伟大时刻。唱诗的人中约有一半不久即将战死。.[②]

罗斯福总统在我们最初会晤的一次谈话中对我说，他认为，我们最好能够拟订一项联合宣言，规定一些广泛的原则，以便沿着同一道路引导我们的政策。我亟愿依从这项极其有益

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雄，战死疆场（John Hampden）。

② 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与另一艘英军主力舰“却敌号”都被日本空军击沉于新加坡附近海域，总司令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和旗舰舰长约翰·利希以下海军官兵一千余人都随舰溺毙。

的建议，因而于次日（8月10日）交给他一篇初步的宣言大纲，……

考虑到所有关于我的反动的“旧世界”的观点的传说，以及据说使总统因此感到的痛苦，我愿意记录下来：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那个文件的初稿的实质与精神，是出自英国方面，是我自己的手笔。……

当我们在早晨会晤时，总统交给我一份修正稿，我们以此稿作为讨论的基础。……

8月12日，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去看总统，为了就宣言的最后形式同他取得一致意见。我向总统提出内阁对于第四点的修正文，但是，他宁愿依从业经同意的措词，我对这点也就没有再坚持。他欣然同意插入内阁希望添入的关于社会安全的那一节。许多词句上的改动都经双方同意，于是宣言定稿。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

1941年8月12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曾举行会谈，认为应当公布某些有关两国国策的共同原则，他们希望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世界的前途。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

第二，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的愿望的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这些权利。

第四，两国在适当照顾到它们现有的义务的条件下，力图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国或小国，战胜国或战败国，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贸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为其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原料。

第五，两国愿意在经济领域内促成一切国家之间的最充分的合作，目的在于使所有国家改善劳动标准，发展经济，享有社会安全。

第六，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以使一切民族得以在自己的疆界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居民都可以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

第七，这样的一种和平应当使所有的人能够在公共海洋上不受阻碍地航行。

第八，两国相信，世界上一切国家，基于实际的和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在自己的国界以外进行侵略威胁或可能进行侵略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备，就不能保持未来的和平。两国相信，必须在建立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前解除这类国家的武装。两国也将赞助和提倡一切其他实际可行的方法，以减轻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军备方面的沉重负担。

这次联合宣言的影响深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名义上仍属中立，却会同一个交战国发表这样的宣言，仅就这一事实而论，就是惊人的。宣言中包括有“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的词句（这是根据我的原稿中的一句话写的），这等于一个挑战，在平时这种挑战意味着战争行动。最后，不容忽视的

一点就是最后一节的现实意义。这一节清楚而鲜明地宣告，在战后，美国将和我们联合起来维持世界的秩序，直到建立起一种较好的局面为止。

总统和我本人也拟就联名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

1941年8月12日

哈里·霍普金斯自莫斯科归来后提出了一个报告，我们趁着研究这一报告的机会磋商，当你们正在对纳粹的进攻进行英勇抵抗的时候，我们两国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帮助你们的国家。目前，我们正通力合作，尽量提供你们最急需的物资。许多船已经载运物资驶离我们的海岸，最近将有更多的货船驶出。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一项更长时期的政策，因为，在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以前，我们还要走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如果不能赢得完全的胜利，我们的努力和牺牲就白费了。

战争在许多战线上进行着，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还可能发展出更多的战线。我们的资源虽然雄厚，却是有限的，因而必然要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在何时何地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以使我们的共同努力达到最大限度。这也同样适用于军用产品和原料。

你们的武装部队和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各种需要，只有凭着充分了解我们在作出决定时所必须考虑到的那些因素，才能决定。为了便于我们大家迅速规定我们合在一起的资源的分配，我们建议，筹备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将派遣高级代表出席，以便直接和你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你同意举行这个会议，我们想要告诉你，在这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我们将继续尽快地运送军需物资和材料。

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英勇而坚决的抵抗，对于击败希特勒主义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觉得，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立即制定将来分配我们的合在一起的资源的方案。

我在启航回国以前收到国王的一份贺电。在航程中，我答复了这封电报和其他电报。……

到冰岛的航程一路无事，只是在某一个地点，由于据报附近发现德国潜艇而不得不改变航线。我们这一段航程的护航舰只有两艘美国驱逐舰，总统的儿子海军少尉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在其中的一艘驱逐舰上。在15日，我们遇到由七十三艘船只组成的驶向本国的一个联合运输船队，所有的船只在幸运地通过大西洋上一段航程后，秩序井然，阵容整齐。这种情景令人振奋。那些商船上的海员见到了“威尔士亲王”号也很高兴。

我们在8月16日(星期六)晨抵达冰岛，停泊在赫瓦尔斯湾，从这里换乘驱逐舰至雷克雅未克。在抵达港口时，我受到一大群人的热烈欢迎。在我们逗留的期间，只要人们认出了我们，就向我们表示友好的欢迎，到我们在下午离开时，热情洋溢的场面达到最高潮，欢呼声和鼓掌声不绝于耳。人们告诉我，这样的欢呼和鼓掌声在雷克雅未克的大街上是很少听到过的。

我到冰岛议会大厦进行短时间的访问，向摄政者和冰岛内阁成员表示敬意，随后参加联合检阅英美军队的仪式。一长列

三人一排的队伍走过，当时“美国海军进行曲”的曲调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以致长时间在我的脑际萦回。我抽暇去视察我们正在建造的新飞机场，参观那些奇异的温泉和利用温泉而设置的温室。我立刻想到，这些温泉也可以用来为雷克雅未克取暖，并且试图甚至在战时就推行这个计划。我高兴地获悉，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了。我同站在我旁边的总统的儿子一起接受了军队的敬礼，这次检阅又一次为英美的团结一致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在回到赫瓦尔斯湾后，我视察了“拉米伊”号，并对停泊在港湾中的英美舰只上的船员代表讲话。这些舰只中也包括驱逐舰“赫克拉”号和“丘吉尔”号。

经过这次长时间的、令人非常疲倦的跋涉后，我们在暮色苍茫中启程向斯卡帕湾驶去。一路平安无事。18日早抵达该湾，我于第二天回到了伦敦。

17. 对俄国的援助

这时，在俄国前线上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德国军队曾施加多次猛烈的打击。但是到这时事情有了另外的一面。尽管俄国的损失惨重，他们的抵抗却仍然顽强不屈。他们的士兵拼死作战，他们的军队获得了经验与技术。游击队在德军的后方兴起，在残酷的战斗中不断地袭击交通线。德军占据的俄国铁路系统实际上不敷应用。公路在繁重的运输下日益损坏，而雨后的行动又往往离不开公路。运输车辆出现了许多损坏的迹象。再过三个月就要进入俄国严寒的冬季。莫斯科能够在这段时间内被攻陷吗？况且，即使被攻陷，难道就到此为止吗？决定命运的问题就在于此。虽然希特勒还因为基辅之战的胜利而洋洋得意，德国的将领们可能已经感觉到，他们最初的疑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已成为决定胜负的前线上，行动已经被耽延了四个星期。中路集团军群还没有完成交给它的“歼灭白俄罗斯地区敌军”的任务。

但是，到深秋，当俄国前线上的最大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苏联就更迫切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了。……

苏联大使在艾登先生陪同下，在我处和我谈话一个半小时。他用激烈的措辞强调，过去十一个星期内，俄国怎样实际

上单独抵御德国猛烈的进攻。俄国军队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攻击力量。他说，他不愿说些耸人听闻的话。但是，这可能是历史上的转折点。如果苏俄战败，我们怎能打胜这场战争呢？麦斯基先生着重指出俄国前线上的危机的极端严重性，言语沉痛，博得了我的同情。但是，我立刻感觉到他的呼吁中暗含着威胁的意思，于是我被触怒了。我对这位相识多年的大使说，“请记住，仅仅在四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岛国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入德国那边来与我们为敌。的确，我们曾认为你们很可能会那样做。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确信我们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你们站在我方或站在敌方。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你们做些什么，在所有的人们中，你们是没有权利来责备我们的。”当我说得激烈的时候，大使大声说：“丘吉尔先生阁下，请冷静一些吧！”但是，以后他的语调明显地改变了。

讨论转入往来电报中所涉及的问题。大使吁请立即在法国或比利时与荷兰海岸登陆。我阐明不可能采取这一行动的军事上的理由，并且说，这一行动也不能解救俄国。我说，我曾在那天化了五小时的时间同我们的专家们研究大大提高横贯波斯的铁路的运输量的方法。我提到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的莫斯科之行。我提到，我们决意要给予俄国我们所能节省下来和运出的一切供应物资。最后，艾登先生和我告诉他，从我们这方面，我们要对芬兰表明，如果芬兰军队向俄国进军，越过1918年的边界线，我们就要对芬兰宣战。麦斯基先生当然不能放弃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而继续争辩是无益的。……

9月15日，我又收到斯大林发来的一封电报：

我曾在上次电报中说明苏联政府的观点，即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开辟第二战场是改善局势的最根本的方法。你在来电中再次强调目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作为回答，我只能重申，没有第二战场，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图谋。

我毫不怀疑，英国政府愿意苏联胜利，并且正在寻找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如果说，据他们想象，目前不可能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或许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给予苏联以积极的军事援助的方法？

据我看，英国可以无须冒任何风险派遣二十五到三十个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或者取道伊朗运往苏联南部地区。这样，苏英军队就可以在苏联的国土上建立军事合作。在上次大战时，类似的情况曾在法国出现。这个办法会是一种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会是对希特勒侵略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俄国政府的首脑，既然有许多军事专家提供意见，竟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看来，要同一个想入非非的人争辩，是没有希望会得出什么结果来的。……

10月2日，我从总统那里获悉关于美国将来生产坦克和飞机的计划。从1942年7月起，到1943年1月止，美国每月将以一千二百辆坦克分配给英俄两国，并在以后六个月内每月分配二千辆。美国通知它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可以答应从7月1日起每月供给俄国四百辆坦克，并且，在同我们的代表讨论后，还可以增加那个日期以后的供给数目。

美国当能履行这项增加坦克供应的义务，因为当时它的坦

克生产就要增加一倍，每月将达到二千五百辆以上。

总统又告诉我，他已经答应从1942年7月1日起到1943年7月1日止，超过已经商定了的数目，供给俄国前线使用的飞机三千六百架。

结果，在莫斯科达成了一项友好的协议。有关方面签订了一项议定书，列举了英国和美国能够在1941年10月到1942年6月期间提供俄国的供应物资。这使我们已经由于军火非常缺乏而受到妨碍的军事计划被打乱了。一切都落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不但要拿出我们自己的产品，而且还必须放弃美国本来可以运交我们的最重要的军火。……

我的妻子深深地感觉到，当德国军队如潮水一般越过俄国的草原，而我们却不能给予俄国以任何军事援助，几个月过去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我告诉她说，开辟第二战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在一段长时期内我们所能做到的事，只是大量运送各种供应物资。艾登先生和我鼓励她试行用自愿捐助的办法募集医药援助基金。这件事已经由英国红十字会和圣约翰医院开始举办，于是我的妻子就应这个联合组织的邀请去带头呼吁“援助俄国”。10月底，她在他们的赞助下发出第一次呼吁书……

人们立即作出了慷慨的响应。在其后四年中，她热心而负责地致力于这项工作。一共从贫富人等募集了将近八百万镑。很多富有的人慷慨解囊，可是基金的大部分是广大群众从每周工资中节省下来的捐款。这样，通过红十字会和圣约翰医院的强大的组织，尽管北极运输船队遭受严重的损失，医药和外科器材、各种慰劳品和特制设备却川流不息地通过多冰而危险莫测的海洋运给英勇的俄国军队和人民。

18. 日本与珍珠港

日本曾经在1936年同德国缔结反共公约，这原来是由日本陆军省同代表国社党的里宾特洛甫背着双方当时的外交部长谈判的。这还不是同盟，但是它提供了同盟的基础。1939年春季，以平沼男爵为首相的那个内阁里的陆相企图同德国缔结一个完全的军事同盟条约。由于海相米内大将的反对，他没有成功。在1939年8月间，日本不但从事于在1937年7月间开始的对中国的战争，而且也卷入了因新成立的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而导致的与俄国之间的地方性的敌对行动。沿着这个战火未熄的前线和它的后方，双方布置着大军。当德国在欧洲战事爆发的前夕未经同它的反共伙伴日本协商或给予通知即同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日本人是有理由感觉受到了薄待的。他们同俄国的争论落到后面去了，而对德国则非常愤慨。英国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曾经使我们同昔日的盟国疏远起来，在欧洲战事的最初几个月内，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已经不是友好的。但是对德国的热情，在日本是很少有或简直是没有的。

平沼内阁由于德苏条约而“失掉面子”，因而不得不辞职。继任内阁由阿部大将任首相，阿部大将虽然是陆军出身（退役的），却算得是一位温和派人物，他于1940年1月为米内海军大

将所接替，米内大将在任平沼内阁的海相时曾经反对同德国缔结同盟。在阿部和米内的政府下，日本的政策是对欧洲守中立，结合着日本本身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不久，极度的动乱震撼了全世界。在希特勒的突击下，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沦陷了，英国有在1940年秋季被侵入和毁灭的可能，于是想念已久的一些灿烂计划由梦想变成了现实。从在远东拥有大片属地的法国、荷兰和很可能还有英国的崩溃中，日本是不是将一无所获呢？它的历史性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呢？深沉的热情在陆军和民族主义的政界人士中激动起来了。他们要求日本立即开始南进，夺取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和垂涎已久的荷属东印度。为了要强迫执行这个政策，陆相畑大将退出了内阁，因而迫使米内海军大将辞去首相职务。

清醒和慎重分子在日本从来不乏其人，他们要维持控制就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元老推荐近卫公爵接替米内，近卫是一个少壮的贵族，同宫廷有密切关系，但是同陆军的领袖们也友好。他在职期间是从1940年7月起到1941年10月止。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极其灵活的政治家，他的方法就是给陆军以一些象征性的满足而不曾准许它把国家拖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1940年夏季，近卫公爵设法约束陆军不对英国和荷兰的属地进行任何袭击。在另一方面，他却同意为了要在印度支那北部获得空军基地而对维希法国施加压力，并在9月间同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这项条约规定日本在美国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加入欧洲战争时有在轴心国的一边参战的义务。

在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已更加明显。到1940年11月底，不列颠战役的结果以及希特勒从入侵英国的大话退回去，这在日本都被认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英国对停泊在塔兰托的

意大利舰队进行的成功的空袭使几艘现代化的第一级战列舰失却战斗力达数月之久一事，使日本海军深深地感觉到新式空军的威力和它能够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用于突袭的时候。日本转而相信英国并没有完蛋。它无疑将继续战斗下去，并且的确正在变得更强了。在那里普遍感觉到，日本签订三国条约是一个错误。那里始终隐约地出现一种恐惧——害怕英帝国和美国联合行动，将两支海上最强大的海军联合起来，它们的资源一旦开发，将是不可计量和无以匹敌的。看来这种危险越来越近了。1941年春季，近卫得到他的内阁的同意和美国开始谈判，以期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陆相东条大将这次支持近卫的政策而反对外相松冈，因而松冈的认为同美国的这种谈判违反日德同盟的一些声明被驳回了。……

1941年7月间经济制裁的断然实行，使日本政局的内部危机达到爆发的关头。保守派分子震惊，温和派的领袖们也吓慌了。这已经牵涉到日本陆军在制定日本政策方面作为一个构成因素而在国内享有的威望问题。在此以前海军曾经发挥它的约束力。但是美国、英国和荷兰所实行的禁运，断绝了海军的，而且实则为日本的全部战争力量所依靠的一切石油供应。日本海军立即不得不专靠它的石油储备来维持，因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经在十八个月的供应量中消耗了四个月的供应量。显然，这是一种束缚，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就是对日本来说或者与美国达成协议，或者走向战争。美国的要求限定日本不但须从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新侵略方面撤退，而且也须从他们已经化费巨大，一直在那里进行了这么久的战争的中国本部撤退。这是一个合乎正义的，但是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外交上不能获得一种可以接受的协议的话，海军在战争政策上就

与陆军联合一致。海军这时已经把它的航空队发展到具有高度进攻能力的这个事实，加强了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方针的意志。

在日本统治人物的圈子里所进行的紧张辩论，一直延长到夏秋两季。我们现在知悉，不惜同美国一战的这个最主要问题，是紧接着禁运以后在7月31日讨论的。所有的日本领袖人物都清楚地看出，进行选择的时间是短促的。德国可能在日本实现它的任何野心以前就在欧洲战胜。日美政府间的谈判在继续进行。日本政界里的保守派人士和宫廷，则希望获得使他们能够控制国内主战派的一些条款。美国国务院和我一样，相信日本可能终于在美国压倒一切的力量面前退缩。……

10月间，近卫公爵卸下了他的重担。他曾经要求同罗斯福在檀香山亲自举行一次会谈，他希望携同他的陆军和海军首长参加，以使他们在可能解决的事项方面受到约束。但是他的提议被总统拒绝了，于是陆军方面的舆论对这个明智的政治家的批评增加了。他的地位由东条大将所接替，东条大将同时任首相、陆相和内务相。按照现代习惯在战后被战胜国处以绞刑的这个东条大将在受审时说，他亲自接管内务省是因为“他面对着显示内部将有混乱的一种可怕趋势，如果决定和平而不是战争的话”。他奉天皇的命令，恢复同美国的外交谈判，但是同他的政府成员有一种默契，即在内阁的建议遭到拒绝时，日本将走向战争。在1941年11月间，当东条和幕僚长以战事或将不免一节告知天皇时，天皇表示希望仍可作进一步努力以避免这次战祸，但对东条说，“若事态果如你所说的，则除进行战争准备外，别无他法。”

我于11月初收到蒋介石将军关于日本人将在中国继续有所行动的一项措词激昂的警告。他认为日本人已下决心从印度支

那进攻，夺取昆明而切断滇缅公路。他呼吁英国从马来亚空运援助。他在结束时说：

> 乍看起来，你或许会以为正当贵国在欧洲与中东如此英勇作战之际，此事将使贵国卷入对日战争。余之所见不同。余不信当中国坚持抗战之时，日本尚自觉有进攻能力，惟一旦无此顾虑，彼当于其认为适当时机进攻贵国。……中国业经达到抗战之最严重关头。目前能否保卫至新加坡与缅甸之陆上通路，首先须视英美是否愿意合作以保卫云南为断。倘若日本人在此处突破战线，则吾人与贵国之联系将被切断，而贵国同美国与荷属东印度在空军与海军方面进行协调之全部机构将以新方式并从新方向受到严重威胁。余愿尽一切力量以表示余之信念，即畀予中国所述之援助实属明智与有远见之举。能使日本溃败并保证现时抵抗侵略之国家获胜，舍此别无他途。切盼见复。

我除把这项警告转给总统外，不能多所作为。……

总统于11月9日答复说，虽然低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会铸成大错，他却怀疑日本所作的由陆路向昆明进攻的准备会不会证明日本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推进。他将竭力根据租借法案来援助中国，并在中国成立美国志愿空军。他觉得照日本的情形，任何"新的拘于形式的口头警告或劝诫"至少会具有产生出相反效果的均等机会。"整个问题将由我们加以持续和认真的注意、研究和努力。"

我以重复说明这项谨慎回答的要点的方法来竭力安慰那位大元帅。

我们除了继续实行我们在远东的海军计划，并让美国去试行以外交方法尽可能长久地使日本在太平洋上保持平静以外，别无方针可循。……

11月25日，总统发给我一封电报，说明谈判的情况。日本政府曾经提议在同中国谋取全面解决或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前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而在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之时，日本将准备从印度支那完全撤退作为回报，美国应以石油供给日本，避免干涉日本在中国恢复和平的努力，协助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的产品，并把日美两国间的商务关系置于正常基础之上。双方应同意在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不作任何“武装进展”。

接着，美国打算提出一个反建议，一般地接受了日本照会中的条件而简要地提出专门条件，附于日本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的条款之后，而并不提及中国局势。美国准备接受把原来的冻结命令加以修正的一项有限的经济协定。例如石油只可以按月供平民的需要而运出。美国的这项建议的有效期将为三个月，并基于这样的一种谅解，即在这个期间将讨论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全面解决办法。

当我读到昔日称为、而现在仍然称为“暂定条约”的这项草拟的复文时，我认为它是不适当的。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蒋介石都有这个意见，蒋介石曾以一项激烈的抗议送达华盛顿。但是我深深地觉察到当我们就单靠美国去决定行动的一个问题对他们的政策加以评论时，我们所必需遵守的那些限制。我了解到随着“英国人正力图把我们拉入战争”的这种想法而来的危险。因此，我就不去触动这个问题，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听凭总统去处理，于是我只提到中国方面而发给他下列

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11月26日

今晚收到你关于日本的电报。也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关于讨论情形和你对日本的反建议的详细报告。……当然，处理这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样呢？他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所焦虑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于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们的行动。我们觉得日本人对他们自己是最没有信心的。

……就在26日那天，赫尔先生在国务院接见了日本的特使们。他甚至连总统于23日电告我的那个暂定条约都没有对他们提到。相反地，他交给他们一个“十点照会”。其中两点如下：“日本政府将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退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除首都临时设在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的在中国的任何政府或政权。”

特使们都“目瞪口呆”，极其狼狈地退出去了。这可能是真诚的。他们之所以被遴选，大都是由于他们以谋求和平和温和人士而著名，因而可以哄骗美国不加防备，直到一切都决定下来和一切都准备好了为止。他们不大知道他们的政府的全部心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赫尔先生在这方面所知道的事要比他们多。美国人从1940年底起就已经破获了日本的关系重大的密码，而一直在译出大量的他们的军事和外交电报。在秘密的美

国人圈子里说到这些电报时称作"魔术"。美国人把"魔术"对我们复述一遍，但是在我们收到以前，有不可避免的稽延——有时两三天。因此，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并不知道总统或赫尔先生所知道的全部事情。我对此并无怨言。

在那同一个下午，总统以下列电报发给驻菲律宾的高级专员：

> 准备工作正日益明显……以便在最近作出某种性质的侵略行动，虽然直到目前还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这次行动的实力，或者它将指向滇缅公路、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还是菲律宾群岛。向泰国推进，似乎是最可能的。我认为这下一次日本的侵略有引起美日之间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

当我们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1月29日访问国务院时，赫尔先生对他说，来自日本的危险"就悬在我们头上了"。"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中的外交方面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目前，问题将由陆军和海军的官员们去处理，我已经同他们谈过。……日本可能在出乎我们意料的时机突然行动。……我认为，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现在全面地重新开始的无限制征服的方针可能是孤注一掷，因而需要最大的勇气并作最大的冒险。"他又说："当丘吉尔收到蒋关于暂定条约的强烈抗议时，如果他给蒋一封强硬电报使之振作起来，以日本人和美国人正在显示出来的那样的热情去战斗，那就会更好一些。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项抗议转交给我们，而从他那方面并不反对。……"

我不知道日本的计划已定，也不知道总统的决心已经达到

什么程度。……

30日，午后不久(美国时间)，赫尔先生访问总统，总统的桌上放着我在昨夜发出的同日电报。他们认为我关于对日本提出一个联合警告的建议不会有任何好处。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这时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封截获到的自东京发至柏林，日期也是11月30日的电报，这封电报告诉日本驻柏林大使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作如下的通知："非常秘密地对他们说，存在着通过某一场军事冲突而使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突然爆发的极度危险，并附带说明这个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梦想到的来得更快。"

我于12月2日收到这类电报的译文。这不需要英国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我们只须等待而已。日本的航空母舰舰队事实上已经在25日载着即将袭击珍珠港的全部海军航空队启航。当然，这支舰队是仍然受东京的约束命令的支配的。

12月1日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御前会议，作出了对美国开战的决定。按照东条在受审时的作证，天皇未发一言。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太平洋上如死一般地沉寂。可能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的那些方法都一一试过了。这时，还没有任何军事侵略行动发生过。我的最深的忧虑就是日本人会向我们或荷兰人进攻和宪法上的困难会阻止美国宣战。……

……美国领袖人物了解到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将征服许多广大地区，如再结合着德国侵俄的胜利和以后英国的被侵入，那将使美国单独地面对着洋洋得意的侵略者们的势不可当的联合力量。那么，不但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伟大道德事业将要被抛弃，就是美国和至今才对他们的危险有了一些觉醒的美国人民的生命也可能遭到毁灭。总统和他所信任的朋友们长久以来就认识

到在反抗希特勒和希特勒所主张的一切事情的战争中美国守中立的严重危险性，并且由于国会的掣肘而辗转不安，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就在几个月以前只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必须恢复的强迫兵役制，如果不恢复这个制度，他们的陆军就已经在世界动乱当中几乎瓦解了。罗斯福、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将军、斯塔克海军上将和作为他们的联系人物的哈里·霍普金斯，都是同心同德的。后代的美国人和各地区的自由人民将因他们的先见而感谢上帝。

日本对美国的袭击，使美国的问题和任务大大地简单化了。对于美国，这次袭击的实际形式，甚至它的规模，与整个美国为它本身的安全而将空前地在一项正义事业中团结起来这个事实相比，显得非常之不重要，我们怎么会对此感到惊奇呢？据他们看来，如我所见一样，日本去袭击美国，并和它开战，这无异于自杀。再者，关于敌人全部的和最近的目的，他们比我们在英国知道得更早。我们想起克伦威尔在注视着苏格兰军队从邓巴的高岗上往下进扑时怎样地大声呼道，“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到我们手里来了。”

我们也决不能容许利用外交来往的详细叙述来把日本描绘成一个受害的无辜者，说它不过是要借着欧洲战争的机会来求得适度的扩张或分润，而这时遇到美国向它提出了不能期望它的被狂热地鼓动起来的而且有了充分准备的人民接受的一些建议。多年以来，日本一直以它的恶意侵略和征服在折磨着中国。此时，由于它强占印度支那而在事实上以及由于签订三国协定而在形式上都已经同轴心国家共一命运了。让它去做它敢于做的事而承担一切后果吧。

日本竟会同英美开战，并且可能终于同俄国开战，因而自

耻灭亡，这曾经似乎是不可能的。日本宣战是和理性不相容的。我确信由于这样的一次冒进，它将遭到毁灭达一个世代之久，而这已经被证明是真实的。但是各国的政府与人民并不总是作出合乎理性的决定的。有时，他们作出疯狂的决定，或者一派人掌了权而强迫所有别的人服从他们并帮助他们去做愚蠢的事。我曾经毫不迟疑地一再叙述到我不认为日本将作出疯狂行动的信念。不管我们怎样诚恳地力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我们都不能察看到为理性所无法解释的人类思维和幻想的过程。

然而，疯狂是一种灾害，它在战争时使人去谋求突袭的便宜。

那是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晚间。首相别墅中只有怀南特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同我在一起用膳。我在九点钟的新闻节目开始后不久，就拧开我的无线电小收音机。有许多项关于俄国前线和在利比亚的英国前线战事的消息，在这以后有几句话说到日本人在夏威夷袭击美国船只，以及在荷属东印度也袭击了英国船只。接着有一项声明，说在新闻节目以后将有某某先生作评论，然后将开始听众问题解答节目，或诸如此类的话。我个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直接的印象，但是艾夫里尔说这件日本人袭击美国人的事情是有点重要性的，因而我们不顾疲劳和休息都坐着不睡。这时，听到消息的膳司索耶斯走进房间说，“十分确实。我们在外面亲自听到这个消息。日本人已经袭击美国人。”大家沉默。在11月11日伦敦市长官邸的午餐会上，我曾经说过，如果日本人进攻美国，英国将接着“在一小时内”宣战。我从桌旁立起，走过客厅到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经常在

工作的。我要求接通总统的电话。那位大使随我出来，他猜想我将采取某种不可挽回的行动，就说，“你不认为最好先证实一下吗？”

两三分钟后，罗斯福先生的电话接通了。“总统先生，这件关于日本的事是怎么一回事？”“十分确实。”他回答说。“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大家是风雨同舟了。”我让怀南特去听电话，他们对讲了几句，这位大使最初说，“好，”“好”——然后显然更严肃了，叫了一声“啊！”我再继续说，“这肯定使事情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或大意如此的一些话。然后我们回到客厅里，试图把我们的思想整顿一下，以适应这已经发生了的世界头等大事，此事具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性质，甚至使那些接近中枢的人物也吃惊得目瞪口呆。我的两位美国朋友以令人钦佩的刚毅精神忍受这次震惊。我们还不知道美国海军已经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失。他们不曾悲叹他们的国家已经处在战争中。事实上，人们几乎可以认为他们是从一种长期的痛苦中得到了解救。

……我打电话给外交部，要他们准备毫不耽延地办理对日宣战事宜(在这方面是有一些手续的)，以便及时赶上国会开会，并且一定要召集并通知战时内阁的全体成员，以及我正确地认为已经获得消息的三军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各大臣。……

我也想到在奋斗中的中国，因而致电蒋介石说：

1941年12月8日

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不对的，如果我宣布说，有了美国在我们这一边，这对我说来，是最高兴的事。我不能预言事件的发展如何。我并不擅自以为已经精确地衡量过日本的武力，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完全和拚命到底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是的，经过敦刻尔克；经过法国的崩溃；经过在奥兰的那次可怕的插曲；经过入侵的威胁，当时，除了空军和海军以外，我们是一个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经过那潜艇战的生死搏斗——险些输掉的第一次大西洋战役；经过十七个月的孤军奋战和十九个月在可怕的苦难中由我负荷的艰巨。我们已经战胜了。英格兰将生存下去；不列颠将生存下去；联邦和英帝国将生存下去。战争会持续多久，或者它会怎样收场，没有人能够预言，而且在这时我也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悠久的岛国历史中，不管我们受到怎样的创伤和毁坏，我们将再次以安全和胜利的姿态出现。我们不会被消灭。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我们在孤立无援时，甚至都不会死亡。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把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的运用罢了。据我所见，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美国，他们戮力同心，生死与共，具有两倍或者甚至三倍于他们的敌人的力量。无疑地，这将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我预料东方将会遭到可怕的损失；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局面。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人。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艰苦，但是对于结局已不再有什么疑虑了。

愚蠢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不仅敌国才有，他们可能低估美国的力量。有些人说，美国是软弱的，有些人说，他们永远是

不团结的。他们将在远处闲逛。他们将永远不会与人揪作一团。他们永远经不起流血牺牲。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定期选举制度，将使他们的战争努力瘫痪。他们在敌友的眼中，都将不过是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的斑点。现在，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这个人数众多，但是遥远的、富足而健谈的民族的弱点来了。可是我曾经研究过战到最后一寸土地的美国南北战争。美国人的热血曾经在我的血管中流动。我想起爱德华·格雷在三十多年前对我讲过的一句话——美国好象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当我去睡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并且洋溢着感情与感想，所以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觉。

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听到关于在珍珠港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况，但是现在，其经过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

直到1941年初为止，日本对美国的海军作战计划是当美国人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打开一条通路以横渡太平洋来解救他们在这个前哨据点的守军的时候，由他们的主力舰队在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作战。突袭珍珠港的念头是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大将想到的。在任何方式的宣战以前这种奸险袭击的准备，是极端秘密地进行的。到了11月22日，由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袭击舰队，连同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支援舰队，就在日本以北，千岛群岛中的一个人迹罕至的碇泊地点集中了。袭击日期已经定为12月7日（星期日），于是在11月26日（东经日期），这支舰队就在南云大将指挥下启航。保持在夏威夷以北很远的地方，在这北纬区域的大雾暴风下，南云驶近了他的目标而没有被发觉。在那不祥的一天，日出以前，进攻是从珍珠港以北

约莫二百七十五英里的位置上发起的。有三百六十架飞机参加，包括在战斗机掩护下的各式轰炸机。上午七点五十五分，第一颗炸弹落下。港内有美国海军舰艇九十四艘。在这些舰艇当中，太平洋舰队的八艘战列舰是主要目标。幸而航空母舰，连同强大的巡洋舰队，因在别处有任务，不在港内。

这次袭击的经过经常被叙述得有声有色。这里说明突出的事实，并记下日本飞行员的残酷的效能就足够了。到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的当儿，第一批鱼雷和俯冲轰炸机已经完成了袭击。到上午十点钟，战斗已经结束，敌人撤走了。在他们的后面留下了被炸得七零八落而笼罩在一片火与烟之中的一支舰队和美国的复仇心。战列舰“亚利桑那”号已经炸毁，“俄克拉何马”号已经倾覆，“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已经在停泊地点沉没，并且除了在干船坞的“宾夕法尼亚”号以外，其他的每一艘战列舰都受到重伤。有两千多美国人丧失性命，将近有两千人受伤。太平洋上的优势已经转入日本人手中，在战略上的世界力量对比暂时起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的美国同盟国还有着另外一系列的不幸事件。

在麦克阿瑟将军担任司令的菲律宾群岛方面，曾经在11月20日收到指出外交关系方面将有严重变化的一项警告。指挥着那实力有限的美国亚洲舰队的哈特海军上将曾经和邻近的英荷海军当局进行磋商，并按照他的作战计划，开始把他的舰只向南撤开，以图在荷属海面上联合他的未来的盟友集结一支袭击舰队。他可以调度的舰只除十二艘旧式驱逐舰和各式辅助舰只外，只有重巡洋舰一艘和轻巡洋舰二艘。他的实力差不多完全在于他的潜艇，共有二十八艘。12月 8 日上午三点钟，哈特海军上将截获了一个说到袭击珍珠港这项惊人消息的电报。他没

有等待华盛顿方面证实，就立即警告一切有关方面，说明敌对行动已经开始。在黎明时，日本的俯冲轰炸机来袭了，在以后几天内，空袭始终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继续进行着。10日，在喀维特的海军基地完全被焚毁，同日，日本人在吕宋岛北部首次登陆。灾难在迅速地增加。美国的大部分空军在战斗中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到12月20日，美国空军的残余部分已经撤退到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哈特海军上将的船舰已经在几天以前开始向南散开，只留下潜艇来同敌人在海上较量。12月21日，日本入侵部队的主力在林加延湾登陆，直接威胁马尼拉。此后，事态的发展一如已经在马来亚进行着的那样；但据守时间则较长。

这样，日本长期以来蓄谋的计划在一片胜利的火焰中爆发了。然而这不是终局。……

希特勒和他的僚属都吃了一惊。约德尔在受审时说到希特勒怎样“为了传达这个消息给凯特尔元帅和我本人而深夜来到我的地图室。此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而他在12月8日早晨就命令德国海军对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到的美国船只施行袭击。这是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的三天以前的事。

19. 联合国公约签字

……总统向我提出的一个主要计划就是起草一项将由所有对德国和意大利或对日本进行战争的国家签字的庄严宣言。① 总统和我重复应用我们制定大西洋宪章的方法而各把宣言稿准备好，再把它们合在一起。在原则上，在感情上，以及确实在文字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国内，战时内阁立刻对于所计划成立的大同盟的规模感到既惊奇又震动。当时曾有很多迅速的电讯来往，并且关于哪些政府和当局将在宣言上签字，以及对于先后次序也发生了一些困难问题。我们欣然把首位给与美国。战时内阁非常正确地不愿把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包括在内。赫尔先生反对插入"当局"字样，我用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要包括"自由法国"运动②的组织在内，而这个组织在那时是不得美国国务院的欢心的。

这是我第一次会见科德尔·赫尔先生，我同他进行了几次

① 当时丘吉尔在美国华盛顿。珍珠港事件后，1941年12月12日，丘吉尔即乘坐"约克公爵"号赴美与罗斯福会晤，商谈这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问题。

② 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从贝当等投降派控制的法国逃往英国，当晚对法国人民发表了令人难忘的广播演说，决心举起"自由法国"的旗帜，继续与希特勒作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会谈。据我看来，他在当时并不完全接近总统。在许多大事件当中，有一个小事件似乎支配着他的思想，这点使我惊异。在我离开英国以前，戴高乐将军曾经通知我们说，他想去解放由维希总督罗贝尔海军上将据守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自由法国”的海军舰队是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件事的，并且英国外交部也看不出有反对的理由。但是如以后所出现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却想让一支加拿大远征军去占领。因此，我们要求戴高乐住手，而他的确说过他将这样做。然而，他却命令他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埃攻取了这些岛屿。“自由法国”的水兵们受到人民的热烈接待，并且一次公民投票表明有百分之九十的多数反对维希。

这事对赫尔先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认为国务院的政策已经遭到触犯。他在圣诞节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的初步消息表明，所谓自由法国的船只在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专断的行动，它违反一切有关方面的协议，并且委实未经美国政府事前知晓或在任何意义上同意。”他意欲把“自由法国人”逐出他们从维希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这两个岛屿。但是美国舆论却强烈地持另一种看法。他们在这严重时刻看到这两个岛已经获得解放感到很高兴。因为设在这些岛上的一个正在向全世界散布维希的谎言和毒素的并很可能发出秘密信号给这时追猎美国船只的德国潜艇的可憎恶的电台当可从此寂默无声了。“所谓自由法国”一词几乎引起了普遍的愤慨。

赫尔先生的真正才能我是认识的，我对他怀有最大的敬意，但是我认为他把至多不过是一个局部的问题推到远远超出了它的范围的地方去了。在我们日常谈话中我看出总统对于这全盘事情是不满意的。总之，有很多其他的烦恼缠绕着我们，或者

即将落到我们的头上来。我在外交部的强烈敦促下，支持了戴高乐将军和“所谓”自由法国。关于这个事件，美国和法国的书籍曾经有许多篇章的叙述，但是我们的主要讨论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受到丝毫影响。

我是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去履行对美国国会演说的邀约的。对于我所确信的英语民族的战无不胜的联盟来说，这个场合是重要的。我在以前从来没有对一个外国议会演说过。但是就我而言，因为可以把我的母亲方面的男性世系上溯五代是一位在乔治·华盛顿的军队里服役的尉官，所以就有可能感觉到有血统上的权利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中的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代表们发表演说。事情居然有这样的发展，这的确是奇特的；尽管不配如此，我再次感觉到我在某种决定了的计划中被使用了(我提到这点，或许可邀原宥)。

我花费圣诞节日的大部分时光来准备我的演说。12月26日，当我在参众两院的领袖们陪同下从白宫向国会议事厅出发时，总统祝我幸运。沿着那些广阔的通路似乎有大批群众，但是为了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在美国是远超出英国的习惯做法的)却把他们隔开很远，有两三辆满载着武装便衣警察的汽车聚集在我们周围护卫。我下车后，出于一种强烈的兄弟情感，我想走到欢呼的群众面前去，但人们不允许我这样做。议事厅里面的情景是动人而又非同等闲的，我从一排扩音器看出去所见的那个半圆形大厅已经挤满人了。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十分自在，并感到比有时在英国下院还更加自信。人们以最大的善意和注意力来听取我所说的话。在我的演说中，人们正好在我所期望的地方发出笑声和鼓掌声。

声响最大的反应是在我说到日本的暴行时问道，“他们把我们当作什么一类人看待？”的时候。从这个庄严的集会中，我不断地意识到美国国家的能力和意志力。谁还怀疑一切将会好起来呢？

我结束演说时这样说：

参议院议员们和众议院议员们，我再费片刻时间从目前的纷争和动乱转而谈到未来的更广泛的基础。我们正在这里共同抵御一群要毁灭我们的强大敌人；我们正在这里共同保卫自由人所珍视的一切。在仅仅一个世代之中，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有两次临到我们头上；在我们一生之中，命运之神的长臂已经有两次伸过大洋来把美国拉入战争的最前线。如果我们在上次战争以后就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为了本身安全而采取了共同措施，这次祸患的再次发生是我们决不会遭遇到的。

难道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子女，对遭受苦难的人类，不负有确保这些灾难不致第三次吞没我们的义务吗？恶性疫病可以在旧世界爆发而把破坏性的灾害带到新世界来，一旦开始蔓延，新世界就无法逃避；这已经得到证明了。我们为职责和谨慎所驱使，必须：第一，经常地和警觉地把憎恨和复仇的病源中心地区加以检查与及时处理；第二，成立一种适当组织，以确保这种疫病可以在它开始发生的最早的时期，在它还没有蔓延和猖獗于全球的时候，就受到控制。

五六年前，美国和英国可以不流一滴血而很容易地坚持要德国履行在世界大战后它所签订的条约中关于裁军的

条款；并且也有机会去保证德国获得我们在大西洋宪章中所宣布过的不应不让任何国家（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享有的那些原料。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需要大力捶击方能再一次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或者，如果你们容许我用别的语言，我就说，如果有人看不出在这个世界上有某种伟大的目标和计划正在完成，而我们荣幸地就是它的忠诚服务者，那么这人一定是心灵受到了蒙蔽。我们并未得到能窥测未来奥秘的禀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和不可侵犯的希望与信念，即在未来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本身的安全和大家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后来，那些领袖们随了我出来而走近围绕着议事厅的群众们，使我能够对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然后，秘密警察和他们的汽车又在我们的左右卫护行驶，把我送回白宫，总统曾经听到我的演说，他告诉我，我讲得很好。……

我于30日对加拿大议会演说。……当我回到白宫时，在联合国公约上签字的一切手续都准备好了。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之间有过许多电报来往，但是这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总统曾经以最大的热诚努力去说服新近由于时局转变而再次得势的苏联大使李维诺夫接受“宗教自由”一语。因此，他被特地邀请到总统室里和我们共进午餐。他在本国有过艰苦的经验之后，不得不小心从事。后来，总统单独和他长谈，涉及他的灵魂问题和地狱之火的危险问题。罗斯福先生有几次对我们谈起他对这位俄国人说的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的确，我有一次对罗斯福先生作出许诺——如果他在下次竞选总统时失败，

我当推荐他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是我并没有就这点向内阁或国王作任何正式推荐，由于他在1944年的竞选中获胜，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李维诺夫显然在恐惧和战栗中就“宗教自由”问题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却把它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战时内阁也提出了他们关于“社会保障”的论点，我是第一次失业保险法的起草人，所以真诚地同意了。经过在一个星期中大量的电报来往于世界各地之后，在大同盟的所有国家之间达成了协议。

“联合国”的名称是由总统提出，用来代替“协约国”这个名称。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进。我指出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我的朋友看：

这里，联合国拔出刀来的所在，
　我们的同胞们那天在战斗！
这是许多将永垂不朽的事——
　而且一切都将永垂不朽。

1月1日早晨，总统坐在椅车上被推到我这里来。我从浴室出来，同意了宣言草稿。单凭宣言本身并不能赢得各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它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作战的目的。随后，在那天，罗斯福、我、李维诺夫和代表中国的宋子文在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个庄严的文件。汇集其余二十二个国家的签字的任务留给国务院去办了。这里得将宣言的最后本文记录下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和南斯拉夫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

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保全它们本土内和其他地区内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它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1）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2）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作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以上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伟大的同盟》（1950年，初版）

20. 北非、东南亚和大西洋上的挫折

……军事上的灾难又再度摧毁了1942年英国在沙漠地区的整个战役，在这悲惨的一月份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是需要切切实实叙述一番的。

1月9日奥金莱克将军①打电报到华盛顿给我，在叙述他的部署之后，报告情况如下："关于敌军可能的行动预测如下。坚守阿盖拉—马腊达战线……守卫阿盖拉地区……驻在马腊达，阻挡我军从南面包围阿盖拉。德军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可能还有阿里埃特装甲师为后备，准备反攻。"……

当时我在白宫的地图室内办公，不难看出这些语不惊人的电报意味着什么。我在1月11日致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中说："我恐怕此电收到时，敌军七个半师大部分已乘机逃逸，现在还正在沿交通线退却。我也注意到，九艘一万吨的商船据报告已安抵的黎波里。大家明白，你以为你直走阿卜德这一路线，定能切断隆美尔的意大利步兵部队，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漏网了。这种种情况将使'杂技家'计划〔长驱直入的黎波里〕受到

① 从1941年12月13日开始，英军在中东战区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的指挥下曾在北非向德意军队发动进攻，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隆美尔却巧妙地避开了各种包围策略而保存了实力。

怎样的影响呢？我敢断定，你和你的部队已经竭尽人力，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目前的事实，它们会大大影响‘体育家’和‘超体育家’计划。”

这里必须再度注意到海上战争对于第八集团军前途的重大影响。K舰队〔马耳他舰队〕的覆没，随之在12月19日“海王星”号巡洋舰于的黎波里附近水雷区内的丧失，使敌护航舰队能够满载重要的供应物资通过海面，在危急关头去补充隆美尔的军队。

请记住，“体育家”是我们在法属北非援助魏刚将军①的计划，如果他乐于接受的话。为此，我们叫一个装甲师和三个野战师整装待命，一俟接到通知，即从英国启程；我们还叫一个相当人数的空军分遣队也整装待命。魏刚和维希都没有好好答复我们的提议，但我们一直希望隆美尔被打败，和我们能进驻的黎波里，以便长驱直入突尼斯，这样就会鼓励他们两者之一或两者都改弦更张。“超体育家”是英美干涉法属北非的更远大的计划；我早已觉得罗斯福总统对此极为赞同，我虽在12月16日的文件里提出，把它当作1942年战役中英美在西方的主要的两栖作战。因此，敌人在阿杰达比亚的坚决的抵抗和他们有条不紊地撤到阿盖拉，对于我和我一切的想法来说，要比在沙漠地区仅仅阻碍我们向西进展，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事实上我和总统讨论的全部计划中，这是一个不利之点。然而从奥金莱克将军以后拍来的电报看来，好象诸事顺利，决定性的行动已迫在眼前了。……

从1月12日到1月21日，隆美尔的部队在阿盖拉阵地上不

① 维希政府的国防部长，英美曾争取他起来推动贝当元帅摆脱德国的控制，但没有收到效果。

见动静，而从地中海到南边名叫“利比亚沙海”的地方保持着长约五十英里的缺口。这条战线上的盐田、沙丘和小的峭壁都很有利于防守，敌人小心翼翼，用了地雷和铁丝网来加强它们。奥金莱克将军觉得在2月中旬以前，还不能袭击这个阵地。在这期间，他派了警卫旅两个主力营和第一装甲师的支援队同隆美尔的军队相周旋。在此背后，在差不多九十英里以外的安特拉特驻扎着梅塞维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一装甲师的剩余部队。这些部队，连同驻在班加西及其以东地区的第四英印师组成了第十三军，由戈德温—奥斯汀将军指挥。这一军分散得很广，由于后勤上的困难，造成了前线薄弱、援军遥远的局面。至于用地雷或别种障碍物来保卫英军前线的安排，也并没有作出。按照计划，如果隆美尔展开反攻，我们的前锋部队准备撤退。然而奥金莱克将军不信隆美尔有进攻的能力，他以为自己颇有富裕时间来加强兵力和作好供应。……

不幸的是，奥金莱克将军低估了敌人重整旗鼓的力量。马耳他岛上的皇家空军，在空军少将劳埃德果敢坚决的领导下，曾向意大利港口和船舰展开秋季攻势，促进了陆战的胜利。但12月里，它遭到西西里岛上德国空军中队集中强大的力量的袭击，搞垮了它。我们最近在海上的失利，大大削弱了海军上将坎宁安率领的舰队，以致在一个时期内，这个舰队不能有效地阻挠通到的黎波里的航线。现在供应品已可自由地送到隆美尔手里。1月21日他派三个纵队，每队约一千名有坦克支援的摩托化步兵，发动了威力侦察。这些纵队迅速地突破了我方部队接合部的缺口，这些部队没有坦克的掩护。戈德温—奥斯汀将军于是命令撤退，先退到阿杰达比亚，然后拦住敌军从安特拉特到姆苏斯的去路。……

在这里我觉得十分清楚，奥金莱克将军一直不曾了解沙漠地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一个电报说明第二装甲师，其实是第十三军的遭遇如何。我希望，他现在既在里奇将军的司令部，就能够查明真相。当时，我也一无所知。……他对于这次发生的灾难，只是埋怨我军坦克质量的低劣，却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而更不好的消息又传来了。……

隆美尔再度证明他是沙漠战术的能手，比我们的指挥官高明，他重占了昔兰尼加的大部分。这次一退几乎三百英里，打破了我们的希望，使我们放弃了班加西，丧失了奥金莱克将军为盼望已久的2月中旬的进攻而收集的一切储备。隆美尔一定感到惊奇：怎么他开始进犯时只用小小三个纵队，在他所能纠集的军队的支援下发动进攻，竟能获得压倒的胜利。里奇将军重新整编了残缺不全的第十三军和其他从加柴拉和托卜鲁克一带调上来的部队。在这里追击部队和被追击的部队都喘不过气来，互相对峙，一直到5月底，那时隆美尔才能够重新发动攻击。

形势的反复无常和军事上的严重灾难，根本原因是这样的：敌军实际上能在地中海自由航行，借以增援和补给他们的装甲部队，他们还能从俄国战线上调回大部分空军。但是现场上的战术变化却从来不曾有过什么说明。决定性的一天是1月25日，那天敌军突破战线，直达姆苏斯。从此之后，情况的混乱和计划的一变再变，使隆美尔得到了主动的机会。警卫旅不明白为什么不许他们作一次抵抗，而撤退的命令却下了又下，非服从不可，第四英印师也没有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最近才从敌军的文件中透露出来，敌军的坦克原来比我军优越。他们的非洲军团有一百二十辆坦克参战，意军有八十辆

或更多一些，以对我军第一装甲师的一百五十辆。然而，为什么没有好好利用这一师，还是没有说明。奥金莱克来电报告说：“该师新从联合王国到达，没有在沙漠上作战的经验”；这个电报又提出总评说，“不但我军全部坦克敌不过德军坦克，而且我军的巡逻坦克作战时机械上也比较低劣。装备既较差，我军在机械上又不可靠，何况同德军相比，防坦克武器大为缺少，因而情况更加严重。”

这一切论调须要仔细分析一番。第一装甲师是我军所拥有的最好的一支部队，该军士兵大部分都受过两年以上的训练，同我们的正规军比起来，效率也达到了一样高的水平。他们是在11月里在埃及登陆的。他们在离开英国以前，曾经根据一切最近的情报和经验，尽了一切力量，使他们的车辆能适合沙漠的条件。在开罗的工厂里又经过了例行的检查，然后这一师通过沙漠开往安特拉特去，于1月6日到达。为了保护履带，坦克车通过全部沙漠地区时装在特殊的运输车上，到了安特拉特，完整无损。可是，这精锐的一师部队还没有投入多大战斗，就损失了一百多辆坦克。在仓卒撤退时，已经运到的大批大批的汽油，全部被抛弃了；有许多坦克因燃料告罄，被遗弃在后面。

警卫旅奉命撤退时，还发现了大批汽油，因敌军逼近，不得不把它毁掉。可是他们看见不少坦克抛弃在沙漠里，他们就尽力运来了不少汽油，自己驾驶了这些坦克。单单科尔斯特里姆的一个连就集合了六辆，把它们驶到了安全地带；其他部队收集得更多。事实上，有些连队把获得的几辆坦克，按照德军那样，同摩托化步兵配合起来，这样，他们在实际上就比当初出动时更加强大。建立象装甲师那样的单位，还有专家和受过

训练的士兵，要付出多少代价和劳动力；绕过好望角把它运到，要作出多少的努力；派它去打仗又要做好多少的准备——当我们想起这种种，而又看到如此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后果，真是痛心极了。德军虽然离开的黎波里的基地四百多英里，还能得逞，而我们却遭失败，相形之下，回顾起来，就更使人难堪了。英国国民在查究这些事情的时候，切勿受人迷惑，以为我军坦克在技术上的拙劣是造成这次损失巨大、影响深远的败绩的唯一原因。

好多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证人已去世了。也许我们始终不会有一个称职的法院，能对英国史上最惨的溃败和规模最大的投降作出正式的判断。……

珀西瓦尔将军保卫新加坡岛的部署①……第三军（军长希思上将）现由主力已于1月29日到达的英国第十八师（师长贝克威思-史密斯少将）以及已经吸收第九师的残余部队的第十一英印师（师长基少将）组成。这一军负责的地区是沿着岛的北岸向长堤伸展，但长堤不在其内。从长堤开始的一线由第八澳大利亚师（师长戈登·贝内特少将）负责，第四十四印度旅归他指挥。这一旅几天以前才开到，同第四十五旅一样，是由青年和受过部分训练的军队组成。南岸由要塞部队保卫，有两个马来亚步兵旅和义勇队，全部归西蒙斯少将指挥。

守卫海岸的重炮中能向北面轰击的，弹药有限，要对付敌军正在集结的密林丛生的地区，是没有什么大用的。只有一个战斗机中队留在岛上，也只有一个飞机场尚可使用。由于伤亡

① 1942年新年伊始，日本军队在马来半岛由北向南大举挺进，英军被迫退守新加坡。

和消耗，现在最后集中的守备军已由陆军部估计的十万六千人减少到八万五千人光景，其中还包括基地和后勤部门以及各种非战斗部队。这个总数之内约有七万人是武装的。野战防御的准备和障碍物的布置，虽然投下了不少的本地人力，却同现在出现的迫切要求不相称。即将受到攻击的前线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军队的士气，经过长途的撤退和岛上的激战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受到威胁的北岸和西岸，有宽度从六百码到二千码不等的柔佛海峡作为屏障；几条江河河口上栲树丛生的沼泽，也有相当的掩护作用。三十英里长的战线需要防守，敌军在对岸丛林中有什么行动，是完全看不到的。岛的内地也大都被繁茂的草木和种植园隐蔽起来，人们看不到远处。武吉智马村四周的地带设有军需品大仓库和三个供应用水的水库，极为重要。在这一切后面就是新加坡市，当时市内住着不同种族的居民约一百万人，还有一批难民。

我们在国内不再抱着长期保卫新加坡的幻想。唯一的问题是要打多久。三军参谋长早在1月21日就注意到破坏工作，曾电示珀西瓦尔将军，“万一情况极度恶化”，在新加坡千万不能疏忽。他们说，“你应该保证，任何可能对敌军有用之物，决不可在全面焦土政策中有所遗漏。”他们也谈到破坏军火。1月31日我对这个文件作了批语道：“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撤出是绝不容许的，万不得已要撤退，这样做总要两三天。……向敌人开火，把弹药花光，这是在要塞即将陷落时早已规定的、当然的作法。应该有充分时间作好安排。如果要塞能保卫得好，到了最后我们只会感到军火的缺乏，不会有大堆弹药遗留下来。”

2月8日早晨，巡逻队报告，敌军正在岛西北种植园上集结，我方各阵地受到猛烈的炮击。下午十时四十五分，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步兵旅，在克兰寺河西边，遭到日军第五师和第十八师的攻击。袭击的高潮是利用装甲的登陆舰艇，越过柔佛海峡来的；原来他们经过长期的周密计划，早把这些舰艇从陆路运到下水的地点了。战斗非常激烈，许多船只被击沉了；但是，澳军在地面上是稀少的，敌军的部队在许多地点登陆。等到这一旅重整旗鼓的时候，敌军已经占领了阿马肯村，那儿是附近地区许多条大道和小路的交叉点。第二日早晨八时，他们进犯登嘉飞机场。……

13日，将三千名指定的人员从海道撤至爪哇的预定计划开始执行。奉命撤离的人们包括要人、技术人员、多余的参谋人员、护士以及其他对于进行战争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同行的还有在要塞上指挥空军、海军的空军少将普尔福德和海军少将斯普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海上旅行。一支给进犯苏门答腊军队护航的日本海军部队袭击了他们。这一天和第二天从新加坡启航的各式各样的小船约八十只几乎全部被敌军击沉或虏获。普尔福德和斯普纳的下落一直到战后才知道。2月15日他们坐的船遭受敌军驱逐舰的攻击，被逐到一个小岛的滩上。他们和同舟的大约四十五人，上了岸，没有受到阻碍。其中有一人，一个年轻的新西兰军官，随即坐了一只本地小船启程，经过了许多风险，于2月27日平安地到达了巴达维亚。到了那时，爪哇本身也很混乱，但是依然作了安排，派一架飞机去拯救那些幸存的人们。不幸这番努力是失败了。在小岛上，这批遭难的而现在又染上疟疾的人们，苟延残喘，希望愈来愈少，只是没有受到敌人的惊扰。3月底前普尔福德等十四人死了，斯普纳等

四人到4月里也死了。5月14日幸存的高级军官、空军中校阿特金斯认识到末日快要到来。他同另外七个人驾了一只本地船驶到苏门答腊，向日军投降，日军于是差人到小岛上，把残存的几个人带走，他们后来在新加坡的俘虏营里受尽折磨。……

2月15日星期日，是投降的一天。军粮的储备只够两、三天了，枪炮弹药所余无几，车辆用的汽油简直没有了。最糟糕的，水的供应最多只能再维持二十四小时。高级指挥官向珀西瓦尔将军提出意见，或者反攻，或者投降，在这两条办法中，第一条是筋疲力尽的部队所办不到的。他决定投降，并给韦维尔将军发出了他最后的悲惨的电报。……日本人要求无条件投降，终于得到了。下午八时三十分，敌对行为宣告结束。

我们是以轻松的心情和高涨的情绪来欢迎美国的参战的。从此以后，我们的重担将有一位拥有无穷资源的伙伴来与我们共同挑起来了；我们可以预期，在海战中，敌人的潜艇势将迅速就范。尽管在我们的盟国未能投入全部力量以前，损失仍然不能避免，但是，有了美国的帮助，我们在大西洋的生命线就会有了保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欧洲和在中东展开反希特勒的战争了。不过，远东暂时还会呈现出黯淡的局面。

但是，1942年将会发生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而在大西洋上，这一年也是整个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到1941年年底，敌军潜艇舰队已经增加到二百五十艘左右，据海军上将邓尼茨①报告，其中约一百艘可以作战，而且每月还要增加十五艘。起初，我们的联防力量虽然比我们在单独作战时强大得多，但

① 德国海军总司令，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前，指定他为纳粹德国的元首（Admiral Doenitz）。

是，由于我们现在遭受攻击的目标更多了，对付敌人的新的攻击，我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有六七个月的时间，敌军潜艇在美洲海面横行无阻，简直要把我们拖到无限期延长战争的灾难中去。如果我们被迫中断我们在大西洋上的航运，或者对之暂时加以严格的限制，我们的联合作战计划也要全部停顿下来。

12月12日，在一次有德国元首参加的会议上，决定向美洲沿海发动潜艇战。但是，由于许多德国潜艇和最干练的指挥官都调到了地中海，而且，由于邓尼茨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不在挪威和北极的洋面上保持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最初只派遣了六艘七百四十吨型较大的潜艇。这些潜艇在12月18日到30日间离开比斯开湾港口，奉命深入纽芬兰和纽约间沿海航线北端，靠近回国运输船队汇集的一些港口。它们的骚扰立刻得逞。到1月底，三十一艘船只，合计二十万吨，在美国和加拿大海岸一带被击沉了。不久以后，攻势朝南推进，越过汉普顿海峡和哈特勒斯角，直下佛罗里达海岸。在海上这条大道上，有的是美国和盟国的无防御设备的船只。宝贵的油船队也沿着这条航路络绎不绝地往返于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湾之间。这条交通线如果受到阻碍，我们的整个战时经济和全部作战计划就会受到影响。

在加勒比海上，在大批目标中，德国潜艇专挑油船作为捣乱的对象。中立国家的各种船只也和同盟国船只一道遭到袭击。这种屠杀的范围每星期都在扩大。2月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造成的损失增至七十一艘，计三十八万四千吨，除两艘以外，全部在美洲地区被击沉。我们从开战以来所蒙受的损失，要算这次最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要克服了。……

2月10日，我们主动向美国海军提供了二十四艘设备最完

善的反潜艇拖网船，十艘驱潜快艇，并带着训练有素的船员。它们受到了我们盟国的欢迎。第一批于3月间到达纽约。尽管少得很，但是，我们是抽出了最大的力量的。……

到了4月1日，美国海军终于能够实行沿海局部护航制度。在开始时，这顶多不过能使几队有护航的船只白天在保卫森严的停泊地之间，行驶一百二十来英里的航程，而在夜间，所有的船只都得停航。无论哪一天，往来于佛罗里达和纽约间的船只，总有一百二十艘以上需要保护。因此而引起的延误又变成了另一种灾难。直到5月14日，才有一支充分组织起来的护航运输船队，从汉普顿海峡驶往基韦斯特。自此以后，这个制度很快便向北发展到纽约和哈利法克斯。到5月底，从基韦斯特沿东海岸向北伸展的连锁终于形成了。形势马上缓和下来，尽管敌人的潜艇在设法避免被击毁，我方船只的损失毕竟减少了。

21。扭转失败：中途岛、阿拉曼、斯大林格勒

太平洋上，现在发生了轰动整个战局的事件。到3月底，日本极其圆满地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参与计划的人员也为之目瞪口呆。日本变成了香港、暹罗、马来亚以及广大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主人。日军在缅甸正向腹地深入。在菲律宾群岛，美国依旧在科里几多尔苦战，但是并没有解围的希望。

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无意战斗到底；这种信念更加巩固了他们对领导人的信心，以及对军事胜利的自豪感。现在皇军已站在战前计划中慎重选定的进军边界上了。在这个广大的区域之内，包含着无尽的资源与财富，他们能够用来巩固这些被征服的地方，并且发展他们新近赢得的力量。在他们长远的计划中，规定这个阶段为一个喘息的时机，用以抵抗美国的反击，或者进行组织进一步的攻势。不过，由于胜利的兴奋，日本领导人物认为天赋给他们的命运已经实现了。他们不能辜负它。这些想法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人们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自然产生的诱惑，也是由于认真的军事推理。彻底巩固新获得的外围地区，还是为这些地区的防卫起见而大举向纵深

前进，究竟哪一种较好，对他们说来，似乎是应该从战略上权衡得失的问题。

东京方面在反复思考之后，采取了野心更大的计划，决定向外扩大占领，其中包括阿留申群岛西部、中途岛、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以及新几内亚南部的莫尔斯北港。这项扩张威胁到美国的主要基地珍珠港，如果保持下去，也将会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直接交通线，并且使日本得到合适的基地从事未来的进攻。

日本最高指挥部在制订与执行计划方面，表现了极端的巧妙与勇敢。不过，他们是从没有按照正确的比例来估计世界力量的基础出发的。他们从来不理解美国潜在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会在欧洲获胜。他们情绪激昂，要无限制地征服亚洲，领导亚洲前进，创建功勋。这样，他们就陷进了一场赌局：即使获得了胜利，也只能使他们的优势延长一年；如果失败的话，会在同样长的时间内遭到毁灭。实际的结果是，他们以相当强大而已牢牢掌握住的利益换取了一片广大而松散的无力控制的领土；而且在这些外围地带失利的时候，他们才感到在内线与主要地区建立一个紧密的防线已经没有力量了。……

向珊瑚海进军仅仅是日本更加野心勃勃政策的开始阶段。甚至当这个开始阶段正在进行的时候，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就准备攻占中途岛及其机场，在中太平洋与美国势力一较长短，从这个岛屿可以威胁或者征服东面一千英里的珍珠港。在同时，由一支牵制部队前往占领阿留申群岛西部优越的据点。经过仔细安排行动时间，山本希望首先把美国舰队引到北面去应付对阿留申群岛的威胁，从而，使他能无阻地把主力投入中途岛的

战斗，到美国能够对这个岛屿进行大举干预时，他就希望占领中途岛，并且准备迎击强大的反击。中途岛对美国极为重要，它是珍珠港的前哨，由于这些动向，将会引起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会战。山本自信能够迫使对方参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而且，由于他有压倒的优势，尤其是在高速战列舰方面，他就极有机会歼灭敌人。这就是告诉他的部下南云海军大将的概括计划。不过，全部计划的关键在于尼米兹海军上将①能否进入圈套，而且，也在于他本身会不会遭到突然袭击。

然而，美国指挥官都是积极而机警的。他的情报部门使他消息非常灵通，甚至连预计的进行袭击的日期都知道。尽管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可能是用来掩饰攻击阿留申群岛的，从而使它可能转向美洲大陆前进。不过中途岛总是比任何地方更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危险，因此，朝这个方向展开他的力量，他是从来没有犹豫过的。他的主要忧虑是，他的航空母舰怎么也比不上南云的四艘战斗经验丰富的航空母舰，它们从珍珠港至锡兰一直取得杰出的战功。南云舰队中另外两艘已转向珊瑚海，并且有一艘受伤；在另一方面，尼米兹损失了“莱克辛顿”号②，“约克顿”号失去了战斗力，“萨拉托加”号修复之后还没有重新加入他的舰队，“黄蜂”号救助马耳他岛，仍然还在地中海附近。只有“企业”号与“大黄蜂”号从南太平洋兼程回驶，“约克顿”号如果能够及时修复，也可以参加即将来临的战斗。尼米兹海军上将没有比在旧金山更近的战列舰，而且它们的速度太慢，不能与航空母舰配合；山本却拥有十一艘战列舰，其中有三艘是世界上最强最快的。美国虽处于劣势，但是，

①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Admiral C.W.Nimitz）。
② 1942年5月8日在珊瑚海战役中沉没。

尼米兹能够得到从中途岛起飞的强有力的空中支援。

在5月最末的一个星期中，日本海军的主力开始离开它们的基地。首先出发的是阿留申的牵制舰队，预定于6月3日攻击荷兰港，并且引诱美国舰队向那个方向驶去。在此之后，登陆部队即前往夺取该岛西端的阿图岛、基斯卡岛与阿达克岛。南云率领四艘航空母舰于次日向中途岛攻击，6月5日登陆部队即将到达该岛并占领它，他们预料不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山本的作战舰队在其时将停在后方西面，在空中侦察范围之外，待机迎击预料中的美国反击。

这次事件是仅次于珍珠港的高潮。航空母舰“企业”号与“大黄蜂”号在5月26日自南方抵达。“约克顿”号也在次日出现，原来预计修理需要三个月时间，但是，为了适应危急的需要而决定在四十八小时内将它修复，以适应作战，并且重新调配了一个新的航空大队。在30日它再次航行，去参加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舰队。斯普鲁恩斯是在两天以前率领两艘航空母舰先行离开的。弗莱彻海军上将仍然负责混合舰队的战术指挥。在中途岛的机场上停满了轰炸机，防卫该岛的地面部队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早些得到敌人接近的消息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5月30日开始了连续的空中侦察。美国潜艇在中途岛西面和北面进行监视。四天的时间在忧虑不安中度过。6月3日上午九时，一架“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在中途岛西南七百多英里处巡逻时，发现敌方舰只十一艘。轰炸与鱼雷攻击随即展开，但未成功，只有一枚鱼雷命中了一艘油船，不过战役从此开始了，并且所有关于敌人企图的疑团全部消除了。弗莱彻海军上将根据情报，有理由相信敌方航空母舰将由西北方向迫近中途岛，第一次发现敌人的报告并未使他立刻出发，他

正确地估计到所发现的敌船只是一批运输舰只。4日黎明，他率领下的航空母舰驶至中途岛北面二百英里处的预定位置，假如南云在此处出现，立即可以猛扑他的侧翼。

6月4日拂晓，天气良好，五点三十四分一架中途岛起飞的巡逻机终于发出了久已等待着的信号：报告发现了迫近的日本航空母舰。报告不断传来。许多飞机正向中途岛前进，并且，发现支援航空母舰的大批战列舰。早晨六点三十分，日本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这次袭击遭到顽强的抵抗，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来犯者永远没有回去。尽管空袭造成了许多损失与伤亡，但是机场依然能够使用，还有向南云的舰队发动反击的时机。他的占压倒优势的战斗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次寄托着极大期望的勇敢攻击，其结果令人失望。然而，他们的猛攻所引起的紊乱似乎模糊了日本指挥官的判断，他的飞行员也告诉他说有必要向中途岛再一次进行攻击。他的航空母舰保留有一批足够数目的飞机，以便迎击随时可能出现的美国航空母舰，不过，他的侦察能力不强，而且，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收获，所以，他认为美国飞机不一定会来。现在他决定把为迎击美机而保持的队形散开，以便为再犯中途岛而进行重新装备。无论如何，这样就必须清理飞行甲板，以便使第一批攻击的飞机降落。这个决定使他招致致命的危险。尽管南云后来得悉一支美国舰队，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在内，在东面出现，但是已经太迟了。他的飞行甲板上塞满了正在加油添弹的不能用的轰炸机；他肯定要遭到美国攻击的灾难。

弗莱彻与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根据他们早期冷静的判断，已经做好了参与这场紧要关头战斗的布置。他们在早上截获了源源而来的消息。上午七时，"企业"号与"大黄蜂"号

除去自卫必需的飞机以外，出动了所有的飞机发动一次攻击。“约克顿”号上的飞机曾执行早晨的侦察任务，由于它们的起落而耽误时间，但是它的攻击机群也在九点稍过之后升空。这个时候，另外两艘航空母舰起飞的第一批机群已接近目标。敌人周围一带，天空多云，俯冲轰炸机群起初没有找到目标。“大黄蜂”号的机群，不知敌人已转向他去，一直没有发现敌人，因此错过了战斗。由于这些事故，首次攻击乃由三艘航空母舰的鱼雷轰炸机群单独进行；虽然它们极其英勇地接近目标，但是，面临着猛烈的抵抗，未能成功。参加攻击的四十一架鱼雷轰炸机仅有六架返航。他们的献身带来了报酬。当全部日本人的注意力与全部可以使用的战斗机向他们集中的时候，“企业”号与“约克顿”号上的三十七架俯冲轰炸机飞临上空。它们的炸弹几乎毫无阻拦地投进南云的旗舰“赤诚”号与它的姐妹舰“加贺”号；大约同时，“约克顿”号上的另外一批十七架向“苍龙”号展开攻击。在数分钟之内，这三艘航空母舰的甲板都变成了杀戮场，乱堆着正在燃烧与爆炸的飞机。舰身下舱发生大火，不久，显然这三艘航空母舰注定了要遭灭亡的命运。南云海军大将只得把他的司令旗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坐视他统率的良好舰队四分之三付之一炬。

中午以后美国飞机才返航降落。他们损失六十余架飞机，但是，获得的战果极其巨大。敌人的航空母舰只有“飞龙”号一艘还存在，它立刻决意为了太阳旗的荣誉发动一次猛烈攻击。正当返航的美国飞行员们在“约克顿”号上谈论着他们的故事时，传来了敌机来袭的消息。据报敌机约四十余架猛扑而来，尽管敌机遭到战斗机与炮火的重大打击，“约克顿”号还是被三枚炸弹击中。虽然造成严重的损害，但是燃烧已被扑灭，

这艘航空母舰还能坚持航行，直至两小时以后“飞龙”号再度来袭，使用了鱼雷进行攻击，产生了致命的结局。该舰在海上漂浮两天之后，被一艘日本潜艇击沉。

“约克顿”号在它还在漂浮时就已开始报复行动。下午二时四十五分“飞龙”号即被发现；在一小时之内从“企业”号上起飞了二十四架俯冲轰炸机比翼向它飞来。下午五时正，攻击开始，数分钟内它已经烧成一团，直到次日清晨才沉没。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最后一艘也被击沉了，随之俱去的是它的全部训练精良的航空人员。这些损失永远不能补救。这次战役在6月4日结束。这次战役被正确地当作太平洋上战争的转折点。

我所等待的那个字终于传来了。1942年10月23日，中东总司令①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齐普！”②

我立即电告总统。1942年10月23日，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埃及战役于伦敦时间今晚八时开始。陆军全部兵力将投入此次战役。我将随时向你报告战况。在埃及打一次胜仗对我们的主要事业将极为有利。你在托卜鲁克那个黑暗的早晨给我的那些‘谢尔曼’式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均将在这次战役中大显身手。”

当时共有三个装甲师和相当于七个步兵师的兵力可供蒙哥马利将军③随时调遣。集中这么大的兵力，必需采取若干欺骗

① 1942年8月10日，丘吉尔任命亚历山大将军（Field-Marshal Sir Harold Alexader）继奥金莱克将军担任中东地区英军总司令。

② 1942年10月20日，丘吉尔在给亚历山大将军的电报中说：“当你开始进攻的时候，请用‘齐普’一字通知我。”

③ 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Field-Marshal Sir Bernard Montgomery）。

敌人的巧妙措施和预防办法。特别重要的是，决不能让敌机俯瞰到我方的准备工作。这一切都极成功地做到了，因此这次进攻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

10月23日夜晚，皓月当空，近一千门大炮对敌人的炮兵阵地开火，一直轰击了二十多分钟，然后又轰击敌人的步兵阵地。在这种集中炮火的掩护下，再加上空中轰炸的支援，第三十军（军长利斯将军）和第十三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发动了进攻。第三十军所进攻的敌军防线系由四个师的兵力防守，该军全体部队力图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打开两条通路。在该军后面紧跟着第十军（军长拉姆斯登将军）的两个装甲师，以便扩大战果。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奋力挺进，到拂晓时已深深楔入敌人战线。工兵部队已经把先头部队后面的地雷扫除了。但我军仍未突破敌人布雷阵地的纵深地带，我军装甲部队也并无很快即可突破敌人阵线的希望。更往南一点，第一南非师奋战前进，以便保护突出部的南翼，第四印度师由鲁威塞特山脊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十三军所属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也突破了他们面前的敌军防线。这样，这支部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当主要战斗在北面展开之际，诱使敌军在这一部分战线的后方将两个装甲师保持三天之久。

截至此时为止，我军一直未能在敌军很深的布雷地带和防线上突破任何缺口。25日凌晨，蒙哥马利和他的高级将领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命令装甲部队按照他原来的指令，在拂晓前再度向前猛攻。在这一天里，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的确获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那块通称为腰子岭的有特点的地方却成为我军和敌军第十五装甲师和阿里雅特装甲师激战的焦点，他们接连不断地猛烈反扑。第十三军在它的战线上没有继续推

进，为的是保存第七装甲师的实力，以便在高潮时使用。

在敌军司令部里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混乱。隆美尔在9月底回德国治病去了，接替他的是施登姆将军。战役开始后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施登姆便死于心脏病猝发。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出了医院，在25日傍晚重新担任指挥官。

25日那天，在这个目前已深深楔入敌人防线的突出部分的整个战线上敌我双方继续激战，这一次仍然是以腰子岭打得最厉害。在前两天一直销声匿迹的敌方空军，此刻也毫不示弱地向我们的空中优势挑战了。空战多次，结果多半是我方占上风。第十三军的奋战，虽然推迟了敌军的行动，但并未能阻止德军将其装甲部队调到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他们防线的要害地区去。但是，这一调动受到我方空军的痛击。

此时，在莫斯黑德将军指挥下的第九澳大利亚师发动了一次新攻势，大有所获。该师由突出地带向北朝海边方向攻击。蒙哥马利抓紧时机，扩大这次出色的胜利。他命令新西兰师停止西进，并命令澳大利亚部队继续向北挺进。这一行动威胁了在北翼的德国步兵师一部分人员的退路。这时，他感到我军在密布地雷和强大的防坦克炮阵地中趑趄不前，锐势已有所衰退。于是，他重新集结部队和后备力量，以便为再度猛攻作好准备。

在27日和28日两天里，为了争夺腰子岭，我军和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二十一装甲师进行了整整两天的激烈战斗。这两个师是新近由南部地区调来的，他们反复向腰子岭的进攻，均被击退。……

就在10月26日与28日这两天中，三艘极端重要的敌方油船被我空军击沉。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的空中作战得到

了最大的报酬，空中作战就是陆上作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蒙哥马利这时已订好计划，作好部署，准备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增压”作战计划)。他把第二新西兰师和英国第一装甲师从前线撤下来，后者在腰子岭击退德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获得赫赫战果以后，特别需要进行整顿。英国第七装甲师和第五十一师以及第四十四师的一个旅合并，编为新的后备部队。此次突破将由第二新西兰师，英国第一百五十一和一百五十二步兵旅及第九装甲师打头阵。……

澳大利亚健儿在经过一系列苦战后，长驱直入，战果辉煌，这使整个战局对我十分有利。11月2日清晨一时，“增压”开始。在三百门大炮的掩护下，第二新西兰师下属的几个英国旅突破了敌人的防区，英国第九装甲旅一马当先，直捣敌人阵地。但是他们发现，沿着通往拉曼的道路上，有一条配备了强大的防坦克武器的新防线阻挡了他们的去路。经过长时期的战斗后，该旅损失惨重，但却为后续部队打通了一条走廊，英国第一装甲师便通过这条走廊向前挺进。接着就发生了这次战役中最新的一次坦克会战。敌军以所有残存的坦克猛攻我军突出部两翼，均被击退。这是一场决战；但到次日，即3日，当空军报告敌军已开始撤退时，在通往拉曼道路上的敌军掩护撤退的后卫部队，却依然缠着我军装甲部队的主力，使之无法前进。希特勒下令不准再后退一步，但是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已不在德国人手中了。现在仅需在敌人的防线上再打开一个缺口，大功即告完成。11月4日清晨，第五印度旅在特勒阿格及尔以南五英里的地方发动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猛攻，十分成功。我军至此已大获全胜，我装甲部队终于打通了横越广漠无垠的沙漠追

击散军的道路。……

阿拉曼战役与以前在沙漠所发生的历次战斗均有不同。因为战线狭窄、工事极为巩固，并且有重兵固守。没有侧翼可以包抄。只有较强的并且敢于采取攻势的一方才能突破。谈到这些情况，不禁使我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线所进行的那些战斗。我们在埃及又看到1917年底曾在康布雷出现过、后来又在1918年的许多战役中出现过的实力较量，就是说，攻击者握有短近而优良的交通线，尽力集中使用炮兵，用猛烈炮火组成火网，然后用大批坦克蜂拥向前推进。

蒙哥马利将军和他的上司亚历山大都是经验丰富、研究有素并且肯动脑子的人，所以深谙此道。蒙哥马利是一位伟大的炮兵专家。他相信大炮可以杀人，正如萧伯纳说拿破仑也相信这一点一样。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力图使三四百门大炮在统一的指挥下参加战斗，而不是用分散的炮兵来进行小规模的炮轰；在过去，这种小规模的炮轰总是与坦克在宽广的沙漠地带的袭击一起进行的。自然，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论，阿拉曼战役的规模都远不及在法国和佛兰德所进行的那些战役。在阿拉曼，我们在十二天中损失一万三千五百人，而在松姆地区我们头一天就损失了近六万人。就另一方面而言，自第一次大战以来，防御火力已大为增强，而且在那次大战中，人们一直认为，不仅在炮火上，而且在士兵的人数上，必须是二或三对一之比，才能突破一条工事巩固的防线。在阿拉曼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敌军的阵线不仅包括连绵不断的前沿据点和机枪阵地，而且这样的防御体系遍布整个纵深区域。此外，在这样的一个阵地前面，还有大片布雷区，形成强有力的屏障，其所布的地雷质量之高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因此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

阿拉曼战役将永远成为英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它将永垂青史，还有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标志着“命运的关键”。我们可以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

“最近发生的极为重要的事件，已经改变了并且正在改变着迄今为止一直为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思路根据的论据。俄国人在1942年的战事中并没有一败涂地或一蹶不振。与此正相反，一败涂地的倒是希特勒，死伤惨重的倒是德国军队。据冯·托马将军①说，在俄国前线的一百八十个德国师中，有许多师的人数还不到一个旅。在东线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军队军心显然已经涣散。芬兰军队除了少数的山地部队以外，已经停止作战了。

“目前正在斯大林格勒和俄国前线中央部分进行中的几场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俄方的攻势很可能对德国的实力产生深刻的影响。倘若目前在斯大林格勒阵前被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被歼灭的话，俄军的南方攻势可能攻抵它的目的地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北高加索的已经遭受俄军猛攻的三个德国集团军的地位就不但岌岌可危，而且甚至可能全军覆灭，这样一来，其后果也是无法估计的。俄军在中央部分所采取的攻势，和他们在整个战线上许多地点所发动的反攻，可能使德军阵线缩至冬季阵地。冬季将使原已精疲力竭的德军备尝艰苦，虽然他们目前拥有较好的铁路系统。在1942年年底以前，也许我们至少能有把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1943年，

① 德国将军，于阿拉曼被俘（General Von Thoma）。

德方不可能把大量部队由东战场调至西战场。这将是一桩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①

我们现在必须要回述在斯大林格勒周围展开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件。前面已经讲过了，11月间会战的结果是，保卢斯②所率领的德国第六集团军为俄军的钳形攻势所包围，成为瓮中之鳖。曼施泰因在12月间由西南力图突破俄军的封锁线，解救被围的驻军，但终告失败。他于突入俄军防线深达四十英里后，便被挡住了，这时他距斯大林格勒尚有五十英里。俄军由北方发动的一次新攻势威胁了他的侧翼，迫使他从整个德军南线，包括高加索在内，全面后撤，一直退回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的后面。

保卢斯现在已经陷于绝境。德国人曾力图由空中为他提供给养，但是能越过封锁线的飞机寥寥无几，并且损失惨重。天气奇寒，粮弹两缺，再加上发生了斑疹伤寒，他的士兵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于1月8日拒绝了令他投降的最后通牒，次日，俄军由西方发动猛攻，战役的最后阶段遂告开始。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此俄军猛攻了好几天才仅推进了五英里。但最后德军终于不支，到1月17日俄军距斯大林格勒城已不到十英里。保卢斯将军所有能作战的人都投入了战斗，但是徒劳无益。1月22日，俄军再度猛攻，直将德军逼到他们枉费心机、妄想占领的这座城市的近郊。在该处，一度是一支不可一世的大军的残部被压制在一条只有四英里长和八英里宽的长方形地带

① 这两段文字引自英国国防大臣（丘吉尔）提出的备忘录，1942年12月3日。

② 德国陆军元帅（Field-Marshal Paulus）。

里。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和轰炸，为了保卫自己而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但是他们已处于绝境，随着俄军的逼近，这些筋疲力尽的部队便开始大批地投降。保卢斯和他的幕僚在1月31日被俘，到2月2日，沃罗诺夫元帅宣告一切抵抗均告终止，共俘德军九万名。他们便是二十一个德国师和一个罗马尼亚师所余的残部。希特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妄图以武力征服俄国，妄图以一种可憎的极权专制制度来消灭共产主义，在德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后，这一切也就都成为泡影了。……

1943年春季标志着东线战事的转折点。甚至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击溃以前，俄国早以汹涌澎湃之势在全线击退了敌人。德国在高加索的军队也巧妙地撤退，一半退至罗斯托夫；其余则在诺沃罗西斯克和库班半岛上形成了强大的桥头阵地。俄国人从顿河直把敌人赶过了顿涅茨河，也就是希特勒在头年夏天开始进攻时的战线。再往北，德国人也失去了地盘，一直退到距莫斯科二百五十多英里的地方。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也被冲破。德国及其附庸国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前一年所占领的地方都被收复。在地面上，他们已经失去对俄国人的优势。在天空，他们现在也要考虑到实力日益壮大、以英国和非洲为基地的英美空军了。……

现在，苏联政府同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发生了破裂。在德军和苏军侵占波兰以后，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于1939年9月缔结协定之后，曾向并未同波兰交战的俄国人投降，并被拘禁。根据纳粹和苏联之间后来签订的一些协定，已将其中许多人移交德国，供强迫劳动之用。根据日内瓦公约，不能这样对待军官级的俘虏。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

三个苏联俘虏营所拘禁的一万四千五百名波兰人中，有八千名是军官。在这些军官中，有很多是波兰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和被动员去服后备役的知名人士。1940年春天以前，还断断续续地听到有关这些俘虏生存的消息。从1940年4月以后，沉默笼罩了这三个俘虏营。在十三、四个月当中，居住在这里的人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们肯定是在苏联管辖之下，但是他们那里从未发出任何书信和消息。没有出现逃俘，也没有听到片言只字的报道。

当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① 对俄国突然袭击时，俄国和波兰的关系顿时起了变化。他们成了盟国。以前在俄国监狱中，一直在鞭打等严酷条件下监禁着的安德斯将军以及其他波兰将军，现在都沐浴更衣，得到释放，受到欢迎，并在苏联当时组织起来以抵抗德国入侵者的波兰军队中，担任高级指挥官。这些波兰人早就为那三个集中营里面的大批军官的命运担忧，现在便要求将他们释放，以便参加这支新的波兰军队，这批人对这支军队来说将是无价之宝。从俄国其他地区曾征集了大约四百名军官，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来自目前处在德国掌握下的三个集中营。波兰人一再询问，但是他们的新战友却无言以对。波兰的领袖们，现在已能接近许多苏联权威人士，一起并肩工作，在组织自己的军队中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这些波兰人在许多场合下，都察觉到苏联官员的窘态，但是从未听到有关那三个集中营的一万四千五百名居住者的消息，也从未看到生还者露面。这自然要引起波兰和苏联政府之间的怀疑和摩擦。

① 原文作20日，今校正。

战争在继续着。德国人仍然占领着这几个集中营所在的地方。几乎又是一年时间过去了。

1943年4月初，西科尔斯基① 到唐宁街十号来进午餐。他对我说，他有证据说明苏联政府谋害了他们手中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及其他俘虏，他们被埋葬在主要以卡廷为中心的树林中的一个大冢中。他有大量证据。我说，"如果他们已经死去，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起死回生。"他说，他不能不让他的人民说话，他们已向报界发表他们的全部消息了。在伦敦的波兰内阁并未向英国政府透露他们的意图，但在4月17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声称，他们已同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接洽，要它派一个代表团到卡廷去进行现场调查。4月20日，波兰驻苏联大使奉本国政府命令，向俄国人征询他们对德国人的说法有何意见。

4月13日，德国无线电公开指责苏联政府，说它谋害了三个集中营里的一万四千五百名波兰人，并主张在现场举行一次有关这些人命运的国际调查。波兰政府对此计划很感兴趣，这一点我们是不能置疑的；但是国际红十字会从日内瓦宣称，除非接到苏联政府相应的要求，否则不能为了德国人的臆断而举行任何调查。德国人于是进行了自己的调查，一个由德国控制下的各国所抽调的专家所组织的委员会拟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声称在万人冢里发现了一万具以上的尸体，而且从他们身上找到的书面证据以及冢上所种植树木的年轮说明，处刑是远在1940年春季进行的，当时这一地区正处在苏联控制下。

最后在1943年9月，卡廷地区又被俄国人占领。在收复斯

① 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General Sikorski）。

摩棱斯克后，任命了一个完全由俄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去调查卡廷波兰人的命运。他们在1944年1月发表的报告声称，当时由于德国人进军迅速，来不及撤退这三个集中营，于是这些波兰俘虏便落入德国人之手，后来遭到他们屠杀。要人相信这种说法，就等于承认这样的事实：自从1940年春季便没有记录记载的近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和士兵，是在1941年7月落入德国人之手，并被他们消灭的，并且，没有一个人逃出来向俄国当局，或向在俄国的波兰领事或向波兰的地下运动报告。当我们回忆起德国人进军时造成极大混乱，因而集中营的警卫人员必定会在入侵者临近的时候逃走，而且后来在俄波合作阶段又进行了一系列接触，那么，要相信这种说法似乎得看信仰什么了。①

——以上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
《命运的关键》(1951年，初版)

① 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声明：根据苏联内务部档案，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一事系苏联所为。供读者参考。

22. 墨索里尼的垮台

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多年，最后给国家带来了战争的灾难，他现在必须对此负主要责任。他一直行使着几乎绝对的统治权，所以不能把责任推卸到王室、议会、法西斯党或总参谋部的身上。一切都归咎于他。现在在意大利国内消息灵通人士中间，散布着一种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情绪，于是曾经非常专横地把国家推向错误和失败的一方的那个人物，自应受到谴责。在1943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这些信念逐渐形成，而且广泛地传播开来。孤独的独裁者坐在权力的顶峰，而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意大利人在俄国、突尼斯和西西里岛①遭到杀戮等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些是直接进攻意大利本土的序曲。

他枉费心机地在政界人物和军事将领中间进行一些人事更动。2月间，安布罗西奥将军继卡瓦勒罗任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和宫廷大臣阿奎罗纳公爵，都是国王的私人顾问，并获得王室的信任。几个月来，他们希望推翻法西斯党的领袖，结束法西斯政权。但是，墨索里尼仍然留在欧洲的政治舞

① 1943年7月10日，美英联合武装部队在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和副总司令亚历山大的指挥下发动西西里战役，三十八天内占领全岛。在此期间还对罗马等城市进行轰炸并散发传单敦促其投降。

台上，仿佛他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当他手下的新的军事首脑提议立即从巴尔干半岛撤回意大利师团时，他感到受了侮辱。他认为这些部队是对德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的补充力量。他没有认识到，由于在国外的失败和国内的民心涣散，他已经失去了作为希特勒的同盟者的地位。当现实情况已经消逝时，他依然眷恋于权势和个人影响的幻想。因此，他拒绝了安布罗西奥的重大要求。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权威的印象以及对他个人的极端行动的畏惧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因此，关于如何将他驱逐下台，意大利的所有社会力量，都长期地犹豫不决。谁愿意冒险去“把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呢？春天已经过去，拥有海陆空三军优势的强大敌人对意大利的进攻，也越来越逼近了。

7月间，高潮来到了。从2月以来，沉默寡言和谨小慎微的立宪国王，一直同由于1940年在希腊的惨败而被罢免的巴多格利奥元帅保持着联系。他终于发现后者是一个可以受他委托、掌管国政的人物。于是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决定在7月26日逮捕墨索里尼；安布罗西奥将军同意物色执行计划的人，并为完成这一行动制造形势。安布罗西奥将军的计划，无意中得到了法西斯老战士中一些人的帮助；这些人企图复兴法西斯党，而在复兴运动中，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会成为失败者。他们准备召开从1939年以来一直没有举行的法西斯党的最高组织——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以此作为向他们的领袖提出最后通牒的手段。7月13日，他们会见了墨索里尼，劝诱他在7月24日召开大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述的两个运动，看来是互不相干和彼此独立的，但是，它们在时间上的几乎完全偶合，则具有重大意义。……

7月17日，盟国的飞机在罗马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上空，散发了这一文告的传单：

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给意大利人民的文告

在目前这个时刻，美国和英国的联合武装部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下，正把战争深深地推进到你们的国土。这是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权迫使你们接受的那种可耻的领导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墨索里尼引导你们作为一个残杀各国人民并摧毁人们自由的野蛮国家的仆从，参加了这场战争。墨索里尼把你们投入了他认为希特勒已经稳操胜券的战争。尽管意大利容易遭受来自空中和海上的袭击，你们的法西斯领袖却仍然把你们的子弟、你们的舰只、你们的空军派往遥远的战场，帮助德国去实现它想要征服英国、俄国和全世界的企图。这种与纳粹德国的阴谋勾结，同意大利在自由与文化方面的悠久传统，也就是，同英美两国人民与之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的那些传统，是极不相称的。你们的士兵，不是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是为了纳粹德国作战。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他们在俄国前线以及在从阿拉曼到邦角的非洲各个战场上，都被德国人出卖和遗弃了。

今天，德国企图征服世界的希望，在各个战场上都已经被粉碎了。意大利的天空是在美国和英国庞大的空中机队的控制下。意大利的海岸受到了英国和盟国集中在地中海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海军力量的威胁。现在，你们所对抗的力量誓死要摧毁纳粹德国的势力，这种势力曾经被无情

地用来使一切拒绝承认德国人是统治种族的人们，遭到了奴役、毁灭和死亡。

为意大利谋取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对盟国的武装部队的不可抵拒的威力，实行体面的投降。如果你们继续容忍为纳粹党的邪恶势力服务的法西斯政权，你们势必要承受你们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后果。我们并不乐于攻入意大利的领土，使意大利人民经受战争毁灭的悲剧；但是，我们坚决要摧毁那些虚伪的领袖和他们的那种使意大利沦落到如此处境的主义。你们抵抗盟国的联合部队的每一分钟——你们流的每一滴血——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给法西斯与纳粹领袖更多一点时间，让他们逃脱他们自己的罪行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你们的一切利益，你们的一切传统，都被德国和你们自己的虚伪而又腐化的领袖们背弃了，只有推翻上述两者以后，一个重新建立的意大利，才能在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中得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现在，由你们意大利人民考虑你们自己的自尊，你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你们自己要求恢复国家的尊严、安全与和平的愿望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这个时刻要求你们决定：意大利人究竟是要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卖命，还是为意大利和文明求生。

罗斯福
丘吉尔

两天以后，墨索里尼在安布罗西奥将军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里米尼附近的费尔特雷，在当地的一个别墅会见了希特

勒。……

德国元首喋喋不休地发表了他的意见，指出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他说，准备用来袭击英国的新的秘密武器，预期在冬季可以使用。必须保卫意大利，“这样，西西里岛对于敌人，就可能像斯大林格勒对于我们那样。”意大利人必须自己提供人力和组织。德国由于在俄国前线遭受的压力，对于意大利要求的增援和装备无法供给。

安布罗西奥敦促他的首长坦率地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已经不能再继续参加这场战争了。这种表示究竟会带来什么好处，并不明显。但是，墨索里尼那种呆若木鸡的样子，终于使安布罗西奥和其他在场的意大利将领下定决心不能再指望他作领袖了。……

7月25日，星期日，墨索里尼上午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并巡视了罗马几个遭到轰炸的地区。他请求觐见国王，下午五时，国王接见了他。“我认为国王会撤回他在1940年6月10日授予我的关于指挥武装部队的权力，我在不久以前，曾经考虑要放弃这个指挥权。所以，我走进别墅时，心中没有感到任何不祥的预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毫无怀疑。”① 在到达国王寓所时，他看到各处的军事警察都增加了。国王身穿大元帅制服，站在门口。他们两人走进了客厅。国王说：“我的亲爱的领袖，情况不妙了。意大利已经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法西斯大委员会的表决太可怕了——赞成格兰迪的动议② 的竟有

① 参阅墨索里尼的《回忆录》。

② 法西斯党元勋、前外交部长和驻英大使格兰迪在24日的会议上提议请国王掌握更大的权力，恢复对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结果就连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都给他以支持。

十九票，而在这些投票人中，有四个人竟是天使报喜勋章的获得者！……此刻，你在意大利是大家最痛恨的人。你能够依靠的，最多不过一个朋友。现在你只剩下了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就是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对于你的个人安全，用不着担忧，我保证给你保护。我在考虑，你的职位现在由巴多格里奥元帅来担任。……”

墨索里尼答道：“你正在作出一个极端严重的决定。目前的危机将使人民认为，那个宣战的人一旦解职，和平就在望了。这给军队士气的打击将是严重的。这个危机将被看作是丘吉尔与斯大林一伙的胜利，尤其是斯大林的胜利。我体会到人民的怨恨。昨天晚上，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上，我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人统治了这么久的时间，并且使人遭受了这么多的牺牲，那就不能不激起愤恨。不管怎么说，我祝愿控制目前局势的人幸运。”国王陪送墨索里尼到门口。墨索里尼写道，“他的脸色苍白，显得比平时更加矮小，几乎象是一个侏儒。他和我握手告别后就进去了。我走下几级台阶，向我的汽车走去。突然，一个国家警察上尉拦住了我，他说，‘国王陛下派我负责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我继续向我的汽车走去，这时那个上尉指着停在附近的一辆救护车对我说，‘不，我们必须乘那辆车。’我和我的秘书一同乘上了救护车。除了那个上尉，还有一个中尉、三个国家警察和两个便衣警察，他们也一同上车，坐在车门口，拿着机关枪。车门关上以后，救护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去。我仍然认为，所有这种做法，都象国王所说的，是为了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那天下午，稍晚时候，国王命令巴多格利奥组织一个包括军事首脑和文官的新内阁，当天晚上，巴多格利奥元帅向全世

界广播了这个消息。两天以后，巴多格利奥元帅命令将这个法西斯领袖拘禁在蓬察岛上。……

墨索里尼在7月26日以后被拘留在蓬察岛，随后又转到离撒丁岛海岸不远的拉马达勒纳岛。巴多格利奥担心德国人进行一次奇袭，因此曾在8月底，把他以前的首长迁到意大利中部阿布鲁齐高山上的一个小型休养地。因为从罗马逃出时十分慌张①，巴多格利奥没有给看守这位垮台的独裁者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以明确的指示。9月12日，星期日的早晨，由滑翔机运载的九十名德国伞兵，在墨索里尼被拘禁的旅馆附近降落。当时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事件，墨索里尼就被一架轻型德国飞机运到慕尼黑去，同希特勒举行另一次会议。

墨索里尼既被救了出来，德国人便能够在北部成立一个与巴多格利奥政府对抗的政权。一个虚设的法西斯政权设在加尔达湖滨，墨索里尼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百日丑剧"。罗马北面的地区处在德国军事占领的蹂躏下；一个无人效忠的挂名政府设在罗马，现在那里听任德国军队自由出入；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在盟国委员会的监视下，在布林迪西成立了一个残存政府，他们拥有的有效权力，不能越出市行政大楼的范围。由于我们的军队正从半岛的趾形地区向前推进，盟国的军政府接管了统治解放地区的任务。

意大利现在将要经历它的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并成为战争中几次最激烈的战斗的战场。

---

① 9月3日，巴多格利奥政府的代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签署了停战条件。9月8日至9日之间，德军包围罗马，意大利王室和巴多格利奥仓皇逃至盟军占领区，成立反法西斯政府。

23. 我和罗斯福、蒋介石举行开罗会议

“威名”号在(1943年)11月21日清晨到达亚历山大港，我立即乘飞机到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在这里，凯西先生[1]把他自己居住的那座舒适的别墅供我自由使用。在我们住所的周围，是一片辽阔的卡塞林森林，森林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开罗的各国富豪们的豪华住宅和花园。蒋介石大元帅和夫人已经在半英里以外的地方安适地住下了。罗斯福总统将在通往开罗的道路上大约三英里的地方，美国柯克大使的宽敞别墅里居住。第二天早晨，他乘“圣牛”号飞机从奥兰到达时，我到沙漠机场去迎接他，并同车前往他的别墅。

随从的参谋们很快地都聚集在一起了。会议的总部和英美三军参谋长们的集合地点，都在金字塔对面的米纳大旅馆，离我的住所只有半英里远。整个地区布满了军队和高射炮，在所有的通道上布置了最严密的警戒线。各级人员也都立即开始工作，处理需要决定和调整的大量事务。

① 英国驻中东国务大臣（R. G. Casey）。

我们担心由于蒋介石的到来将会引起的问题，现在终于发生了。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而且，象下面将要叙述的，罗斯福总统由于对印度—中国战场过于重视，不久便同蒋介石大元帅举行了几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我们曾希望劝说蒋介石夫妇去参观金字塔，并消遣一下，等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再说①，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结果，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最后，而是最先得到了讨论。不论我怎样争辩，罗斯福总统还是答应中国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这个计划，不论同我的土耳其计划或爱琴海计划相比，都会更多地占用“霸王”作战计划②所需的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而目前这些舰艇的数量的不足，已经使作战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此外，在孟加拉湾的作战计划也一定会严重妨碍我们正在意大利进行的大规模战役。11月29日，我用书面通知三军参谋长们：“首相希望将下列事实记录在案，即他明确拒绝蒋介石大元帅关于要我们在缅甸进行陆地战役的同时，负责发动一次两栖作战的请求。”但是，直到我们从德黑兰回到开罗以后，我才终于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诺言。即便如此，仍然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情况不久将要谈到。

我当然乘这个机会到蒋介石大元帅住的别墅去访问他，他和他的妻子舒适地住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和蒋介石会晤。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

① 斯大林不肯与日本的三个敌国一起举行四国会议而危及他与日本的关系（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日苏中立协定》），他只肯到德黑兰去与英美两国首脑举行三国会议。

② 英美军队从英国本土出发在法国大举登陆的作战计划（代号“Over lord”）。

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我和蒋介石夫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我发现她是一位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我告诉她说，当我们同时都在美国时，竟未能找到一个会面的机会，这曾使我感到多么遗憾①。我们一致认为，今后不应让那些繁琐礼节妨碍我们的会谈。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会谈时，有一次罗斯福总统让我们大家合影，虽然许多过去曾经崇拜蒋介石大元帅夫妇的人

① 1943年5月，丘吉尔与蒋夫人（宋美龄）同时在美国访问，罗斯福总统竭力主张他们两人应当会晤，但终因双方都坚持“礼节”要求而未实现。关于这件事，丘吉尔在原书第4卷第43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周末讨论了我同在美国漫游的蒋介石夫人会面的问题。她那时正在纽约，她暗示愿在那里接见我。我们的工作繁忙，而且，我在美国只能逗留几天就必须返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不能作这样一个长途的旅行。因此，总统邀请这位夫人午餐，以便和我在白宫见面。她带些傲慢的神气拒绝了总统的邀请。蒋夫人的意见是：我应当专程到纽约朝拜她。总统因为她未采纳他的计划有些生气。保全伟大的同盟的和睦是我的强烈愿望，因而我提议我到中途见她，如果她也同样做的话。可是这一提议被认为是滑稽可笑，所以我在开罗会议以前便没有兴致也没有机会会见这位夫人。”关于那次没有蒋夫人参加的宴会，丘吉尔写道：“在蒋介石夫人缺席的遗憾情绪下，总统和我单独地在他的房中用了午膳。”

们，现在都把他们看成是邪恶的和腐败的反动人物，但我仍然愿意保存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开罗会议（密码代号“六分仪”）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3日，星期二，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正式扼要地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会议上所拟定的东南亚作战计划草案。蒙巴顿海军上将①及其僚属已从印度乘飞机到来。他首先叙述了他已接到的而且要在1944年在东南亚战场执行的军事计划。然后，我就海军的一般情况作了补充。由于意大利舰队的投降，以及其他对海军有利的事态发展，不久就可以在印度洋建立一支英国舰队。这支舰队最后将拥有不下于五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四艘重型装甲巡洋舰和十二艘辅助运输舰。蒋介石插话说，他认为缅甸战役的胜利，不仅依靠我们驻在印度洋的海军部队力量，而且还要依靠海军的行动与陆地作战的同时配合。我指出陆地战役和孟加拉湾的舰队行动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的主要舰队基地能够在距离陆军作战的战场二千至三千英里以外，发挥它在制海权方面的影响。因此，这些战役和西西里岛的战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在西西里岛的战役中，英国舰队能够在密切地支援陆军的情况下作战。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并且商定由蒋介石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召开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讨论欧洲和地中海的作战计划，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我们在前往德黑兰以前，要考虑这两个战场的关系并互相

① 英国海军上将（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

交换意见。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他谈到了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问题，将对“霸王”作战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发言时说，“霸王”作战计划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战役不应当粗暴地否定了地中海的任何其他的活动，例如，在使用登陆艇方面，应该有一些灵活性。亚历山大将军曾经要求登陆艇前去参加“霸王”战役的日期，应当从12月中旬延迟到1月中旬。在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出了命令，要求额外建造八十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设法做得甚至比这更好。我们也许会发现美英两国参谋人员所争执的问题，只不过影响到两国人力、物力的十分之一(太平洋的力量未计在内)。无疑地，某种程度的伸缩余地是留得出来的。我仍然希望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们削弱了和冷淡了“霸王”。或企图退出这个战役。相反地，我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总起来说，我认为我所主张的方针是在1月份占领罗马，2月份占领罗得岛；恢复对南斯拉夫的物资供应，解决关于司令部的安排问题，并且根据我们和土耳其交涉的结果来打通爱琴海；在上述地中海的政策的范围内，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在德黑兰会议前夕所持的立场的一个忠实的记录。……

11月25日，适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在那天按说都要吃火鸡，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3年确实也吃到了。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的大批火鸡，是由罗斯福总统乘坐的军舰运来的。罗斯福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参加晚餐。他说，“让我们来举行一次家宴。”因此，

萨拉①也受到邀请，此外，还有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包括他的私人亲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女婿伯蒂格少校，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我们愉快而又安静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由人按照隆重的仪式送了进来。罗斯福总统高高地坐在椅子上，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毫不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因此，切鸡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而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替自己切上一份。我看到他把一盘盘堆得满满的鸡肉分给大家，担心他自己会一点也吃不到。但是，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到最后，当两副鸡骨架撤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一份，这才放了心。哈里看见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席间，大家致词表达了热诚而亲切的友谊。那两个小时，我们把一切忧虑都抛在一边。我从未看见过罗斯福总统那么高兴。晚餐以后，大家便到我们曾经举行过好多次会议的那个大厅去。跳舞音乐——用留声机唱片播送的——开始响起来了。萨拉是唯一在场的女人，她已被人抢先请走了，因此我和沃森“老爹”（罗斯福的亲信、旧友和副官）跳舞，他的首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欢乐的夜晚，以及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景象，是我在开罗停留期间所有最愉快的经历中最突出的印象。

一切难题终于都得到了解决。……于是，我们就在11月27日黎明乘飞机离开开罗，向那个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的会议地点飞去。沿途天气非常晴朗，我们从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

① 丘吉尔的女儿。此次启程赴会前，丘吉尔刚得过一场重病，英国内阁决定由他的女儿随他同行。

24。我和罗斯福、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议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三英里的路程中，沿途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骑马的卫兵是在指示路线，却不能提供任何保卫措施。……然而，沿途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们也都向我报以微笑。最后，我们到达了英国公使馆，使馆周围有英印部队的严密警戒线。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英里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街道两三次。这时，在我们之前二十四小时已经到达这里的莫洛托夫，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说苏联的秘密情报人员发觉

了一个有人阴谋杀害“三巨头”（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中的一两个人物的阴谋。因此，他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不断地来往通过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发生了任何这类的事件，那就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总统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广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出色的菲律宾厨师，一同搬进俄国大使馆。那里已为他准备了宽敞、舒适的住所。这样，我们都住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讨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不会受到任何打扰。我很舒适地住在英国公使馆里，只要步行二百码，就可以到达富丽堂皇的苏联大使馆，这里暂时称得上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体还是很不舒服，感冒和喉痛都非常厉害，以致一度不能说话。但是，莫兰勋爵用药水喷进我的嗓子，并且不断地医治，终于使我能够说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可不少哩。

关于我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充分同意），有着许多错误的说法。在美国，有一种传说，说我曾极力阻挠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展开攻势的“霸王”作战计划，同时又说我妄图引诱盟国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入侵，或者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样实际上等于砍掉“霸王”作战计划。这些荒谬的说法，多半已经在以上的各章中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但是，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实际上在追求什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什么，也许还是值得的。

目前正在仔细准备中的“霸王”作战计划，将于1944年5

月或6月，至迟在7月初发动。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和输送这些部队的船舶仍然享有最优先的待遇。其次，英美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必须给予补充与给养，以便它们能够占领罗马，并进而占领这个都城北面的飞机场，从这些机场可以空袭德国的南部。在获得这些进展后，在意大利战场，就不越过比萨-里米尼线——也就是说，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半岛更宽广的地带。如果敌人对这些战役进行抵抗，那就会吸引和牵制很大数量的德国军队，会给意大利军队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而且可以使战火在敌人的前线不断地燃烧。

这时，我并不反对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一带进行登陆，以马赛和土伦为目标，然后英美军队沿罗纳河谷向北推进，以策应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主攻。但是我却宁愿采取另一种方案，即利用伊斯的利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山峡，从意大利北部展开右翼进攻，指向维也纳。当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一方案时，我很高兴，并象下面所说的那样，我企图使他着手进行这个计划。如果德国军队进行抵抗，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许多师团从俄国或英吉利海峡前线吸引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抵抗，我们就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解放大片重要的地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遭到抵抗，这样，就会给“霸王”作战计划以决定性的支援。

我的第三个要求是，只要不影响能够用于横渡海峡进攻的实力，我们就不应该忽视地中海东部战场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重大收获。在所有这些问题方面，我坚持自己在两个月前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比例——即把我们的兵力的五分之四用于意大利，十分之一用于科西嘉和亚得里亚海，另外十分之一用于地中海东部。我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主张——一年以来，我没

有退让过一步。

英、俄、美三方都一致同意前面两个战役，这就需要使用我们现有实力的十分之九。而我必须极力要求的，只是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地利用我们十分之一的实力。只有傻子才会这样争辩说："把兵力全部集中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而放弃只应看作是白白分散兵力的其他一切机会，这岂不是好得多么？"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些主导一切的事实。西半球现有的一切船舶，为了准备"霸王"战役和维持我们的意大利前线，连最后一个吨位也都安排了任务。即使还能发掘更多的船舶，也无法利用，因为登陆计划已把有关的港口和营地最大限度地填满了。至于地中海东部战场，它不需要任何可以用于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埃及而集结的空军，如果在更向前推进的前哨地带起飞，也一样能够有效地或更有效地执行任务。所有的军队（外地还有两三个师）都已经到达这个战场；除当地的船只外，也没有其他船只，可以把他们运往较大的战场。如果积极地、大力地利用这些部队，那就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损伤，否则他们就只会成个瞧热闹的人。如果我们攻下了罗得岛，我们的空军就可以控制爱琴海，同时我们也能从海路上与土耳其建立直接的联系。再一个办法是，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参战，或者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而把我们为它修建的机场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也同样能够控制爱琴海；那样也就没有必要去夺取罗得岛了。两个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我们所争取的目标是土耳其。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土耳其，我们不需要从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调用一兵一卒，一艘舰只或一架飞机，就可以用潜艇和轻型海军部队来控制黑海，大力援助俄国，并且通过一条比北冰洋或波斯湾航

路所需的代价更小、航程更短、运输更加频繁的航线，将物资运给俄国的军队。

这是我每次向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力提出的三个主题，而且毫不踌躇地、毫不后悔地反复说明我的理由。我本来能够说服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受到他的军事顾问的偏见的严重影响，在这场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这些次要的但颇有希望的机会，全部束之高阁了。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于他们顽固的态度还自得其乐，他们认为，“我们总算没让丘吉尔把我们牵扯到巴尔干半岛去。”其实我心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那些在其他方面无法使用的部队，把土耳其拉入战争，并控制爱琴海，是在军事方针上犯了一个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不是用没有采取上述方案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所辩解得了的。

罗斯福总统迁入苏联大使馆的新居不久，斯大林就去拜访他，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根据霍普金斯的传记，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大林，他已同蒋介石讲定要在缅甸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他提醒斯大林，不要向丘吉尔提起印度的问题。斯大林也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容易伤感情的问题。罗斯福说，印度的改革，应该从底层开始。斯大林回答说，“从底层开始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那天早晨，我很坦然地呆在床上，一面治疗我的感冒，一面处理从伦敦发来的许多电报。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四时，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我们事先取得协议，由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

会议，罗斯福也同意这样做。会议开始，他首先致词，讲话非常得体。根据我们的记录，他说：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事前并未为这次会议拟定任何固定的议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他想讨论的任何问题，同时也可以不讨论他不愿讨论的任何问题。在友好的基础上，每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内容却一概不予发表。

我在开场白中，也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我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会。缩短战争，也许已掌握在我们手中；稳操胜券，差不多肯定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人类的幸福和命运，无疑地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说，他很重视我们提到三大国的友谊。三大国确实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机会，他希望大家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罗斯福总统接着便开始了这次讨论，首先从美国的观点，简单地叙述了战争的形势。他先谈到对美国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太平洋战场，因为驻在那里的美国部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配合下担负着主要责任。美国把它大部分的海军和一百万士兵的绝大部分，都集结在太平洋战场。这个战场范围广阔，一艘供应船只，每年只能往返三次，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点。美国采用的是一个消耗敌人实力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日本的船只，不论是军舰或商船，都大量地被击沉，以致新建的船只来不及补充。罗斯福先生接着说明了重新收复缅甸北部的计划。英美军队将同中国军队合作，由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指挥。他谈到我们也讨论了从曼谷对日本的交通线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虽然

我们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把为完成我们主要目标所必需的部队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但是所需兵力仍很可观。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能继续积极参加战争，打通滇缅公路，同时建立阵地，以便我们在德国崩溃以后，能够从这些阵地出发，以最快的速度打败日本。我们希望能在中国获得基地，以便明年袭击东京。

罗斯福总统然后谈到欧洲的形势。英美两国曾举行过多次的会议，也制定了很多的计划。一年半以前，就曾决定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远征，但由于运输和其他困难，还不可能决定进行战役的确定日期。必须在英国集结足够的兵力，不仅用于实际登陆，而且也要用于向内地推进。英吉利海峡是非常讨厌的一部分水域，要在1944年5月1日以前发动远征是不可能的。1944年5月1日是在魁北克会议上确定的日期。他解释说，在历次登陆中，登陆艇总是一个限制因素。如果我们决定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远征，我们就必须完全放弃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如果决定在地中海只进行规模较小的战役，那也要使上述战役耽误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因此，他和我都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听取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意见，看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对苏联最有帮助。许多计划都曾经提出来讨论过——增加我们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土耳其等地的进攻力量。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决定采取哪一个方案。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使英美军队能够尽量减轻苏联军队的负担。

接着，斯大林发言，他欢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但是说目前苏联还不能参加对日战争，因为苏联的军队几乎全部都要用来对付德国。苏联在远东的军队，若用于防御还算够用，但是要发动攻势，那就至少需要超过现在三倍的兵力。他们到

太平洋战场上来同友军会师，必须要在德国崩溃的时候；到那时大家将会并肩作战。

至于欧洲的局势，斯大林说，他要先简单地说明一下苏联进行战争的经验。他们在7月间发动的攻势，德国人事先已经预料到了；但是苏联人在集结了充分的部队和装备以后，就发现发动进攻还是比较容易的。他坦率地承认，他们事先并未料到7月、8月和9月所获得的胜利。德国军队要比人们想象的软弱些。

然后，他详尽地说明了苏联前线最近的形势。在某些战区，战斗已经缓慢下来，在其他一些战区，战斗已经完全停顿了，而在乌克兰以及基辅的西面和南面的战区，在最近三个星期内，主动权已经转到德国人手中了。德国人重新占领了日托米尔，也许还会重新占领科罗斯田。他们的目标是要重新占领基辅。但是总的说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苏联军队的手中。

他说，他要答复英美军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俄国的问题。苏联政府一向认为，意大利战役对于盟国的事业有重大价值，因为它打通了地中海。但是要进攻德国，意大利却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出发点。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两国之间。因此，为了进攻德国而把大量军队集中在意大利，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土耳其是一个比意大利更适于进入德国的地方；但是它离德国的心脏地区又太远了。他相信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是最适于英美军队进攻的地方，当然，德国军队在那里是会拚命抵抗的。……

我说，我们很早就同美国商定，我们将从英吉利海峡攻入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我们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和资源都集中于这个作战计划。……

我还说明，我们没有打算攻入意大利靴形本土的较宽地带，更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攻入德国境内。我们总的计划是首先夺取罗马，占领它北面的飞机场，从而使我们能够轰炸德国南部，然后，我们就能够在比萨-里米尼线附近建立一条战线。在那以后，就应当考虑开辟第三战场的可能性，以便配合，而不是替代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一个可能性是进入法国南部，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象罗斯福总统所建议的，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朝东北向多瑙河进军。

在未来六个月这一段时间中，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关于支援铁托的问题，我们要说的理由很多。他牵制了德国的许多师团，对于盟国的事业所作的贡献，要比米海洛维奇手下的"采特尼克斯"大得多。我们用物资和游击活动来支援他，显然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巴尔干战场是我们能够使敌人力量拉得最远的地区之一。这就使我们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军事人员研究以后，必须作出决定，即如何促使土耳其参战，打通我们经过爱琴海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到达黑海的交通线。只要土耳其参战，我们能用上它的空军基地，那么，我们使用较少的兵力（大约两三个师）和已经驻在这个战场的空军，就能够占领爱琴海中的岛屿。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黑海的港口，运输船队就可以不断往返。目前我们在北方的航线上，只能保持四个运输船认，因为护航舰只必须用于"霸王"作战计划；但是一旦打通了达达尼尔海峡，目前已在地中海的运输船只，就可以川流不息地把供应物资运往苏联的黑海港口。……

在正式会议之间，穿插着罗斯福、斯大林和我在午餐和晚宴上进行的谈话，这些谈话甚至可以认为是更重要的。在这种场合下，大家兴致勃勃，无话不谈，什么事情都听得进去。28

日，星期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设宴招待，我们共有十人或十一人参加，其中包括译员。谈话不久就变得全面而认真起来。

第一天晚上的聚餐后，当我们在室内漫步的时候，我把斯大林请到一张沙发旁边，提议我们谈谈战争胜利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坐了下来。艾登也来参加了。斯大林元帅说："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吧。"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再发动一次新战争。他担心德国国家主义会死灰复燃。凡尔赛会议以后，和平好象已经有了保障，但是德国很快地就卷土重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防止德国发动新战争。他深信德国是会东山再起的。我问他："时间要多久呢？"他答道："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内。"我说一定要使世界至少有五十年的安全。如果这种安全只能维持十五到二十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士兵了。

斯大林认为我们应当考虑限制德国的制造能力。德国人是一个能干的民族，非常勤劳而又富于智谋，他们会很快地复原。我答复说，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控制措施。我要禁止他们的一切民用和军用的航空事业，不准设置总参谋部制度。斯大林问道："你是否还要禁止钟表工厂和家具工厂，以免他们制造炮弹零件呢？德国人曾经制造玩具步枪，教练过几十万人学会射击。"

我说："凡事都不会一劳永逸的。世界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得世界至少能有五十年的安全，办法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禁止重新武装，监督德国工厂，禁止一切航空事业，进行有深远意义的领土方面的变更。这一切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美国和苏

联是否能够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而维持密切的友谊，并且对德国进行监督。只要我们看到了危险，就不要害怕发布命令。”

“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管制，”斯大林说：“但结果却失败了。”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我答复说。“上次的战争还不是今天这样范围的民族战争，而俄国也没有参加和会。这次的情形就不同了。”我总觉得应该孤立并削弱普鲁士；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的而非侵略性的联邦。我认为对待普鲁士应该比对待德国其他部分更为严厉，这样就会影响后者不敢再同前者一道孤注一掷。但不要忘记，这都是战时的心情。

“你说的都很好，不过还不够，”斯大林作了这种评论……

斯大林又问起怎样对待德国的问题。

我答复说，我不反对德国的劳动者，而只是反对它的领袖们和具有危险性的同盟。他说在德国各师部队中也有许多奉命作战的劳动者。他问那些来自劳动阶级（记录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许是指“共产党”）的德国战俘，为什么替希特勒作战，他们回答说他们是执行命令。他便把这些战俘都枪毙了。……

斯大林设晚宴招待我们。参加的人数是严格限制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哈里曼、克拉克·克尔、我和艾登以及我们的译员。在大会的辛劳之后，大家兴高采烈，一再干杯。不久，埃利奥特·罗斯福在门口出现了，他是乘飞机前来此地和他父亲相聚的。有人招呼他进来。于是，他在桌旁就座了。他甚至在我们的谈话中也多嘴多舌，以

后还大肆渲染他所听到的一切，引起了极其严重的误解。据霍普金斯说，斯大林同我开了不少的玩笑，我丝毫都不介意，直到斯大林元帅以温和的语调谈起要对德国人进行惩罚这样一个严肃的、甚至是可怕的问题为止。他说一定要消灭德国的总参谋部。希特勒的强大陆军的全部实力都是依靠五万左右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如果在战争结束时，把这些人都抓来枪毙，德国的军事实力就会根除。我听了这话，就觉得应该这样回答："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即使在战时的狂热下他们允许这样做，但是当这样的暴行初次发生以后，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那些负责人。苏联人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

但是，斯大林，也许只是出于戏谑，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枪毙五万人。"我听了非常生气。我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的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这时，罗斯福总统插嘴了。他提出一项调解的办法，说应该枪毙的，不是五万人，而是四万九千人。毫无疑问，他希望使整个问题让大家一笑了之。艾登也向我作出种种姿势和暗示，要我相信这都不过是笑话。可是，埃利奥特·罗斯福这时却从餐桌那头的座位上站起来讲话，说他如何诚挚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如何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种意见。我受到这种打搅，就起身离开餐桌，走到隔壁那间灯光幽暗的房间里去。我刚到那里，就有人从后面用手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斯大林，他的旁边站着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恳切地说明他们只是开玩笑，根本就没想到什么严重问题。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拿出这种风度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表现出像当时那样吸引人的仪态。虽然在当时和现在，我都不完全相信这是开玩笑而背后没有隐藏着什么认真的意图。我同意回到原来的房间去。当晚的其余时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1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的六十九岁诞辰，全部时间几乎完全用于处理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的事务。罗斯福总统同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而且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中；尽管总统和我以往过从很密，同时我们的重要问题又交织在一起，然而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来，他一直避免单独和我会见——这些情况使我想到要设法对斯大林作一次直接的私人访问。我认为，俄国的领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没有获得真实的印象。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错误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丘吉尔和英国参谋人员有意要尽量地停止执行'霸王'作战计划，因为他们想以进攻巴尔干半岛代替这个计划。"我的责任就是要清除这种双重的误解。

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确切日期，决定于数量较少的登陆艇的调集。这些登陆艇对于在巴尔干半岛进行任何战役，都是不需要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要我们承担进行一次孟加拉湾的战役。如果取消这次战役，那么我所需要的登陆艇便可以够用，也就是说，我拥有的两栖登陆的能力，足以使得两师人在敌人的抗击下，能在意大利或法国南部的海岸一齐登陆，并且还能按照预定计划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我已经向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把日期定在5月，而罗斯福总统也已放弃了5月1日那个特定的日期。这样我就获得了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能说服罗斯福总统暂不履行他对蒋介石的诺言，并且放弃在德黑兰

会上从未提到的孟加拉湾计划，那么，地中海战役以及按期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就都够用了。结果，这些重要的登陆都是在6月6日开始，但这个日期是在后来很晚才决定的，其根据不是我的需要，而是月光和天气的情况。正如我以后要讲到的，当我们回到开罗的时候，我顺利地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使他放弃了孟加拉湾计划。因此，我认为已经办妥了在我看来是必需处理的问题。……

斯大林说，他必须预先指出，红军指望的是我们进攻法国北部的胜利。如果在1944年5月间不进行战争，红军就会以为这一年中根本就不会再进行什么战争了。天气将会变坏，而运输方面将发生困难。如果战争不能进行，那么他不愿使红军失望。失望只能使情绪低落。如果在1944年欧洲的战局不能大大地改观，俄国人就很难维持下去。他们对于战争已经很厌倦了。他担心红军会产生一种孤军作战的情绪。他要弄清“霸王”战役是否会按照许诺的时期进行，原因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他就要采取措施去防止红军产生不良的情绪。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说，只要敌人调往法国的部队不超过美国和英国集结在那里的军队，“霸王”战役当然是会进行的。如果德国人有三四十个师在法国，我认为我们准备渡过海峡的部队就不能坚持下去。我并不害怕登陆，但是担心到了三十天、四十天或五十天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假如红军能拖住敌人，我们在意大利又将敌人牵制住，再加上土耳其可能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斯大林说，进行“霸王”战役的最初步骤，对于红军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如果他知道这次战役将在5月或6月进行的

话，他现在就能够着手作打击德国人的准备了。春天是最好的时机。3月和4月是战事稀疏的时候，在这段期间，他可以集中军队和物资，到5月和6月便能够进行袭击。德国将无力向法国增兵。德国师团仍在不断地调往东方。德国人对于他们的东方战线很担心，因为在这方面没有必须渡过的海峡，也没有必须通过的法国。德国人害怕红军前进。而红军如果看到盟国给以协助，就会向前推进。他问"霸王"战役将在什么时间开始。

我说，在我没有获得罗斯福总统同意以前，不能透露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但在午餐时，将会给他答复。我想他对此会感到满意的。

片刻以后，斯大林元帅和我分别前往罗斯福总统寓所，出席他邀请我们参加的"只有三人"的午宴，此外尚有我们的译员。罗斯福这时告诉斯大林，我们两人都同意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斯大林元帅对我们两人的这种庄严而直接的诺言，显然感到非常欣慰。谈话转到比较轻松的问题，对于这些谈话唯一记录下来的内容，就是有关俄国的海洋出口问题。我一向认为，像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拥有将近两亿人口，竟然在严冬的几个月中不能有效地与一望无际的海洋沟通，这是一件错误的事，而且会引起严重的纠葛。……我说，我希望俄国海军和船队能在海洋上航行，并且对俄国船舶的来访表示欢迎。……

罗斯福总统说，波罗的海应当对各国商船开放。港口应有自由区，基尔运河应当交付托管，而达达尼尔海峡应当对世界贸易开放。斯大林问道，这点是否也适用于俄国的贸易，我们向他保证可以适用。……

在这以前，我们都是在苏联大使馆中开会或聚餐。但我要求第三次宴会由我作东，在英国公使馆举行。这是无需争论的问题。按照字母次序，英国和我本人的名字都列在前面，按照年龄，我又比罗斯福或斯大林年长四、五岁。我们是三国政府中成立最久的一个政府，比其余两国要早几个世纪；我还可以说，我们参战的时间最长，但是我并没有提到这点；最后一点，11月30日是我的生日。这些理由，特别是最后一点理由，是毫无争论余地的。我们的公使主持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招待将近四十位客人，其中不仅有军政领导人，还有他们的某些高级官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治警察，坚持要在斯大林到达以前对英国公使馆进行彻底的搜查，对每扇门和每个坐垫都不放过；大约有五十个俄国武装警察，在他们自己的将军指挥下守在所有的门窗附近。美国的保安人员也到处都是。然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斯大林在卫队严密保护下来到公使馆，显得兴高采烈，坐着轮椅来的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笑逐颜开，表示愉快和亲切。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刻。在我的右边，坐着美国总统，在我的左边坐着俄国的主人。我们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海军和四分之三的空军，能够指挥将近两千万军队，而这些军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仅见的一次最可怕的战争。1940年夏天，我们是孤军作战，除了海军和空军以外，在抵抗德国和意大利那种攻无不克和势不可当的威力时，简直是赤手空拳，因为它们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及其资源。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欣慰。罗斯福先生把一个美丽的波斯瓷瓶当作寿礼赠送给我。虽然这个瓶子在我归国途中被打得粉碎，但

后来却精巧地修好了，成为我的一件珍藏。……

……我们在德黑兰举行的长时间的和艰巨的会谈就要结束了。关于军事方面的结论，大体上决定了战争的未来过程。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定于5月举行，当然这还要以潮汐和月光的情况为转移。俄国将以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来支援这次进攻。关于派遣盟国驻在意大利的一部分军队去袭击法国南部海岸的提议，我从一开始便很赞同。这个计划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但是由于美国人和俄国人都表示赞同，这就使我们比较容易地获得为保证意大利战役取得胜利以及攻陷罗马所必需的登陆艇，而如果没有这些登陆艇，上述战役是会失败的。我对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个提议当然更感兴趣，这就是从意大利经过伊斯的利亚半岛和的里雅斯特向右推进，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到达维也纳。所有这一切都是五、六个月以后的事。只要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的活动能力，不致由于将他们数量不多但是必不可少的登陆艇弄走而变得瘫痪，那么随着战争的总的形势发展，还是有充分的时间作出最后的选择的。许多两栖作战或半两栖作战的计划，都有实现的可能。我希望放弃在孟加拉湾的从海上展开攻势的计划，而正如下一章将要谈到的，这一点证明是正确的。我很高兴地看到，好几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案仍然保留着。我们将重新作出巨大的努力来促使土耳其参战，而在土耳其参战以后，爱琴海将发生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引起黑海的形势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希望后来却落空了。当我们在充满友谊和为当前的目标而团结的气氛中分别时，纵观整个军事形势，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政治形势则比较模糊，难以料定。很明显，政局要以尚待进行的巨大战役的结局为转移，而在那以后，又要以每个盟国

在获得胜利时的情绪为转移。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在德黑兰会议上，对俄国人在获得胜利和消除了它的一切危险后所持的态度有所疑惧，并根据这种疑惧来制订他们的计划，那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答允在推翻希特勒和打垮他的军队后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这是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情。未来的希望在于最迅速地结束战争，并建立一个旨在防止另一次战争的世界机构，这些是以三大国的联合力量作为基础，而这三大国的领袖们已经在会议桌旁频频握手，以示友谊了。

我们为芬兰减轻了赔款的负担，这个办法大体上至今还在执行。新波兰的东方和西方边界大致上已经划定。东面以寇松线(尚待解释)为界，而西南以奥得河线为界，看来这片地方将为受尽苦难的波兰民族提供一个真正的和永久性的国土。当时，东、西尼斯河(它们汇合为奥得河)的问题尚未发生。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以激烈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立即宣布英国只坚持东部的支流。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立场。

关于战胜国如何处理德国这个首要问题，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只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给予初步研究”，而且正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当然是非常初步的”研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这时正在同强大的纳粹国家进行着一场可怕的战争。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战争的一切风险，而同盟国之间的战友情谊以及对于共同敌人的复仇情绪，支配了我们的全部思想。罗斯福总统关于把德国瓜分为五个自治的国家以及把两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地区交给联合国家托管的这一设想中的计划，对于斯大林元帅来说，当然要比我提出的关于孤立普鲁士和成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或成立一个南部德国和一个

多瑙河联邦的建议，容易接受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对自己在德黑兰时我们所处的那种环境下提出这一问题，一点也不后悔。

我们大家都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普鲁士有它自己的伟大历史。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同它签订一个严肃而体面的和约，同时，也可重新建立一个大致按照奥匈帝国轮廓的、具有现代形式的国家。关于奥匈帝国，人们说得好："如果它不存在的话，也会把它创造出来。"这里将形成一个广大的地区，有了这个地区，要比通过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法，能更早地实现和平及友谊。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联合的欧洲，从而使所有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为它们饱经忧患的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我不认为我对于这一广大的领域的想法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在事实的领域中，我们已经遇到了重大的和灾难性的变化。波兰的疆界已经名存实亡，……德国确是被分割了；但只是令人厌恶地被分成各个军事占领区。关于这个悲剧，我们只能说，这是不能持久的。

——以上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
《紧缩包围圈》(1952年，初版)

25. 诺曼底登陆、解放巴黎、德国的飞弹和火箭

我们为了历史上最大一次两栖作战所进行的长年累月的准备和计划，终于在进攻发起日——1944年6月6日——告成。登陆前夕，庞大的舰队和护航船舰乘敌人不觉，由怀特岛沿着已扫过雷的海峡水道驶达诺曼底海岸。皇家空军的重轰炸机袭击了敌人构筑在混凝土掩体内的海防大炮，投下了炸弹五千二百吨。美国空军于破晓时紧接着以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飞临战场，轰炸岸上的其他防御工事。在6月6日的二十四小时内，盟国空军出动了一万四千六百架次。我们的空中优势如此之大，以至白天敌人出动来对付我方进攻滩头阵地的飞机只有一百架次左右。三个空降师从午夜开始降落，英国第六空降师在卡昂城东北降落，夺取处于该城与海之间的那条河流上面的桥头堡，同时两个美国空降师在卡朗坦北面降落，协助海上登陆部队对海滩进攻，并堵截敌人后备军进入科汤坦半岛。虽然在有些地点这些空降师比较原计划散布得广了一些，但是各项目标都达到了。

拂晓时分，大小船只开始陆续进入预定阵地，准备进攻，

当时的场面俨然是一个检阅式。敌人的直接抵抗仅限于一些鱼雷艇的攻击，击沉了一艘挪威驱逐舰。甚至当我方海军开始炮击的时候，从敌方海防炮台发出的反击也是盲目的、无效的。毫无疑问，我方已经完成了一次战术上的奇袭。登陆艇和支援舰艇载着步兵、坦克、自动推进火炮以及各式各样的武器和清除海滩上障碍物的工兵爆破队等等，都编组向海滩推进，其中也有D。D。坦克(两栖坦克)，这种坦克还是初次在战斗中大规模地出现。由于前一天的气候不好，海面仍然是汹涌澎湃，所以好多两栖坦克中途沉没了。

驱逐舰和登陆艇上安装着的大炮与火箭炮对滩头防御工事连续不断地猛轰，同时，在海中较远处的那些战列舰和巡洋舰压住了敌方海防炮台的炮火。地面上的抵抗是微弱的，直到首批登陆艇距离海岸只有一英里远的时候，敌人迫击炮和机关枪的火力才增强起来。拍岸的浪潮以及半露在水面的障碍物和水雷使登陆艇冒很大的危险，有许多登陆艇在卸下所载的军队以后就毁了，但是部队继续前进。

最前面的步兵刚一登岸，就向他们的目标猛冲，除有一处外，各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在贝叶西北的“奥马哈”海滩，美国第五军遭遇到激烈的抵抗。由于不幸的巧合，这一防区最近才由一个满员的德国师接防戒备。我们的盟军激战终日，一直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立足点；直到7日，损失了几千兵力之后，才能向内地挺进。虽然我们未得到我们原来所谋取的一切，特别是卡昂城仍牢固地掌握在敌人手中，但是在开头两天的突击中获得的进展，大家认为是很令人满意的。

来自比斯开湾各港的一批德国潜艇冒着一切危险，露在海面上高速行驶，力图阻碍我们这次的进攻。对此我们已做了充

分的准备了。英吉利海峡的西岸入口处有大批飞机保卫着，构成了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海军舰队则在它们后面掩护登陆。这些德国潜艇受到了我方防御部队的猛烈炮火的袭击，遭到了惨败。在具有决定性的头四天中，六艘潜艇被我空军击沉，六艘受到损伤。它们丝毫未能影响进攻的护航船舰，那些船舰继续朝着目标前进，损失极为轻微。之后，德国的潜艇就比较谨慎了，但并不比过去有更大的成就。……

我认为应该把情况告知斯大林。……他立即回电，其中包含一项值得欢迎的非常重要的消息。“……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斯大林又在6月11日来电说：

> 显然，原定计划中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能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和它类比的事业。如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当时已经接掌最高指挥权的艾森豪威尔，决心避免为争夺巴黎而战。……他决定包围这个首都，迫使驻防军队投降或逃遁。8月20日，行动的时刻到了。当时，佩顿① 已在芒特附近

① 美国第三集团军军长，又译“巴顿”将军（General G·S. Patton）。

渡过了塞纳河，他的右翼部队也到达了枫丹白露。法国的地下军队起义了。警察也罢工了。警察总局已为爱国分子所占领。法国抵抗运动的一名军官带了一些关系重大的报告，来到佩顿的总部，星期三（8月23日）早晨，这些报告就已送到了勒芒，递交艾森豪威尔。

勒克莱尔将军[1]率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隶属于佩顿麾下，于8月1日在诺曼底登陆，并在进攻中发挥了光荣的作用。戴高乐于同日抵达，盟军最高统帅向他作了保证，说只要时候到了——就象早已协商同意的那样——勒克莱尔的部队是会首先开进巴黎的。当天傍晚，首都内发生巷战的消息，促使艾森豪威尔决定行动，勒克莱尔也奉命进军。布雷德利[2]于晚间7时15分将这些指示交给这位法国司令官，当时，他这一师人驻扎在阿尔让当。8月23日发出的这些作战命令开门见山地用了这几个字："任务（1）攻占巴黎……"

勒克莱尔致戴高乐报告称："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1940年的局面正在倒过来重演着——敌方情况十分纷乱，各部队无不惊慌失措。"这位将军决定大胆行动，与其征服德军的集中力量，毋宁避开它。第一批几个分遣队于8月24日从朗布依埃出发，向巴黎推进，这批队伍是前一天从诺曼底开到朗布依埃的。由比约特上校（1940年5月间阵亡的法国第一集团军群司令官的儿子）领导的主攻从奥尔良出发。当晚，一支坦克先头部队就到达奥尔良门了，9时22分整，开进市政府前面的广场。这一师的主力队伍准备好在次日开入首都。第二天一早，比约特率领的几个装甲纵队占领了巴黎城对面的塞纳河两岸。到了

① "自由法国"的陆军少将（Major-General Leclerc）。
② 美国第一集团军军长（General Omar Bradley）。

下午，德国司令官冯·肖利茨设在默里斯大厦的总部就被包围了，肖利茨向一位法国中尉投降后，已经解交比约特。正在此时，勒克莱尔也赶到了，并在蒙特巴那斯车站建立指挥部，当日下午，又移至警察总局的所在地。四时左右，肖利茨被解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从敦刻尔克到乍得湖又回到了老家所走的一条道路的尽头！勒克莱尔以低沉的语调说出了他的思想，他说："这回可行啦！"之后，他用德语向这个手下败将揭示了他自己的身份。经过一段简短、不客气的谈话之后，就签订了驻防军投降书，接着由抵抗运动所属部队和正规部队逐一占领敌方其余一些支撑点。

巴黎城到处沉浸在狂欢的示威游行之中。人们向德国战俘啐唾沫，把通敌的奸细拖着游街，而解放队伍则备受款待。戴高乐将军就在这时出现在这一个推延已久的胜利场面上。他于下午五时抵达圣多米尼克道，并在陆军部地址设立了总部。两小时之后，他在抵抗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暨勒克莱尔将军和朱安将军陪同下，以自由法国领导人的身份在市政府首次出现于兴高采烈的群众面前。到处充满着自发的狂热的热情。翌日下午（8月26日），戴高乐举行了正式入城式，徒步从爱丽舍田园大街走到协和广场，之后，又在一长列汽车随从下，到了圣母院。那时，有一些暗藏的通敌奸细从教堂内外两面开枪射击，人群当即走散，但在片刻慌乱之后，庄严的巴黎解放奉献仪式一直进行到底。

到了8月30日，我军就分头从许多地点渡过了塞纳河。敌人损失极为浩大：士兵四十万人，其中一半是俘虏，坦克一千三百部、车辆两万部，野战炮一千五百门。德国第七集团军以及所有奉调前往支援的几个师全部被我方打得溃不成军。盟军

从滩头阵地出击曾经由于天气恶劣和希特勒的错误决定而有所迟延。然而，那次战役一旦结束，诸事进行得就都非常顺利。而且我们到达塞纳河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六天。有人批评说英军在诺曼底战线上行动迟缓，而且以后的几个阶段，美军进展迅速，也似乎说明了他们的成就比我们的大。因此，有必要再度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全盘计划是以英军战线作为枢纽，而将敌方后备力量引到这方面去，借以帮助美军的迂回运动。英军第二集团军在它的原定作战计划中，把自己的目标规定为："保卫美军的侧翼，而由美军部队攻取瑟堡、昂热、南特以及布列塔尼各港口"。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经过艰苦的战斗，这一目标是完成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完全了解他的英国战友们的工作；他在正式报告中写道："如果没有英、加军队在争夺卡昂城和法莱兹两地的残酷凶猛的战斗中作出重大牺牲，那么，盟国军队也就永远不可能在其他地区取得惊人进展。"

6月13日清晨，恰好是进攻发起日后一星期，四架无人驾驶的飞机窜过我国海岸。这是德军为要对我方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作出反应，而于进攻发起日紧急发出命令，以致造成时机未熟的后果。……从6月15日晚间起，德军就认真地开始了他们的"报复"战役。在二十四小时内，有二百个以上的飞弹飞来袭击我们，接着在其后五个星期之内，又飞来了三千多个。

希特勒把我们后来称之为飞弹的这个东西命名为V_1号，因为他希望——是有些理由的——这只不过是德国研究工作所能提供的一系列恐怖武器中的第一种。这种飞弹的发动机是一个设计新颖而精巧的喷气机，由于它的发动机发出尖叫声，所以，不久之后，伦敦人就称之为"无线电操纵无人轰炸机"，

或“喷射推进式炸弹”。它的飞行时速达四百英里，高度约三千英尺，携带炸药重约一吨；弹身凭一个磁性指南针以校正方向，而射程则用一具小型推进器加以控制，弹体在空中飞行，就使推进器转动起来。当推进器转动次数相当于自发射场所至伦敦的距离时，飞弹的操纵装置即告松开，向地面俯冲。其爆炸所造成的损害尤属严重，因为弹体总是在钻入地面之前即已爆炸。

这种新的袭击方式给伦敦市民造成的困难，甚至远较1940年和1941年间空袭时为甚。人们更是长期感到悬虑不安和紧张。天亮了固然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阴云天气也不见得使他们能够安逸些。晚间回家，一个人总不知道他会发现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而他的妻子整日在家独守，或同子女们一起，也无从肯定他是否会安返家门。飞弹的这种盲目而不具人格的性质，使得地面上的人感到束手无策。他几乎无力应付这个局面，根本就看不到他能够击中的敌人……

第二种威胁又相逼而来了。这就是：在十二个月以前，我们就已极其注意的远程火箭，又称V_2武器。……火箭是予人深刻印象的一项技术上的成就。它的推力是由于酒精和液态氧在喷射器内燃烧，而发展出来的，每分钟内消费酒精几达四吨，液态氧约五吨。把这些燃料按需要的程度压入喷射器内，要有一具近一千匹马力的特制泵。而泵本身则系凭一具利用过氧化氢所推动的涡轮机来运转的。火箭的控制，是通过回旋器；或者通过喷射口后面的大型石墨瞄准板上的无线电信号来调整排气的方向，从而起导航的作用。它先直线上升约六英里，然后，自动控制器把它掉转角度，在四十五度的斜度内，用逐渐增加的速度使之向上飞升。当速度加速至足以达到所需的射程时，进

一步的控制是将注入喷射器内的燃料截断，于是弹体即循一高度抛物线向前飞进，可达到的高度约五十英里，而在距离发射地点约二百英里之处落下。其最高速度每小时约四千英里，所以整个飞程所需时间是不会超过三四分钟的。……在我方军队解放了大部分火箭所由发射的地点海牙以前的七个月中，敌方向英国发射的火箭约一千三百支，……有五百支击中了伦敦。……我们感谢我方军队在德军准备就绪发射之前，就已经把火箭逐回到它的射程极限的地点。我方战斗机和战术轰炸机持续不断地骚扰海牙附近的敌方发射场。我方还准备好，如果德方使用无线电控制火箭的话，我们就对他们的无线电控制加以干扰，……

这就是希特勒多少个月以来，顽固地寄以厚望的新式武器，以及这些武器为英国当局凭其先见之明，各军兵种的技术，以及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予以挫败的故事经过；英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再度用自己的行动，给“大伦敦”增添上一层更大的自豪感。

26. 俄国人的胜利和华沙的殉难

俄国夏季攻势是一篇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能作扼要的记述。

这次进攻以对芬兰人采取辅助攻势为序幕。芬兰人在拉多加湖到波罗的海之间加深并加固了原先的曼纳海姆防线，建成难以攻克的防御系统。但这时苏军的素质和装备与1940年在此地作战时已大不相同，因此经过十二天剧烈战斗后，就突破防线，于6月21日攻克维堡。当天又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扫荡拉多加湖北岸。月底，苏军已将敌军驱回本土，并恢复从列宁格勒通往我们北极运输船队终点站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交通。芬兰军队在德军支持下曾作短暂抵抗，但毕竟抵挡不住，终于在8月25日请求休战。

6月23日开始进攻维切布斯克与戈梅利之间的德军防线。在这两个地方以及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等许多城镇和乡村，德军已建立了坚固的阵地，布置了环形防御工事；但苏军涌入这些城镇之间的空隙地带时，这些阵地便接连受到包围，并被肃清。一周内苏军已突进八十英里；接着又抓紧战机，乘胜前进，7月6日攻克明斯克，将溃退的敌军封锁在一条仓促组成的防线上。这条防线自维尔纳向南伸展直达普里皮亚特沼泽

地区；从那里，德军又被其势锐不可挡的汹涌而至的苏军迅速一扫而光。7月底，红军开进科夫诺和格罗德诺，抵达涅曼河。在五周内挺进二百五十英里后，苏军暂时停止行进，在此地休整。德军损失惨重，二十五个师覆灭，同样数量的部队被围困于库尔兰德。仅7月17日一天，就有五万七千名德军俘虏通过莫斯科——谁也不晓得他们将被押向何方？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南面的苏军，也干得毫不逊色，战果辉煌。7月13日，他们在科韦耳与斯坦尼斯拉夫之间的战线上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十天后，德军全线崩溃，俄国人又向西挺进一百二十英里，抵达桑河畔的雅罗斯瓦夫。斯坦尼斯拉夫、伦贝格和普热米什尔在苏军大举进攻中沦为孤城，不久即被攻克。俄国人乘胜前进，于7月30日在散多梅尔以南横渡维斯杜拉河。这时苏军由于需要补给，暂停前进。横渡维斯杜拉河被华沙的波兰抵抗运动看作是发动那不幸的华沙起义的信号。……

俄国人在这次大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远不止此。他们的胜利一直扩展到南面的罗马尼亚。直到8月以后，从切尔诺夫策到黑海之间的德军防线还一直封锁着通往罗马尼亚及其普洛耶什蒂油田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道路；但由于德军调兵增援其远在北面行将陷落的防线，这条防线就削弱了，接着在8月22日苏军发动的猛烈攻击之下，防线即告迅速崩溃。俄国人由于有海上登陆部队的支援，迅速打垮敌军。德军损失十六个师。8月23日，年青的米凯尔国王率领心腹在布加勒斯特发动政变，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罗军全体官兵一致追随国王举事。在苏军到达之前的三天之内，德军有的被解除武装，有的越过北面边界撤退。到9月1日，德军已全部撤离布加勒斯特。罗军瓦解，罗马尼亚被占领。罗马尼亚政府投降。保加利

亚虽在最后一刻曾企图对德宣战，结果还是被征服了。俄军挥师西进，长驱直入多瑙河流域，越过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到达匈牙利边境；与此同时，多瑙河南岸的俄军左翼也陈兵南斯拉夫边境，为大军向西推进作好准备。这次向西推进将在适当时机把他们带到维也纳去。

7月下旬俄国人的夏季攻势使他们的部队推进到维斯杜拉河。各方面的报告都表明波兰在最近的将来将落入俄国人手中。忠于伦敦政府的波兰地下军领导人现在必须决定何时举行反对德国人的总暴动，以加速解放他们的祖国，阻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华沙本地进行一系列的死守作战。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授权波军司令员博尔·科马罗夫斯基将军与他的文职顾问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宣布总起义。这时候看来时机恰好。7月20日传来了谋刺希特勒的消息，紧跟着又是盟军猛冲过诺曼底海滩的新闻。7月22日左右波兰人截获了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无线电报，下令全线撤退到维斯杜拉河西岸。同一天，俄国军队渡了河，他们的前哨向华沙方向推进。毫无疑问，一场总崩溃看起来行将发生了。……

博尔将军因此决定发动大起义来解放这个城市。他手下大约有四万人马，储备了够打七天到十天的粮食与弹药。维斯杜拉河对岸的俄国军队的炮声现在已经可以听见了。苏联空军从刚占领的靠近首都的各机场起飞轰炸华沙的德军，最近的机场只需二十分钟即能飞到。同时在波兰东部，一个共产党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成立，俄国人宣称解放了的国土必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苏联的广播电台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敦促波兰人别再那么小心翼翼，要发动一场反对德军的总起义。7月29

日，也即起义开始前三天，莫斯科电台播发了一篇波兰共产党人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说解放的炮声已在耳边响起，号召他们象1939年那样参加到对德斗争的战斗中去，现在是决战的时候了。“华沙，这个未曾屈膝投降、抗战到底的城市，行动时刻到来了。”广播指出德国人设置防守据点进行抵抗的计划会给城市逐步造成破坏。广播在结尾提醒居民们：“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华沙逐巷逐舍的战斗等等，最终解放的时刻将加速到来，而同胞们的生命会得到拯救。”

7月31日傍晚，华沙地下军司令部得悉苏军坦克已在华沙东面突入德军防线。德国军用无线电台宣布：“今天俄国部队自东南方向华沙发动总攻。”俄国部队现在位于不到十英里远的地点。在首都的波兰地下军司令部命令在次日下午五点举行总起义。博尔将军这样描绘发生的一切：“钟敲五点，千万面窗户猛然一闪而开，一阵弹雨从四面八方落在过路的德军头上，射向他们的建筑物与行进的队列。一眨眼，留在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消失了。从一幢幢房子的门里，我们的弟兄一涌而出，投入战斗。十五分钟内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各种交通都停了。就在德军前线的紧后方，华沙，作为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轮车辐集的巨大交通中心来说不再存在了。解放这个城市的战斗在进行中。”

消息于次日传到伦敦，我们急切地等着更多的消息。苏联电台却保持缄默，俄国空军的活动也停止了。8月4日，德军从还在他们手中逼及市区与郊区的各个支撑点，发动了进攻。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通知我们空运补给十万火急。起义者面对着匆忙拼凑起来的德军五个师的反击。赫尔曼·戈林师已从

意大利开来了，另外还有两师党卫军随后也很快抵达。

我因之致电斯大林(1944年8月4日)："应波兰地下军的紧急请求，如气候允许，我方将立即向华沙西南部空投约六十吨的装备与军火。据报，在这一地带波兰人反对德军的起义正处于炽烈的战斗之中。他们又说也曾吁请俄方支援，因为似乎近在咫尺。波兰人正遭受德军一个半师的进攻。奉告此一情况可能有助于阁下采取行动。"

复电迅速而又冷酷。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4年8月5日)："我认为波兰人告知阁下的情报极为浮夸，难予置信。……波兰'国内军'仅由几个小分队组成，……我不能设想，这样的小分队怎能攻占华沙。"……

波兰总理米科莱契克自7月30日起即在莫斯科，试图跟苏联政府达成某种协议，因为当时苏联政府已承认波兰共产党民族解放委员会是该国未来的掌权者。这些谈判在华沙起义的头几天一直进行着。米科莱契克每天收到博尔将军的电报要求军火、反坦克武器以及红军方面的支援。这时俄国人坚持要波兰人同意关于战后波兰的边界并成立联合政府。8月9日跟斯大林举行了最后一次毫无成果的会谈。……

14日我从意大利致电艾登，……"如果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给抛弃的暗示流传开来，这将会使俄国人大为恼火，但他们很容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来避免麻烦。这真是莫名其妙，当地下军起义时，俄国军队竟然中断对华沙的进攻并后撤一段距离。……我想最好由阁下通过莫洛托夫致函斯大林，提及目前来自多方面的暗示，要求俄国人竭尽所能提供援助。……"

8月16日晚上，维辛斯基召见美国驻苏大使，解释说他希

望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宣读了下述令人惊诧的声明："苏联政府当然不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军火，因为这是英美两国的事情。但苏联政府断然拒绝美国或英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军火后在苏联领土着陆，因为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

8月20日，我和罗斯福总统向斯大林元帅发出由总统起草的联名呼吁："我们正在考虑，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弃置不顾的话，世界舆论会说些什么。我们深信我们三人都应竭力从那里拯救尽可能多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向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空投救急补给品和弹药，不然，你们能否同意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进行空投。我们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是极端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答复：斯大林元帅致首相与罗斯福总统（1944年8月22日）……"关于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的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这些家伙利用华沙居民的诚意驱使许多几乎手无寸铁的居民跟德国的枪炮、坦克与飞机作战。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局面，日复一日情况不是有利于波兰人解放华沙，而有利于希特勒匪徒惨无人道地屠杀华沙居民。……"

我曾经指望美国人会支持我们采取断然措施。9月1日我接见了从莫斯科回来的波兰总理米科莱契克。我不能给予什么安慰。他告诉我打算向卢布林委员会提出一项政治解决的办法，让他们在联合政府中得到十四个席位。这些建议在火线上经过在华沙的波兰地下军的代表们辩论，得到一致通过。一年后参加这次讨论的大部分人都在莫斯科的苏联法庭以"叛国罪"受审。

9月4日晚内阁开会时，尽管我有点发烧，我认为议题是如此重要，还是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地下会议室。为了许多起不愉快的事件，我们曾聚集在一起。我记不得过去有过什么时候，所有的阁员都表示了这样深沉的愤怒，不管是属于保守党、工党、自由党全都一样。我本来很想说："我们派出的飞机在华沙空投补给以后将在贵国领土着陆，如果你们不以礼相待，我们即刻起就停止派出所有护航运输队。"但是今后岁月里读到这几页的读者必须明白每个人都必须把在世界范围进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命运牢记心头；有时为了一个总的目标，就得作可怕的甚至卑躬屈膝的屈服。因之，我并不建议采取这个激烈行动。当时这种行动可能会有效，因为跟我们打交道的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并不受感情的影响而是工于心计。他们不打算让波兰精神重新在华沙发扬光大。他们的打算是寄托在卢布林委员会上。那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波兰。也许只有在俄国人大举挺进的紧要关头，切断护航运输队，他们心里才会有可能象普通老百姓通常要考虑名誉、人道和合乎常情的诚意那样来估量问题。……

波兰人饱受六星期的苦难之后，9月10日克里姆林宫看来改变了策略。那天下午，苏军大炮的炮弹开始落在华沙东郊，苏联飞机又出现在城市上空。波兰共产党部队在苏联命令下，打到首都的边缘。从9月14日开始苏联空军空投补给，但降落伞很少打开，许多装箱的空投物资碰碎了，无法加以利用。次日，俄军占领了普拉加郊区，但不再前进。他们希望非共产党的波兰人遭受全歼，但又给人们保持着这样一种感觉，认为他们要援救波兰人。同时，德国人逐房逐舍地前进，肃清全城波兰人的反抗中心，悲惨的命运落到居民身上。许多人被德寇运走。博尔将军致苏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呼吁没有得到答

复。饥馑盛行。

我想得到美国支援的努力导致一项单独的但是规模巨大的行动。9月18日一百零四架重型轰炸机飞临首都上空，空投补给。但已太迟了。10月2日晚，米科莱契克总理来告诉我：华沙的波兰军队快要向德军投降了。这个英雄城市最后几次广播之一在伦敦收听到了：

> 这是道道地地的老实话。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平作出裁决吧，希望他因之惩治那些犯罪者。
>
> 您的英雄们是一些士兵，他们用左轮手枪、汽油瓶作为武器跟坦克、飞机、大炮搏斗。您的英雄们是那些妇女，她们在弹雨纷飞的炮火下护理伤员，传送信件，她们在炸得倾塌的地下室搞炊事，喂养小孩，供应成人。她们安慰垂死者，减轻他们的痛苦。您的英雄们是这些孩童，他们在还在冒烟的废墟间安静地嬉戏。这些就是华沙的人民。
>
> 能够鼓舞起这样广泛的英雄行为的民族是不朽的，因为死者可以说已经战胜了；而生者将继续战斗，取得胜利，并再一次证明：只要波兰人活着，波兰就存在下去。

这些话语是令人难忘的。华沙的战斗持续了六十多天。波兰地下军四万男女中大约一万五千名牺牲了。百万人口中有二十万遭殃。德军为了镇压起义付出了一万人丧生、七千人失踪、九千人受伤的代价。这个比例说明了战斗具有短兵相接肉搏的

特点。

三个月后，当俄国人入城时，除了疮痍满目的街道与无人收埋的尸体外，他们一无所获。这就是他们对波兰的解放，现在那儿归他们统治着。但这不会是故事的终结。

27. 十月在莫斯科

……一临近秋天，东欧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紧张了。我觉得有必要再次亲自同斯大林见面，自从德黑兰会议以来我没再见过他，尽管发生过华沙的悲剧，可是我感到“霸王”作战行动的成功开始后，我和他又有了新的联系。俄国军队此时正在巴尔干战场穷追猛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已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正因为伟大同盟的胜利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俄国的野心也就很自然随之滋长起来。在炮声隆隆的俄国战线背后，共产主义抬头了，俄国是救世主，共产主义就是她带来的福音。

我从未觉得过去我们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系，需要我们付出任何特殊的牺牲，但波兰和希腊的命运却唤起我们强烈的感情。为了波兰，我们参加了大战；为了希腊，我们曾经作出艰苦的努力。这两国的政府都流亡在伦敦，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光复自己的国家，只要这确是他们的人民所真正希望的。总的说来，这些感情也为美国所共有，然而他们对共产主义影响的高涨却领会得十分迟钝，这种影响从前是渗透进来的，现在又随着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大军长驱直入而到来。我希望利用同苏联的较好关系，在东西方之间揭开的这些新问

题上达成圆满的解决。

除了这些事关整个中欧的重大问题之外，世界组织的问题，现在也正在我们大家的脑海中萦回。8月到10月间，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那里，已经召开了一个冗长的会议，会上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制定了现在众所周知的维持世界和平的方案。他们倡议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要参加一个称为联合国的新组织。该组织由一个大会和一个安全理事会组成。大会要讨论和研究如何促进和保持世界和平，并向安全理事会建议如何实行。每个国家都得为大会的会员国，并各有投票权，然而大会只能提出建议和通过宣言；它并无执行权。安全理事会要调查联合国之间的任何争端，并且实际上可以在无法和平解决时采取武力解决争端。这与国际联盟迥然不同。根据这种新方案，大会可以讨论和建议，只有理事会才能够采取行动。理事会的自由裁决不受“侵略”定义的限制，也不受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武力、什么时候可以实行制裁的条例的限制。

关于谁应成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以及他们应如何行使其重大权力的问题，曾经进行过大量的讨论。最后确定下来：“三大国”和中国应为常任理事国，到适当的时候，法国也可以参加进来，大会应另行选出六个国家参加该理事会，一次任期定为两年。剩下的是表决权问题。大会的每个会员国虽然都有投票权，但只能研究和提出建议，就是这个，也很少有实质性的价值。确定安全理事会内部的表决办法更是困难重重，讨论中已经暴露出了三大盟国之间的不少分歧，这可以在本章往下叙述时看到。克里姆林宫不打算加入一个国际组织，在那里他们将会被一大批小国家的多数票所压倒，尽管这些国家不能够影响战争的进程，可是它们在胜利时肯定会要求平等的地位。我

确信我们只有在由于共同敌人把我们联合起来成为伙伴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同俄国达成妥善的解决。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是注定灭亡的了，然而在希特勒之后，又将是什么呢？……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没有达成协议便结束了。可是我感到迫切需要见见斯大林，我一向认为可以和他象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普通人那样谈一谈。……(1944年9月30日)斯大林对我发来了盛情的邀请。……

我们在10月9日下午飞抵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和许多俄国高级人员用全套礼仪盛情迎接。这次我们住在莫斯科市内，备受关照，起居舒适。我住在一幢设备完善的精选的小房子里，安东尼① 住在附近的另一幢。我们对让我们单独在一起膳宿这一点感到满意。当天夜里十点钟，我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第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艾登和我，由伯尔斯少校和巴甫洛夫担任翻译。大家同意邀请波兰总理、外交部长罗默先生和格腊布斯基先生，一位胡子灰白、颇有魅力和才干的老院士，立即前来莫斯科。为此我电告米科莱契克先生，说我们希望他和他的朋友前来与苏联政府和我们，以及卢布林波兰委员会进行讨论。我明确指出，不肯前来参加会谈就等于是对我们的建议的断然拒绝，这将使我们不再承担对伦敦波兰政府的责任。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

① 艾登。

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与美国一致）…90%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此时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给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就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致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

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我也提起了德国问题，会上同意由我们的两位外长以及哈里曼先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10月11日晚上斯大林来到英国大使馆参加宴会。这是英国大使首次成功地做出这样的安排。一切戒备都由警察担任。我的一位客人维辛斯基先生在走过那些在阶梯上的俄国秘密警察的武装卫兵时说：“显然，红军又取得了另一个胜利，把英国大使馆都占领了。”我们在一种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直至凌晨两三点钟。除开其他问题外我们还讨论了下一届的英国大选。斯大林说他深信大选的结果是保守党得胜。在政治舞台上，真是知己不易，知人更难。……

10月13日傍晚五点钟，我们在名叫斯皮里多诺夫卡的苏联国家迎宾馆开会，听取米科莱契克和他的同僚们阐明立场。谈判是为下一步会议作准备的，英美的代表将在会上与卢布林波兰人会见。我力劝米科莱契克考虑两件事，就是事实上接受寇松线①，包括居民互为交换，和同卢布林波兰委员会进行友好商讨，以便成立一个统一的波兰。我说，变化就要发生，但要是统一的问题能在当前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实现，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因此我要求波兰人当天晚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艾登先生和我将听候他们的意见。与波兰委员会接触，接受寇松线作为初步的协议，以便于提交和平大会讨论，这对他们来说是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议重建波兰国家。1920年7月12日，苏俄红军击退波兰干涉军后，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代表协约国照会苏俄建议停火，停火线大体上就是巴黎和会决议中规定的俄波临时分界线，即沿着格罗德诺、布列斯特、赫鲁别舒夫、普热米什尔，直到喀尔巴阡山一线（Curzon Line）。

最重要的。

同一天晚上十点钟，我们会见了所谓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马上就看透，卢布林波兰人把自己的台词练习、预演得太认真了，甚至连俄国人也显然觉得过分做作。譬如那个领头的贝鲁特先生就讲出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代表波兰提出要求，利沃夫必须属于俄国。这是波兰人民的意志。"当这些话从波兰语译成英语和俄语时，我瞧了瞧斯大林，看到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在会意地一眨一眨，似乎是说："我们苏联教得不差吧！"另一个卢布林头头奥索布卡-莫腊斯基作了一通冗长的发言，同样令人感到沉闷窒息。艾登先生对这三个卢布林波兰人的印象真是坏透了。

整个会议开了六个多钟头，可是收效甚微。……

日子一天天过去，唯独苏波事务这个脓疮少有改善。波兰人准备承认寇松线"作为俄国与波兰的分界线"。俄国则坚持要使用"作为俄国与波兰双方国境线的基础"这些字眼。双方都不让步。米科莱契克宣称他会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而斯大林在我和他单独进行两小时又一刻钟的谈话结束时说，在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当中，赞成对待米科莱契克"温和"一点的只有他和莫洛托夫两人。我确信在这个背景里面存在着党和军队两方面的强大压力。

斯大林认为国境线问题如果未经取得一致意见，就不好着手组织波兰统一政府。倘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他十分乐意让米科莱契克来领导新政府。我自己认为，在讨论波兰政府与卢布林波兰人合并的问题上，一定会碰到同样棘手的困难，卢布林的代表一直给我们留下极坏的印象。因此我对斯大林说，他们"只是苏联意志的表达而已"。他们无疑地怀有统治波兰的

野心，因而充当了吉斯林①一类的角色。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两个波兰代表团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我深深感到我和外交大臣有责任为苏波问题的解决拟出一些提案。即使是只把寇松线强加于波兰都会引起责难。

在其他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苏联政府决心在消灭希特勒之后攻击日本这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整个斗争的缩短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所作的安排，我确信是再好不过了。这些安排再配合上军事行动方面的成功，现在在拯救希腊上必然是有效的。同时，鉴于铁托的行为和俄国指挥的俄国部队与保加利亚部队开到并支援他的东翼的情况，我确信我们协同奉行对南斯拉夫五十比五十的政策，对解除我们的困难是最好的。

无庸置疑，在我们的狭小范围里，我们进行了两国之间从未有过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和诚心诚意的交谈。斯大林几次表示了个人的敬意，这些我觉得确实是真诚的。可是我更加确信的是：他绝非只是个人说了算。就象我回国时对我的同僚们所说的："骑马者的后面，总坐着个阴沉而忧虑的人。"②

① 希特勒德国在挪威的代理人（Vidkun Quisling）。
② 罗马诗人荷拉斯的诗句。

28. 我和罗斯福、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

……(1945年)1月5日苏联人竟然违背英美两国的愿望，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的临时政府。……总统深信再度举行"三方"会议的必要，并且曾花了若干时间来讨论这个会议的安排。通常关于会议地点的辩论也跟着发生。总统说，"如果斯大林不能设法和我们在地中海会晤，我准备到克里米亚去，在雅尔塔开会，此地似乎是黑海上最适宜的地点，岸上既有最好的登陆设施，而且飞行的条件也最有利。……"

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4时1刻开始的。……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

这时斯大林问起关于怎样支解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或几个的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如果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我们应当保存他的政府或是拒绝跟它打交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曾经建议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斯大林也表示过同意。而我却反而踌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伐利亚两个部分，而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放在国际共管之下。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德国应当支解，但是实施的办法过于复杂，不能在五六天之内解决。对于历史方面的、人种研究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查考，并且需要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作长时间的复查，该委员会要对各种建议进行研究，然后提出意见。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鲁士该怎样处置？哪些领土应当归于波兰和苏联？莱因河流域和鲁尔及萨尔大工业区应该由谁来管？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国政府也将慎重考虑两个大盟国的态度。应该立即设立一个机构来研究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应该先听取它的报告。

当时我对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莱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跟任何战犯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是德国人所能推举出来的唯一人选，那么我们只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杀掉或失踪，而另外一班子人会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三大国应当立即进行商讨，决定是否值得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应该把已经准备好的投降条件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值得，战争就要继续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国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

罗斯福先生建议由我们的外长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制定出一个支解德国的确切计划。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

其他问题也予以讨论，但没有得到解决。总统问是否应该让法国人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占领区。我们都同意应当在英美占领区划分一部分给他们，并由外长们考虑对这个地区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随后斯大林请麦斯基说明俄国所拟定的关于责成德国赔款和拆除其军火工业的计划。我说上次战争的经验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从德国索取象麦斯基建议单独付给俄国的那样大的数目。英国也同样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外投资，并面临着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偿付我们所需的粮食进口的问题。我怀疑这些负担能否由德国赔款而得到切实的减轻。其他国家也受到损失，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德国陷于饥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可以存心袖手旁观，见危不救，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吗？或者我们应当倡议赈济德国人，而如果要这样做，由谁来付款？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我回答说，你要叫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最后我们同意将俄国的提案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审查，该委员会应在莫斯科秘密开会。

之后，我们对下一天的会议作了安排，同时对即将进行讨论的两个主题也作了考虑，就是有关世界安全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计划问题和波兰问题。

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来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三千英里的欧洲的军队上。因此美国的占领将以两年为限。可怕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

2月6日在我们第二次开会时，我为此而竭力主张法国人帮助挑起这样一个重担。划一个占领区给法国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德国肯定是要再次复兴的，总有一天美国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国人不得不跟德国人贴邻而居。一个强大的法国不

仅对欧洲是重要的，而且对美国也同样重要。只有法国才能取消它海峡沿岸的火箭发射场，并且建立起一支军队来遏制德国人。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谋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总统说在美国舆论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提议或与之相似的提议，他的国家似乎更有可能为组织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组织在美国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的，敦巴顿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里十分重要的表决权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协议。

1944年12月5日，总统曾向斯大林和我提过新建议。建议内容如下：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任何一项决议，须在十一个理事国中取得七个理事国的投票赞同方能付之实行。这在程序细节上是够充分的了。至于一切较大事情，如接纳新会员国进组织或开除出组织，制止和解决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除非“四大国”一致同意，否则安理会是没有实权的。如果美国、苏联、英国或中国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拒绝同意和制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否决权。

罗斯福先生的建议含有另一个精辟独到之处。争端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解决。这样的话，也要取得七票，而且常任理事会——就是说，“四大国”——都得同意才行。但是如果安理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包括“四大国”）牵涉在那个争端里面，该理事国只能有讨论权而不能有表决权。这样的计划是斯退丁纽斯先生在2月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斯大林说他将对这个建议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不过

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白。他说他担心的是，虽然三大国今天是同盟国，谁也不会进行侵略，但是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后，这三个领导人会隐退消失，新的一代要起来掌权，他们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因此会忘记我们所经受过的一切。他又说，“我们大家都愿意保持和平至少五十年之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我们自己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德国的威胁就不致十分严重。为此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如何保持我们将来的团结，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中国和法国也在内)能够维持一条统一的战线。必须制定出一种制度来防止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余下的细节问题很快就解决了。2月8日下午我们再次集会的时候，一致同意支持俄国人请求让两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意世界组织的第一次大会于4月25日(星期三)召开。邀请出席的仅限于3月1日以前对共同敌人宣战的国家，或已经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我同意斯大林的说法，这样做意味着邀请了某些没有积极参战而一直观望着直到看出谁胜谁负之后才参战的国家，然而，这样做大大有助于使德国丧气。……

雅尔塔会议的八次全体会议中，至少有七次讨论到波兰，……在会议结束时发出的公报包括了关于波兰的联合宣言，其文如下：

1945年2月11日

我们前来参加克里米亚会议，决心解决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我们重申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要看到建立起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商讨的结果，我们对于一个可以得到三大国

承认的全国统一的新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条件，已经意见一致。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如下：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可能建立的基础更广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因此应该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①和克拉克·克尔爵士②受命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今临时政府的成员并与波兰国内外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会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当保证：尽速根据普遍选举与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其候选人。

当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已经依照上述原则正式成立时，目前和波兰现在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以及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要和新的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各该政府根据大使的报告，将经常获悉波兰的情形。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应依照寇松线，但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

---

① 美国驻莫斯科公使，职业外交家（Averell Harriman）。
② 英国驻苏大使（Sir Archibald Clark Kerr）。

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我们在雅尔塔的正式讨论之中不曾谈到远东。我知道美国人打算向俄国人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我们在德黑兰曾经一般地谈到这件事。在1944年12月斯大林也曾向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先生提出关于俄国在战后对这些地区的一些权利要求的若干详细的建议。美国的军事当局估计在德国投降之后还要十八个月才能打败日本。俄国的帮助可以减轻美国的严重伤亡。这时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还处于计划的阶段。麦克阿瑟将军在雅尔塔会议的第二日才进入马尼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性爆炸要再等五个月才实现。如果俄国仍旧保持中立，那么在满洲的大量日本军队就能够投入保卫日本本土的作战。

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曼先生带着这个问题在2月8日跟斯大林讨论俄国在远东的领土要求。除了一个俄国的译员之外，唯一在场的是国务院的查尔斯·E·波伦先生，他也当翻译。两天以后又继续会谈，俄国的条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被接受了。哈里曼先生1951年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曾提到这些作为交换的条件。俄国方面则允诺在德国投降后二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

当天下午，在跟斯大林的私下谈话中，我问他关于俄国对远东的愿望。他说他们要有一个象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美国人认为那些港口最好由国际共管。但是俄国人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我回答道，我们将欢迎俄国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二天，2月11日，他们给我看前一天下午由总统和斯大林草拟的协定，我

就代表英国政府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在苏联政府跟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之前，一直是保密的，斯大林则肯定同意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支持。这件事至此告一段落，直到我们在波茨坦重行开会以前不久才又提起。……

2月15日清早我们就乘上我的飞机到埃及去。……就在当天上午，那条美国巡洋舰"昆西"号驶进了亚历山大港。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我上船去和总统作一次后来竟成永诀的谈话。后来我们聚在他舱室里吃了一次家常便饭。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有萨拉和伦道夫①，罗斯福先生的女儿伯蒂格尔夫人，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和怀南特先生。总统似乎沉静而虚弱。我觉得他的寿命已经不长了。我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们作了恳挚的告别。当天下午总统一行人员就由海道回国。……2月19日我飞回英国。……2月27日中午，我请求下院批准克里米亚会议的协定。……

议会中一般的反应，是无条件地支持我们在克里米亚会议中所抱的态度。不过关于我们对波兰人的义务方面存在强烈的道义上的感情，因为波兰人在德国人手中吃了那么大的苦头，而我们为了他们的缘故，最后一着是参加了战争，约有三十人的一群议员对这件事非常激动，以致他们有些人发言反对我的建议。有一种苦恼的感觉，深恐我们会看到一个英勇的民族遭到奴役。艾登先生支持了我。在第二天进行分组表决时，我们得到了压倒的多数，但是有二十五个议员，其中多数是保守党，投票反对政府，而且还有十一个政府成员弃权。城乡计划部的政务次官斯特劳斯先生提出了辞职。

---

① 丘吉尔的女儿和儿子。

对于那些负责处理战时或危急期间中大事的人们，不容许他们只谈为善良人民所同意的一般大原则。他们必须逐日作出具体的决定。他们必须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否则怎能维持联合一致的行动呢？在德国人被击败以后，对于曾尽全力鼓舞俄国努力作战并主张和我们受难如此深重的伟大同盟国保持密切接触的人们，加以谴责是容易的。当德国人还有二三百个师在战线上，如果我们跟俄国人发生了争吵，试问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寄予希望的种种设想不久即告落空。然而，这些设想是当时仅仅可能的设想。

29. 罗斯福逝世、德国投降

4月12日，星期四，罗斯福总统突然在佐治亚温泉逝世，享年六十三岁。那天下午，正当人家给他画像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从此不省人事，隔了几个钟头就逝世了。

在前数章中已经指出，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其错综复杂性上可与战争中种种最严重的危险相提并论。的确，罗斯福可以说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我于13日，星期五清晨获悉此噩耗时，感到身上仿佛受了一次打击。我跟这位卓越人物的关系，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漫长而充满惊涛骇浪般的岁月中，曾经起过极其巨大的作用。现在这些关系已经告终，一种深沉而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感把我压倒了。我到下议院去，原定十一点钟开会。我只用短短几句话建议：为了悼念我们卓越的朋友，我们应该立即休会。这种因一个外国元首逝世而采取的空前的做法，是符合全体议员一致的愿望的，他们仅开了八分钟的会，便缓缓地鱼贯走出会议室。

一切国家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悼念罗斯福。一面面镶着黑边的旗帜挂在莫斯科。当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时候，他们起立默哀。日本首相向失去自己领袖的美国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把

"美国人今天的有利地位"归功于这位领袖。德国无线电中所说的话却正相反，"罗斯福将在历史中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由于他的煽动才使现在的战争蔓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终于做到使他的最大的敌手，布尔什维克苏联得势的这样一个总统。"……

4月17日，星期二，当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提议向英王陛下奏明议会深切的哀悼和他们对于罗斯福夫人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应当由各党领袖发言来支持这样一个提议，但是当时有一种自发的感觉，认为应该由我单独代表下议院发言。我今天找不到比我当时在那个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说的更为恰当的话。

我说，"我和这位伟人的友谊是在这个战争中开始和成熟起来的。我们今天向他的功绩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后，我曾经见过他，但只有几分钟。1939年9月，我一进海军部，他就给我发来电报请我就有关海军或其它问题跟他直接通信，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不论何时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许可后，就这样做了。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对海战有浓厚的兴趣，就提供他一连串关于我们海军事务和各种作战行动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的战斗①，这次行动照亮了战争中第一个黯淡的冬天。

"当我担任了首相，而战争在极度可怖的激烈状态中爆发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死存亡还在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在最亲密和最愉快的交谊之中跟总统互通电报。这一情况

① 1939年12月13日，英国舰队在南大西洋普拉特河口击伤德舰"施佩伯爵"号，并把它困在中立国的港口，17日该舰被迫自行凿沉，舰长朗斯多夫于19日自杀。

在全世界斗争的整个升沉起伏之间，始终继续保持下来，直到上星期四我接到他最后的电报为止。这些电报表明，他在处理疑难复杂的问题上所一贯具有的明确的见解和活力，并没有衰退。我可以指出，这样的通信（在美国参战以后当然大为激增），包括我们之间来往的电报，计达一千七百件以上。其中有许多长篇的电报，大多数是处理那些在其他阶段上得不到正式解决，必须由政府首脑一级来讨论的比较困难的问题。除了这些通信以外，还得加上我们的九个会议——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华盛顿，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一次在德黑兰，二次在魁北克和最后一次在雅尔塔。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天亲密的个人接触，其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住在白宫里，或在海德公园他的家中，或在他称为香格里拉的蓝山城中他的别墅山庄里。

“我钦佩他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领导人。我极其信赖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见识，我对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个人的尊重——我应该称它为情谊。他爱他的祖国，尊重它的宪法，和他判断变化不定的舆论倾向的能力，这些始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还得加上他那颗跳动不已的宽宏大量的心，这颗心经常因见到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压迫的种种现象而激起愤怒，采取行动。如今这颗心永远停止跳动了，这的确是一个损失，人类一个痛苦的损失。

“罗斯福总统的病痛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在这许多年的动乱和风暴之中，竟能克服肉体上的病痛，这真是一个奇迹。象他那样深受病魔折磨而残废的人，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会试图投入一种体力和脑力都很紧张，以及艰苦而永无休止的政治论争的生活中去。千万人中没有一个敢于尝试，一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得到成功，他不仅进入这个领域，不仅在里边积极活

动，而且成为那个场面里不容置辩的主人翁。在这样一种精神战胜肉体、意志战胜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个高贵的妇女，就是他的忠诚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并驾齐驱，今天下议院充分倾泻出对于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没有疑问，总统预见到笼罩着战前世界的巨大危险。比起大西洋两岸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来，更具先见之明。他用全力促进美国和平时期舆论可以接受的预防性的军事准备。当不和睦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他的同情寄托在哪一边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对于法国的陷落和本岛以外大多数人认为大不列颠行将覆灭一事，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虽然他对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感到痛苦，不仅因为欧洲之故，而且也因为一旦我们被击溃或者在德国奴役下苟延残喘，那时美国本身也将暴露在严重的危险之下。当我们处于孤独的紧急时期，英国所忍受的痛苦使他和他的无数同胞对我国人民充满着最热烈的情感。在1940—1941年那个严峻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决心要用猛烈的空军闪电战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们正和我们中任何人一样，感同身受，或许还要更强烈些，因为想象中的痛苦时常要比实际的更为厉害。毫无疑问，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国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们所遭受的大火灾更难熄灭。还有，那时，虽然有韦维尔将军的胜仗（确实是由于我国给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国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担忧，认为德国在1941年春季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定会向我们侵犯。在一月里总统派了现已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英国来，他虽然是总统的政敌和反对党的候选人，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跟他有同样的见解。威

尔基先生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朗费罗的几行著名的诗句：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
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想出了一种援助的非常措施，叫做租借法。这种办法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中最无私和最慷慨的财政法案。它的效果是大大地增强了英国的战斗力，并且为所有的战争努力服务，使我们好象变得人数多了，力量大了。那年秋天，我在战争期间第一次跟总统会见于纽芬兰的阿根夏，我们共同起草了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宣言。我相信它将长久成为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人民的指南。

“在这整个时间里，日本人埋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极端秘密之中，准备着他们的背信弃义和贪婪的勾当。当我们下一次在华盛顿会见的时候，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对美国宣战，而我们两国已经在并肩作战了。从那时起，我们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与挫折失望，但总是不断扩大战果，在陆上和海上前进。这里我无需多谈在西半球发生的一系列大战，更不必说世界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另一场大战了。我也无需谈到我们跟我们的伟大盟邦俄国在德黑兰所制定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现在已经完全付诸实施了。

“但是在雅尔塔我注意到总统有病痛。他的动人的微笑，

他的愉快而潇洒的风度，并没有消失，可是他的面色异常苍白，形容消瘦，眼神往往有惘然若失之感。我在亚历山大港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忧虑之感，觉得他的健康和体力正在衰落下去。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变他那不屈不挠的责任感。直到临终，他面对着他的无数任务毫不畏缩……当死亡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做了他一生应做的那一份工作。就象有句谚语说的，他以身殉职，而且我们可以更恰切地说他就象那些跟我们的战士一起在世界各地并肩战斗、把任务执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员殉身战场一样。他的死真是值得钦佩的！他已经把他的国家从最大的危险和最沉重的苦难中挽救过来。胜利的确定而可靠的光芒已经投射在他的身上。

“在和平的日子里，他曾经扩大和稳定了美国的生活和团结的基础。在战争中，他把伟大的共和国的实力、威力和荣誉提高到历史上任何国家所从未达到的高度。美国用左手来领导得胜的盟军进入德国的心脏，又用右手在地球的另一边，势如破竹地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且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把船只、军火、补给品和各种食品大规模地援助它的大小盟国……

“但是，如果他不是把一生这么许多的精力用于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事业，使之增添上一层光彩……从而将永久为世人所认识的话，那么，这一切充其量也不过是世俗的权势和威严罢了。他身后留下了一批坚决和能干的人，来处理庞大的美国战争机器中无数互相关联的各个部门。他留下一个继承者，这个人以坚定的步伐和充分的信心出来担当任务，以期达到预定的目的。我們惟有这样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失去了历来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美国朋友，也是把援助和安慰从新

世界带到旧世界来的最伟大的自由战士。”……

我开头时情不自禁地想飞去参加葬礼，而且我已经关照准备好一架飞机。哈利法克斯伯爵来电报说，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对于我可能要去的想法，大为感动，并对我认为去了将大有好处的看法，都热烈赞成。后来杜鲁门又请他转告，他个人将如何重视尽可能早日和我见面的机会，他认为如果我有意要去的话，吊丧期间进行访问将是一个自然而方便的机会。杜鲁门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礼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作两三天的会谈。

但是十分繁忙的公务压在我的身上，使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最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我只好顺从了朋友们的愿望。……

后来我回顾此事时，惋惜当初不曾采纳新总统的建议。我过去没有见过他，我觉得有许多事情要是能跟他面谈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如果能分成几天谈，不匆忙，也不拘束。我觉得奇怪的是，特别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内，罗斯福不曾使他的副总统和可能的继承人充分熟悉事情的全过程，也没有叫他参预正在执行的决议。这显得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极大的不利。亲历其境，躬预其事，同事过境迁之后靠阅读卷宗文件去了解情况，两者之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艾登先生是我的同僚，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因此任何时刻都能够把我的全部领导工作接过去，尽管目下我的健康很好，精力也极充沛。但是美国的副总统是从原来知道得很少和权力较小的地位，一跃而掌握最高的权力。杜鲁门先生在这个战争的高潮时刻怎样能够了解和估量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呢？从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说明他是一个刚毅而无所畏惧的人，能够采取最大的决策。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的地位是极端困难的，这

使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卓越的才能。……

杜鲁门总统采取的与我们有关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就是着手处理仅仅四十八小时以前罗斯福逝世时那样情况的波兰问题。他建议由我们两人向斯大林发出一个联合声明。……在举行就职典礼和前任丧葬仪式之中，他能够这样迅速地把这件事担当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他承认斯大林的态度不太有希望，但是觉得我们应该“再作一次尝试”，因此他建议告诉斯大林，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们毫无疑问已经同意邀请华沙政府的三个领袖到莫斯科会商，并且向他保证我们从来没有否认他们在组织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中，将担当重要的职务。我们的大使们并没有要求从波兰国内外邀请无限数目的波兰人的那种权利。真正的问题在于华沙政府是否对于各个参加会商的候选人可以有否决权。据我们看来，雅尔塔协定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权利。……

……波兰人失踪的事件现在需要把它记载下来，虽然这一记载似乎比一般的叙述要追溯得稍早一些。在1945年3月初，俄国政治警察邀请波兰的地下工作者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讨依照雅尔塔协定的方针组织一个统一的波兰政府。邀请时还附有一个对于个人安全的书面保证，并且有过谅解，就是谈判如果成功，可以让这一方的当事人到伦敦去跟波兰流亡政府洽谈。3月27日接替博尔-科马罗夫斯基将军指挥地下军的利奥波德·奥库利茨基将军、其他两个领袖和一个翻译员在华沙市郊跟一个苏联代表会见。第二天又有代表波兰各主要党派的十一个领袖加入他们。此外有一个波兰领袖原已为俄国人所控制。没有一个人从约定会见的地方回来。4月6日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一个声明，叙述这一阴险的插曲的概况。波

兰地下工作者中最受人尊敬的代表们已经失踪，下落不明，虽然有俄国官员所发给的正式通行证。议会里有人提出询问，此后又纷纷传说在目前红军占领区内有枪毙地方上波兰领袖的事，特别是在波兰东部谢德尔策有这种插曲。直到5月4日莫洛托夫才在旧金山承认说，这些人正在俄国拘留之中，次日俄国的一个官方通讯社宣称他们因被控“在红军后方搞牵制性破坏活动”一案正在等候审判。

5月18日斯大林公开否认这些被捕的波兰领袖有过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事，而且坚持说，他们只不过是“牵制性破坏活动分子”，将受到“一种类似英国保卫国土法案的法律”处理。苏联政府拒绝改变这立场。关于这些被诱捕的受害者此后就毫无所闻，一直到6月18日对他们被控的案件开审。审理是按照共产党用的方式进行的。犯人被控犯颠覆、搞恐怖活动和间谍等罪名。除一个人外，其他被告或全部或部分承认被指控的罪状。十三个人被判罪，分别处以四个月到十年的有期徒刑，三个人被开释。实际上这是用司法手段清洗了曾经对希特勒进行过如此英勇作战的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士兵则早已葬身在华沙的废墟之中。……

正当旧金山会议在愉快地规划一个自由、文明和团结的未来世界的基础之际，正当伟大同盟的各国人民因战胜希特勒和纳粹暴政而欢欣鼓舞之时，我的内心却因迅速展现在我的视野之前的新的和更大的危险而感到忧郁。其次还有对大选的忧虑，无论其结果怎样，势必导致全国的分裂而削弱它在这一段期间里的态度，那时候，我们在这一场正义战争中所赢得的一切，可能都丢失了。看起来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杜鲁门和我应该尽早会晤，不应有任何耽误。……

……我们看到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扣人心弦的。希特勒的德国已经完蛋，他本人也即将灭亡。俄国人正在柏林作战。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大部分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俄国跟西方盟国的整个关系是处于变动之中。每一个涉及将来的问题在我们之间都悬而未决。雅尔塔的协议和谅解，当时是那样的，现在已经被胜利的克里姆林宫所撕毁而甩在一边。新的危险，或许象我们所已经克服过的一样可怕，已经幽然出现并瞪着四分五裂的受折磨的世界。

我对于这些不祥的发展所抱的忧虑，即使在总统逝世以前也已经明显。据我们看来，他本人也觉得不安和烦恼。关于他对莫洛托夫就伯尔尼事件的指摘感到愤慨一事已见前文①。尽管有艾森豪威尔军队胜利前进，杜鲁门总统在4月的后半月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危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尽力要给美国政府一个印象，就是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当东西方盟军的前线互相接近而夹攻德军的时候，我们西方国家的军队不久将大大地越过我们占领区的界线。

……如果其它的协议也得到尊重的话，我绝不会主张取消我们关于议定的占领区的诺言。然而事实渐渐使我相信，在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或者甚至于撤退以前，我们应该设法跟斯大林当面会谈以便确能达到一个有关整个现状的协议。如果我们

① 德国驻意大利纳粹党卫军头子沃尔夫于3月8日亲自到瑞士与美国情报机关负责人艾伦·杜勒斯接触，探索投降条件。3月12日，英美方面及时地将此事通知苏联政府，但仍未消除苏联政府的怀疑（担心德国与英美单独媾和）。3月22日，莫洛托夫向英国大使递交了一封信，对英美加以指责。这件事使罗斯福极为愤慨，4月5日他致电斯大林，称之为“卑劣的诬蔑”，并表示“深恶痛绝”。

严格信守着一切协议，而苏联人却把一切能得到的东西都抓在手上，丝毫不顾他们所承担的义务，那真将引起一场灾难。

到了4月中已经很明显，希特勒的德国很快就要被彻底打垮了。进攻的军队长驱直入，彼此之间相隔的距离一天天地缩小。希特勒曾经寻思要在什么地方作最后的抵抗。迟至4月20日，他还想离开柏林而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南方堡垒”去。这一天他召开了有主要的纳粹首领参加的一次会议。当德国人的东西两线有即将被盟军先头部队的挺进切成两半的危险时，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司令部。海军上将邓尼茨将负责管理北方的军事和民政，特别要负责把东方的两百万的难民带回到德国本土来。在南方将由凯塞林将军指挥残余的德军。一旦柏林陷落，这些措施就立即付诸实行。

两天以后，4月22日，希特勒作了最后的和断然的决定，留在柏林直到最后一天。这个首都不久被俄国人完全包围起来，元首失去了控制事态的一切能力。给他留下要做的事只是如何在危城的废墟中安排自己的死法。他对留在他身边的纳粹首领宣布他要死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自从20日的会议以后都已离开，一心盘算着怎样进行和平谈判。已经到南方去的戈林以为希特勒既然决意留在柏林，实际上已经退位，因此请求确认他应正式行使元首继承人的权力。但所得的答复是立即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希特勒总部里最后的景象在别的书中已有很详细的描绘。在他的统治集团的头面人物中，一直跟他在一起到底的，只有戈培尔和博尔曼。俄国军队当时正在柏林进行巷战。4月29日清早希特勒立下了遗嘱。那一天，以在总理官邸底下的地下避

弹室里照常进行例行公事开始。墨索里尼的死讯传来了①。时机来得这样冷酷无情地巧合。30日，希特勒安静地和他的随员一起吃午饭，吃过了饭他跟在场的那些人握了手，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寝室去休息。到了三点半钟，听到一声枪响，他的随从人员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躺在沙发上，身旁有一支左轮手枪。他是对准了自己的嘴巴开枪的。埃娃·布劳恩死在他的身边。在最后这几天里他跟她秘密结了婚。她是服毒死的。两人的尸体就在庭院里焚化。希特勒的火葬堆，伴以越来越大的俄国人的枪炮声，构成第三帝国阴惨的结束。

遗留下来的首领开了一次最后的会议。他们作了跟俄国人谈判的最后一分钟的尝试，但是朱可夫要求无条件投降。博尔曼试图冲过俄国人的前线，从此失踪，不知所终。戈培尔毒死了他的六个孩子，然后命令纳粹党先锋队警卫员把他自己和妻子开枪打死。希特勒总部里的其他人员落在俄国人的手里。

那天晚上，邓尼茨海军上将在霍尔施泰因的总部里收到一封电报："元首任命你，帝国海军上将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应根据形势需要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博尔曼。"

混乱开始了。邓尼茨曾经和希姆莱进行过接触，他原认为柏林如果陷落，希姆莱将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而现在最高的责任在未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落在他的身上，这样他就面对着部署投降的任务。……

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是在5月7日上午二点四十一分

① 1945年4月25日墨索里尼在逃往瑞士的途中被游击队捕获，第二天与他的情妇贝塔西女士一起被处决。他俩的尸体被运往米兰，用肉钩挂在洛雷托广场上。

由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同约德尔将军签订的，当时在场作证的有法国和俄国的军官。因此所有战斗在5月8日午夜全面停止了。正式由德国最高统帅部追认的仪式，是在俄国人的安排之下，于5月9日清早，在柏林举行的。空军上将特德代表艾森豪威尔，朱可夫元帅代表俄国人，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分别签了字。

30. 波茨坦：我的记载的结束

当我在欢呼的伦敦人群中走动时，看到饱尝忧患的人们，正沉浸在得来不易的欢乐之中，我心中却充满着对未来的忧虑和许多困惑。希特勒的危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考验和艰难，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已经消失在光荣的火焰之中。五年多来，他们曾与之搏斗过的强大敌人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三个强大的战胜国未了的工作只不过是建立由一个世界机构来保障的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遣送士兵还乡同他们的盼望已久的亲人团聚，从此进入一个繁荣与进步的黄金时代。的确，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想的，不多不少恰就是这些。

然而那幅图景还有它的另一面。日本还没有被征服。原子弹还没有制成。世界还处在混乱之中。由于有了共同危险这一条主要纽带曾把伟大盟国联合起来，但是这条纽带已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了。而在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的威胁。但是与之相抗衡的伙伴关系尚未形成。在国内，战时内阁赖以岿然不动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力量，曾经战胜过这么许多风暴，在灿烂阳光下却不再能维持下去了。那么，我们又怎样能够达成最后的解决，而只有它才能使这场斗争的艰辛痛苦得到补偿？我心上丢不开

那种恐惧，就是民主国家的胜利的军队即将解散，而真正的和最严峻的考验还在我们的前头。这一切我过去全见过。我记起将近三十年以前的欢乐的一天，那时我曾经同我的妻子驱车从军需部通过和今天相仿佛的热情沸腾的人群前往唐宁街，去向首相祝贺。那时候，像现在一样，我对于世界整个局势有一个理解，但是那时候至少没有足以使我们需要惧怕的强大的军队。

我的主要考虑是三大国开一个会议，并且希望杜鲁门总统在赴会的路上会先到伦敦来一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不相同的意见，正从华盛顿的各个有势力的方面冲着新总统提出。以前在雅尔塔我们注意到的那种心情和看法一直有所加强。有人主张，美国必须留神别让它自己被引入到任何反苏的行动中去。他们认为，这种反苏行动将激起英国的野心而在欧洲造成一条新的鸿沟。另一方面，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美国站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充当一个友好的调停者，甚或是一个仲裁者，力图缩小这两个国家之间关于波兰或奥地利的分歧，使问题得到解决，达成安定和幸福的和平，从而使美国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日本。这些意见对于杜鲁门的压力一定是十分强大的。从他的历史上著名的行动表现来看，他的本能反应可能与此迥不相同。我当然无法衡量在我们最亲密的同盟者的神经中枢上起着作用的是哪些力量，虽然不久以后我对于它们有所意识。我只觉得拥有巨大声势的苏维埃和俄国帝国主义正在朝着那些无能为力的国土席卷而前。……

就在这几天里，我又发给杜鲁门总统一份可以称为有关“铁幕”的电报。在我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公开文件中，我宁愿以这一份电报供人们对我作出判断。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5月12日

我对于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我得悉美国在欧洲的空军已有一半开始向太平洋战区移动。报纸上充满了美军从欧洲大批开拔的消息。我们的军队，按照以前所拟定的办法，也很可能要有很大的裁减。加拿大军队当然要走。法国人力量薄弱，不足以应付。谁都能看出，我们在大陆上的武装力量，除留下少量部队用来管制德国以外，将在很短的时间以内消失。

2. 同时俄国方面将会有些什么情况？我始终为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努力，但是，象你一样，我感到深切忧虑，因为他们对雅尔塔决定作了曲解，他们对波兰的态度，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除希腊以外，占有压倒的势力，他们在维也纳所造成的困难，他们把俄国的实力同在他们控制或占领之下的地区结合起来，再配合上他们在其他许多的国家里所施展的共产党伎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广大地区里长时间维持着的庞大的军事实力。一二年后，那时英美的军队已经散掉，法国军队还不能大规模地建立起来，我们可能只有寥寥几个师，大部分是法国师，而俄国人可以随意保持现役的二三百个师，试问那时的局面将会怎样？

3. 他们将在前沿地区拉下一道铁幕。我们不知道这个铁幕后面将发生些什么事情。在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一线以东的整个地区看样子毫无疑问，不久将完全落到他们手中。此外，还得加上美军所攻占的在艾森纳赫和易北河之间的一大片地区，据我料想，当美军一撤回，这一地区在几个星期之内，又将被俄军占领。当俄军大举向欧洲

中心前进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必须作好一切安排以防止又有一大批德国人向西逃走。到那时候，铁幕又将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即使不是完全地）降下来。这样，将有一个好几百英里宽的俄国占领区的广阔地带，把我们同波兰隔开。

4. 同时，我们的人民方集中注意力严厉惩办已被摧毁、残破并已屈服的德国，这就给了俄国人以可乘之机，如果他们想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水域，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进来。

5. 的确，在我们军队极度削减，或退到占领区内以前，现在就十分需要同俄国达成一项谅解或者看看我们跟它的关系究竟如何。要做到这一层，只有亲自会面。我对于你的意见和指教将非常感激。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看法，即认为俄国的行径将是无可非议的，那无疑提供了最方便的解决办法。总而言之，在我们的力量还没有消散之前跟俄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6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我，斯大林元帅已同意于7月15日左右在柏林举行一个他所称为的"三人"会议。我立即答复说，我将很高兴地带着英国代表团到柏林去，但是我认为杜鲁门所提议的7月15日，对于要求我们彼此注意的紧迫问题来说，是太晚了，而且我们如果让我们个人或一国的需要而妨碍及早开会的话，我们还将使全世界的希望和团结受到损害。我复电中有这样的话，"我虽然处于火热的竞选运动之中，我并不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可以与我们三人之间的会议比拟。如果6月15日不可能，为什么不在7月1日、2日、3日？"杜鲁

门先生答称，经过充分考虑后，就他来说，7月15日是最早的了，并且说正在依此进行布置。斯大林是不愿意把会期提前的。……

我曾经说过，我多么强烈地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首脑，在危机时期中，应该有一个副手能参与一切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就能够因此保持连续性。在战时的议会中，保守党占了大多数，我一向把艾登先生看成我的继承人，并且在国王召见的时候，我曾照这样禀明了国王。但是现在已进行一个新议会的选举，而结果尚未揭晓。因此我觉得理应邀请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先生出席波茨坦会议，使他能熟悉一切事务而不致脱节。……

我所以一直着急要趁早开会，主要理由当然是因美军急于要从战争中所曾经赢到手的界线撤退到占领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中去。关于占领区协定的来历，以及赞成和反对把它们改变的论据，在前面有一章已有记述①。我所担忧的是华盛顿有一天会作出决定，让出这一大片地区——长达四百英里，最深处达一百二十英里。这里面拥有好几百万的德国人和捷克人。放弃它就将在我们同波兰领土之间设置一道很广阔的鸿沟，并将实际上结束我们影响它的命运的能力。俄国对我们的态度的改变，雅尔塔所达成的谅解经常遭到的破坏，它向丹麦的挺进幸被蒙哥马利及时的行动所挫败，对于奥地利的侵占，以及铁托元帅

① 关于由主要盟国占领德国一事曾经研究了很长时间。1943年夏季，英国内阁委员会曾向欧洲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苏联大使古谢夫和美国大使怀南特）提出全部占领德国的建议，即：英军占西北部、美军占南部和西南部、俄军占东部，柏林由三国共管。在雅尔塔会议上，这个方案（在1944年9月英美两国的魁北克会议上达成了肯定的协议）成为与苏联讨论的基础。

在的里雅斯特的威胁性的压力，这一切，在我和我的顾问们看来，已经造成与两年前规定占领区时完全不同的形势。的确，所有这些问题应该通盘考虑，而现在正是时候了。此时英美两国的陆军和空军，在未因复员及对日作战的压倒的要求而离散之前，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前是作出总解决的最后时机。……1945年6月4日我在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说："对于美军撤退到中部地区我们的占领线内，因而使苏联的力量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放下一道铁幕使我们和东边的一切事物隔开，我认为是深可忧虑的事。如果非撤不可的话，我希望这次的撤退能和将真正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的许多重大事情连带一起解决。"……

6月12日总统答复了我6月4日的去电。他说，关于占领德国的三方协定，是罗斯福总统同我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之后才批准了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为了促使其他问题的解决而推迟美国部队从苏联占领区的撤出。……

这件事在我心头敲了一下丧钟。但是我除顺从外，没有选择的余地。……7月1日，美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撤到指定给他们的占领区里去，有大量的难民跟着走。苏联从此在欧洲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这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一块里程碑。……

杜鲁门总统和我在同一天到达柏林。我急于会见这一位当权人物，我跟他虽然意见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通过书信的来往……，我已同他建立起真诚的关系。我在到达的那天上午就去访问他，他的愉快的、一丝不苟的、神采奕奕的风度和明朗的决断能力给我深刻的印象。

7月16日总统和我分别在柏林巡视一周。城内只是断垣残壁，一片混乱。我们的访问，当然事先没有发出通知。街道上

也只有寻常的行路人。在总理官邸前面的广场上却有相当多的人聚集在那里。当我步出汽车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除了一个老年人，摇头有不豫之色外，其他人都欢呼起来。他们投降之后，我的仇恨心已经随之消失。而且看到他们的表示，他们憔悴的形容和褴褛的衣服使我深受感动。随后我们走进了总理官邸。在残破的走廊和厅堂里走了好一阵。然后我们的俄国向导把我们带到希特勒的防空地下室里去。我走到底层，看到他和他的情妇在那里自杀的房间。当我们回到上面的时候，他们指给我们看他的尸体被焚化的地方。我们听到那时所能得到的关于最后几场情景的最好的第一手报道。

希特勒所采取的办法，并不是我所顾虑的那个办法，这对我们倒是方便得多。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的任何时间里，他可以飞到英国去自首，说道，“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但请宽恕被我引入歧途的人民。”毫无疑问他会得到纽伦堡战犯的同样命运。现代文明的道德原则似乎有规定，凡战败国的领袖应该由战胜者置之死地。这样，将来再有战争的时候，势将促使这些人苦战到底，至于有多少生命将作不必要的牺牲与他们无干；反正他们不会有更多的损失。真正付出额外代价的是对于发动和结束战争都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广大人民。罗马人守着相反的原则，他们的胜利一半归功于他们的勇敢，也几乎同样归功于他们的宽大。……

7月17日震动世界的消息来了。下午史汀生① 到我的寓所里来访问，把一张纸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写着，“孩子们满意地生下来了。”看他的神色，我知道有桩非常的事情发生了。他

① 美国政治家，战前曾任国务卿，战时任国防部长（H.L. Stimson）。

说道，“这意思表示墨西哥沙漠里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原子弹已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了。”……然而还没有人能衡量这种发明在军事上的直接后果，也没有人估计到关于原子弹的其他一切。

第二天早晨一架飞机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一件惊人事件的详尽描绘。史汀生带给我那份报告。我现在就回忆所及，把情况讲一讲。这个炸弹，或威力相等的装置，是在一个一百英尺高的塔顶上起爆的。周围十英里以内任何人都得离开。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蹲伏在大约距这样远的地方的坚厚的混凝土掩蔽部和防御物的后面。爆炸的威力可怕得很。一股巨大的火焰和烟雾直冲到我们可怜的地球表面的大气边缘。周围一英里以内的东西完全遭到毁灭。于是这里有迅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也可能成为结束其它许多事情的简捷办法。

总统邀我立即跟他会谈。跟他在一起的有马歇尔将军和李海上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攻击日本本土。我们所想到的是日本人以武士道的精神，拚命抵抗，到死方休。不仅在对阵作战是如此，而且在每一个洞穴，每一条壕沟里也都是如此。我心中有着冲绳岛的景象，那边有好几千日本人不愿投降，等他们的领袖庄严地实行切腹礼以后，就排成一队，用手榴弹毁灭自己。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需要丧失一百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英国人的生命——如果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运到那边，损失还要大，因为我们决心要同美国共患难。现在这一个可怖的梦境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一二次剧烈震动之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似乎真是光明而美丽。我立即想起素以勇敢使我敬服的日本人，自

从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武器出现以后，或许会从中找到一种借口来挽回他们的面子，并且脱卸他们战至最后一人的责任。

此外，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依赖于他们的大军源源参战以从事于最后的和旷日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乞求他们的恩惠。隔了几天，我写信给艾登先生说："事情十分清楚，美国现在不希望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因此那一连串的欧洲问题，可以就他们本身的利害并且按照联合国的大原则来处理。我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上帝恩赐的良机，可以减轻东方的屠杀，并且在欧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我觉得毫无疑问，我的美国朋友的心中也有这些思想。无论如何我们从来不曾花一刻工夫来讨论到底应否使用原子弹。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无止境的屠杀，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使世界得到和平，为了使苦难中的人民得到安抚，而不惜付出几次爆炸的代价，来显示一种无比的威力，这在我们历尽一切艰辛危险之后，不失为一种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在实行试验以前，英国对于这种武器的使用，已经在7月4日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现在作最后决定的，主要在于拥有这个武器的杜鲁门总统；但是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事后也从没有对他作法的正确性表示过怀疑。对于应否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就没有人提出争议过，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后代必然会加以判断的。至于在当时的会议桌上，大家是一致的、自动的，和毫无疑义地赞同这样做法；我也从来没有听到有人作过丝毫的暗示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1945年7月26日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

首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无条件投降。……这些条件遭到日本军事统治者的拒绝，因此美国空军订出计划，准备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一个原子弹。

我们同意对于居民们给以一切准备机会。实施的程序都详详细细地拟出来。为了尽量减少生命的损失起见，在7月27日散发传单警告十一个日本城市，它们将遭受猛烈的空中轰炸。下一天其中六个受到袭击。7月31日另有十二个城市受到警告，其中四个在8月1日遭到轰炸。最后一次警告是在8月5日发出的。到了那个时候，据称超级空中堡垒每天散发了一百五十万张传单，还有三百万份最后通牒。到了8月6日方始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在对日战争收场的时候，我已离职，我只简单地把它们记下来。8月9日，继广岛一弹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市。次日，日本政府不顾一些军阀极端分子的叛乱，表示：如果不损害天皇作为一国元首的特权，同意接受最后通牒。盟国政府，包括法国在内，答复他们，天皇应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节制，他应该授权并且保证降书的签订。盟国的武装部队将留驻在日本，直到波茨坦会议所提出的目标达到为止。这些条件在8月14日都被接受。艾德礼先生在半夜把这个消息广播出去。

盟国的舰队驶进了东京湾，9月2日早晨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正式投降书。俄国在8月8日对日宣战，离敌人崩溃只有一个星期。然而它照样要求交战国的全部权利。

对于执行投降条件，我们不容许有任何拖延。马来亚、香港和荷属东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在敌人手中，还有在其它地

方的一些孤军可能不顾天皇的命令而继续作战。因此占领这些广大地区成为当务之急。蒙巴顿将军自缅甸战役以后，即一直在准备解放马来亚，并且已经为在瑞天咸港(巴生港)附近登陆作好一切准备。9月9日实行登陆。9月初占领其他港口时，没有战事，到了9月12日蒙巴顿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受降仪式。

一个英国军官，海军上将哈考特，在8月30日抵达香港，9月16日接受了该岛的正式投降。

在美国有些人相信多多利用以中国或以西伯利亚为基地的空军力量，可以更经济地击败日本。他们主张单凭空军的行动，一样可以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并且摧毁它本土的抵抗力量；而不必从海上作耗费很大的长途跋涉以进行进攻的序幕战，空军中先进的代表人物主张其他地区象缅甸、马来亚及东印度群岛的政治目标可以暂时放弃，等到空战取得胜利以后，可以不战而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不赞成这些意见。

认为日本的命运决定于原子弹是错误的。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以前，它的失败已经注定，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是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只有这个使我们有可能夺得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进行最后的攻击，并且迫使它的京畿军队不打一仗即行投降。它的船只已遭到摧毁。它开始投入战争时有五百五十万吨以上的船只，后来由俘获和新造所得，更大有增加，但是它的护航制度和护送舰只，力量不足，并且组织得也不好。被击沉的日本船只超过八百五十万吨，其中有五百万吨是被潜艇击沉的。我们是一个岛上的强国，同样倚靠着海洋，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假如我们不能制胜德国的潜艇，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就可

想而知了。

在波茨坦会议上，我们面临着的问题之中，对日战争的胜利既不是最难的问题，也不是影响最大的问题。德国已经打垮了；欧洲必须重建起来。士兵必须回家，难民只要可能，必须回家。尤其是，各国必须谋取和平，使大家能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即使得不到舒适，至少应有自由和安全。我不打算把我们在正式会议和私人谈话中关于压在我们身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所交换的详细意见加以复述。其中有许多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英国为了波兰而战，但波兰现在既不自由，又不平静；德国还是分裂的；同俄国还不和睦。俄国取自波兰的土地，波兰取自德国的土地，德国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些是凌驾一切的话题。……

我们在雅尔塔曾有约定，俄国的西部边界应该推进到波兰境内的寇松线为止，因而一向承认波兰也应当大体上从德国领土取得补偿。问题是取得多少？它应该在德国推进到多远？关于这个问题，颇有不同的意见。斯大林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沿奥得河推进到与西尼斯河合流处；而罗斯福、艾登和我坚持应该止于东尼斯河。三国首脑曾在雅尔塔公开约定，把这件事情就商于波兰政府，并且留待和平会议作最后解决。我们竭尽全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但是在1945年7月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俄国已经把它的边界推进到寇松线。据罗斯福和我的体会，这意味着住在这条界线另一边的三四百万波兰人不得不向西迁移。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比这些情况要坏得多。受苏联支配的波兰政府也已经向前推进，不是到东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这个地区里，大部分住的是德国人，虽然已

经逃跑了几百万，还有许多留在后面。我们怎样来处置他们？迁移三四百万波兰人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迁移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这样的迁移即使认为可以完成的话，剩下的德国土地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德国的粮食大部分就是从波兰人夺去的那片土地上得来的。如果这片地不给我们，那么留给西方盟国的只是已经遭到破坏的工业地带和饥饿而膨胀的人口。就欧洲未来的和平来说，这是一个大错，那个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跟这个比较之下，显得渺小了。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想要回他们的领土，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

……在7月24日下午三点一刻的时候，以贝鲁特总统为首的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们到环行街我的寓所里来。……

我一开头就提醒他们，英国是为了波兰受到侵犯而参加战争的。我们一向非常关心波兰，但是现在人家提供给它的、显然也是它自己所要得到的边界，意味着德国将失去它在1937年所拥有的可耕地的四分之一。有八九百万德国人将必须迁出，这样大量的移民，不仅震动了西方民主国家，而且也使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直接受到危害。因为我们不得不维持到那边求庇的难民的生活。结果将是波兰人和俄国人握有粮食和燃料，而我们徒有吃饭用的嘴巴和生火用的壁炉。我们反对这样的分割，而且我们深信波兰人向西推进得太远，正象他们一度向东推进得太远一样，是危险的。

我告诉他们还有别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不安。如果要消除英国舆论对波兰问题的疑惧，那么选举应该做到真正自由而不受限制，一切主要的民主党派应该有充分的机会来参加，并且宣

布他们的政纲。民主党派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相信只有共产党人是民主主义者。要把每一个非共产党的人称为法西斯野兽是容易的；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存在着大量的坚强的力量，他们既不属于这一端，也不属于那一端，而且既无意要成为共产党也不想当法西斯。波兰应该尽量容纳这些温和分子参加它的政治生活，而不应该把一切不符合极端分子的主观成见的规定的人都加上罪名。

在目前欧洲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以打击他的对方并定他们的罪。但是唯一的结果是把中间分子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要成为一个国家，须容纳各种人在内。波兰还经得起国家分裂么？它应该力求广泛的团结，既和俄国朋友携手，也同样和西方携手。例如，基督教民主党还有国家民主党里面没有同敌人积极合作过的一切人士，都应该参加选举。我们又期望报纸和我们的大使馆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观察和报道在选举以前和选举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唯有通过容忍，甚至有时还需要相互宽恕，才能使波兰继续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尤其是英国的尊重和支持，……

我的呼吁归于无效。我所预言的"严重后果"有待于世人去衡量。

最后这一次"三大国"会议的命运是"挫折"。我不打算把我们历次会议中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全都加以叙述。我只想对我当时所知道的关于原子弹的事和对于可怕的德国—波兰边界问题说一个大概。这些事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获得解决。

其余，我只想提一些在我们沉闷的辩论之后使我们感到轻

松的社交和个人之间的接触。三大代表团轮流设宴款待其他两方。先是美国开始。轮到我的时候，我提议为“反对党领袖”举杯祝贺，附带说明“不管将来是谁”。艾德礼先生和在座的人都觉得很有趣。苏联的宴会也同样地使人感到愉快，还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会，由俄国第一流的艺术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后来我溜走了。

23日晚上轮到我举行最后一次宴会。我把它的规模搞得大一些。代表们和主要的指挥官都被邀请在内。我请总统坐在我的右边，请斯大林坐在我的左边。会上有许多人讲话。斯大林甚至不问侍者和勤务兵是否已全部离场，就提议我们下次会议将在东京举行。毫无疑问，俄国的对日宣战，随时可以发布，而且他们的大军已经云集边界，准备踏破在满洲比较软弱得多的日本前线。为使宴会进行得轻松愉快些起见，我们时常掉换座位，因此总统坐在我的对面。我又跟斯大林作了一次十分友好的谈话。他非常高兴，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总统所告诉我的关于新型炸弹的重要消息。他热烈地谈到俄国的对日参战，似乎预料要有好多个月的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作战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只是受着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的限制。

席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显赫的贵宾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他回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照他的愿望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们彼此相顾而笑。斯大林的眼睛闪烁着快乐，非常高兴。我以前曾提到过在这些宴会的祝酒中，苏联代表们一向用极小的杯子来喝酒，而斯大林从未破例。但是现在我想请他提高一步。因此我用盛红葡萄酒的小号玻璃杯为他和我各斟了一杯白兰地。

我意味深长地对他看着。我们俩一下子都干了，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斯大林说道，“如果你不可能在马尔莫拉海中给我一个要塞阵地，我们能不能在德德亚加奇① 有一个基地？”我自己觉得回答得相当满意，我说，“我当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

第二天，7月24日，我们的全体会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从圆桌旁站了起来。在分散以前，我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我看见总统走到斯大林那边，他们俩单独谈起话来，只有译员在一起。我离他们大约只有五码，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总统要做什么。我要窥测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次谈话对于斯大林所发生的效果。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的样子似乎很高兴。一种新型的炸弹！威力非常大！可能对于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的作用！那是多么好的运道！这是我当时所得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中，原子弹这件事显然不曾使他操过心。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世界事务的重大变革略有所知，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最方便的回答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把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告诉了我。我当然没有技术知识。我能不能派我的这方面的核子科学专家在明天上午去看你们的专家？”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温和愉快，于是这两个统治者的谈话不久就告终止。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的身旁。我问他，“事情怎样？”他答道，“他始终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因此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在那一天，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

① 希腊海港。

程并没有特别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曾押上了四万万英镑以上的赌注。

就波茨坦会议来说，这事就到此为止。以后苏联代表团就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没有人向他们再提起。

25日上午会议又重开。这是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再度极力主张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非考虑到留在那个地区里的一百二十五万德国人不能解决。总统郑重说明任何和平条约，只有参照参议院的建议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获得批准。他说，我们必须找出一个他能如实推荐给美国人民的解决办法。我说如果我们容许波兰人取得第五个占领国家的地位，而没有定出办法把德国产出的粮食均匀分配与全德人民，也不需我们商定关于赔偿和战利品办法，那么会议将归于失败。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焦点，而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于是争论就继续进行。斯大林说从鲁尔取得煤和金属比粮食更重要。我说它们将跟东方的粮食作物资交换。除此之外，矿工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煤？答复是，“他们以前也是从国外输入粮食，现在还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怎样能偿付赔款？冷酷的回答是，“德国还留下许多肥肉。”我反对因波兰人占据了东部一切产粮地区而使鲁尔陷于饥荒。英国本身也缺煤。斯大林说：“那么在矿上用德国俘虏，我就在这样做，在挪威还有四万德国军队，你可以从那里把他们弄来。”我说，“我们正在把我们自己的煤输送给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为什么波兰人可以把煤出卖给瑞典而英国却为了被解放的国家而自己刻苦？”斯大林答道，“但是那是俄国的煤。我们的处境甚至比你们的还要困难。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五百万以上的人，因此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劳动力。”我再一次提出我的意见，“我

们当把鲁尔的煤送到波兰或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可以为产煤的矿工换得粮食。”

这样一说似乎使斯大林停了下来。他说须把整个问题加以考虑。我同意，并且说道，我只是要指出我们当前的困难。就我而论，这事就到这里结束。

除了这里所说明的事以外，我对于在波茨坦所达成的任何结论，都不负责任。在会议过程中，我对于在圆桌会议上或每天的外长会议中无法调整的分歧，就让它们悬着。结果是，为数惊人的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都搁置下来，如果象一般的预料，选举人要重选我的话，我打算在这一连串的决议上跟苏联政府来一个肉搏。例如，我和艾登先生都决不会同意以西尼斯河为边界线。奥得河和东尼斯河那条界线已被承认为波兰退到寇松线的补偿，但是俄国军队侵占的领土直到了西尼斯河，有的地方甚至越过了这条河，那是以我为首的任何政府无论以前或今后决不会同意的。这里不仅是个原则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影响到又一批大约三百万的不愿遣返的政治难民。

还有许多事情应当跟苏联政府以及波兰人据理力争。这些波兰人一口吞下了许多大块的德国领土，显然已经成为苏联的热心的同伙。然而由于大选的结果这一切谈判都被截为两段，并且作出了不合时宜的结论。这样说，并非责备新政府的部长们，他们是被迫着无所准备地重开谈判，当然也不知道我心中原来的想法和计划，就是：在会议临了的时候，预备摊牌，遇有必要时，宁可公开决裂，而不让超过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以外的任何土地割让给波兰。

然而前几章中已有说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适当的时候，

是在强大的盟国在战场上列阵相对之时，而且应在美国人及范围较小的英国人在一条长达四百英里（有些地方甚至宽深达一百二十英里）的战线上还没有大规模撤退，从而把德国的腹地和大部分土地让给俄国人以前。在那个时候，我原想在我们作如此巨大的撤退以前和盟国军队还存在的时候，把事情解决。美国人认为我们应受固定的占领界线的约束，而我极力主张只有在从北到南的整个战线按照我们当初协议时的愿望和精神而得到满意的解决时，我们才能谈到这条占领线。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而俄国人以波兰人为前驱，继续前进，把前面的德国人驱逐出去，使德国的大块地区居民减少，夺取了这些德国人的粮食，而把大批的吃粮的户口赶到人口已经过多的英美占领区里去。即使在波茨坦会议上，事情或许还可以挽救过来，但是英国联合政府的结束以及我在还有相当的影响和权力的时刻离任，这就使达成满意的解决成为不可能的了。

我在7月25日的下午带了玛丽① 乘飞机回去。我的妻子到诺索尔特飞机场来接我，我们大家在一起安静地吃了一顿饭。

皮姆上尉和地图室的工作人员事先已作了极好布置以便第二天在选举的结果开始揭晓时，作连续的报导。保守党总部最后的估计是，我们将结结实实地保持一个多数。我在忙于会议的重要事务之中，对于这件事不曾负起过多的责任。基本上我接受了党务经理人的看法，因此就去睡觉，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我继续工作。我希望有可能按照新下院的比例来重组全国联合政府，我就这样睡着了。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一刀似地猛醒过来。我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剛冒

① 丘吉尔的女儿。

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过去许多重大事件所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倚靠着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而我也快将失去重心而跌倒了。缔造未来的大权将非我有。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许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都将归于幻灭。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身过去，立即又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9点。当我走进地图室，初步的结果已经开始报告。这些结果对我不利，正如我当时所预料的一样。到了中午，事情已经明显，社会党人将获得多数。在午餐的时候，我的妻子对我说道，“表面不利，也许福在其中。”我答道，“目前看来，这外表还装得顶象样呢。”

就通常的情况来说，我应该有几天工夫按照常规把政府事务作一结束。我未尝不可根据宪法等待几天以后议会开会，然后接受下院的解职。这样使我可以在辞职以前把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公告全国。但是当时波茨坦会议上所有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重要问题正待处理，那里亟需一位不列颠的全权代表出席，因此任何耽搁将违反国家利益。还有，选举人的抉择既已这样以压倒多数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我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因此在请求觐见之后，我在7点钟驱车入宫向英王提出辞呈，并请英王召见艾德礼先生。

我发表了下面的告全国人民书，我的叙述也就到此结束：

1945年7月26日

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检得的选举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

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可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唯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我的不折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表达的许多厚意。

——以上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胜利与悲剧》（1954年，初版）

·附　录·

授奖辞

瑞典学院院士 S·齐凡尔茨

身兼伟大作家的伟大政治家和战士从来是非常罕见的。人们会想起裘力斯·凯撒、玛可·奥勒留①、甚至拿破仑，拿破仑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写给约瑟芬的信确实既热情洋溢又文采斐然。但是，最能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相比的人要数迪斯雷利②，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丘吉尔曾说过，罗斯伯里③“活跃于‘大人物小事件’的时代”，这话也可用于迪斯雷利。他从未受到过任何真正可怕的考验。写作对于他，既是政治跳板，又是感情的安全阀。他以一系列浪漫的、自我显示的、有时还很难读的小说为自己报了仇，尽管他的一生成就辉煌，但他作为一名外来的犹太人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受到羞辱和挫折。他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他把主角戏演得令人目眩神迷。他完全可以重复奥古斯都④的告别词：“朋友们，鼓掌吧，喜剧演完了！”

---

① Aurelius, Marcus (121—180)：古罗马皇帝兼新斯多噶派哲学家。
② Disraeli, Benjamin (1804—1881)：英国首相兼作家。
③ Rosebery, ArchibaldP.P. (1847—1929)：英国首相。
④ Augustus (前63—前14)：古罗马皇帝。

丘吉尔的约翰牛形象与那位戴着外国人样儿的粉白面具、前额上留着一绺黑发的老一代政治家对照起来显得非常突出。保守派迪斯雷利尊重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对于在诸多方面属于激进派的丘吉尔而言，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已融进了他的血液，这意味着在风暴中坚定不移，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果敢有力。他不戴面具，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分裂的迹象，也没有令人莫测高深的复杂性格。现代人心目中的作家身上那种不可或缺的细腻分析的特点却与他毫不相干。在他看来，现实的大厦并未倾圮。在他面前只有一个世界，太阳、星辰和旗帜俯瞰着世上的道路和目标。他写散文的目的非常明确，正如运动场上的竞技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争取什么荣誉一样。他的每一句言语都相当于半件行动。在心灵深处，他是一位遭受飓风冲击的维多利亚后期人物，或者说，他是自愿选择一条去迎击暴风雨的道路的人。

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巨大，使人不由地想把他描绘成一位具有西塞罗天才文笔的凯撒。古往今来的领袖们中还从未有过一位如此杰出的兼有二者才具又与我们这样接近的人物。丘吉尔在他的那部关于他祖先马尔巴罗① 的伟大著作中写道："说话容易，可以说得很多，而伟大的行动则难能可贵。"这话很对，但是，伟大、生动而有说服力的言语同样也难能可贵。丘吉尔表明：言语同样可以具有伟大行动的性质。

首先打动读者的也许是丘吉尔作品那令人振奋而丰富多采的一面。《我的早年生活》(1930)除了很多别的长处之外，还是

①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 (1650—1722)：英国安娜女王时代的名将，以功晋封公爵。

世上最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之一。即使是一个很幼稚的心灵也能怀着无比的欢愉伴随主人公开始那生气勃勃的生命旅程：学校里难管教的儿童，骑兵中打马球的中尉(当时大家都说他太笨，不适于当步兵)，在古巴、印度边境地区、苏丹以及波尔战争时在南非的战地记者。迅速的行动、果敢的决定以及鲜明的洞察力使他当时就已崭露头角。作为一位语言描绘家，年轻的丘吉尔不但富于活力而且还有敏锐的目光。后来，他把绘画当作自己的业余爱好，他在《随想和奇遇》(1932)中娓娓动听地讲述绘画给他带来的乐趣。他喜爱明丽的色彩，憎恶贫薄的棕褐色。然而，丘吉尔最擅长的还是用语言来作画。他描绘的战争场景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色调。危险是男子汉最古老的情人，这位年轻军官在热烈行动的激发下目光锐利得几乎臻于神奇的境界。多年前在访问恩图曼时，我发现《河上的战争》(1899)中所描绘的粉碎马赫迪叛乱①的最后战斗的情景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能看到成群的伊斯兰托钵僧在我面前挥舞长矛和枪支，黄褐色的沙土墙被子弹打得粉碎，英埃军队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骑兵冲锋时丘吉尔几乎丧命。

就连那些必须从尘封的案卷中发掘出来的古老战役也被丘吉尔描绘得极其鲜明、生动。屈列维连②也曾以老练的笔调写过马尔巴罗的历次战役，然而，丘吉尔描绘的历史战役的场景自有一种迷人的力量，这恐怕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以布伦海姆战役③为例，你会全神贯注地追随那血腥的战争棋局上的每一

---

① 指1898年苏丹伊斯兰教马赫迪派信教徒们所举行的反英起义。

②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 (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

③ Blenheim：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座村庄，1704年马尔巴罗率领英国军队大胜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于此。

步，你会看到弹雨在紧挨着的棋盘方格上翻起道道深沟，你会被骑兵迅雷激雨般的冲锋、短兵相接的猛烈厮杀深深吸引，等你放下书，晚上睡觉时会猛然惊醒，出一身冷汗，想象自己正站在穿红军装的英军队伍的前列，周围堆满死尸，躺满伤兵们的躯体，但军人们毫不动摇，正在把弹药装入枪膛，接着就是一阵闪光的齐射。

但是，丘吉尔渐渐成为一位远远不止是战士和描绘战争的人了。即使在那所从事权力冒险活动的严格而辉煌的议会学校里，也许他一开始就稍稍带有“难管教的儿童”的色彩。然而，这位性如烈火的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急躁脾气，迅速成长为一位著名的政治演说家，能言善辩一如劳合一乔治①。他妙语惊人，言词犀利，但始终不乏温情和骑士风度。步着乃翁伦道夫·丘吉尔勋爵②的足迹，他徙倚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他写过一部传记，描绘他父亲短暂而充满不安的一生，写他如何随着政治事业的悲惨中断而死亡，这部著作在英国浩瀚的传记文学中占有无可争议的光荣的一席。

尽管有种种挫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意味着丘吉尔在作为政治家和作家这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他的历史著作里，个人因素与史实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谙熟他所要讲述的内容。在判断种种事件的动因时，他深刻的经验总是正确无误的。他是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火线经受过极端沉重的压力的人。这就使他的话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许有时，个

---

① Lloyd-George, David (1863—1945)：英国政治家，1916—1922任首相。

② Churchill, Lord Randolph (1849—1895)：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之父。

人的一面居于主导地位。巴尔弗①把《世界危机》(1923--1929)称作一部"乔装成世界史的温斯顿的光辉自传"。该书对档案、文件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同时，作为一部由亲身参与创造历史的人所写的历史著作，它总有某种非同寻常的特色。

在他的伟大著作《马尔巴罗公爵传》(1933—1938)里，他猛烈地攻击了那些诽谤他祖先的人们，他那位祖先的生平事迹与丘吉尔本人非常相似。我不知道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于他对麦考莱②的驳难有何评论，但是，书中对于一贯憎恨和谩骂那位大将军的人们的嘲骂确实既有趣又痛快。

这部马尔巴罗传不仅是一系列生动的战争场景以及为这位政治家兼战士所作的巧妙辩护，它还是对一位莫测高深、卓然不群的人物的深刻研究。它表明，丘吉尔除其他才能之外，还具有描绘真实性格的能力。他一再提到，在马尔巴罗身上，斤斤计较的悭吝脾性和光彩照人的艺术素养往往杂糅在一起。他说，"他聚敛私人财产时所遵循的原则与他作战时的参谋工作的原则相同，是同一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情场上和战场上他才肯把一切都豁出去。在那样的时刻，他意气风发、兴高采烈，一扫平素的生活制度与规则，闪耀出英雄气概的熠熠光彩。在他的婚姻和胜利中，规定其日常生活并支持其作战战略的那些世俗的审慎、盘算、凡事要保险又保险的习性都被他卸掉了，就象脱下一件过于沉重的绣花斗篷一样，从而显出了一位充满自信和胜利气概的天才的本相。"丘吉尔对军事的热情使他暂时忘却了马尔巴罗钟爱的那位著名的莎拉决不是一个可供人任意驱使的人物，不过，这段文章写得实在妙极了。

① Balfour, Arthur (1848—1930)：英国政治家，1900—1906曾任首相。
② Macaulay, Thomas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

丘吉尔为自己未能进牛津大学读书而遗憾。他不得不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但是，从他成熟的散文中确实看不到任何教育上的不足之处。他最富魅力的著作之一《当代伟人》(1937)就是一个范例。有人说他的文体风格是以吉本①、柏克②和麦考莱为榜样塑造而成的，但是，这部书的文体完全是他自己的。在这座人物画廊里有如此灵巧的笔触，同时又有如此丰富的对于人性的理解、恢宏的气度和欢快的恶意！

丘吉尔对萧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是两位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间的有趣的交锋。丘吉尔情不自禁地要拿萧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言行开玩笑，萧的这些表现与作为丘吉尔立身行事基础的严肃、庄重恰好形成对照。半是觉得有趣，半是感到惊讶，他急忙从那位诙谐成性的天才不断犯错误、不断翻着跟头从一个极端折向另一极端的道路上退避。这是作家与政治家的对照，作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惊人的事物，而政治家的任务则是应付和驾驭它们。

丘吉尔文体风格的伟大是不易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的，对于他的老友、自由派政治家约翰·莫莱③，丘吉尔说，“尽管他谈话时总是灵巧而文雅地围绕着自己的信念行进、移动，对于往昔的战争说一些愉快的恭维话向对方致敬，但是他总是回到自己坚固设防的营垒中去睡觉。”丘吉尔本人作为一位文体家，尽管有生气勃勃的骑士精神，却并不倾向于这种温柔悦人的精致玩意儿。他并不旁敲侧击，他是个说话坦率的人。他的热情

① Gibbon, Edward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② Burke, Edmund (1729—1797)：英国政治家兼作家。
③ Morley, John (1838—1923)：英国政治家兼作家。

是立足于现实的，他的惊人力量只有用宽宏和幽默方能铸成。他懂得，一个好的故事本身就会发生影响。他嘲笑不必要的虚饰，他的隐喻虽然不多但很有表现力。

作家丘吉尔背后还有一位雄辩家丘吉尔——他的措词富于弹性，辛辣、尖刻。我们在赞美别人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自己的个性特点。譬如，丘吉尔在谈论他的另一位朋友伯肯海德勋爵①时说："当他爱上自己的主题时，就会产生信念和魅力的光辉，它出自天性，珍贵无比，构成了真正的雄辩之才。"这些话若用在丘吉尔身上会更加恰当。

著名的沙漠战士、《智慧七柱石》的作者阿拉伯劳伦斯②是另一位既创造历史又撰写历史的人。对于他，丘吉尔是这样说的："正如飞机凭借它撞击空气的速度和压力才能起飞一样，他在飓风中飞得最好、最从容。"这些话同样引人注目，丘吉尔在这里诉说出他本人穿透历史事件的暴风雨、实践自己诺言的同样的天才。

丘吉尔成熟的演说，才思敏捷，目标明确，以其博大崇高而感人至深。它有一种铸造历史链环的力量。拿破仑的文告常以碑铭体风格见长，而丘吉尔在自由和人类尊严面临生死关头时的辩才，完全以另一种方式动人心魄。也许他以他那伟大的演说为自己树立了一座最恒久的纪念碑。

丘吉尔夫人，瑞典学院对您的光临表示欣悦，并请您向温斯顿爵士转达我们深深的敬意，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

---

① Birkenhead, F.E.Smith, Lord (1872—1930)：英国政治家兼作家。

② Lawrence of Arabia, Thomas Edward (1888—1935)：英国考古学家、东方语言学家和传奇英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深入沙漠把阿拉伯部落组织起来，反抗土耳其的统治。

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现在，我请您代表您的丈夫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G.·利列斯特兰德院士
在丘吉尔夫人领奖前的简短致词

过去曾有几位首相、外相，甚至还有两位美国总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①。如今，有史以来第一次，又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是一位举世公认的英语大师，英语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奇妙而灵活的手段。他的纪念碑式的传记作品早已成为经典，他的关于当代历史的著作流泻出深刻、精湛的第一手知识，文体明晰，洋溢着幽默与宽宏的精神。但是，对于温斯顿爵士来说，英语还是可供他使用的一件重要工具，他的部分职责就是凭借英语而完成的。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们心中的信念和希望。只要稍作更动，我们就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他本人："在人类冲突的领域里，以前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如此众多的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一个人。"对于他通过他的著作和演说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谨请丘吉尔夫人向她的丈夫转达我们严肃、诚挚的赞佩和崇敬。

（薛鸿时译）

① 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6)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9)。

受奖演说

由丘吉尔夫人宣读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来说既无尚光荣又出乎意外，可惜我因职务在身不能亲临斯德哥尔摩从你们热爱的、理应受到尊敬的国王陛下手中受奖。感谢你们允准我委托我的夫人来完成这一任务。

我得以列名于其间的那份名单体现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许多杰出的成就。文明世界一向认为瑞典学院的判断是公正的、权威性的和真诚的。你们决定将我也列入这份名单，我感到自豪，然而我必须承认，同时又感到恐慌。我真希望你们是正确的。我觉得自己还不配，我和你们都冒着一定的风险呢。但是，如果你们对此并不担忧，那么我也就放心了。

自从1896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暴风雨和悲剧的时代。人类的力量在一切领域里都增强了，唯独对其自身却无法驾驭。人类活动领域里所发生的事件似乎从未如此无情地使人格力量变得渺小。历史上罕有这样的情景：野蛮的事实如此牢牢地主宰着思想，或者说，普遍存在的个人美德只能找到一个如此模糊的集体聚焦点。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难道我们已无法控制我们的棘手难题了

吗？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呀，愿我们谦卑自抑，寻求指引与宽恕吧！

我们，生活在欧洲和西方世界里的人们；制订保障健康和社会安全的计划，赞叹医学和科学的成就，并且把全体人民的正义和自由当作自己的目标，然而，我们同时又是饥馑、痛苦、残酷、毁灭的目击者，那些景象会使阿蒂拉①和成吉思汗的事迹相形失色。我们起初在国际联盟，现在又在联合国，企图为长期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但是我们却眼睁睁地看到一个被分裂所毁坏、被不和所威胁的世界，这些纷争比罗马帝国倾覆以来震撼着欧洲的纷争更为严重和激烈。

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阴暗的背景前赞赏那激励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形成他的思想的崇高精神和希望。他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道明亮而持久的光芒，那是留给极度困窘的一代人的文明、决心和灵感之光。这个举世闻名的机构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真正可以遵循的道路。那么，让我们以容忍、变通和镇定的精神来应付四处可见的纷扰和严峻的景象吧！

世人以羡慕的、甚至是宽慰的目光注视着斯堪的纳维亚，这三个国家无需牺牲自己的主权就能按照他们的思想、经济实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结合成一体。从这样的源泉，也许会给全人类带来新的、更加光明的机会。我相信，有幸被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选中的人们将会被这样美好的感情所鼓舞，从而充分意识到他们将遵奉该奖金的卓越创始人的理想和愿望。

（薛鸿时译）

① Attila（406？—453）：匈奴王，曾率领大军横扫欧洲，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

丘吉尔生平、创作年表

1874年　11月30日温斯顿·丘吉尔（以下简称丘吉尔）生于英格兰牛津郡布伦海姆宫。父亲伦道夫勋爵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之子，当年二十四岁，任国会议员。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纽约富商之女。

1876年　马尔巴罗公爵七世出任爱尔兰总督。伦道夫夫妇携子偕同前往，小丘吉尔由慈爱的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精心照料。

1881年　丘吉尔进圣乔治寄宿学校，他十分淘气，常受老师的责打，是出名的"难管教的孩子"。他的拉丁文成绩很差，而历史、地理却学得很好。在家时常爱用一套玩具士兵，玩调兵遣将的游戏。

1883年　丘吉尔转入汤姆逊姐妹学校，那里气氛宽松，他的学习成绩有很大的进步。

1885年　伦道夫出任保守党内阁的印度事务大臣。

1886年　伦道夫改任财政大臣和下院保守党领袖。五个月后因与索尔兹伯里首相政见分歧而去职。以后因患梅毒身体日衰，政治事业上一蹶不振。

1887年　丘吉尔入哈罗公学，但入学考试时拉丁语交了白卷。

1889年　丘吉尔转入哈罗公学军事专修班，该班被其他学生嘲讽为"笨蛋们的乐园"。他的历史成绩十分出色而拉丁文成绩差，法文、数学也成绩平平。他比较散漫，有一次故意打破学校的窗户而受到校长的鞭打。他爱好体育，曾获击剑比赛的银质奖章。

1892—1893年　丘吉尔第一次参加桑赫斯特军校的入学考试，名落孙山。经过个别辅导，第二次才被录取，但分数不高，只能进骑兵专业。父亲写信骂他“丢人现眼”。

1895年　伦道夫勋爵逝世。同年逝世的还有丘吉尔的外祖母以及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丘吉尔对后者的感情很深。那年丘吉尔通过了桑赫斯特的毕业考试，在130名学生中成绩第20名。毕业后即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任中尉。在军队里，他痛感以前所受的教育不足，开始刻苦自学，特别爱读的书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丘吉尔利用假期访问古巴。当时古巴革命者正在与西班牙占领军作战。丘吉尔由大使介绍，得以随西班牙的一支分遣队深入原始丛林作战，曾遭到伏击，被俘、染上流行病。他得了西班牙红十字勋章。回国后为英国《每日记事报》写战地报道。

1896年　丘吉尔随团调往印度。10月驻扎在班加罗尔，他努力自学吉本、麦考莱等人的著作和当代政治史，暇时打马球、抓蝴蝶，充满生活情趣。

1897年　回国休假期间在巴思举行的保守党会议上第一次发表政治演说，效果极好。回印度后以《加尔各答先驱报》记者身份参加镇压北部山区游牧部落反抗的军事行动。后担任参谋部联络官，历尽艰险，因勇敢而获得勋章。他写的通讯报道描绘生动，很受欢迎。

1898年　报道文集《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出版，受到舆论界的注意。同时创作长篇小说在杂志连载。8月初获准参加对苏丹起义的镇压行动。9月2日亲身参加了恩图曼战役，粉碎了托钵僧的军队，占领喀土穆。10月回国休假，旋即返回印度。

1899年　报道文集《河上的战争》出版，出色的描写技巧赢得评论界高度的赞扬。丘吉尔离开印度，辞去军职，10月以《晨邮报》记者身份赴南非参加波尔战争。在军车遭到伏击时，丘吉尔挺身而出指挥作战，使其他人得以乘机车逃脱，但他自己当了俘虏。他奇迹般地从俘虏营中逃脱，躲在英国人开的煤矿的井下，12月逃往英属领土德班，受到热烈欢迎。

1900年　长篇小说《萨伏罗拉》单行本出版。丘吉尔以记者身份参加南非轻骑兵团，一边作战一边采访。6月英军击溃波尔人的主力。丘吉尔回国，出版两本通讯文集：《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得到热烈的赞扬和可观的经济收入。不久，丘吉尔在奥德姆选区当选为下院议员，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12月，丘吉尔赴美国、加拿大演说。

1901年　2月到下院上任，发表首次演说。

1903—1904年　丘吉尔因主张自由贸易，与保守党执政者发生意见分歧，终于导致割断与保守党的联系。

1905年　1月丘吉尔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党籍。5月丘吉尔正式转入自由党，与劳合-乔治关系密切。12月出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1906年　1月《伦道夫·丘吉尔传》问世，受到好评，说丘吉尔“避免了党派的偏见”。丘吉尔以自由党人身份参加曼彻斯特西北选区的大选，取得胜利。丘吉尔向内阁提出处理南非事务的备忘录，主张与战败的波尔人和解。

1907年　自费赴东非旅行，深入丛林调查研究，亲自勘察铁路建设线路，回国后写出长篇报告和有关非洲事务的备忘录。

1908年　《我的非洲之行》出版，受到好评。4月出任阿斯奎斯内阁的商务大臣。9月与克莱门蒂娜·霍齐尔小姐结婚。

1909年　《自由主义和社会问题》出版。

1910年　演讲集《人民的权利》出版。丘吉尔在丹迪市参加大选获胜。2月改任内政大臣，致力于社会保险事业的立法工作。

1911年　德国派军舰到摩洛哥，出现紧张局势。10月丘吉尔改任海军大臣，为增强海军实力、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14年　8月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年　2月—8月丘吉尔大力支持的英国海军袭击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受挫。5月丘吉尔改任不管部大臣，失去行政实权。丘吉尔开始学习绘画以自娱。11月丘吉尔辞去大臣职务以少校身份奔赴法国前线

作战。

1916年　5月放弃中校军衔回国。7月为《星期日画报》等报刊写文章，得到优厚的稿酬。12月劳合-乔治出任首相，但丘吉尔未能入阁。

1917年　1月达达尼尔调查报告解脱了丘吉尔对战败应负的责任。丘吉尔继续撰文、在下院发表演说，为打赢战争献计献策，并继续从事绘画。7月丘吉尔被任命为军需大臣。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英国为不让俄国退出对德战争而进行干涉。

1918年　1月丘吉尔改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

1919—1920年　丘吉尔主张积极援助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

1921年　2月丘吉尔改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空军大臣职务保留至4月)

1922年　10月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辞职，成立以博纳·劳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丘吉尔在丹迪市选举中惨败，失去议席。12月赴法国南部休养。

1923年　从2月份起《泰晤士报》连载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5月博纳·劳因病去职，鲍德温继任首相。11月丘吉尔在西莱斯特选举中又一次失败。

1924年　1月英国成立第一个工党政府，麦克唐纳任首相。丘吉尔反对自由党与工党合作，他主张与保守党合作建立反社会主义联盟，因此与自由党领袖发生意见分歧。3月丘吉尔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份参加威斯特敏斯特区补缺选举，又遭失败。10月工党政府垮台，鲍德温重新组阁，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身份在埃平选举中获胜，重新回到议会。

1925年　丘吉尔正式成为保守党人。

1927年　8月丘吉尔出任财政大臣。

1929年　5月丘吉尔以保守党人身份在埃平选举中获胜。但在全国获胜的是工党，鲍德温内阁辞职，麦克唐纳组织新内阁。6月丘吉尔卸任。8—11月携家人去加拿大和美国旅行。

1930年　《我的早年生活》一书出版。

1931年　丘吉尔反对甘地的国大党和在印度实行宪政改革，与鲍德温发

生政见分歧，从而退出保守党看守内阁。8月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成立，丘吉尔未能入阁。《世界危机》(1923—1931)五卷全部完成并出版。同年还出版《印度》一书。9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成立伪满洲国。

1932年　《随想和奇遇》出版。

1933—1934年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丘吉尔一开始就认清德国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他大声疾呼要加强英国的军备，特别是空军。

1935年　6月鲍德温代替麦克唐纳担任首相，邀请丘吉尔参加空防研究委员会，但无意邀他入阁。

1936年　英王爱德华八世执意与辛普森夫人结婚而不惜退位，丘吉尔对国王的这一做法持同情的态度。

1937年　5月鲍德温引退，内维尔·张伯伦接任首相，实行对德、意、日的绥靖政策，遭到丘吉尔、艾登等人的强烈反对。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中国实行全面抗战。《当代伟人》出版。

1938年　《马尔巴罗传》(1933—1938)四卷全部完成并出版。

5—6月丘吉尔发表演说，主张与法国、苏联一起对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作出公开承诺。10月张伯伦、达拉第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丘吉尔在下院演讲时发出警告说："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帐的开始。"但张伯伦等人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1939年　3月希特勒撕毁协定，全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丘吉尔的话应验了，全国舆论一致要求丘吉尔入阁。8月23日苏联政府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张伯伦请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11月苏联进攻芬兰。

1940年　3月13日芬兰战败，向苏联投降，并全部满足苏联的领土要求。5月德军进攻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张伯伦辞职，丘吉尔被任命为首相。法国土崩瓦解，5月26日—6月4日，英国远征军和一部分法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本土。德国对英国连续进行狂轰滥炸，但在英国举国一致的抵抗下，希特勒被迫放弃攻占英国的"海狮

计划”。

1941年　1月英共《工人日报》发起举行“要求和平”的全国大会，丘吉尔下令查封该报。3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租借法案”。4月丘吉尔向斯大林发出希特勒即将入侵苏联的警告。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受到严重损失，但仍顽强抵抗。7月英国和苏联签订协议，决心共同进行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保证决不单独对德媾和。英国派空军援助苏联保卫北方航线，并把大量军需品拨给苏联。8月丘吉尔、罗斯福在纽芬兰会晤，共同制订“大西洋宪章”。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正式参战。日军击沉英国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使英军无力固守东南亚属地。12月丘吉尔再次赴美会谈。

1942年　元旦，丘吉尔、罗斯福发表文告，提出由反侵略国家组成“联合国”的构想。春季日军全部占领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大批英军当了俘虏。同时德国隆美尔将军也率部在北非沙漠地带大败英军。6月美军在中途岛战役中一举击沉四艘日本航空母舰，解除了日军占领印度的威胁。同月丘吉尔访美，与罗斯福会谈，曾谈到共同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会议期间接得隆美尔在北非俘获英军三万人的坏消息，罗斯福决定派美军去北非。8月丘吉尔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要求英美早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派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11月美英军队在北非阿拉曼战役中击败德军，丘吉尔称之为“战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

1943年　1月丘吉尔、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决定战争的目标是使德、意、日“无条件投降”。2月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大胜德军，美军在所罗门群岛也战胜了日军。5月北非战役结束，俘敌25万人。8月丘吉尔、罗斯福在魁北克会晤。7月美英军队在西西里登陆，9月8日意大利投降。11月丘吉尔、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会晤，商谈远东战争的战略问题。11月27日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

1944年　1月美英军队发动安齐奥登陆战，受到德军顽强抵抗。6月4日美英军队才占领罗马。6月6日美英军队在诺曼底发动大规模登陆

战取得成功。6月23日苏联军队越出国界向德军大举反攻。9月丘吉尔再次赴美与罗斯福会谈。10月8日丘吉尔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明确英国、苏联对巴尔干各国“应负担的责任”。

1945年　2月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晤。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同月反侵略国家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组织，由美、苏、英、中、法五大国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身亡。5月9日德国无条件投降。5月12日丘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首次提出“铁幕”的概念，明确西方世界在战后要以遏制苏联作为战略目标。英国联合政府解散，由丘吉尔任看守内阁首相，准备举行大选。7月丘吉尔、杜鲁门与斯大林在波茨坦会晤。会议期间英国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失败，艾德礼组织工党新内阁，并代替丘吉尔继续参加波茨坦会议。

1946—1949年　丘吉尔以反对党领袖身份在国内政策上批评工党政府，在国际问题上不断大声疾呼反对所谓的苏联集团的“暴政”和“扩张”。1946年在美国富尔顿市的演说中，公开使用“铁幕”一词，被公认为二次大战后“冷战”开始的标志。丘吉尔也从而被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指斥为“战争贩子”。

1947年　8月15日印度、巴基斯坦独立，丘吉尔为大英帝国的崩溃而痛心，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巴次大陆必然会发生“激烈的宗派冲突和严重的生命损失”。

1949年　4月北大西洋公约成立。10月1日中国革命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　10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再次奉命组阁。

1952年　2月英王乔治六世逝世，伊丽莎白女王接位。10月英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逝世，5月丘吉尔建议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议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7月朝鲜停战。11月丘吉尔参加英美法三国首脑在百慕大举行的会议，当时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是强烈反对与苏联

举行首脑会议的杜勒斯国务卿。丘吉尔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1954年　6月赴美与艾森豪威尔会晤，

1955年　4月5日因年事已高正式递交辞呈，由艾登接任首相。

1956—1958年　《英语民族史》问世。1958年还出版了《战后演讲集》。

1964年　7月27日丘吉尔最后一次出席议会。翌日，霍姆首相提议：因丘吉尔对议会、国家和世界的贡献，英国议会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并载入议会记录。这项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1965年　1月24日晨8时，丘吉尔逝世。

（薛鸿时编写）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孤独与沉思	诗、散文	〔法〕普吕多姆(1839—1907)	1901	胡小跃
罗马风云	散文	〔德〕蒙森(1817—1903)	1902	王建、王炳钧
挑战的手套	剧本、小说	〔挪威〕比昂松(1832—1910)	1903	多人
金　岛	诗、散文	〔法〕弗·米斯特拉尔(1830—1914)	1904	罗国林
伟大的牵线人	剧本	〔西〕埃切加赖(1832—1916)	1904	沈石岩
第三个女人	小说	〔波兰〕显克维奇(1846—1916)	1905	林洪亮
青春诗	诗、散文	〔意〕卡尔杜齐(1835—1907)	1906	赵洋仲等
老虎！老虎！	小说	〔英〕吉卜林(1865—1936)	1907	文美惠等
精神生活漫笔	散文	〔德〕鲁·奥伊肯(1846—1926)	1908	多人
骑鹅历险记	小说	〔瑞典〕拉格洛夫(女，1858—1940)	1909	石琴娥等
特雷庇姑娘	小说	〔德〕保尔·海泽(1830—1914)	1910	杨武能
花的智慧	散文、剧本	〔比利时〕梅特林克(1862—1949)	1911	谭立德等
群　鼠	剧本、小说	〔德〕霍普特曼(1862—1946)	1912	章国锋、陈恕林
饥饿的石头	诗、小说	〔印度〕泰戈尔(1861—1941)	1913	倪培耕等
约翰·克利斯朵夫	小说	〔法〕罗曼·罗兰(1866—1944)	1915	傅　雷等
朝圣年代	诗、散文	〔瑞典〕海顿斯塔姆(1859—1940)	1916	李之义
磨坊血案	小说	〔丹麦〕吉勒鲁普(1857—1943)	1917	吴裕康
天　国	小说	〔丹麦〕彭托皮丹(1857—1919)	1917	甄建国等
奥林比亚的春天	诗、小说	〔瑞士〕施皮特勒(1845—1924)	1919	多人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大地硕果·畜牧神	小说	〔挪威〕汉姆生(1859—1952)	1920	唐荫荪等
苔依丝	小说	〔法〕法朗士(1844—1924)	1921	吴岳添等
不吉利的姑娘	剧本	〔西〕贝纳文特(1866—1954)	1922	陈凯先、屠孟超
丽达与天鹅	诗	〔爱尔兰〕威廉·叶芝(1865—1939)	1923	裘小龙
福　地	小说	〔波兰〕莱蒙特(1868—1925)	1924	张振辉、杨德友
圣女贞德	剧本	〔英〕肖伯纳(1856—1950)	1925	申慧辉、杨宪益等
邪恶之路	小说	〔意〕黛莱达(女，1871—1930)	1926	黄文捷、肖天佑
创造的进化	散文	〔法〕亨利·柏格森(1859—1941)	1927	吴岳添等
新娘·主人·十字架	小说	〔挪威〕温塞特(女，1882—1949)	1928	朱碧恒
魔　山	小说	〔德〕托马斯·曼(1875—1955)	1929	杨武能等
巴比特	小说	〔美〕辛·路易斯(1885—1951)	1930	潘庆舲
荒原和爱情	诗、散文	〔瑞典〕卡尔费尔德(1864—1931)	1931	陈文龙
有产者	小说、剧本	〔英〕高尔斯华绥(1867—1933)	1932	周煦良、黄梅等
米佳的爱	小说、诗	〔俄〕伊·蒲宁(1870—1953)	1933	王庚年、赵洵等
寻找自我	剧本、小说	〔意〕皮兰德娄(1867—1936)	1934	吕同六、刘庭儒等
天边外	剧本	〔美〕尤金·奥尼尔(1888—1953)	1936	荒芜、汪义群
蒂博一家	小说	〔法〕马丹·杜伽尔(1881—1958)	1937	郑克鲁
大　地	小说	〔美〕赛珍珠(女，1892—1973)	1938	王逢振、韩邦凯等
少女西丽亚	小说	〔芬兰〕弗·西兰帕(1888—1946)	1939	黄道生、孙叔林等
漫长的旅行	小说	〔丹麦〕约·延森(1873—1950)	1944	林　桦
柔　情	诗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女，1889—1957)	1945	陈光孚、赵振江
荒原狼	小说	〔瑞士〕赫尔曼·黑塞(1877—1962)	1946	李世隆、刘泽珪
田园交响曲	小说	〔法〕安德烈·纪德(1869—1951)	1947	罗新璋
四个四重奏	诗	〔英〕托·艾略特(1888—1965)	1948	裘小龙
我弥留之际	小说	〔美〕威廉·福克纳(1897—1962)	1949	李文俊、陶洁等
哲学·数学·文学	散文	〔英〕伯·罗素(1872—1970)	1950	蓝仁哲等
大盗巴拉巴	小说	〔瑞典〕拉格奎斯特(1891—1974)	1951	沈东子
爱的荒漠	小说	〔法〕弗·莫里亚克(1885—1970)	1952	桂裕芳
不需要的战争	散文	〔英〕温·丘吉尔(1874—1965)	1953	韩鸿时等
老人与海	小说	〔美〕海明威(1899—1961)	1954	董衡巽、赵少伟等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渔家女	小说	〔冰岛〕拉克斯内斯(1902—　)	1955	张福生
悲哀的咏叹调	诗	〔西〕希门内斯(1881—1958)	1956	赵振江等
局外人·鼠疫	小说、散文	〔法〕阿尔贝·加缪(1913—1960)	1957	郭宏安等
日瓦戈医生	小说、诗	〔苏〕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1958	力冈、冀刚
水与土	诗、散文	〔意〕夸西莫多(1901—1968)	1959	吕同六等
蓝色恋歌	诗	〔法〕圣·琼·佩斯(1887—1975)	1960	管筱明
德里纳河上的桥	小说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1892—1975)	1961	郑恩波
人鼠之间	小说	〔美〕斯坦贝克(1902—1968)	1962	秦似、巫宁坤等
画眉鸟号	诗、散文	〔希腊〕塞菲里斯(1900—1971)	1963	李野光
苍　蝇	剧本、小说	〔法〕保尔·萨特(1905—1980)	1964	柳鸣九
静静的顿河	小说	〔苏〕肖洛霍夫(1905—1984)	1965	力　冈
行为之书	小说	〔以色列〕约·阿格农(1888—1970)	1966	徐　新
逃　亡	诗、散文	〔瑞典〕奈丽·萨克斯(女，1891—1970)	1966	孟蔚彦
玉米人	小说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	1967	刘习良、笋季英
雪国·千鹤·古都	小说	〔日本〕川端康成(1899—1972)	1968	高慧勤
等待戈多	剧本、小说	〔爱尔兰〕萨·贝克特(1906—1990)	1969	施咸荣
癌症楼	小说	〔苏〕索尔仁尼琴(1918—　)	1970	姜明河
颂歌·挽歌	诗、散文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	1971	赵德明等
女士及众生相	小说	〔德〕海因利希·伯尔(1917—1985)	1972	高年生
风暴眼	小说	〔澳〕帕·怀特(1912—1990)	1973	朱炯强等
露珠里的世界	诗、小说	〔瑞典〕哈里·马丁逊(1904—1978)	1974	斯文等
乌洛夫的故事	小说	〔瑞典〕埃·约翰逊(1900—1976)	1974	石琴娥等
生活之恶	诗、散文	〔意〕埃·蒙塔莱(1896—1981)	1975	吕同六等
赫索格	小说	〔美〕索尔·贝娄(1915—　)	1976	宋兆霖
天堂的影子	诗、散文	〔西〕阿莱克桑德雷(1898—　)	1977	赵振江等
魔术师·原野王	小说	〔美〕艾·巴·辛格(1904—1991)	1978	陆煜泰、戴骢
英雄挽歌	诗	〔希腊〕埃利蒂斯(1911—　)	1979	李野光
拆散的笔记簿	诗	〔波兰〕切·米沃什(1911—　)	1980	绿　原
迷　惘	小说	〔英〕埃·卡内蒂(1905—　)	1981	钱文彩
霍乱时期的爱情	小说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1928—　)	1982	徐鹤林、魏民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堕落·蝇王·塔尖	小说	〔英〕威廉·戈尔丁(1911—　)	1983	梁彦华、周议等
紫罗兰	诗	〔捷〕雅·塞弗尔特(1901—1986)	1984	星灿、劳白
弗兰德公路	小说	〔法〕克劳德·西蒙(1913—　)	1985	林秀清
狮子和宝石	剧本、散文	〔尼日利亚〕索因卡(1934—　)	1986	邵殿生等
从彼得堡到 斯德哥尔摩	诗、散文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　)	1987	王希苏、常晖
街　魂	小说	〔埃及〕纳·马哈福兹(1911—　)	1988	关偁
为亡灵演奏玛祖卡	小说	〔西〕卡·何·塞拉(1916—　)	1989	李德明等
太阳石	诗、散文	〔墨西哥〕奥·帕斯(1914—　)	1990	朱景冬
七月的人民	小说	〔南非〕纳丁·戈迪默(女,1923—　)	1991	莫雅平

* 1914、1918、1935、1940、1941、1942、1943 年因战事未授奖。